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It depicts misty, layered mountains with sharp peak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tall, slender pine trees with dark foliage.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atmospheric,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皇叔載濤

郑怀义 张建设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叔载涛 / 郑怀义等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1

ISBN 7-5075-1291-6

I. 皇... II. 郑... III. 载涛—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18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开本 11.75 印张 27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帝王之家	(1)
父贵四朝	(1)
母掌王府	(5)
二兄称帝	(10)
幼侄登极	(14)
五兄摄政	(17)
六兄治军	(23)
 显赫王爷	(28)
三府宠儿	(28)
骑术精深	(32)
爱车成癖	(36)
烹饪里手	(38)
兴趣广泛	(41)
 京城“龙票”	(46)
京戏行家	(46)
太后指师	(48)
武戏专精	(51)
巧育“猴王”	(53)



执掌禁旅	(55)
贵胄习武	(55)
欧洲学军	(58)
保卫宫禁	(60)
临危受命	(64)
改革营制	(67)
抵制立宪	(70)
编练校阅	(73)
除袁未成	(75)
辅佐溥仪	(81)
择定帝师	(81)
张勋复辟	(86)
为嫂治丧	(89)
承办大婚	(92)
阻侄出洋	(97)
照料后妃	(99)
深宫救火	(103)
遣散太监	(106)
运宝出宫	(110)
继任宗令	(112)
生产自救	(115)
经营两陵	(119)
巧治奕劻	(121)
开放禁苑	(124)
苦心周旋	(126)
叔侄反目	(131)
龙颜盛怒	(134)
天津避难	(136)

“静园”不静	(141)
祝节“万寿”	(145)
无故受斥	(148)
平淡天真	(152)
三拒出山	(152)
治家理财	(154)
变卖“破烂”	(156)
移居马厰	(159)
枯木逢春	(165)
助侄办学	(165)
策婿起义	(169)
人大代表	(174)
主席关怀	(177)
国庆观礼	(179)
和睦家庭	(180)
男女平等	(184)
军旅新篇	(186)
马政顾问	(186)
抚今思昔	(188)
东北扬鞭	(190)
祁连并辔	(193)
情深谊长	(194)
参政议政	(198)
庄严议席	(198)
加入民革	(200)





会见战犯	(201)
满族首领	(205)
“冤家”重逢	(209)
痴情爱国	(213)
视察各地	(217)

皇族“族长”	(219)
手足情深	(219)
抚顺会亲	(229)
家族团聚	(237)
教育子侄	(245)
邀嵯峨浩	(248)
再主“大婚”	(254)
欢度“五·一”	(259)
精心照料	(263)

幸福晚年	(268)
总理会见	(268)
宫廷忆著	(270)
助出“奇书”	(274)
满堂高朋	(279)
宫苑重游	(284)
“故事大王”	(291)
政协献戏	(297)
“文革”风雨	(300)
渴望统一	(302)
光荣归宿	(308)

载涛家系简表	(310)

附录

原《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后记(一九八九年版)	(311)
清末贵族之生活	载 涛 恽宝惠(313)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 涛(340)
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	载 涛(344)
清代官员品级简表	(349)
载涛年谱	(355)
清代中央机关简介	(360)
后记(一九九一年版)	(363)
附记(一九九六年版)	(365)
朱家溍先生的《有关载涛种种》	(366)
溥杰先生的修改意见	(367)
增订附记(二〇〇〇年版)	(368)



帝王之家

父贵四朝

爱新觉罗·载涛，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五月三日，诞生在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这座古老而著名的王府，是一座威严而豪华的府邸，世代居住着一个显赫而特殊的家族。

作为道光皇帝旻宁之孙，醇亲王奕譞之子，咸丰皇帝奕訢之侄，同治皇帝载淳之堂弟，光绪皇帝载湉之胞弟，宣统皇帝溥仪之叔，载涛在其一生中，充满了曲折的、戏剧性的色彩。

“爱新觉罗”是满族姓氏的译音，其内涵是“女真金朝的遗族”。作为我国古代女真人的后裔，爱新觉罗家族以其强悍和武功而著称，借助农、牧、渔、猎等各业的迅速发展，于一一一五年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金王朝。

金王朝在会宁建立都城，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的地方，领土广阔，资源丰富，兵强马壮。经不断扩充，曾一度占领黄河流域和淮北大部，给南宋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金王朝延续了九代，共计一百一十九年，到一二三四年以后，逐渐为新崛起的蒙古所灭，但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在顽强地发展着。

一六一六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重新统一分散的女真各部并快速向西南侵犯，很快成为中国东北部最强大的家族。一六三五年，夺取汗位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将旧“女真”的族名正式改为“满洲”。从此，这个民族习惯地被称为“满族”。

一六三六年，正式登上皇位的皇太极，将“后金”的国号称为



“清”，进一步发展国力和军力，不断发动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一六六四年，爱新觉罗·福临亲率清兵突入山海关，定都北京，入据中原，进而统一了全中国。爱新觉罗家族从此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显赫家族。

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在当时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中，福临（顺治帝）借鉴了明王朝灭亡的教训，重视汉文化，不断启用汉官，限制满洲新贵，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封汉民喜爱的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还注重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凡有灾害的地方，多次减免税赋，减轻人民负担。福临亲政十一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清朝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爱新觉罗家族，相继繁衍了十代皇帝。与载涛，这位末代皇帝宣统的皇叔有关的就有五代帝王，即祖父道光皇帝旻宁，二伯父咸丰皇帝奕訢，堂兄同治皇帝载淳，二哥光绪皇帝载湉，侄子宣统皇帝溥仪。载涛的五哥载沣，又是宣统朝的监国摄政王。载涛就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五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帝王之家。

载涛之父醇亲王奕譞原有七个儿子，三个早丧，余下的四个，即二子载湉（光绪皇帝）、五子载沣、六子载洵、七子载涛。

爱新觉罗·奕譞，在清廷皇族家室中是位颇有来头的亲王。父亲的身份，对于载涛在后来能够著赏穿亲王补服，也是不无关系的。

奕譞，字朴庵，是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生。是道光皇帝诸子中，公认为一生最顺利的一个。他的生母马雅氏，曾封为琳贵妃，死后追封为庄顺皇贵妃。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一月，奕譞的四兄奕訢（咸丰皇帝）即位时，他被封为醇郡王。

载淳（同治皇帝）嗣位后，奕譞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加



封亲王衔，同治十一年晋封为醇亲王。他除了得到免宴见行叩拜礼和奏事免书名等等特殊的优待、礼遇之外，还先后被授予满洲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等许多显要官职，“命弘德殿行走，稽察（皇帝的）功课”，还负责筹办京师防务。从此，奕譞在爵位、文事、武备三个方面同时并进地全面提升，达到了人臣的极限。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去世，而皇太后慈禧宣布奕譞的次子载湉，弟继兄位入宫嗣位（即光绪皇帝），特下优诏赐奕譞以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并给予“免朝会行礼”，“有大政事备顾问”等一系列优遇。

这在大清国，可以说是极少颁赐的特权。本来亲王已是清朝最显贵的爵位，不可能再晋升了。但沿袭清朝旧例，父死子袭，要降爵位一等。因此，还可加以儿子袭位时不按祖制降爵的颁赐。

这种特殊恩宠称为“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而奕譞就荣幸地得到了这种少有的特大恩赐。死后又谥为“贤”，这就是后人所习惯称为的“醇贤亲王”。

奕譞备受“恩典”，是“奉旨”与受到咸丰帝宠爱的懿贵妃——慈禧，即后来的西太后之妹成亲之后。在封建专制时代，这种血缘裙带关系对奕譞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一年）宫廷政变中，奕譞便一头扎在西太后一边。

作为新皇帝载淳的叔叔和姨父，年轻而好强的奕譞，坚定地站在妻姐和嫂子的立场上，亲赴半壁店擒拿护送“梓宫”返京的肃顺，为西太后肃清政敌并垂帘听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奕譞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成为西太后班底的一大砥柱。

奕譞加封亲王“世袭罔替”，这在清制二百余年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衰微而多难的晚清时期，奕譞未曾失宠，恩典有增无减，实在是个奇迹。他平生为人处事颇为注意，态度谦和，



遇事退让,处处谨慎小心。

尤其是在慈禧和光绪的多年反目中,在帝后两党生死相搏的复杂政局中,他既能与慈禧的亲信荣禄等人诗酒往来,以至成为亲戚(慈禧指婚,五子载沣娶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福晋),同时又与光绪方面的翁同龢等人保持着以文会友式的联系,始终一帆风顺,未遭猜忌贬谪。

奕譞恰到中年,身经多朝,富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宫廷经验。特别是儿子当了皇帝之后,出于对妻姐慈禧为人的了解,深知儿子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有如进了虎口,搞不好还会祸及全家。

于是,奕譞采取了弃“权”而避“祸”的措施,远离政治,充分显示了他的精明过人。儿子当皇帝了,他倒决心赋闲了,怕的是同慈禧发生矛盾。他当时惟一做的事,就是照料陵园。因而,甚得慈禧满意。

奕譞自撰有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自知保,俭使俭用也过了。”以此告诫子孙,勿因贪财而招灾惹祸。

说来有趣,奕譞为时时提醒自己并告诫子孙,还让人仿制了一只周代欹器,陈放在宝翰书堂的条案上。把水放进一半,这只欹器便保持平衡而不会倾溢;如果把水放满,它会倾倒过来,将水全部流掉。奕譞还在上面亲笔写了铭文:“月盈则昃”、“满招损,谦受益”,以策励自己和子孙戒满戒盈。

奕譞在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表现自己的忠诚和谦恭。他时时刻刻谨慎小心,为人处世态度谦抑,即使在慈禧和光绪多年反目之中,在帝、后两党尖锐而复杂的争斗中,也能够保全自身,实为不易。

在醇王府内,多处可见他亲笔撰写的“恩波亭”匾额和“福祿



重重增福祿，恩光輩輩受恩光”的对联。对于“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奕譞曾再三力辞。尽管慈禧赐他可乘用杏黄轿，他却始终未敢乘用过一次。

聪明而勤于心计的奕譞，对于慈禧的特殊恩赐，不仅采取了自动罢退的举动，而且进一步上书朝廷，防止有人借此给他以更大的尊崇。

例如光绪登极那年，他曾秘密上书慈禧，援引明朝事例，说“将来如有人给他醇亲王多加尊崇，就应把倡议者视为小人”。果然，后来有一个想拍马屁、搞投机的官员上书，奏请尊醇亲王为“皇帝生本父”的尊号。因此触了慈禧大忌，立即被罢职赶回原籍。就是这样，奕譞巧于周旋，不仅使慈禧对他放心，而且使一般王公大臣也没有算计他的借口。

他平日说话、为人、处事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些后人看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过分做作，当时却在慈禧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颇得慈禧的赞许。奕譞也因此平安无事，而且一升再升，福上加福。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奕譞病逝，丧葬准用皇帝之礼。末代皇帝溥仪登极后，改定他的称号为“皇帝本生祖考醇贤亲王”，被礼葬于北京西郊妙峰山。

载涛对阿玛（满语父亲）的治家格言极为崇尚。他不仅自己熟读牢记，身体力行，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孙也都要按照去做。令人惊奇的是，载涛的孙子毓崑，至今仍一字不差的背诵奕譞治家格言的全文。

载涛的平生谨慎、为人正直、待人谦恭的性格，无不深深地刻上了他父亲性格的烙印。

母掌王府

载涛的生母是刘佳氏。她是奕譞的二侧福晋，与一般贵族



主妇不同,精力过人,乐于持家,实际上是醇亲王府的当家人。特别是奕譞于一八九〇年去世以后,他的嫡福晋,即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也在一八九六年去世,她从而成为王府中最为尊贵的长辈。但是,刘佳氏又与当时几乎所有贵族主妇的毛病一样,工于心计而又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好管家而又管不好,特别是在复杂多变、日趋没落的历史演变中,更是根本不可能管理好一座偌大王府的。

管理佣人 昔日醇王府,在京城各王府中,各种编制以庞大而著称。府内设有长史、管事官、庄园处、回事处、随侍处、司房、祠堂、厨房、茶房、更房、马圈、裁缝铺、轿夫、太监、妇差、丫环等近二十个机构,佣人多达三百余人。

以更房为例,刘佳氏为便于管理,首先明确了职责和分工,开始将更夫分为东、西两组,隔日轮流值夜、巡更;清晨,还要负责打扫内、外庭院。进入民国以后,更夫每夜巡更,一边照例敲梆子,一边要按着规定的线路不断巡逻。

后来又有所改进,将梆子改换成木棍,一边巡逻,一边用木棍敲墙。美其名曰:木棍可以做更夫自己护身的武器,而且还可以防止更夫犯困偷睡。

再说马圈管理,更为有趣。以前醇王府有东、西两个马圈。东马圈主要负责饲养骑乘的马匹以及出门乘坐的旧式骡拉轿车。西马圈则负责马车、汽车的管理、维护和驾驶。说来好笑,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东马圈里常年养着一只猴子。为什么养猴呢?府里人解释道,大概是《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曾在天宫中当过“弼马温”,而又与“避马瘟”为谐音,所以在马圈内养猴子可以避免马匹闹瘟疫。

醇亲王府当年由太平湖畔向后海北沿搬迁的时候,正值奕譞刚去世,承袭醇亲王爵位的载沣少不更事,因而主持大局的又是刘佳氏。她规划不周,疏于管理,可给一些中饱私囊的人捞到了机会,一路搬迁,成为一路偷盗。因搬迁物品雇用马车拉运,



路途又远,沿途无人监守,往往出现一车东西从旧醇王府拉到新醇王府就仅剩半车东西了。载涛诸兄弟,很早受教育,也很爱读书,对于家藏的史书册目,是很了解的。可迁入新居后,书房藏书反而比以前少多了,其中惟一的一部元版书《宋史》,竟不翼而飞,令人痛惜不已。其他物品,对照以前醇王府珍藏目录,也丢失不少。

由于刘佳氏持家无力,管理不善,以至王府中曾有“闹鬼”之说。巡逻的更人反映,夜静更深,总听到神殿附近有人说话的声音,走近一看却又不见人影,吓得无人敢从这里走。而且,这种现象往往多发生在秋天。后来,社会上抓住一个盗贼,才将谜底揭穿。原来,他与府中佣人勾结,借秋凉之机在王府偷盗多年,从而使“闹鬼”之说大白于世。因为秋天气候不冷不热,树叶摇动飒飒作响,正好可以掩盖砸门撬锁的声音。

掌管钱财 刘佳氏掌管着王府的财政大权,所有开支,均由她一手负责。进入民国,按照当时政府对皇室的优待条件,醇王府每年可领到四万多两岁俸。这可是一笔大数目,刘佳氏自然更不敢轻视。但是,府内开支与日俱增,又无其他经济来源,加之社会动荡不安,物价飞涨,日子越过越艰难。刘佳氏望着管事、账房先生报来的一张张账单,却常常无力付款,不免泪眼汪汪。无奈之下,刘佳氏和当时绝大多数没落清室贵族一样,开始陆续变卖家藏古玩珠宝及部分房产、田产,以维持家计。

正常开支尚难以为继,刘佳氏又偏偏碰上了一个花钱似流水的恶儿媳。这就是儿子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她是清末重臣荣禄的女儿,经慈禧指婚与载沣成亲。她素来娇生惯养,奢侈之极,号称“花钱狂”。依仗着这个背景,她从未把婆婆放在眼里,一想花钱就向刘佳氏要,要多少就得给多少,少给一点就大吵大闹。刘佳氏少给不行,不给更不行,久而久之,家中储蓄及王府岁俸竟被瓜尔佳氏讨要一空。

那么,瓜尔佳氏到底是如何挥霍这笔巨额钱财的呢?据后



来了解内情的载涛说,她将其中一小部分钱用于自己享用外,绝大部分都用在了企图复辟清王室的政治活动上。她经常会见并拉拢父亲荣禄的老部下以及有政治野心的遗老遗少,馈赠他们大把大把的钱财。特别是对那些在民国时又掌握军权的人,像原荣禄旧部后又当上民国步兵统领衙门总兵的袁得亮等人,不仅馈赠大量银两,而且还给不少珍贵首饰。到后来,她甚至把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陪嫁也变卖了。

刘佳氏对瓜尔佳氏挥霍无度以及毫无效用的复辟活动,十分反感,并设想很多办法加以对付。例如,限制她的用钱额度,与她在财物上分家等等,但都作用不大。后来,在载涛的建议下,她开始给儿子施加压力,让载沣管教、制约瓜尔佳氏。她说:“男人是搂钱耙,女人是装钱匣;不怕耙掉齿,就怕匣漏底。”开始果然有效,载沣为了表示自己的重视和愤怒,竟一反常态,摔碎了卧室中的瓷瓶,以后又摔碎了第二只、第三只……摔多了,瓜尔佳氏反倒不怕了。载沣也觉得可惜,又让人准备了一些经摔的瓶瓶罐罐放在房中,以便“镇”住瓜尔佳氏,但她很快识破了载沣的小把戏,依然花钱似流水。

管理伙食 醇王府每天精肴美饌,千奇百样。有时虽算不得上乘,但总还算丰盛。载涛曾介绍过,刘佳氏对饮食要求不高,在吃的方面,似乎有鱼有肉就足够了。但是,一向吃惯美味佳肴的瓜尔佳氏就不干了,开始“造反”。她第一次打破王府相传多年的惯例,以吃不惯王府大厨为名,另雇来几名手艺高超的厨师,在戏台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悄悄搞起了自己专用的小厨房。当然,这种“越轨”行为理所应当当地遭到了刘佳氏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是对祖宗的不孝。可瓜尔佳氏也有对策,她每天餐前必亲自送去几样精美菜肴,恭恭敬敬地“请婆婆品尝”,使得刘佳氏渐渐没了脾气。看来,醇王府大厨房的饭菜也的确做得一般,最后连刘佳氏也接受了瓜尔佳氏小厨房的菜肴。

王府后期,也出现了经济危机。市面价格一日三变,人多开



销多,生活先要糊口,糊口就要有钱。应付眼前一日三餐,毫无经济来源的刘佳氏,惟一的办法就是变卖王府中的旧物。开始,一星期卖一次旧物就足够了。后来改为一星期卖两次,但后来发展到卖两次仍入不敷出。

刘佳氏大怒,下令彻底清查,才发现管事串通几个下人,运出并变卖了比售物单更多、更好的物品,而且将所卖钱款大部据为己有。难怪王府旧物越卖越少,越卖越不够用。对于佣人如此勾结,明目张胆地盗卖府中财物,刘佳氏毫无办法,也只是辞退了几个当事人了事,以至于王府的盗窃风,渐渐兴起,愈演愈烈。

教育子女 刘佳氏受到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自小享受全面的教育,识书达理。同时,她对子女们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家中的孩子,特别是她亲生的载沣、载洵、载涛三兄弟,从小就安排老师,实行了严格的教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孙儿辈,她也倾尽全力,关怀照料,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影响。

尤其是溥仪,他一生下来,就归祖母刘佳氏亲自抚养,一向疼爱有加。听乳母说过,她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溥仪是否睡得踏实。她来的时候,甚至连鞋都不穿,生怕木底鞋的响声吵醒了孩子。因此,溥仪对祖母有着很深的感情。

溥仪称帝后,曾一度与端康太妃关系紧张,得益于刘佳氏软硬兼施,大力排解。端康原是光绪贵妃,在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她便晋升为皇贵妃,而且照规矩成为溥仪的首席母亲。她对清室十分忠诚,清帝退位之后,仍然有着强烈的复辟愿望。按理,溥仪因这些关系,应该对端康太妃更恭敬才对,可事实恰恰相反。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讨厌端康太妃对他的严厉管教,极力想摆脱她对自己的限制。原来,溥仪十七岁那年,出于好奇,他穿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佩上军刀和皮带,帽子上还插着一个高高的白翎子。端康闻讯赶来,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说罢将随侍溥仪的太监,责打了二百大板,罚到打扫处充当苦役。从此,溥仪恨透



了端康太妃。

后来，端康太妃擅自辞退了溥仪身边一位叫范一梅的大夫，从而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也正好为溥仪提供了向她发泄不满的机会。溥仪急冲冲地跑到端康太妃面前，顾不得什么礼仪，大声嚷道：“你太专擅了！我还是不是皇帝？我说话算数还是你说话算数？”

端康太妃从未受过别人的气，更别说受到溥仪如此蛮横的质问，气得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事后，她立即宣溥仪的祖母刘佳氏和母亲瓜尔佳氏入宫，又哭又嚷，让她们教训溥仪。果然，刘佳氏被“镇”住了，吓得直哭，最后竟跪下来恳请她息怒，答应一定让溥仪认错赔礼。溥仪是尊重祖母的，更经不住刘佳氏一会儿好言相劝，一会儿严词教训，复加流着眼泪，苦苦哀劝，终于说得溥仪回心转意，还向端康太妃当面认错赔罪。但刘佳氏心里仍然不好受，觉得对不起端康太妃，又难以管好孙儿，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心情十分复杂。

而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受到端康太妃的无理训斥，非常想不开。这位绞尽脑汁，连做梦都想复辟的女狂人，在复辟声浪中苦苦拼搏了十年，钱财搭了无其数，但结果，复辟仍不见成效。这次又与端康太后闹翻，更感到前景暗淡，复辟无望，于是吞食鸦片，自杀而亡。临死留给溥杰的遗书中，她仍念念不忘复辟，可怜、可悲到了极点！

就是这样，刘佳氏以一女流之辈，在风雨飘摇的动乱时期，支撑着每况愈下的醇亲王府，以其特有的方式，维系着家人的生存和安全。

二兄称帝

载涛对四岁就被清廷矛盾的旋涡卷上皇帝宝座的二哥载湉，非常敬佩。他更敬佩哥哥身居宫禁，但不贪安逸，力主变法



维新的革新精神；尤其对他哥哥一生的悲惨结局，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五日，做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同治虽为慈禧亲生，但母子不和，由来已久。同治开始年幼，不能处理朝廷大事，慈禧便参与听政，裁决国事，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随着同治长大，矛盾便发生了。慈禧喜欢侍郎凤秀的女儿，想让她做同治的皇后。而同治却喜欢侍郎崇绮的女儿，在慈安太后的支持下，最后迎为皇后。慈禧为此十分恼怒，开始嫉恨同治。同治到了十八岁，可以亲政了。慈禧表面上同意归政，实际上仍然抓住朝廷大权不放。她还干涉帝后的婚姻生活，派人监视，甚至不准他们接触。

载涛曾向家人介绍，过去人们常说同治是因为染上了花柳病不治而死的，实际上是患了天花。因在病中受到刺激，发生“痘内陷”的病变，以至抢救无术而亡。原来，皇后去同治病床前探视，忍不住哭诉了婆婆经常无端责骂她的事情。同治劝她强忍，将来会有出头之日。接到密报，慈禧怒气冲冲闯进养心殿，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甚至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很快就死去了。

同治帝死时年仅十九岁。慈禧丝毫不为其子早逝而痛心，她为了重掌操纵朝政的“可倚”之托，宣布以奕譞之子载湫“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以至当时深知宫廷争斗复杂而尖锐的奕譞，竟吓得魂不附体，当场“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奕譞以极大的不安与惊恐，面对着意外飞来的“洪福”。他历经咸丰、同治两朝，富有政治经验。对于妻姐慈禧的为人，他了解得愈来愈深透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只不过当了个名义上的皇帝，实际是进入了危险可怕的虎口，随时都可能丧生，甚至会祸及全家。

当时，光绪帝年幼，实际上是慈禧独掌朝廷大权。她有野心，懂权术，为专权，对资本主义列强一直采取妥协、投降的方



针。光绪十年,法国为了占领中国的东南地区,率军进入福建马尾军港,发动了“中法战争”。李鸿章奉慈禧之命,一味求和,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慈禧丝毫不把战争胜败当回事,生活照样奢侈、豪华。她一顿正餐要摆一百多个菜,仅金银餐具就重达一万五千八百两。慈禧六十岁生日时,倾尽全力大修颐和园,还专门定做衣服一百三十五套,耗银三万八千两。而正是这一年,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缺乏装备、给养支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签订了卖国求荣的《马关条约》。按规定,清政府把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银二亿两,开放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从此,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

在充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封建宫廷中,载湫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矛盾性格,而且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无不体现了这一突出的特点。特别在他亲政以后所面临的重大中外战争中,都站在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一边。

他曾亲自颁布诏谕表示:“君臣上下,艰苦一心,痛除积弊,力求兴革,勿生懈怠,以求自强。”一八九八年春夏之际,国内外形势已十分严重。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救亡运动也形成燎原之势。年轻的光绪皇帝要冲破阻力,决定变法了。他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对一向望而生畏的慈禧太后,公开摊牌要权,以彻底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变法救亡运动付诸实施。当甲午中日战后,国势垂危之秋,他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推进立宪政治,并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将中国引向近代发展的蓝图。

变法维新是光绪一生中最为显赫的功绩。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向中外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次被称为著名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先后发布有关改革的诏令达一百八十条之多,平均每日一点



七条,体现了他“深观时变,力图自强”的急迫心情。

革新建议和图强要求迅猛冲击着死气沉沉的清王朝。通观光绪颁布的诏令,其主要内容是: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参与新政;发展近代教育,培养新人,实力振兴;改革行政规则,裁减机构、冗员,整顿吏治,严斥墨守陈章;鼓励上书言事,广开言路,勇于进言;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游学,勤求治理;振兴近代工、农、商业及交通事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陆、海军,以期富国强兵。

为确保维新成功,光绪连续三次召见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大加赏赐,任其为兵部侍郎,“以兵卫圣躬”。但善于投机的袁世凯,看透了新旧势力斗争的格局,不肯为走投无路的光绪铤而走险,将密谕及“详细情备述”出卖给荣禄,终于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

慈禧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光绪秘密看押起来。然后按照预定的计谋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谕宣布,重由西太后“训政”。然后又颁发上谕,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按律问罪”,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在处于步步深入的关键时刻被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

光绪被押到中南海的瀛台囚禁起来,他为革新朝政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从此,光绪不仅在政治上的抱负受到横暴的摧残,在人身和生活上也备受凌辱,身陷囹圄,惨不堪言。缠绵于无限凄凉忧伤之中的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

慈禧扼杀了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同时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同法、俄等十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总计达九亿八千万两。北京和山海关之间的战略要地,外国可以驻兵;北京至大沽之间的炮台,一律削平。在北京设立使馆区,外国可自设军队,华人不准居住。从而不仅保证了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

大肆掠夺中国,而且也实现了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

光绪恨透了袁世凯。载涛和他的五哥摄政王载沣心里也埋下了对袁世凯的深仇大恨。他们兄弟下定决心,要千方百计除掉袁世凯,为二哥报仇雪耻。

幼侄登极

溥仪是载涛五哥载沣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月,长于心计的慈禧在她七十四岁生命垂危时,突然破例宣布“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

人们心里都明白,慈禧之所以立幼儿溥仪为储,还是想继续作为皇太后而长期垂帘听政,执掌清廷大权。深得其中奥秘的载沣,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慈禧的宣布,好似当年其父奕譞听到慈禧宣布载湫去当皇帝一样,惊吓得如呆人一样。但一旦清醒过来,立即伏在地上连连叩头,“叩辞圣再”。他认为,国家处于多难之秋,应立长君为好。而内心里,他的二哥载沣名为皇帝实为囚徒的下场,实在令他寒心,他怎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再去当光绪第二呢?

清朝皇室规定,如果皇帝无嗣应从近支晚辈中选立皇太子。因此,载沣死后,首先要挑选溥字辈的后人。而慈禧为此则自然升为太皇太后,不能再垂帘听政了。所以,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沣要来做儿子。当时,有位名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名,据理力争,也未能使她回心转意。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她用两宫皇太后的名义,对跪地请求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俩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的,我们姐俩也不愿意。”

载涛自然明白,按照祖制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哥哥载沣痛哭昏迷,还是御史“尸谏”,都是徒劳无用的。

然而,慈禧丝毫不退一步。这是她的最后决定,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她用特有的口气吩咐载沣，务必将溥仪当日送进皇宫，交皇后严加管教。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继续独揽大权、作威作福的私欲，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又一次搬出了其惯用的册立幼君的手法。

这场政治儿戏的结局是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其父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继而接替慈禧成为大清国的实际统治者。事实上，这并未挽救大清国的灭亡，反而加速了其死亡的进程。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慈禧病亡。

溥仪登极大典时，才只三岁。按照清朝祖制惯例，作为大清国的第十代皇帝，溥仪要在正式的大典中，坐在那至高无上的龙椅之上。当时正是滴水成冰、北风凛冽的寒冬腊月，一个小孩子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感到的只是无比的寒冷、恐惧和孤独，面对跪在下面的一大群老头子，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他害怕得哭哭啼啼，闹个不停。不断嚷道：“我要回家，我不在这！我要回家，我不在这！”

负责照顾溥仪的载沣，侧身单膝跪在宝座的下边，双手扶着孩子，不让他乱动。而面对群臣不断的三跪九叩，溥仪越来越怕，越来越烦，哭闹得更厉害了。载沣无力招架，尽管天气严寒，仍然满头大汗。载沣为劝阻幼子哭闹，连声不断地说：“快别哭，这就快……好了！”

这些话后来被传说成不吉利的“快完了”。当时，不仅在宫中引起议论，民间百姓中也纷纷传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果然，溥仪当皇帝不到三年，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隆裕皇太后不得不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代表小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

溥仪在退位后的一段时间里，按照中华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照旧居住在紫禁城，原封不动地过着奢侈豪华的帝王生活。在此期间，载涛作为清末重臣，又是皇上的亲叔，为照顾小皇帝，真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他为溥仪精心挑选了老师，



还亲自送儿子溥佳入宫伴读。他关心溥仪的生活,也关心溥仪能否坐稳紫禁城的宝座。载涛在封建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是从他的侄子溥仪登极称帝开始,也是在这个宣统时代达到了顶峰。

辛亥革命以后,溥仪作为宣统帝退位。在当时神州大地盛赞共和的情况下,紫禁城内却依然对他山呼万岁,顶礼膜拜。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日益增生着强烈的惟我独尊意识和复辟愿望。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发动丁巳复辟,拥戴溥仪就位听政。

但是,在讨逆军的枪炮声中,短命的复辟闹剧很快破产了。而过了几天皇帝瘾的溥仪,却颇为动心,光复大清的愿望愈来愈强烈。

特别是在一九二八年,发生了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溥仪受到的刺激比当时被驱出紫禁城还严重。他摆案设灵,每日三祭,痛哭流涕。面对络绎参拜的遗老遗少们,他表示:“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并发出誓言:“有我在,大清就不会灭亡!”

日本侵略者觊觎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而溥仪却满怀着借助外国力量实现复辟的梦想,被日本人弄到了生拼硬凑的“满洲国”。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载涛却开始同他这个侄子在政治上分野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仪执政一年之后,正式就任“满洲帝国”皇帝,举行登极大典。北京的宗室觉罗以及前内务府官员差不多都赶到东北来,大行三跪九叩礼,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却惟独没有见到载涛的影子。

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当了十四年伪满洲国的儿皇帝。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后期。欧洲战场,德、日、意轴心国的德、意两国已战败。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已逼近日本本土,原子弹轰炸了广岛和长崎。八月八日,苏联突然对日宣战,苏联红军长驱直入伪满洲国。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



仪也随之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他一生中三次当皇帝的特殊经历。

五兄摄政

载涛对他少年袭王、青年摄政的五哥载沣，有着非同一般的评价：“他遇事优柔寡断，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纵观载沣的一生，不能不说载涛的这个评价是十分贴切的。

载沣，字亦云，生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正月初五，是第二代醇亲王。他自幼精明，青云直上。两岁时，被封辅国公；六岁，晋封为镇国公；七岁，承袭醇亲王；十一岁，“赏戴三眼花翎”；十七岁，命在内廷行走；十八岁，历任阅兵大臣、正蓝旗总旗长、都统；二十岁，任随扈大臣；二十三岁，任正红旗满洲都统；二十四岁，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二十五岁，任军机大臣，后又任监国摄政王，实际上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载沣受父亲影响颇深，老实厚道，做事谨慎，自小养成了一种退让、谦和、好逸畏事的性格。他中等身材，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好。他不善言辞，对政治一向淡漠。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情，表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将白居易的诗书写在团扇上：“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和载涛一样，载沣也是少年进入朝廷专为皇族子弟开办的“贵胄学堂”，接受过较为全面、系统的教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颇为难能可贵的。说来奇怪，他最感兴趣的竟然是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家族中也是公认的。他收集了不少天文学的书籍，进行了不少独到的研究，常常说出惊人的见解。他把日食、月食的发生详细记入日记，并附有工笔的图形，同时写下自己的分析和研究。心情好的时候，他还兴致勃勃地带领孩子们观看日食或月食，用蜡烛熏黑玻璃片，作为观测工具。夏夜乘凉的时候，



他一边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教他们指认星座。

载沅自诩是一个懂得点科学的新派人物，有时也能够较快地接受一些新鲜事物。他是王府中最先安电话、穿西服的人，也是皇族中最早剪掉辫子的人。他还最先买了一辆汽车，自己悄悄地乘坐，开始甚至连家人都不许乘坐。以致他的开通，成为皇族更年轻一派企图改变旧生活的借口。他的新派做法传入宫内，溥仪也要安装电话，受到太妃的强烈反对。溥仪无奈，最后请出载沅，以北府（载沅王府）早已安装电话为由，才最终遂了心愿。

同时，载沅又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思想和生活方式又是古板守旧的。比如，他不信西医，有时连中医也不信。得病之后，从不吃药，医生给的药，甚至连溥仪寄来的珍贵药品，他都让家人扔掉。晚年患糖尿病，医生严禁食糖，但他照吃不误，根本不听医嘱。

光绪二十七年，载沅奉慈禧懿旨，作为专使赴德“谢罪”，以平息和了结爱国军民枪杀德国公使的所谓“克林德事件”。在“罕见的冷淡气氛下”，他感到难以言状的压抑，尽管严辞拒绝了向德皇行跪叩之礼的无理要求，但这种令中国人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已经留在了德国皇宫内，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可悲而又可耻的一幕。

载涛当时曾与六哥载洵，陪同载沅到天津塘沽，送他登上开平矿务局的安平轮，才又重回北京。事后，他曾向后人讲述了这段屈辱而难忘的历史。

中国的跪拜之礼，起源于古代席地而坐、亲友相见的习惯，对跪拜者本无屈辱之意。发展到后来，亲友相见便不再跪拜，但对皇帝仍要行跪拜大礼。因为中国的皇帝已被神化，贵为“天子”，集人神于一身，对他跪拜便是自然的事了。而外国却没有这种习惯，认为跪拜是一种污辱。为避免争端，清王朝便与外国公使议定，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免去跪拜虚文，而中国使节出使外国也不屈膝下拜。因此，载沅认为这是明显违背中外交



往的惯例,不仅是对中国使臣的污辱,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他明确表示了使臣本人的态度,说:“宁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后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德皇室不得不被迫取消了无理要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压迫,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不敢说个“不”字。而载沣能对德国皇帝抗拒跪拜,并能坚持下来,对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对此,中外报纸在报道中,颇多赞赏。说载沣不避“重洋多阻”、“风波险恶而使于西方”,“仍寓保全国体之意”。甚至还:“王之此行中外邦交所系,为中国维新所关。”更有人把对载沣的赞颂推向了巅峰:“驾海天潢第一人,从今一代撑天柱”。“醇亲王诚中国之贤王也哉!”几乎把载沣的出国道歉,誉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了!

载沣的婚事,也是慈禧老谋深算、玩弄权术的结果。为了达到一举笼络和控制两个显贵家族的目的,她不惜撕毁载沣原定的婚约,令他同当时称作“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的大臣荣禄的女儿结亲。

原来载沣生母刘佳氏早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那个出自满洲的少女,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与全家满门自尽了。后刘佳氏又亲自主持,为其子选择了第二门亲事。双方很满意,放了“大定”,只待吉日迎娶过门了。然而,无视常理的慈禧,却武断地下令他们断了这门婚事。刘佳氏对此敢怒不敢言,最后气得精神失常。载沣本人也不满意,但也不敢抗旨,只得忍气接受。这一政治上的联姻,注定载沣的婚后生活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荣禄当时是慈禧的心腹重臣,说一不二,早年曾因贪污受贿,被革职驱出北京。但惯以投机、攀附为己任的他,借进京为慈禧祝寿之机,先钻营到专办财事的奕訢身边,花言巧语,得到



信任。后又用大把银子买通了总管太监李莲英，最终讨得了慈禧的欢心。于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几年便升至兵部尚书。戊戌维新中，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告密：维新派准备乘慈禧和光绪阅兵之际发动兵谏，诛杀荣禄，拥戴光绪帝。他便星夜赶往颐和园，密报慈禧从而扼杀了戊戌维新。

载沅成婚那天，醇王府内，张灯结彩，鼓乐喧天，车马如流，人如潮涌。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纷纷前来祝贺、送礼。而载沅内心却心如死水，脸上无一丝笑容，拜天地，入洞房，行坐帐礼，经历了满族这些必备的结婚礼节，仍然没有换来他婚后生活的舒心。

封建专制国家，婚姻历来是统治阶级为巩固政权、世袭承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也不例外，慈禧更看重了这一点。而且，她恰恰看上了载沅处事谨慎的特点，把他视为能“令她放心的人”。

因此，在她年高多病的危难时刻，为防清帝国大权落到袁世凯手中，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月，三日内连下三条懿旨给载沅，先“授为摄政王”，又“例行公事俱由摄政王代行”，再“摄政醇亲王监国”，将朝廷大权交给了载沅。

载沅个人并无政治野心，但由于慈禧临终时玩弄的“策立幼主”的计谋，使他这个还不满二十六岁的年轻书生一下子登上了摄政王的宝座。为了国家，也为了家族、自身及儿子，他只能竭尽心力，挺身向前了。

自幼在王府成长的载沅，在宫禁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清廷内部错综复杂的争权斗争，感受颇深。他知道即便他并非自愿的登上了最高政治舞台，也会有谋害他的政敌出现，还会有人夺取溥仪的帝位。因此，他一方面谨慎小心，时时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全面展开法制的宣传，大力加强实力的控制，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护突然到手的大权。

载沅与袁世凯积怨已久。他摄政监国后，首先就是设法除掉袁世凯。他以德皇安排皇室子弟掌握军队大权的做法为榜



样,让六弟载洵出任海军大臣,七弟载涛当了训练禁卫军大臣、军咨大臣,他亲自掌握陆军,削弱了袁世凯在军队的势力。

然而,终因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惧怕袁在清廷内外的势力,迟迟未敢对袁下手。结果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导致袁世凯复出,载沣被迫交出兵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很快爬上了内阁总理的高位,逼迫隆裕皇太后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宣布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予政事”。

尽管如此,载沣仍不失为一个有头脑、识时务的人。当辛亥革命发生后,身为皇帝生父和监国摄政王、年仅二十八岁的载沣,曾主动表示辞去摄政王的职务。在隆裕皇太后主持的御前会议上,他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淡态度,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抵抗。不少清廷成员认为载沣断送了大清江山,把清朝的灭亡归罪于他。

历史上,对于载沣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载沣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胆小怕事的人。他一生平庸,未成大事,之所以当了摄政王,只不过是按照慈禧临终时错误的决定办事。在复杂和多变的国务、政局斗争中,他往往束手无策。

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更是一言不发。因此,特别是皇族中的一些人,认定他断送了清王朝,是一介无能书生,参与政治是一个悲剧。

同时不少人却认为载沣头脑清醒,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反面的不同意见,能够追随历史的进步,不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退位后,他一身轻松,毫不留恋摄政王的高官富贵。回家后,说从此可以和家人欢聚,安享天年。他在王府内写下了“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对联。当太妃及自己的福晋积极进行复辟活动时,他并未参与,只是安于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皇族旧臣中许多人借助外国力量谋求复辟,他则不以为然。特别是后来溥仪逃往东北,载沣认为凶多吉少,忧心忡忡。他阻挡不了儿子当伪满洲国“康德皇帝”,但却保证自己和家人



不再钻进外国人设立的阴谋圈套。

他的七弟载涛始终认为他的表现是十分明智的。特别是推翻清朝江山、首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十日，走进北京醇王府，专程拜访载沣，更对他备加称赞。

那是一天的午后，载沣早早来到门前，迎接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还是穿那一身中山装，在门前下车后，与载沣携手步入“宝翰堂”。这是一次非同一般的礼节性会见。主客依次坐定，主要是孙先生谈话，致以慰勉之意。他称赞载沣主动辞去摄政王，同意清室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血战，是明智之举，是爱国行为。特别是载沣当时正处于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更加难能可贵，在历史上实为罕见。

孙中山还说，他将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后，将接受全国铁路督办的任职，全心全意致力于国家建设，兴办铁路，实业救国。他们互相勉励，同心协力，共济实施。

离别时，孙中山向载沣赠送了一张照片，背后题写：醇亲王惠存，孙文敬赠。

载沣与孙中山的交往，还不止这一次。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在京逝世前，报纸曾有这样的报道：“目前清室醇亲王送燕筵一席，给酒一埕，给孙文洗尘。……并云极崇敬中山人格，盼望中山清恙早日告愈……认真整理中国，务使早偕富强之邦云。”

在载涛的记忆中，深深地留下了孙中山先生对载沣的直肠热语：

——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在二十八岁的青年时期，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把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二位，实为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

——载沣顺应历史潮流，追随时代前进，而不是阻挠历史前进，没有成为辛亥革命的罪人。判定一个人的是与非，主要看他行为的效果。

载涛事后曾向家人清清楚楚地作过介绍：载沣是主动向隆



裕皇太后缴还监国摄政王的印章,奏请退位。当时,他对复杂而激变的形势,已经完全无力控制了,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特别是在外交上,不拉拢外国人,是他一贯的作风。而袁世凯则一直同外国人勾结。各帝国主义列强要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因此目标自然集中到袁世凯身上。

所以,载沣已经明白,此时他仍留在摄政王的位子上,不但无力挽救大清王朝的灭亡,反而自己随时都有丧失身家性命的危险。基于各方面的原因,他终于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没有实权,也没有实际意义的最高位置。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载沣才真正变得清醒起来。正式辞职时,他作出了严厉的,甚至是苛刻的自责,没有开脱自己,更没有推卸责任于他人,最后竟否认了自己良好的主观动机,“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他这一对形势的认识,表明他对大清的前途已不再抱任何幻想。

历史对载沣作出了公正评价。在他的后半生中,包括他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地接受了中山先生谈话的影响。他经常深情地凝视着中山先生亲笔题字赠送的照片,向后人讲叙那难忘的会见……

六兄治军

载涛与五哥载沣、六哥载洵,一母同胞,均为奕譞侧福晋刘佳氏所生。他们一起在醇王府长大成人,亲密无间。特别是后来载沣承继了第二代醇亲王,载涛与长他两岁的六哥载洵接触更多,共同玩耍、学习和参政,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回忆和深情。

载洵于光绪十一年生于醇王府。他宽额大耳,长相喜人,得到了父亲的欢心和偏爱。在父亲的调教下,自幼精明的载洵,进步很快,吟诗作画,吹拉弹唱,门门精通,可谓多才多艺。其中,尤以书法见长,篆隶楷行草无所不能,令一些老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功力。载洵幼年曾为府内写过一些匾额,至今宋庆龄故居



内南楼和听雨屋两幅匾额，仍然保存完好。

和载涛一样，载洵自幼喜爱京戏，又在看戏中接受教诲。有一次，王府请来一个著名的戏班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载洵看到陈士美突然被捺在虎头铡下，一下子受到惊吓，跌坐在地上哇哇哭起来。此举惹怒了父亲奕诤，他当即喝斥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任吗？”原来，咸丰皇帝临终前，曾任命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肃顺为人凶狠残暴，结怨甚多，朝权抓到手后，更加专权跋扈，甚至对两宫太后不恭。慈禧大怒，与慈安商议，密谋除掉肃顺。她们设计召来恭亲王奕訢，安排好了在护送“梓宫”返京途中发动政变。奕訢就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中，奉密旨赶赴半壁店，亲手抓捕了肃顺，立下功勋，从此飞黄腾达。晋封为亲王之后，又加封“世袭罔替”，子子孙孙可世袭承继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

光绪二十八年，载洵十七岁时，奉慈禧旨意过继给瑞敏郡王奕志为嗣，并承袭贝勒。原来的承袭人是载漪，因参与义和团运动被清皇朝革职退继。他所居住的原瑞王府，早在庚子年间被八国联军侵占烧毁。所以，载洵闻知载洵承继奕志为嗣后，主动将原属于醇王府的适园，赠与弟弟为府，也就是后来的洵贝勒府。

载洵历来受母亲刘佳氏疼爱，自小在她怀里长大。正像漠贝子诗中所说：“避角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突然接到这个“懿旨”，一下子又少掉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不觉哭得死去活来。经过这次刺激，她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

母子情深，载洵深深关心着母亲的身体，不时来府探望，问寒问暖。一次，母亲不幸患上乳疮，久治不愈，连中医也失去了信心。经载洵反复建议，载洵请来当时京城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医生看过后，打算开刀诊治，却遭到载洵等人的强烈反对。无奈，只好采取敷药保守治疗的办法。说来好笑，敷药之前，医



生点燃酒精灯,准备消毒用具。却吓坏了一旁的载沣:“这是干什么?烧老太太?”看他如此外行,载洵在其身后对翻译摇头咧嘴,不让译给医生听。

几天后,载洵又上府探母,发现老太太病情竟无好转,不禁大怪。连忙找来药盒一看,原来载沣看不懂外文就吩咐下人一点也没给刘佳氏用药,气得载洵一阵大骂,连忙给母亲敷药,病情才慢慢好转。

载洵对父亲是十分尊崇的,尤其对父亲创建清朝新式海军,更是神往,立志子承父业。清廷接受奕譞建议,整顿海防,重建海军。这一重任,是他完成的。海军建成后,奕譞奉旨与李鸿章一起巡视海口。当时,慈禧派心腹大太监李莲英同行。一位御史闻知,以太监同行巡查不符祖制为由上奏慈禧。慈禧不悦,但又不能不“公事公办”。奕譞惯于察言观色,便全然否认此事,使御史变成了“诬奏”,“罢职丢官”。此时,奕譞为讨好慈禧,借重建海军之机,拔出部分经费,扩建了颐和园。

于是,载洵抓住时机,在载沣监国摄政之后,及时而明确地向哥哥提出了“皇族抓军权,一定要重建海军”的建议。深知军权对于巩固政权重要性的载沣,很快采取了集军权于一身的重大举措。其中,他下令把海军处从陆军分离出来,设置独立的“海军事务处”,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而战功卓著的海军名宿萨镇冰则排列其后。

然而,载洵只不过是养尊处优的贵族纨绔子弟,既不是行伍出身,又不懂军事,更从未认真学习过海军。他的兴趣和作为,只是以重建海军为由,四处巡查,吃喝玩乐,大幅度增加税收,变本加厉搜刮百姓民脂民膏,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据《清鉴纲目》等书记载:

“其弟载洵等诸亲贵/用事(当权),借口振兴海军,多事搜/括(刮),人民愁怨,载沣不能制。”

“载洵之贪心,令人难以想象。他曾奉命到奉天查案,



火车到了，却不肯下车。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关外虽是出产貂皮的地方，但一口气拿出三千套却是办不到的。而钦差大臣不下车，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吊胆承担责任。于是，他们派专人携巨款四处采买，勉强满足了载洵的要求。这是当时流传全国的一件大丑闻。”

载洵不满足在国内游玩，还要仿效五哥载沣出洋考察。于是，一九〇九年秋天，他终于以海军大臣的名义到欧洲各国考察海军。因其具有大清帝国的皇叔、监国摄政王之弟的高贵身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异国情调，豪华舒适，比起国内的陈旧习俗，令载洵更加兴奋不已。总之，对国外的衣、食、住、行，处处新鲜，样样满意，所到之处还不忘采买丰富多彩的洋货。另外，离别之际，外国人还大量馈赠精美的礼品，令载洵满意而归。

后来，载洵发现七弟载涛去了日本、美国，而自己却没去过，十分不甘，于是争取机会，于一九一〇年夏天，又一次出洋，专往日本、美国考察海军。兄弟二人同去一国，考察题目又都是军事，却要把陆、海军一分为二，你去你的，我看我的，全然不顾其他。其实说穿了，他们所谓的出洋考察，只不过满足了出洋游玩的瘾头，充其量不过参加一些应酬，看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因此，归国后，也不曾看到载洵在重建海军方面有多大建树。

武昌起义之后，载洵身为大臣，在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本应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却因不懂指挥，而退居二线。他只知道做官，高高在上，毫无作为，完全辜负了朝廷和他的兄长对他的重托，白吃了皇家二十多年的俸禄。

载洵在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上，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而且自始至终，坚持到底。起初，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者还很多，甚至摆出了拼命的姿态，对言和者充满了愤恨和抨击。但随着革命起义遍及全国，特别是袁世凯施展阴谋诡计，左右逢源，不仅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统掌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而且也取得

了民军、立宪派、外国使馆的好感,进而要求清室退位。

大势已去,主战者愈来愈少,最后只剩下包括载洵在内的四个人。他们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的仇杀,要对京城汉人进行报复。以良弼为首,成立了清皇族最顽固、最反动的“宗社党”,对革命党人采取暗杀和恐怖行动。载洵还提出了“以退为进,长期作战”的方略计划,主张“化整为零,王公分藩,分踞各地,顽强抵抗”。可惜无一人赞同!

退位后的载洵,赋闲在家,百无聊赖,生活日渐艰难。一九二八年,随载沣、载涛两家,一起到天津避难。闲来无事,与梨园界交往,说说唱唱,虚度时光。后来,他竟染上大烟瘾,身体也搞糟了,解放前夕死于天津寓所。



显赫王爷

三府宠儿

载涛在爱新觉罗家族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他在少年时代，曾连续两次过继，跳了三个家门，当过三家王府的后嗣，使这位青年王爷从小便有了显赫的名声。

作为奕譞的小儿子，载涛得到了父亲的宠爱和特殊的教育。载涛高贵的家族和身分，使他的爵位来得又快又高。三岁时，便赏给头品顶戴并赏戴花翎；同年，为示优异，又赏二等镇国将军；六岁时，便正式晋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为了载涛的成长，奕譞亲自安排和指导他的学习。按照清朝贵族子弟的习惯，载涛很小就开始读书。在博学通儒的教师指导下，他完成了烦琐的拜师礼节，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又开始读“四书”。

载涛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奕譞平时礼贤下士，对教师尤其尊敬。当时要升官发财，只有靠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得。贵族子弟天生就有了爵位，所以根本不认真读书。而载涛却在父亲的熏陶和教育下，接受教师的严格要求，自幼勤奋好学。他的国学和古文基础很好，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载涛的生母刘佳氏是奕譞的二侧福晋（满语，夫人之意）。她个子不高，胖胖圆圆的面容，性格十分和善，对家人和亲友也很有礼。只是平生胆子小，而自尊心又很强。年轻时，接触佛教，晚年更加笃信、虔诚。每日晨起第一件事，就是诵念一遍佛经，可谓雷打不动。载涛儿时，有一次出于好奇，悄悄潜入母亲



房内，听她诵经。由于不断走动，发出声响，惊怒了母亲，吼道：“你怎么这样不懂事？我这里念经做功课你也胆敢来捣乱？”从此，载涛再也不敢惊扰母亲了。奕诤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妹妹。载涛有了这么个姨妈，固然增添了不少的荣耀，但也给他的家庭、亲友和生平带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磨难。

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有着很深的积习。至于封建皇族，那就甚之又甚了。刘佳氏作为一个侧福晋得了一子，那喜悦的心境自然无可言状。她对自己的亲生骨肉简直疼爱得不知如何是好，吃多了怕撑着，穿少了怕冻着。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的爱子，竟成了皇室中明争暗斗的一个工具和筹码，得而复失，她最后也因此送掉了性命。

那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的事。载涛当时还不满十一岁。醇亲王府突然接到慈禧太后的一道懿旨，硬把刘佳氏最疼爱的小儿子载涛过继给奕诤的堂兄、嘉庆皇帝的孙子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门下为嗣，事先竟连个招呼也不打。

固山贝子奕谟没有儿子，恭忠亲王奕訢的儿子载湜曾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过继”为嗣，承袭贝勒。后因“坐事夺爵归宗”，慈禧才又下懿旨，令醇亲王奕诤的七子载涛“承继固山贝子奕谟为嗣，著承袭贝勒”。

这件事震动了醇王府。奕诤全家对慈禧的这个举动，都很气愤，但又发愁，苦于想不出好的对策。那时候，西太后的懿旨谁敢违抗？即使稍稍流露出不满意或不痛快的情绪，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刘佳氏闻此惊变，更是万分恐惧。她深知慈禧的狠毒，终日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

恰恰在这一年，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病死了，惊动了慈禧的大驾，她亲自到醇亲王府凭吊。谁曾料，她把因妹妹身亡的痛苦，转化为对刘佳氏的妒恨，硬是无缘无故地让刘佳氏在滂沱大雨中跪了一个时辰。临走时，还把她妹妹生前用过的珠宝器物，莫名其妙地统统扔在地上，用棒砸，用脚踩，凡未破损的才被认



为是货真价实，作为她妹妹的陪葬物，其余的全部扔掉。由于受雨着凉，刘佳氏除了受惊受辱，还从此留下了腰腿痛的病根。

深知慈禧心毒手狠的刘佳氏，对她要夺走爱子载涛的意向是决不敢违抗的。自从载涛离开了醇亲王府，刘佳氏经受不了这巨大的刺激和打击，心中结下疙瘩，精神开始失常了。然而，慈禧并没有到此为止，她还继续折磨着刘佳氏。

一九〇一年，慈禧为了进一步拉拢和控制醇亲王府，强行指婚，让载涛一母同胞的哥哥载沣与她的心腹重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联姻。当时，载沣已经同一位满族姑娘订了亲。按照满族习俗，这位姑娘应该算是婆家醇亲王府的人了。这一意外的事变，又重重地打击了自尊心极强的刘佳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在一九〇八年，慈禧为了保全爱新觉罗家族的宝座，防止大清皇朝权力旁落，突然宣布刘佳氏长孙、载沣之子溥仪继嗣同治，兼祧光绪。刘佳氏深知光绪帝晚年的悲剧，现在自己心爱的长孙又要入宫，在慈禧的手心里当嗣皇帝，不只是活活拆散了她们祖孙之缘，更可怕的是，溥仪的命运难卜。

按照醇亲王府的惯例，溥仪作为长子，生下来并不由他的母亲抚养，而应在满月之后，上交给祖母刘佳氏亲自抚养。可以说，溥仪是在刘佳氏怀里抱大的。对溥仪的进宫，刘佳氏惊恐万状、悲痛欲绝。她害怕溥仪也会像他的伯父光绪一样，在深宫里当一个活囚徒。

在刘佳氏眼里，慈禧是她不共戴天的死敌。尽管由于封建礼节的制约，她不敢公开诅咒慈禧，但却把仇恨的怒火埋藏在心灵深处。在她精神失常的前夕，毕竟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老太太的直言。她以醇王府两代人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慈禧的为人。想到爱孙将要到那个可恶、可怕、可恨的人身边去，刘佳氏又一次昏厥了过去。从



此，精神病愈来愈重，终于在五十九岁那年抑郁而死。

奕谟膝下无儿无女，得到慈禧恩赐，白白“拣”了个十一岁的载涛为过继儿子，自然格外高兴，于是大摆家宴庆贺了一番。但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尽情的高兴，反又惹恼了喜怒无常的慈禧太后。据说慈禧有句格言：“谁要让我一阵子不高兴，我就叫他一辈子不高兴。”慈禧看到奕谟夫妇那种得意的神气，打心眼里感到不舒服。

奕谟平日本来很瞧不起慈禧，偏偏又在此时，画了一幅发牢骚、讥讽慈禧的画，画面上的人只有一只脚，喻意慈禧把家事、国事搅得一团糟，并题诗曰：“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离三百尺脚仍来。”

慈禧得知此事，火冒三丈，极为气愤。她为发泄对奕谟的私愤，出尔反尔，又下一道懿旨，让载涛再过继给奕谟的另一个堂弟、道光帝第八子钟端郡王奕诒。这时的载涛已在奕谟府上生活五年了。奕谟夫妇遭到这样侮辱性的打击，恼愤成疾，不久便相继去世。

高贵的家族，优越的生活，在幼小的载涛心田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载涛牢牢记着在孩提时代，母亲反复讲给他的一段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在白雪皑皑的长白山上，有一个清澈透底、甜如甘泉的大湖泊。一日，天上突然降下三位仙女，在湖水中纵情嬉戏。这时天边飞来一只天鹅，掉下一粒又红又大的樱桃，其中的小仙女馋涎欲滴，竟一下将果实吞入肚内。

但当她们洗好澡，准备返回天上时，小仙女发现自己怀孕了，无法腾云驾雾，只好留在人间。很快，她生下了一个相貌出众的男孩。在母亲的细心抚养下，孩子长大成人，仪表堂堂，气度非凡。

于是，母亲对孩子说：“你叫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你

来历不凡，要安邦兴国，成就一番大事业！”后来，他在伊兰统一了三个相互争斗的部落，建立了满洲。雍顺，作为满洲人的祖先，得到了族人的信赖和爱戴。

.....



这段故事的内涵，载涛所能理解到的，就是他的祖先是仙女生的。满族是仙族，而爱新觉罗又是仙族中的贵族。这些观念，使载涛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载涛转继奕诒，承袭贝勒时已是十五岁的翩翩少年了。从此，他有财有势，开始放荡无羁。后来又由于五哥载沣当上监国摄政王，他也随之加官进爵，成为掌握清廷军中大权的风云人物。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刚登上摄政王宝座的载沣，使用溥仪的名义，下旨晋升载涛的爵位：“贝勒载涛着赏加郡王衔”。尽管这是一次例行封赏，但年轻的载涛，刚刚任职为皇室服务，毫无建树，便得到如此殊荣，不能不说明载沣要准备给其弟实封郡王的意图。

一九〇九年八月十五日，载涛又得到一枚二级宝星荣誉勋章。这个勋章等级是很高的，一般不轻易颁发，只奖给那些有特殊功绩的人物。同时获奖的毓朗、铁良、萨镇冰等人，年龄、职务、功勋都高于载涛，而得到的勋章等级却低于载涛。

同年十月十四日，载沣再次下旨晋升载涛的爵位：“赏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涛佩戴郡王爵章”。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载涛封官晋爵，离实封郡王只差一步了。然而后期朝廷多难，历史风云多变，随着宣统朝的终结，载涛的实封郡王梦，也就成为泡影了。

骑术精深

载涛一向对军事抱有特殊的兴趣，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满族人具有我国北方骑射民族的特点，被称为“马背上的民



族”。依靠武力，满族统一了中国。到清朝后期，虽然皇室腐败日益严重，但对满族官员仍强调文武兼用，相互调任。载涛的父亲奕譞是清朝亲贵中公认的杰出军事将领之一，一生主要是练兵、带兵。

这对载涛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载涛虽然只是一个年轻的文弱书生，但却渴望纵横疆场，为保卫家族利益而战。于是载涛逐渐与马产生了解之缘。不仅迷上了马，喜爱骑马，而且骑术精湛。在清皇族和“老北京”中，都知道涛贝勒骑马、养马、相马是出了名的。

载涛从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六年在贵胄学堂学习时，在骑马、驯马以及有关马的知识方面，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九〇八年，他的侄子溥仪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受哥哥载沣的委派，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建立皇家卫队，这更给他提供了骑马和研究马的机会。

为了提高禁卫军的骑射技术，在这期间，他曾远涉重洋，到法国著名的索米骑兵学校进修。皇室卫队建立起来之后，载涛当上了军咨大臣，由最初对骑马的爱好，而变成把骑马当职业了。

载涛从十几岁起学习骑马射箭。他能够驾驭各种烈马，纵马奔驰；还能够飞身上马，并在飞奔的马背上表演马技，作出俯身、倒立、倒骑等各种姿势。他不仅精于马术，而且对马颇有研究。任何一匹马从他面前一过，他就能说出这匹马有几岁口，几乎十拿九稳。单凭直观，他还能很快分辨出哪是骑马，哪是驭马，哪是驮马，哪是耕马。特别是他在改良马种方面的知识，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出于对马的特殊兴趣，载涛发现谁家添了好马，总要登门拜访，有时甚至忍不住张口讨要。有一年，善于投机经营的袁世凯，为自己保官晋爵，悄悄地进贡给当时执掌大权的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四匹一色青的高头大洋马。

载涛闻讯后心想，载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我何不敲他一



笔？便找上门软说硬磨，要从他那里讨出两匹马，不给就不走。深知载涛爱马如命的载振，无可奈何，只好打消了装备一辆两式四套马车的主意，从中给他两匹，这才了事。

辛亥革命之后，载涛离开了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的职位。但是，骑马仍然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他在山老胡同居住时，西扬威胡同有个远近知名的马号，就是载涛养马的地方。当时这个马号里养着五匹马：两匹是专供拉车使役的；一匹是夫人骑的；另外两匹，一叫“小兔子”，一叫“紫燕子”，是专供载涛骑的。

说来有趣，供他骑的两匹马中，有一匹是他在街上捡来的。当时一匹马病卧街头，骨瘦如柴。载涛一眼看出是匹好马，便牵回家里，精心调理，很快成为一匹理想的坐骑。

在山老胡同西口的对面，有一个大院，原为“固伦荣寿公主府”。这个院里有比较宽阔的场地，载涛经常到这院里来骑马、驯马。他骑马的花样很多，骑马越过障碍，是他最喜欢的项目。每当周末，他要到德胜门外马道参加赛马。他同京城里一些骑术很高的骑手们一起比赛，很少落后过。

载涛当年还与号称张大帅的张作霖赛过一次马，令京城高手们大开眼界。那是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得胜进京，他派人传话，点名要与载涛赛马比比高低。赛场上，张作霖盛气凌人，全然不把载涛放在眼内，甚至还要让载涛几步。结果，载涛远远领先，取得胜利。

赛后，张作霖说要在“大帅府”宴请载涛。这时，好心人便悄悄对载涛说：“你的马头怎么能超过张大帅的马头呢？晚上恐怕摆的是鸿门宴，不去为妙。”然而载涛却果断地说：“怕什么？既然我允诺了，就不能失言。”

当晚，载涛毅然赴宴。“大帅府”内灯火辉煌，鼓乐喧天，酒宴十分丰盛。酒过三巡，张作霖说明真意，要请载涛出山，帮助奉系主持政务。只要载涛肯出面，什么条件都可答应。然而载



涛却淡淡地说道：“本人才疏学浅，难当此重任，日后再议吧！”

溥仪学习骑马，也还是载涛竭力促成的。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在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中，对溥仪该不该学骑马发生了争议，后来还专门为此开会商量了一番。载涛作为皇叔，同时又是马术专家，力排众议，坚遵祖制：大清朝皇帝历来都是“马上天子”，现在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如不会骑马则违祖制，最后终于统一了人们的看法。

经过妥善准备，在八个“压马大臣”的护卫下，溥仪终于上马了。他曾经事后记录下这段历史：“在走廊上学着骑马，前面有御前大臣，也骑着马，两旁有侍卫，王公大臣在四周观看的很多。我骑着马一步一步地走，走得极慢，在走廊上来回走两趟也就算了。”

溥仪在载涛的影响下，逐渐对骑马有了兴趣。在清宫内，包括以后到天津张园，都设有专人负责饲养马匹。当然，这些人已经很不尽心了，常常卖出好马，又买进次马充数，或克扣饲料从中贪污。到东北后，溥仪的驻津办事处仍然喂养着他认为甚好而实际很糟的一批“坐骑”。

一九三七年，清室驻津办事处向帝宫司房报告“老马倒毙”的信件：“敬陈者园中喂养之黑马一匹于本月二十六日因齿老倒毙，即飭马夫孙玉秀跟同苏拉等，拉运津郊外掩埋矣，即请代为上陈是祷。”溥仪当了“康德皇帝”后，在执政府前建了一座跑马场，里边养着日本天皇送的骏马，关东军送的大洋马，以及“满蒙臣下”进贡的各色名马。其中，令溥仪最为得意的是日本宫内省赠给他的一匹日本名马。此马产自北海道大冠种粮牧场，十二岁口，全身呈枣红颜色，白蹄白鼻梁，长鬃长尾巴，水光溜滑，招人喜爱。这匹名为“毕朗号”的骏马，由日本名兽医等三人专程护送到长春。当时身穿军装得意洋洋的溥仪骑在马上，威武得好像一个“英雄”。但可惜那小小的西花园空地，名马也难以驰骋，骑来骑去，溥仪也渐渐地失去了兴致。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了北京城。大街上见到的都是日



寇的大洋马，而中国人却被剥夺了骑马的权利。侵略者那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令载涛感到难以容忍的愤慨。特别是一次上街办事，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厉声盘问一个骑马的中国人，觉得自己仿佛也受到莫大的污辱。

回到家里，他大发脾气：“日本鬼子骑马都骑到中国人的头上来了！”一怒之下，他把马卖掉了，车也卖掉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他再也没有骑马。

爱车成癖

生性好动的载涛，除了爱马骑马，还酷爱骑自行车，他从十几岁开始学骑车，一直骑到八十岁。

当时，自行车在北京还很稀罕。载涛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在皇宫内看到一个民间艺人表演骑车术。这位艺人精湛的表演深深吸引了他，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尝试驾驶这件神奇之物。如果说王公大臣及遗老们对子弟学骑马还表示赞同，而对骑车则无不认为有失体统，不符家规。

然而载涛对这些全然不顾，他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学会了驾驶这种新玩意儿——脚踏车。当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骑着自行车的涛贝勒爷，在大街上快活地溜来溜去。

最初，载涛骑车只是为了找乐趣，寻开心，把骑车当作游乐的工具。那时候，他常常骑着车满城转悠。北京城里的街巷胡同，他几乎都串过。因此，说起北京的胡同，他熟悉得很，一串串的，简直如数家珍。

载涛为了骑车游玩时有人陪伴，他让家里人都学骑车。载府里的成员，不论大人、孩子，男的、女的，夫人、格格，下人、听差，都得学骑车。而且无论哪个学习骑车，他都要一个个手把手地亲自教。

涛贝勒骑起了自行车，带动了京城一大帮王公贵族子弟，甚



至影响了居住在紫禁城内的小皇帝溥仪。他学骑车当然要比载涛更加费尽周折,但最后也还是突破了老臣们的反对,终于骑上了自行车。美中不足的是他不能像载涛那样随意兜风。然而这位小皇帝更是独出心裁,为了骑车,竟下令将宫内的许多门槛全部锯掉,以便畅通无阻地穿行各宫。这件事也算是千百年来宫闱之中的奇闻了。

三十年代,北京街头上出现了用电滚子带动的自行车。见了自行车就着迷的载涛,也请人在他的自行车上装了一个电滚子,每天“突突”来,“突突”去,招引满胡同的孩子、大人看热闹。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装那么个玩艺儿,搬进搬出,分量太重,就把这辆摩托自行车卖掉了。

载涛爱骑车,也爱买车。家里的人,无论是谁,只要学会了骑车,他都要慷慨解囊,给买一辆新车。有一个时期,七爷府上简直成了自行车行,男式的、女式的,菲力普的、兰牌的,足有三十辆之多。有人说,载涛是见了好自行车就走不动路,这话一点不假。每遇好车,他总是要买的。

当年他刚学骑车时,就拥有京城两辆最好的车子,一辆是兰牌的德国车,一辆是双枪牌的英国车。直到一九七〇年九月他去世时,家里还保存着这两辆老牌的进口自行车。

如果说载涛年轻时候骑车主要是为了玩乐的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地把骑自行车当成了锻炼身体的重要工具了。

新中国建立时,载涛已逾花甲之年。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总后机关离载涛住的东城区西扬威胡同有十多公里。载涛坚持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既不乘公共汽车,也不坐机关的小汽车。

中央的领导同志得知了这件事,认为载涛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来回骑自行车上下班身体吃不消,也不安全。于是作出决定,让载涛到离家较近的全国政协上班。但他依然坚持骑自



行车,以骑车为乐。

醇亲王府在西直门外有座别墅叫做“朗润园”,是个幽静的好去处。他经常星期日早早起来,带上儿子、孙子,一同骑车前往,前呼后拥,好不热闹,一玩就是一整天。直到黄昏,才又骑车返回家。后来,家里人反复劝他,年岁大了,不要再骑车了。他郑重其事地宣告:“我骑到八十岁,就再也不骑车了。”

一九六六年,载涛整七十九岁。他和儿子商量:“我已经许下诺言,到八十岁不再骑自行车了。明年就是八十岁了,今年是我骑车生涯的最后一年。最后一次,我要试一试,看看到底能够骑多远。”

这天一大早起来,他和儿子骑自行车离开家。家里人原以为他们不过是骑车到街上转转。哪知,吃午饭时仍不见他们回来。直到晚上六七点钟,载涛和儿子才推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问他们到哪里去了?回答说:“跑了一趟十三陵!”

载涛最后一次骑自行车,就是从北京的东城到六十多公里以外的十三陵打了个来回。没有强壮的身体和深厚的功底,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烹饪里手

封建皇宫里膳食的讲究,那是世人皆知的。身为皇族、生在王府的载涛,自然在“吃”的方面也受到了熏陶。

载涛还是孩提时住在醇亲王府的时候,就对烹饪产生了兴趣。载涛很小就会挑食。有一次,他与两个哥哥载沣、载洵一起分食烧饼。数量有限,每人只能吃其中一部分。为了自己能吃得更好,他主动提出自己吃麻酱多的烧饼瓢和酥脆的烧饼底儿,而剩下的最没味道的烧饼圈儿,数量很少的烧饼盖,只能归两个哥哥吃了。

早在醇亲王府时期,载涛品尝风味食品的水平就已经显示



出来了。那时候，幼年兄弟三人不知是谁提了一个古怪的建议，每人在就餐时点一道菜，比一比谁点的最好。轮到载沣时，脑子里除了烧鸡、炖鱼外，几乎没有什么新花样。好容易搜肠刮肚点了一道菜，倒把厨师一下子难住了。“熏鸡炖白菜”，他哪做过这样的菜啊！但不做又不行，王爷那儿也通不过呀，只好想方设法做出来。结果连载沣也吃不出是什么味道。

经过载涛的指点，载沣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所想吃的菜应该叫鸭架汤，而不是什么熏鸡炖白菜。这件事以后越传越广，竟开始有人请载涛品尝、鉴赏菜肴，于是他钻研烹饪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了。

果然，载涛日后在自己的贝勒府里，精心建造了个小厨房，聘请四位名厨，配备了中西式两套班子。每逢高兴时，他便自己单开一桌，边吃边饮，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在他的小仓库里，有专门储存食品的房屋；经常存放着山珍海味，以备他随时选用。

当年拜载涛为师学猴戏的李万春，生前还记得，每逢留在贝勒府里用餐时，载涛总爱传“一色餐”，或红、或绿、或白、或黄，即餐具和食品都是一个颜色。他最爱吃“黄”，用黄颜色的餐具，端上豌豆黄、栗子糕、炒鸡蛋、倭瓜羹，又好看，又好吃。平日里，食不厌精，独吃自赏；节日里，大摆酒席，广宴亲朋。时间久了，载涛甚至对皇宫的饭菜都不屑一顾。

载涛在自己的回忆中讲过，他十几岁的时候，曾不断接到慈禧传他进宫陪膳的懿旨。当时慈禧在内政外交上都陷入了困境，心情忧郁，饭食不香，经常传唤一些近族子侄到宫里来陪她吃饭。载涛每次前往陪膳，总是小心翼翼，尽管饭菜十分丰盛、精美，但他也不敢多吃，更不敢多讲一句话。生怕哪个举措不当，哪句话走板，无端惹恼了这位“老佛爷”。因此，什么宫廷的珍馐佳味，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的时候。那是他向居住在紫禁城的逊



溥仪建议开设了野味膳房，并推荐了善做飞龙的福建名厨。为此事，溥仪特请载涛同桌吃了一顿野味膳。

往常留在皇宫用餐，载涛内心总是十分感慨。宫中的菜肴不过徒有虚名，他欣赏的只是那价值连城的精美餐具，而餐具里的东西实在不对他的胃口，只好勉强凑合几口以悦龙颜。但那次，热气腾腾的火锅，香气扑鼻的飞龙，令载涛食欲大振，忍不住大嚼大吞了一番。

载涛不仅会吃，而且会做。他的一手烹饪的好本领，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不论红案、白案，他都颇为擅长。煎、炸、烹、炒，更是样样精通。

他独创了一种面卤叫醋卤，别有风味。做法是先把海米、肉丁、冬菇、玉兰片混在一起，浇上醋汁调匀，再泡面条吃，既好吃又下饭。煮面疙瘩，是用茄汤。把茄子切成丁，用醋淹半个小时，煮熟以后，再浇食面疙瘩，格外有味。可是孩子们中有的不喜欢吃，载涛却说：“不爱吃不要紧，做多了就吃了。”于是，他让厨师天天做，几乎天天都有醋茄汁浇面疙瘩，吃得孩子们一个个都倒了胃口。

载涛的拿手好菜是西瓜肉，极具特色。每到炎热夏季，载涛令人在葡萄藤下摆上案板，取来一只特大西瓜，先把整个西瓜的瓢掏出来，只剩一空壳，然后再把切好的肉块、鸡块加香油、料酒、酱豆腐一块放进瓜壳内，在蒸笼上文火蒸上三四个小时，即可告成。吃起来，肉质鲜美，清香爽口，毫不腻人。这道菜，始终令载涛颇为得意，并成为他家的保留菜谱。

溥仪对载涛的烹饪技能是深信不疑的，即使到了东北，也常常与载涛联系。溥仪对御膳房的厨师，要求很高，甚至很苛刻。他的厨师，有的是从北京、天津带来的；有的是他当了伪满皇帝后想方设法从北京、天津或当地找来的。

溥仪一旦感到御膳房缺乏人手，便向北京去找。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载涛。我们从下面一篇电文里可



以生动地看出载涛的烹饪才能在溥仪心目中的地位。

这是伪满洲国内廷司房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奉命电告北京载涛，迅速挑选各类厨役的电文，全文如下：

涛贝勒爷：

顷奉上使：由北京找做中国菜厨役，做番菜厨役，能做果盒茶役。如找妥，速来回音。

兴趣广泛

载涛是一位兴趣十分广泛的贝勒爷。老北京人大抵都知道这位涛七爷爱玩、会玩，因此送他一个绰号：“大玩家”。

载涛自幼习武，崇尚骑射，后来又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对各种兵器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亲自联系向德国进口新式兵器，经过审查选定后的样品，就作为心爱的物件珍藏起来。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库房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兵器：古代的刀剑，近代的枪炮，还有外国的新式手枪、步枪、望远镜等。有些上面刻有花纹，镶着宝石，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一些求载涛办事的人，知道他这一爱好，便有意送他一些兵器“鉴赏”。平日一向疾恶行贿受贿的贝勒爷也就破例“有来无回”了。

载涛出国考察陆军时，从德国带回两架蔡司厂出品的望远镜，其中一架送给了他的哥哥载沣。这位很早就对天文学发生特殊兴趣的摄政王，捧着望远镜高兴得了不得，几乎每天都用来观天看星。有一次，竟看见了每逢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的哈雷彗星。他连忙让福晋用望远镜看。可她偏不看，还说什么这是扫帚星，灾星出现，要发生天灾人祸了。

当时，刚当政一年的摄政王，正委托可靠忠实的载涛亲掌皇家兵权——禁卫军，颇有稳坐江山的信心，怎肯信这扫帚星之说！载沣大大嘲笑了福晋的迷信无知，还给她大讲了一通天文



知识。福晋一点也听不进去,可看他那认真的样子,不得不连连点头称是。载涛事后听说这事,大加称赞说:“咱们的摄政王可是讲科学的新派人物啊!”

载涛喜好养花、养鸟、养鱼。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走进载涛在山老胡同的大院,满院都是花。正院两边,摆着两排大花盆,有牡丹、石榴、夹竹桃、无花果和橡皮树。后院还有两个大花池,里面也尽是石榴、夹竹桃等。前院和后院到处是“死不了”。

载涛养花非常经心,浇水、施肥、剪枝,他都亲自动手,还常常令仆人拣来马粪,用水泡着,给花施肥。有的花草,他弄不明白生长习性,还要翻翻书本,去向别人请教。在他栽植的花、草、树木中,对橡皮树兴趣最浓,也最有研究,家里人都说他成了橡皮树专家。

他不仅管理内行,还善于移植。春天,他从大橡皮树上剪下小枝,插在土里,待小枝生了根,再把它移到花盆里,慢慢地就长成了一棵小橡皮树了。也许是载涛对栽橡皮树有特殊兴趣和专长,又有偏爱,所以,他的院里数橡皮树最多。

民国时代,八旗子弟无所事事,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多。然而要说养鸟、玩鸟,一般旗人比起涛贝勒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载涛家的鸟,名目之多,数量之大,都是惊人的。单是鸽子就养了一百多只,有白的、黑的、紫圈的、黄圈的,还有尖嘴的、小屯嘴的,以及凤头的。鸽子专有房,而且有专人管。

每天早晨,载涛拿着又大又长的竹竿,统统把鸽子轰起来,让它们飞出去,然后看着表,看看它们能飞多长时间。这一盘五颜六色的鸽子飞起来,铺天盖地,颇为壮观。据说当时全东城还没有第二家有这么大盘子的鸽群呢。

载涛养的鸟中,有两种比较珍贵的鸟,一叫骆鸽,一叫虎皮鹦哥儿。骆鸽全身长着黑色的毛,虽没有八哥那么美观,但模仿人说话的能力却胜于八哥,它连人的嗓音语气都能模仿,有时还



叫人的名字。一次,外面有声音叫:“老五啊!”载涛的五儿子以为其父唤叫,赶忙跑过来,原来骆驼在叫,弄得这位“老五”哭笑不得。虎皮鹦哥儿,形似家雀,其毛色有绿的、蓝的、深黄、浅黄,色彩斑斓,煞是美观。载涛不仅喜欢这些鸟,还常常动手喂,逗着鸟玩。

在载涛院内,大盆花和树木中间,夹着十几个大鱼缸,里面有龙井鱼、望天鱼、红头鱼、水泡眼和红绣球等名目繁多的金鱼。原来还有一种叫珍珠鱼的,满身长着圆圆的珠子,酷似珍珠,故而得名。但这种鱼,很像耗子。载涛极怕耗子,因而对这种鱼也最为害怕,就逐渐将其淘汰了。

养鱼是件很繁琐的事,然而载涛却很有耐心。养鱼虫、晒水、换水、捞漂、吸鱼屎,他都亲自动手。他还很精心地注意鱼的繁殖。每当母鱼甩了子,长成小鱼,载涛总是一条一条地挑选,一部分留来自养,一部分送亲戚朋友。

载涛对养蟋蟀也很感兴趣,特别是到了冬季,他便让小听差挑着装有许多蟋蟀罐的圆笼,到各处去斗,看它们咬斗取乐。载涛出手十分大方,斗胜了的蟋蟀便继续收养起来,凡是输阵的蟋蟀就随意赏给观阵叫好的人们。

因为有钱有闲,载涛也和其他王公贵族、达官显宦一样,喜欢习字作画。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练字、写仿,勤学不辍。特别是辞官回家后,无所事事,更是以习字为乐。他临摹古帖,尤其喜爱柳公权、苏东坡的字。有时兴趣上来,还爱临摹各位祖先的手笔。他把临摹御笔作为一种“精气神”、“修养”,最后的效果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遗憾的是,这类作品未能保存下来。他还常常抄写古诗为乐,白居易、杜甫的诗歌,抄写了不少。室内琳琅满目,也使他眼界大开。他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经常临摹,练习画图画。

当时的一些名画家,不少是他的座上客,也是他的画师。他尤其喜欢画马,他画马既有写意,又有工笔。工笔画马,写意配



景。他经常专心伏案，刻意勾勒，一丝不苟，画出的马，仔细看去，甚至每根毛都可以分辨出来。而作为衬景的远山近水，树、石、花、草，往往几笔挥就。他画好马以后，还常常把他的侄子溥忻（雪斋）或溥侗找来，为他配景。

现在载涛妻妹王淑敏那里还珍藏着载涛的一幅画，整个画的中心站着一匹军马。近处是一块块石头，远处是高山峻岭，山下有一池清水，马的背后，是一株垂柳。画的左上端有这样一段题跋：

乙亥伏日写此自娱情雪斋侄补画野云居士识

辛亥革命后，载涛接二连三地失去了那些显赫的官职。无官一身轻。在他看来，不用进宫上朝、带兵操练，也省得操心费神、出力流汗了。于是，玩乐的时间更多，似乎生活兴趣又增加了许多。

若平日没有约会亲朋好友，他总是喜欢带着小儿子出门四处游逛。他常光顾的地方可多了，不是到动物园看奇珍异兽，就是跑到东安市场欣赏古玩。还时常到当时最好的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来了情绪还到西餐馆叫上一桌西餐。闲来无事，他便一人躲在小书房里，翻看家里存放的古书，一看就是大半天。

特别是后期，读书和藏书成了载涛的最大爱好，也成了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在书房，几乎度过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尽管闲居无事，但读起书来依然认真。他读书的安排甚至和在校学生一样有规律。

载涛读书的兴趣极为广泛，其中以读史书居多，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另外，他还喜爱读一些古典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对于自然科学，他也很神往，尤其对数学，钻研颇深。以至后来，他能自告奋勇当孩子的家庭数学教师，指导并亲自记载全家的经济账目。

载涛的书房里，藏书很多。当时比较珍贵的有《钦定唐诗九百卷》、《悦心集》、《御录经海一滴》、《佛教经典》、《圣经》、《太祖

高皇帝老档译稿》。可惜,后来由于动乱不止和四处搬迁,这类书未能很好保存下来。

他常看的书籍中,属于政治类的有《官场现形记》、《百弊丛书》,属于军事类的有《荡寇志》,属于传记类的有《说岳全传》、《黄天霸演义》,属于掌故类的有《清朝野史大观》、《西太后全史》,属于娱乐类的有《男女新笑话》、《戏考》、《新魔术奇观》、《中外戏法大观》,属于小说类的有《玉生香传》、《胡四奶奶》、《梅福结婚记》、《哑巴老妈》等。

此外,载涛还专门从邮局为家人订了不少报纸、杂志,多的时候达十几种,以此了解国内外大事。他对东西方各国的社会状况及政治形势,尤为关注,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最感兴趣。



京城“龙票”

京戏行家

清代，宫廷中演戏成风。不仅皇宫里有戏台，连皇帝行宫、避暑胜地都设有戏台。只要帝后们高兴，随时都可以请梨园名流来演出戏曲。

由西太后慈禧带头，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都对京剧感兴趣。常常一心一意琢磨京剧，却不顾时局变化和宫内事务。宫中是这样，府中也如此。常常每日锣鼓喧天，夜以继日。有些王公大臣亲自粉墨登场，时常演戏到天亮，来不及洗尽粉墨便匆匆赶入宫中当差。

那时，官府之中的京剧，可谓盛极一时。作为光绪的弟弟和宣统叔父的载涛，也自然从中受到熏染，爱上了京剧。

民国初年，一度销声匿迹的京戏又活跃起来。居住在北京的一般王公大臣及其子弟，为了解除孤独愁闷，从爱听京戏，进一步发展到直接演唱京戏，最后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个不定期、不定人的自我表演、自我欣赏的戏班子。北京的梨园票友们便送了他们一个“龙票”的雅号。而这个戏班的首领就是对京戏兴趣最大、研究得也精深的载涛。

当时一些著名的王府里都自设戏楼，其中载涛家里的戏台别有一番特色。其规模并不算大，位子也并不多，但结构巧妙，建筑精美，特别是这里总有名角登台，引得那帮少年王公贵族子弟闻讯而来。

载涛和当时著名的伶人尚小云、郝寿臣、谭叫天、杨小楼、陈



德霖、王瑶卿等都有来往，他们也常到这里唱戏，或合作演戏。载涛的会客厅，还挂着不少著名演员赠送给他的剧照，这些照片常常使他引以为荣。

为唱戏方便，载涛采买了一大批戏装、戏具、行头，并提倡全府人人学戏，人人上戏。有时唱《安天会》，需要几十人的大场面，载涛便让女仆扮仙女，散差当天官，自己唱主角，锣鼓开打，热闹非凡。一直唱到载涛满意为止，否则决不开饭。

王府戏台建立后，载涛经常召集其他王公子弟前来演戏，除偶尔临时约请几名内行演员和底包外，主要演员都是这些戏迷们。当时演戏活动很多，几乎每月都要在各王府演上几场。其中造诣最深、演技最高的是溥侗。这位前清镇国将军，为了演戏，甚至称自己的别号为红豆馆主，因而在王公票友中，可称为首屈一指。受其影响，在京的蒙古王公也能登台演戏。载涛的孩子，自小就爱听戏，六七岁也能上台演个小角色，更令亲友夸奖不已！

有时，为了捧场助兴，载涛还邀请一些观众，大部分是亲友家属，并设宴招待，但决不请外界无关人士来看戏。有时戏演到高潮，载涛往往不顾司仪的职责，蹦上台去，唱上一段。他最爱演猴子戏，每一动作，全都惟妙惟肖，赢得亲友们的掌声和喝彩。

受载涛的影响，溥仪也很快迷上了京戏，不仅对听戏有兴趣，而且对演戏的人也十分优待。仅以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端康瑾贵妃寿辰来说，溥仪指名请来连花落、赵魁顺、徐狗子等著名艺人进宫演唱，清室王公也应召进内观看。

其中，当时溥仪最欣赏的是梅兰芳与小翠花合演的《游园惊梦》。演出结束后，溥仪单独召见梅兰芳，高兴地赏大洋五百块，并赏食全膳一桌。同时，溥仪对杨小楼、余叔岩、小翠花等也各有厚赏。

溥仪曾召来著名演员焦德海、万人迷“献戏”。他们都是第一次入宫，能够登上漱芳斋戏台，真可谓受宠若惊，竟情不自禁



地说：“草木凡人何能来到此处？慢说咱们在这站着，就是跪着，全没咱们的地方。”惹得溥仪龙颜大开，笑声不断。

溥仪曾一度心血来潮，试图将西洋乐器引入中国戏剧，令载涛哭笑不得。美国洛杉矶乐器城闻讯后发来邀请：“我们曾经为你的同胞，伟大的中国人梅兰芳服务；如果我们的机构同样有机会为您服务，对此将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愉快。梅兰芳来本市曾将办事处设在这里，并且由我们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国家，完成一系列访问演出的。”

在旧社会，人们一般对戏曲是十分轻视的。而皇室成员、王公大臣却热衷于这种活动，更与人以口实。所以不但在遗老旧臣方面，就是在满族群众中，也常常听到讽刺的讥笑：辛亥革命前是这些人把清朝断送了，现在这些人又粉墨登场，总是“不务正业”。

太后指师

载涛真正拜师学戏，还是出于西太后慈禧指师的缘故。慈禧酷爱京戏，尤其到了晚年，几乎每日午睡后，都要听上几段。有时，唤宫中太监戏班演《髦儿排》，即不上装的清唱；有时，召“内廷供奉”谭鑫培、杨月楼等名演员入宫演唱。

宫内演戏，一般是在阅是楼。颐和园演戏，最好的地方是德和园。台有三层，上层降神，下层出鬼，慈禧看得很热闹。遇万寿节庆，她便赏王公大臣入宫听戏。

一次在丰泽园戏台，载涛奉旨随班听戏。只见戏台装饰得富丽堂皇，两侧旁柱悬挂着长串的“喜庆灯”，凭空增添了无限的喜气。在“一枝花”牌子的唢呐声中，王公大臣跪在大红地毯上，恭迎从正面楼厅里走出来的慈禧太后。开场戏是《跳灵官》，又接了一出昆腔《接福迎祥》。

慈禧来了兴致，越听越高兴。她发现坐在台下听戏的载涛，



便叫来当时正在唱戏的京城名角张淇林，让载涛拜张为师，并对张淇林说：“你一定要教好载涛学戏，让他不能比杨小楼唱得差！”

张淇林，绰号“三宝”，唱戏极多，擅演武生。当时梨园公认“武功根底纯实准确者，尚有张淇林”。以致名武生杨小楼唱《冀州城》时，非请张淇林扮马岱不可。这回，张淇林见慈禧指载涛为徒，心中着实惶恐不安。他收过不少徒弟，可哪教过贝勒爷啊！他对家人说：“这可是提着脑袋教戏，载涛唱不好，我可得掉脑袋啊！”

于是，他每日早早来到涛贝勒府，先给徒弟请安，再给徒弟教戏。好在载涛聪明伶俐，又爱唱戏，几乎是一教就会，水平提高很快，使得心悬在嗓子眼的张淇林才稍稍安下心来。

辛亥革命以后，载涛闭门家中，无所事事，除骑马、画画、养花、玩鸟外，又跟当时京城里有名的架子花脸钱金福学戏。他定期把钱金福请到府上，一腔一句地说、一招一式地学。载涛对钱金福招待得周周到到，好吃好喝，尊为上宾。

但钱金福却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想：“人家一个大清国的王爷，哪会瞧得上唱戏这个行当？不过是叫咱来陪着玩玩，寻欢取乐罢了。”因此，他总是客客气气“七爷长”、“七爷短”地叫，说招式、教唱腔也并不那么认真，只是做做应景文章。

可是载涛却始终认真真，实心实意地学得非常卖力气。钱金福看到载涛没有王爷的架子，不仅热情款待他，而且一门心思学戏，于是受到了感动，坦诚地对载涛说：“涛贝勒爷礼贤下士，虚心求教，我一定精心地教，决不含糊。”

从此，钱金福拿出浑身的真本事，耐心地教载涛学戏，前后达三年之久。载、钱二人过往甚密，终成了莫逆之交。载涛后来练就的一身过硬的靠背武生功夫，主要得益于钱金福的亲自传授和指点。

载涛学成之后，技艺大精，和当时梨园名角的关系也愈发亲



密起来。他们既是票友,又是朋友,走动十分频繁。记得一九二二年为祝贺瑾太妃寿辰,清室决定在漱芳斋演戏祝贺。事先内务府点了很多名角戏目,太妃都不满意,惟一想看的是梅兰芳先生的戏。内务府大臣因事关太妃生日祝寿,丝毫不敢怠慢,但又怕请不到梅先生而误事,便由载涛出面致梅先生处谦辞婉约,务请入宫一演。当时,梅先生虽然正为救灾捐献义演,非常劳累,但看在载涛的朋友情意上,还是答应了逊清皇室的要求。

载涛陪梅兰芳先生来到宫内,受到清室的热情款待。梅先生在宫中演了两出戏,一是《游园惊梦》,一是《霸王别姬》。瑾太妃、瑜太妃看后十分满意说:“随先太后看戏几十年,从未看过这样的好戏,以前看的戏都算是白看了。”

经载涛之手,曾组织了很多京戏专场演出,这既是为了给人们捧场,也满足了他欣赏京剧的渴求。在溥杰出生那年,一些盼望大清朝起死回生的王公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位整治乱世、扭转乾坤的人物出世了。因此,他们对这个婴儿寄予了莫大的期望。连慈禧太后也异常兴奋,连忙找了十几个学士翻书查典,要给这孩子取个吉祥如意、预示大吉大利、超出凡人的名字。

最后从许多名字中择定为溥杰。据说才智出众者谓之杰。取名溥杰,自然喻意豪杰执政! 为了表示祝贺,国戚王公前来送礼贺喜的络绎不绝。惟独载涛别出心裁,给载涛出了个主意:在醇王府摆台唱戏,以示祝贺。

载涛在半天时间内,竟一下请四个名贯京城的戏班子进了恭王府,其中有王凤卿率班主演的《文昭关》,有陈德霖率班主演的《彩楼配》,有梅兰芳率班主演的《汾河湾》,还有小翠花和尚小云联合主演的《五花洞》。大演三天,热闹非凡,既达到了贺喜的目的,也使载涛大饱眼福。

武戏专精

载涛对京戏研习甚深，生、旦、净、末、丑样样拿得起来，其中最拿手的要算是武生戏。

当时名震京师的京戏武生杨小楼，就是载涛拜的老师之一。杨小楼为杨派武生创始人杨月楼之子，唱于京津之间，素有“第一名伶”的美称。他身躯高大，相貌堂堂，扮相英俊，具有“寓文于武，武中有文”的特点。加以嗓音清悦，白口沉实，颇能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这些都深深吸引了载涛，令他如醉如痴。

载涛平素对杨派十分崇仰，因此，他一边跟钱金福学戏，一边又学杨小楼的戏。只要杨小楼挂牌演出，不管在哪家戏院，载涛都不惜高价买票去听戏。后来，也常常把杨小楼请到载府来当面指点说教。载涛不仅在唱腔、做戏方面模仿杨派，行头、靴子、道具也都按杨派的模式制作。

有一次，杨小楼在第一舞台义演中演《扒蜡庙》，反串张桂兰。载涛看后，大为惊异。他想，杨是专攻武生的，居然还能反串青衣，可谓戏路宽广，令人叹服。从此，他对杨小楼更加敬重。

实际上，反串角色，在京戏里是常有的事。在人们的心目中，真正的名家，必须通晓两个以上行当，否则，只能算是个一般的艺人。载涛知道了这个梨园界的传统观念，也不甘于人后。他步杨小楼后尘，在专攻武生的基础上，又跟名旦于玉琴学起了《贵妃醉酒》。

不久，他便着装登台，反串青衣，在《贵妃醉酒》中成功地扮演了杨贵妃的角色，博得好评。从此，“载涛能反串青衣，戏路很宽”，在京剧界的内行和票友中传为美谈。

在名师的指点下，载涛经过勤学苦练，表演武戏的水平日渐提高，臻于成熟。有一次，外蒙古那彦图亲王为庆贺生日，邀请全城名伶唱戏一天，也请载涛赏光。因那彦图的次子光祺是载





涛的连襟，非亲贵之家不演的载涛，也粉墨登场，演了两出戏，一是《安天会》，一是《铁公鸡》。

当时曾有幸亲自耳闻目睹载涛演唱京戏的吴丰凯老先生，事后回忆说：《安天会》是载涛的拿手戏。这是一出猴子戏，武生重头，难度很大。猴子需要连翻一串跟头，还要演得灵活、顽皮、诙谐。载涛功底较深，演起来轻快敏捷，干净利落，一招一式，悦人眼目，无不赢来满堂喝彩。

这出戏不同其他武戏，只有主演一角来力战众神将，而且连战十几场，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演起来颇为吃力。但载涛演来，却游刃有余。那时他正当壮年，自有幼工，所以扑跌翻滚，格斗拼杀，毫不费力。

特别是《偷桃》、《盗丹》两场，载涛模仿猴子动作，惟妙惟肖。高难动作，更是见真功夫。跳戏桌时，来了个旱地拔葱，脚步轻快，身段漂亮。所唱所演，婉转动听。力战众神，一场有一场的打法，场场变幻无穷，诙谐而不俗套，滑稽而不厌烦，真是恰到好处。

《铁公鸡》戏很长，分为头、二、三本，说的是太平天国与清帅向荣交战的故事。这出戏全部穿戴清朝官服，纯为武工短打戏，难度更大。有时连杨小楼、尚和玉等名伶都畏难而不敢轻易演出。但载涛对这出戏却颇为拿手。

这一次，他演的是第三本，饰张家祥，身穿单袍、纱马褂上场。一人力敌众将，真刀真枪，赤膊鏖战。全剧中除向荣被烧一场，载涛可得空稍微休息一下，其他都是场场奋战。他还精心设计动作，表演一丝不苟，闪转腾挪，轻捷利落。有一场戏，令人印象极深。对方用真枪相刺后，便将口中所含的红水喷到了载涛身上，那情景竟如鲜血直淌，煞是逼真。一场戏演下来，尽管还是隆冬时节，载涛却是大汗淋漓。足见载涛的演技高超，武功精湛，令人钦佩。

巧育“猴王”

素有京剧舞台“活猴王”之称的李万春，提起载涛，总是尊敬地称他为“恩师”。李万春后来所以能够演猴戏炉火纯青，名冠京华，也确是载涛精心培育的结果。

李万春是晚清名武净李永利之子，自幼学戏，家传渊源。他戏路较宽，文戏方面受到余叔岩、马连良的传授，武戏方面得益于杨小楼、盖叫天，红生戏又求教于李洪春。由于家教严格，他又勤学苦练，十岁时与兰月春合演《两将军》，便一举成名，深得京剧界老前辈的器重和观众的欢迎。

溥仪大婚那一年，邀请全国名角进京，大唱三天。这就是当时举办的规模最大，也是宫廷里最后的一次堂会了。年仅十一岁的李万春，从天津来到北京，一出《闹天宫》轰动了全城。酷爱京剧、擅演猴戏的载涛闻讯后，立即赶到大栅栏广德楼（前门小剧场）听戏。

观后他不禁拍手叫绝，连声说：“小猴子演得太好了，真是个小怪物！”戏还没散，他就来到后台，当场找到李万春，说：“你小子演猴戏好，有前途，我给你说戏如何？”这就是要收他为徒了，喜得当时的斌庆社班主于振亭、李万春之父李永利直蹦高，能有涛贝勒爷做老师，那是多大的荣耀！当即按下李万春，磕头拜师。

第二天，李万春在父亲李永利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涛贝勒府，正式行拜师礼。从此，载涛收下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徒弟，严格要求，精心培养。

载涛教戏是十分认真的。他总是先说明戏的内容，解释清楚戏词，然后再辅导动作。每逢遇到高难动作，他总要示范一遍，直到自己满意，然后再让李万春按照要求，一招一式地做来，从不含糊。与许多著名艺术家一样，载涛最喜爱的一句格言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要求李万春注重练功，“冬练三九，夏练





三伏”，要数十年如一日，苦练不辍。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一出《闹天宫》，载涛整整说了三年，李万春也认认真真学了三年。他几乎每周都到七爷府来，一呆就是一整天。载涛说戏，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中午吃饭时，载涛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下子蹦到大理石椅子上，对李万春挤眉弄眼地说：“小子，你看着！”便把馒头放在嘴边，模仿起猴子啃桃的动作来。

就这样，师徒俩一边吃，一边说，一边演，一边改，以至后来很多精彩的动作，都是在饭桌上设计出来的。其中，尤以啃桃这一动作最为叫绝。他们都能根据剧情需要，选一个不软不硬的桃子，用牙啃皮，连续不断，桃皮直拉出一尺来长。

载涛非常喜欢李万春。在李生日时，载涛还送他一些小银锞子、牛角灯、小荷包等宫中玩意儿。他们的友谊始终没有中断。李万春自成一派后，仍然不断上门求教，载涛也总是欣然指点，诲之不倦。

晚年的李万春，回忆早年恩师载涛的教诲，更是感慨不已。在他从事舞台生活六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曾专门撰文总结自己五十余年来演猴戏的体会。此文发表后，在国内引起轰动。经友人带到台湾，同样引起强烈反响。

台湾由于与大陆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对京剧更视为国粹。李万春在台湾有两个弟弟、两个内弟，都喜爱京剧。其中，二弟李桐春造诣更深，专演红净戏，誉为“台湾第一活关公”、“国剧之星”。

李万春很想念两个弟弟。每当演《古城会》刘备、关羽兄弟相会时，总不禁动情。关羽唱到：“见兄长不由得我泪流满面……”，而刘备接唱：“我原说弟兄们不能相见，料不想今日里得团圆”。有时控制不住自己，掉下泪来，戏都演不下去。

后来，两位弟弟冲破阻拦，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与哥哥团聚。他们心中还藏有一个宿愿，要亲自上门拜见哥哥李万春的恩师载涛，却因载涛早已过世，而未能偿愿。

执掌禁旅

贵胄习武

载涛一直精心保存着一本装帧精美、富丽堂皇的陆军贵胄学堂同学录。正是这家不同一般旧学的半文半武的学校，使载涛眼界大开，受益不浅，对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重大影响。

受家族的影响，载涛自小对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爱新觉罗家族是我国北方典型的马背民族，一向崇尚武功，并以此逐鹿中原，统一全中国。入关之后，仍然如此。清朝后期，武功开始松懈，但作为皇室要求，却始终未变。一些有志之士，更是身先力行。他的父亲奕譞，既有武功，又能带兵打仗，是皇族中卓越的军事干将。他崇尚父亲的武功和战绩，幼年就曾暗暗立下志愿，以父为荣，效法父亲为楷模，习武从军，为保卫大清江山而骑马驰骋。

贵胄学堂是清廷专为王公贵族子弟办的一所军事学校，是抓军权、保皇室的一项重大措施，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正式建立。九月二十二日经御批的练兵处奏折，明确阐明了贵胄学堂的办学宗旨。

“自来习戎振武，实为强国之基。方今军制日新，尤应讲求兵学。兹据奏称建立贵胄学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学，亲习士伍，询属振兴武备之资……激励奋发树之风声，俾壮干城而安磐石。”

这是京城公认的一所典型的封建贵族学校，当时只有王公世爵及四品以上宗室，二品以上京外文武大员的子弟，才可能有



机会通过考试进入这座学校。贵胄学堂的设施、条件、待遇好于京师任何一所学堂。特别是建筑风格，富丽堂皇，甚至可与当时日本的最高学府——帝国大学相媲美。

最先进入贵胄学堂学习的学员将近二百人，共分三班。第一班是听讲王公世爵；第二班是听讲员；第三班是学员。课程设置也与一般学校不同，主要是学军事、数学、地理、化学、电学等，累计达十三门之多。

所聘教师都是一些年富力强、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有一些是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载涛与其五哥载沣、六哥载洵都是贵胄学堂的第一期听讲王公。二十五岁的恭亲王溥伟也是地位特殊的第一期学员。

可能是自幼习武、勤于骑射的缘故，载涛与别的贵族子弟确有不同。他对这家半文半武的学校很感兴趣，真想从中学点本领。特别是他常听访德归来的哥哥载沣讲，西方工业发展迅速，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促使国家日益强盛。这些都使载涛萌生了效法西方、富国强兵的愿望。能有这样一个上学深造的好机会，载涛是格外珍重的。他满怀浓厚的兴致，投身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载涛几乎每天都是最早来到设在北京东城煤渣胡同的贵胄学堂，听讲十分仔细，操练也较为刻苦。尤其是他所喜爱的几门课程，都作了详细的笔记。

直到晚年，他有时还翻出这些发黄的本册，向孙子、孙女们炫耀一番。若是来了兴致，他会把话题扯得很远：在他很小的时候，在醇王府观戏，当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比他大两岁的六哥载洵看到陈士美被包公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倒地大哭。

父亲奕譞大为不满，厉声训斥：“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父亲擒肃顺是他事业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载涛从此也幻想学军抓兵权，为国家建立功勋。



与载涛同堂就读的载沣,尽管当时在学校里数他的爵位高,但学习同样认真。就是在这个学校里,他开始迷上了天文学,并花钱购买了不少观天测星的天文仪器,像地球仪、三球仪、天象仪、各式天文望远镜等,应有尽有。在载沣的日记中,曾多次出现有关日月食、“五星联珠”、“哈雷彗星”等天文现象的实地观察记录。

这座被通称为“八旗子弟贵族学校”,后来也慢慢地失去了它原来的办学宗旨。有言道,“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看一看这个学堂优越的生活条件,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消亡了。

在这个学堂里,吃饭时,一人一张桌子,日需银七八两。吃着饭,一时不高兴,常常飞盘掷碗,闹得天翻地覆。教师要听命于学生,学生想听什么,教师就讲什么。学生上课,需专门派人去请。常有这样的情况,学生刚请到,已时至中午,于是进得门来坐下即吃饭。吃完饭一抹嘴,扬长而去,并不上课。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贵胄学堂叫做“安乐园”。

以“注重征信”而闻名的《清朝野史大观》有一段关于贵胄学堂的叙说:

“贵胄学堂学生,类皆(大抵都是)王公贝勒,宗室子弟。故具膳(准备伙食)须极丰厚精美。人设一席,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随意,即遭呵叱,甚至且飞盘掷碗焉。总办教习(校长和教员),皆为学生之奴隶,呼往喝来,惟命是听。学生每日到堂,须由教习遣人往请。有请至四、五次,至午刻始莅止(来临)者,抵堂即索午餐,餐毕扬长竟去,并不上课。亦有偶尔兴至,入课堂,高唱京调一出者。故时人拟(比)之为‘安乐园’云。”

如此学堂,如此学生,以及如此的生活条件,在腐败的晚清时代,又怎能培养出真正的将才呢?所以,许多人到这里来,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捞一纸文凭罢了。

欧洲学军



以“新派人物”自诩的载涛，对出洋考察十分感兴趣。率员赴欧洲考察陆军，借鉴西方国家的治军经验，成为他步入政治舞台后的第一件大事。

清朝后期，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入中国，“船坚炮利”的政策对皇室成员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致这样的上谕不断发出：“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寔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陆续派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

一九一〇年春天，结束了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习的载涛，以大臣、皇叔、摄政王之弟的高贵身份，赴欧洲各国考察陆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欧洲之行，使他眼界大开。出现在他眼前的，不仅是辉煌壮观的现代建筑，美妙奇特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自然，载涛也有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从东方古国来到欧洲，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在灯火辉煌的高大宫殿里，载涛身穿的官服，头戴的花翎，脑后拖着的辫子，以及言谈举止，似乎都与周围的一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情此景，不禁使他想起六哥载洵不久前的欧洲考察。

那一次，载洵作为海军大臣，在海军提督萨镇冰陪同下，经英、意、奥，于十月间来到了德国京城柏林。听说大清帝国的皇叔来访，不仅德国政府待以上宾之礼，德国京城的民众也好奇地在街上围观。待他们走下车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位皇叔和海军提督都是身着黄绫马褂，肩佩绶带勋章，



背后却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围观者禁不住发出了笑声。

载洵不愧为皇叔，面对此情此景，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提督萨镇冰则有些不大好意思。到达宾馆，萨镇冰难堪地手执辫子说：“这时代我们还拖着这个尾巴，可笑可笑！”

载涛感到，应当接受哥哥载洵的教训。因此当他来到德国之后，便很快卸下官服，换上便装，而且头一次把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不仅行动方便，也免得惹人发笑。当然，人们也就不会知道他的皇叔身份。但是，德国皇室对载涛的招待同样十分周到，每天都派高级陆军官员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考察。

载涛对德国陆军的训练以及军械枪炮工厂的情况尤为注意，参观过程中，看得很仔细，还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德国皇室知道载涛精于骑术，还派人陪他到柏林近郊骑马。对这件事，当时柏林的报纸以还有点惊奇而又带点儿讽刺的口气写道：“中国的皇叔也会骑马！”

欧洲之行，通过一系列身临其境的学习、研究、考察活动，使载涛茅塞顿开，受到极大震动。耳闻目睹德国皇室自上而下的尚武精神，联想到清廷目前的腐败无能，更使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德皇要求皇族子弟从小接受各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便长大成人后，能立即承担各种军事要职。

载涛由此得出结论：这便是德国得以长盛不衰的基本原因。回忆自己的家族史和满清王朝的兴衰史，经验教训何其相似！爱新觉罗首先依赖武力和军事上的强大，征服女真各部落，统一全东北，进而挥兵入关统一全中国。建国初年，清帝本人练武骑马不说，还明确要求皇族子弟习武崇射。因此，政权得以巩固，国家不断发展。

然而后期，皇室子弟日渐堕落，八旗子弟吃喝玩乐，军权旁落，国力军威日渐衰微。他认为在革命党人对清朝统治提出挑战的危机关头，要督促皇室抓军权，皇族子弟要从军当官，重新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家族手里。

保卫宫禁

载涛在五哥载沣当上摄政王之后，为帮助其监国摄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果断而清醒地提出了加强皇宫内廷保卫工作的建议。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载沣在慈禧去世后的第二天，正式颁布了出自载涛手笔的《申严门禁》。很快，载涛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保卫工作细则，作为《守卫门禁章程》正式出台，并充任总司稽查宫廷门禁的首席大臣。

事实很清楚，载涛的建议、任职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全面而严密地加强了对宫廷清室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仅防范敌人的侵袭、暗杀，也有效地制约了朝廷内部汉臣和满人的倾轧，特别是皇族近支中某些人的篡权野心。

历史的经验，给载涛以极大的启示。慈禧在世的时候，京城及外省常有暗杀王公大臣的事件发生。慈禧既要确保自身安全，又要把她的政敌光绪牢牢地囚禁住，还要防范王朝内外的各种阴谋，因而对警卫工作是十分重视的。

因为，载涛深知，载沣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当上摄政王的，平素又缺乏执政的魄力和经验，很可能有人会趁载沣父子还未站稳脚跟就采取阴谋活动，进而危及皇帝的宝座。

当时，载涛认为需格外防范的人物之一，就是恭亲王溥伟。他凭借祖父奕訢帮助慈禧的功绩，直接承袭王位，家中还珍藏着咸丰帝赐给其祖父的“尚方宝剑”，正可谓“孙以祖贵”。他曾在光绪、慈禧两宫病危的时候，昼夜留在内廷，盼望立刻能当上储君。

尽管载涛家族暂时在朝廷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仍不能掉以轻心。溥仪离开父亲独居宫中，对于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来说，风险是相当大的，万一有人谋害于他，恐怕又要由别人继承帝位了。那样，载涛家族的荣华富贵，便会得而复失。因此，载涛作





为总司稽察宫廷门禁的首席大臣,一开始就把严肃宫禁作为加强宫廷保卫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他明确规定:除特殊值班的外,任何人都不准在宫内住宿。

为了确保载沣的统治,进一步树立他的权威,载涛多次公开表示要做百官的榜样,强调“懿亲宗法”,要守法护法。这样,既对怀有异心的亲贵提出了警告,又显示了自己的胸怀和姿态,从而保证了皇亲国戚们能听从载沣的指挥。

在载涛的劝导下,载沣甚至以宣统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告诫群臣”的诏书。“本月二十二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官员的罢退或提升)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懍守(严格遵守)国法,/矜式群僚(做群臣尊敬效法的榜样)。嗣后王宫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张,淆乱/国是(国家大计)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以求)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对那些不听话的王公百官,列出了可以“治以国法”的四条罪状。

诏书实际上是载沣就任监国摄政王的宣言书,提出了对群臣的要求,警告了野心家和阴谋家,表明如果谁胆敢不与载沣合作,或者捣乱,一定要严加治罪而决不宽容。

由此可见,这道所谓宣统皇帝的诏书,实际上说出了载涛兄弟不吐不快的心里话。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认为是载沣就任监国摄政王的宣言书。这里,公开道明了他合法执政的充分根据,提出了君臣同心、大干一场的动员令,而且严厉警告了政敌和阴谋家,如果谁侵犯了新掌权者的尊严和权威,就要毫不例外的“治以国法”。

尽管载涛对宫禁保卫采取了严密措施,但随着革命活动的风起云涌,连载涛兄弟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一九一〇年一月,载洵结束欧洲海军考察活动,经俄国返回



哈尔滨,险些被革命党人熊成基刺杀。

载涛对此十分震惊,重新部署和安排了对载沣的安全保卫工作。原来公布的《监国摄政王礼节十六条》规定:载沣的“舆服、护卫、从官等应备事宜,详细章程应酌量比照摄政睿忠亲王体制”。后期,陆军部又补充规定:“其应添之头等护卫等项员缺,著改为照亲王额设官缺数目增加一倍。”而实际上,醇王府又加派了一连禁卫军以及一个警察派出所。整个保卫工作不仅人员增多,而且力量也加强。

事实上,尽管载沣上台初期并无思想准备,但随着一系列规定及实际保卫工作的展开,特别是载涛在第一线亲自负责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们狠抓宫禁保卫,严防政敌阴谋捣乱,限制了皇族内部的争权夺利。他们“浩诫群臣”,既强调了法统,又有实际的防范措施,采用威权与教育并重的手法,有效地控制了复杂的政治局面。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开始了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活动。黄复生、罗世勋、俞培伦等人为先,汪精卫也参与了这一计划。但当他们在醇王府附近观察地形时,便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经过暗中查访,警卫人员发现了他们的来历以及在铁铺定制的用以装炸药的铁罐,立即加强了严密的警戒。当他们深夜在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银锭桥下安装特制炸弹时,由于技术准备不充分,不幸败露,导致黄复生、罗世勋、汪精卫等人被捕入狱。

此事轰动朝野内外,载沣更是又怕又怒,他严令法部尚书廷杰施以大刑。但有些人出于惧怕革命之意,反复劝说,清政府正考虑预备立宪,何不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显示皇室的一个新姿态。于是,载沣以“安反侧之心”为名,被迫取消汪精卫等人的死刑判决,改送法部终生监禁,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才又将汪精卫等人开罪释放。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银锭桥事件”。这件事并未使载沣受



到丝毫的皮肉之苦,然而其后果却使他心惊肉跳,犹如大祸临头,他感到平生从未有过的极大震动。

载涛由此联想到在海外时方佐治谋刺自己未遂的事件,明显地感觉到:革命的矛头已经集中地对准了载涛兄弟。这些使他不寒而栗,也令他逐渐清醒,深刻认识到小朝廷危在旦夕,个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以致中途几次试图“急流勇退”。

载涛晚年,曾饶有兴趣地向晚辈讲述过两个神奇的故事:

一是轰动全国的“银锭桥事件”之后,在社会上很快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那天载沣上早朝,马车沿着每天必经的路线,出王府向东,来到银锭桥前,驾辕的两匹白马突然止步,任凭车夫驱赶,一点也不肯向前,并发出嘶鸣声。

载沣顿生疑意,认为今天出门与往常不同,很可能会发生意外,便命令车夫掉转马头,改道回府。警察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加强了对醇亲王的保护,一方面严密搜寻道路两旁,终于发现了埋放在小石桥下的炸弹。这两匹驾车的白马,因“救主有功”,从此再不驾辕拉车,被当作“神马”迁出马圈,在王府正宅的一座小院供养了起来,直至寿终正寝。

二是传说载沣福大命大,全都有赖于华龙寺家庙的保佑。华龙寺在醇王府的东面,是祖传家庙。在那多事之秋,醇亲王常常到家庙乞求庙仙暗中保佑。一次,他乘车途经家庙,特意进庙求神拜仙,乞求神灵保佑。正当载沣诚惶诚恐跪下拜神的时候,供桌下突然跳出个大黄鼠狼。

事后,人们纷纷传言,说摄政王福大命大造化大,连神灵都不敢受他一拜。

自然,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载沣虽无治国之才,但却很会利用一切机会欺蒙视听,以此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威望。

临危受命

出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是载涛在清代所达到的最高职位,也是他旧时代政治生涯的顶峰。

载涛位居军事重臣,正是末代王朝岌岌可危之际。当时,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除了各地农民、市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外,在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革现状,而帝国主义列强又虎视眈眈,伺机入侵。

内外交困的清王朝惊慌不安,深感朝不保夕,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下令在全国进行军制改革。最先实施,也乐于实施这一计划的是载涛的五哥载沅。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曾作为清朝的特使赴德“谢罪”。德皇御弟亨利亲王出面接待,并陪同他参观军队。德国贵族子弟亲自掌握装备精良的皇家卫队,给载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载涛后来考察德国军事,书面概括为:“德皇族制度即亲如皇弟、皇子,无不自陆军学校毕业,以至身入联队当兵,由低级军官以至将领,因此,皇族军事力量强大;教以皇室应以统揽军权,革新武备为第一要着。”后来,亨利亲王来华访问,载沅以光绪帝胞弟身份专任接待,又一次谈及创建皇族武装等问题。最后,他从中总结出一条“经验”,一定要把军队掌握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但终因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为避免慈禧太后的猜疑,载沅才没有敢提出这个建议。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慈禧相继逝去,溥仪正式在太和殿登极为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定国号“宣统”。作为溥仪生身之父的载沅,奉旨以摄政王监国,实际执掌清廷大权。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组建禁卫军,并把这一重任交给他认为最放心,最可靠的人——七弟载涛。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载沣在他执政的第四十天,就正式下达了建立禁卫军的谕令,宣布:“著派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拔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这是载沣作为监国摄政王为抓军权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由一般陆军轮流充当保卫工作的局面。

所谓禁卫军,自然不同于一般军队。它的职责和任务,是用以专门负责保卫宫廷和皇帝的安全。过去,由一般的陆军轮值担当。现在,载沣为保证自身安全,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抓军权,首先建立专门的皇室武装部队,显示了他的政治敏感和军事天才。

一向行走宫禁,耳闻目睹清廷内外错综复杂斗争的载涛,深知全力支持自己的侄子和哥哥,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并非轻易到手的大权。用他发自内心的对他哥哥载沣说的话,就是:“咱可得保住皇上。保住了皇上,就保住了您的摄政王,也就保住了咱哥儿几个!”

身负重任的载涛,对清朝军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编练禁卫军的详细方案。他在《禁卫军营制饷章折》中写道:“近年京外改练陆军,力求精进,而禁廷拱卫犹付阙如,虽有一、六两镇轮流入值,宫系分班抽调,尚非经久之规。”要迅速选调兵学兼优的官长、操法纯熟的士兵,承担起守卫宫禁的重任。

载涛认为,作为专门负责保卫皇帝和宫禁安全工作的禁卫军,应该不同于其他一般的部队,要有自己的特点和威力。在士兵来源上,不仅从陆军中选拔优秀士官,而且招收一部分皇室子弟作为骨干,使之真正成为一支忠诚皇帝的部队。

在载涛的精心策划下,禁卫军开始顺利地组建起来。这支新的特殊部队,兵强马壮,武器先进,而且全军官兵“悉着呢衣革履,一切领帽章记,制造均属精良,所以示判别而壮军容。”当时,不仅一般士兵,甚至连皇室子弟也纷纷竞争入选禁卫军,不能及



时入选则又耿耿于怀。没有如此殊荣和待遇的其他部队，竟对禁卫军提出了异议。但载沣却毫不动摇，明确要求载涛“认真训练，不准疏懈”。这支清末建立的皇族武装，很快成为由监国摄政王亲自控制的宫廷卫队。

同时，作为皇室直接控制兵权的这项得力措施，也曾一度有效地防止了贵族、朝廷中彼此争权夺利的矛盾。颇有心机的载涛，对此似乎还不满足，他又向载沣提出：集军权于皇上，即摄政王兼大元帅手中！

他亲手为载沣起草了一道上谕，写道：“建国保邦，莫先兵力，安危定乱，实在人心。”晓谕全国，加紧练兵。他还明确提出，皇上要行使大元帅的实权。

围绕这个问题，在宫廷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老臣张之洞坚决反对，他说：“皇上是君，元帅是臣，皇上兼元帅，岂不是君臣混为一谈？上谕与祖宗法制、皇朝体制不合，切不能发！”他甚至很不以为然地说：“洵贝勒、涛贝勒都是少不更事，怎能带兵练兵？”

这一下子，倒是激怒了生性平和的载沣，他心想：“反对我们家的人掌兵权，岂不是要夺我们的命根子吗？”于是，他更下定决心，必须把全国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家手中！

一九〇九年的夏天，在载涛的多次建议和筹措下，载沣终于代下诏书，采取了集军权于一身的重要行动。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项：

一是明文确定由载沣执掌军权，亲任陆军大元帅，从而明确了军事统帅权的归属。在皇帝年幼不能亲任陆海军大元帅的情况下，暂由载沣作为监国摄政王代理。这不仅在传统上有了正名，而且对那些妄图夺取军权、皇位的人们，也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二是下令设置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沣的六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第一次把海军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为将来正式成立海军部做好准备，也就是为载洵日后当海军大臣铺平了道路。



同时,载沣嫌负责海军事务的大臣过多,借机削去了奕劻等人的军权,为自己直接掌管海军打好了基础。

三是决定专门设立军咨府,“秉承诏命,襄赞军课”,并把它从陆军部里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协助摄政王统率全国陆、海军的权威机构。而负责这个相当于总参谋部,统掌一切军事大权的军咨大臣就是载涛。

原先的军咨处,早在宣统年间就已建立。作为陆军部下属的一级机构,所谓任务不过是根据陆军部长的命令,作出筹备防务和用兵的规划、管理、考察和使用参谋人员,管理军事院校,派遣驻外武官、更换武器装备等,充其量不过是陆军部长的参谋。

而现在,军咨府单独设立,并从原来的陆军部彻底分离出来,使它原来作为陆军首脑的参谋助手,一跃而成为协助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军的总参谋部。

实际上,原来各军兵种所有关于国防用兵的一切命令、计划等,首先要由军咨处提出方案,经皇帝批准颁发,由陆海军各部执行。这就是说,载涛所亲自执掌的军咨府,实质上是载沣集中军事大权,决策最高军事机密,代表皇帝全权指挥军队的高级御用工具。

改革营制

担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的载涛,尽管为时不长,但还算是尽心尽职的。

载涛认为,训练禁卫军,事关重大,头绪纷繁。调整营制、训练营队、筹备饷械、组织编练等,亟须建立一个总汇机构。于是,他提出奏折:“参照督公所及镇司令处之制,在京师地方设立禁卫军训练处。”

每日清晨,载涛在马队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来到禁卫军训练处。春风得意的载涛,身穿一套灰呢禁卫军官服,马裤下蹬着



一双大皮靴，后跟上的踢马刺锃光瓦亮，所到之处，还发出马刺颤动的噔噔声。好不神气！训练处设在东安门外西堂子胡同，后来由于机构扩大，地方不够用，又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嘎嘎胡同购置一片民房，作为办公处所。

从此，原本一条寂静的胡同，得了个“嘎嘎”的浑名，后来又改名为禁卫军衙。在这里，载涛使用“钦命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的关防大印，发布文件，签署命令，总理禁卫军一切事务。

载涛所采取的一系列集中兵权、改革营制的措施，使禁卫军组织逐渐严密起来。他任命了六位得力的军咨官，受命于训练大臣，办理奏咨行存各项文牍以及综理筹备、考功、军略、调派、教育、训练等事宜。同时监察“四科”及协标营队。

四科分别为军械科：办理关于军械各项文稿，管理全军器械，兼管武库，各军械官长悉归节制考察。军法科：办理关于军法各项文稿，本军兵夫遇有过犯，分别公私罪情，按照军律及陆军通行章程办理，同时兼管军狱。军需科：办理关于军需各项文稿，经理饷项事务，各军需官长悉归节制考察。军医科：办理关于军医各项文稿，经理卫生事务，兼管医院，各医务人员悉归节制考察。

载涛认真借鉴外国治军的经验，特别是以德国、日本为榜样，将禁卫军编制定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由于当时人数有限，暂不设立镇统。所有步、马、炮、工程、辎重、军乐等标营队，按兵种编练。

步队两协，统辖四标，每标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共计四百三十二棚；马队一标，计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共四十八棚；陆路炮队一标，计三营，每营分中左右三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共八十一棚；工程队一营，分左右两队，分办行军桥梁、沟垒、电器、雷具各事，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共十八棚；辎重队一营，分左右两队，分办运输枪弹粮秣、桥梁工程等项。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共十八



棚；交通队一营，分办铁路、电信两队，每队三排，每排九棚，共五十四棚；军乐一队。

这里记录的是载涛为禁卫军写下的训练计划：“其前队一、二两标，以第一镇正副目为基干目兵，挑选京营八旗及圆明园、健锐营、内外火器营各旗兵入伍。其官长自管带以次，调由第一镇军官考取录用；第三标续亦如之。第一标统带为忠和（陆军大学毕业），二标为崇恩，三标为扎拉芬（陆大）。清朝宗室，向不充兵，特别奏请挑选入伍，与其他兵丁一体待遇。第四标则奏准专赴直隶、山东挑选农家及格壮丁入伍。其四标之统带，则调田献章充任。马标统带为王廷桢，马一营管带为罗虔（留法陆军），刘嗣荣（留日士官骑兵科）。调马三营目兵补充炮队，将全营目兵调蒙古马队补充，以锡琨为管带（留日士官骑兵科）。炮标统带为宋玉珍（陆大、原军械科科员）。工程营管带为刘锡龄，刘后升任步四标统带，以于彰充补。辎重营管带为兰芳（陆大、后更名为傅桂生）。并成立警察队（即宪兵）一队，队长为李正鹏。军乐队一队，队长为李士奎。”

禁卫军制服威严醒目，这也是载涛精心设计的。他在向清廷申请经费时说：禁卫军是一支宫廷卫队，“出备扈从，入供宿卫，责任綦重，体制宜隆。即衣履服装必须整肃鲜明，自成一部，即便易于识别，亦可壮天观瞻。”因此，载涛参考外国的特点，又区别于本国陆军服制，制订了一整套禁卫军服制。这套服装分帽徽、军帽、领章、肩章、军常服各项，并用三等九级以辨品序。

载涛设计的禁卫军服制，等极标志十分鲜明，宗室觉罗有别，官佐上中下各等有别，官兵有别，各科目兵有别，兵匠有别。这一方面固然是“以示识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军队森严的等级制度。

关于爵章，载涛颇动了一番心思。他自欧洲考察军事归来之后，参酌中外制度，亲自拟定奏请制定爵章制度，计分五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满、蒙一律），其式样采取分茅胙土之

义,中镶红宝石,四周以嵌珠之多寡为等差。凡亲王以次任军职者,由禁卫军大臣奏请颁给佩带。

抵制立宪



皇
叔
載
涛

众所周知,君主立宪并不取消君主,这在当时显然是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清朝皇室的政治改良。然而,信奉和实施高度集权的慈禧,一辈子都在拼命地追求权力,甚至连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和亲侄子亲政都不能容忍,又岂能甘心立宪呢?在她的指使下,载涛和他的哥哥载沣,将千方百计地阻止和拖延立宪,当成了头等大事。

当时,清朝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对外作战,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割地赔银,已使大好河山沦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内加紧盘剥,苛捐重税,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悲惨状况,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为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号召推翻君主专制的政体,建立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而更多的人则是没有革命勇气的改良者,尽管不满清朝皇室的统治政策,但又害怕革命,希望参加到统治阶级的阵营里去,他们的旗帜就是君主立宪!

他们十分清楚,鼓吹民主共和,那是要犯杀头的叛乱大罪。而立宪则以不推翻君主为前提,即使公开论争也不算犯罪,所以寄希望于立宪的人很多,公开宣传的人也不少。民间社会有呼吁,封建上层社会人士也有不少主张,尽管动机不同,害怕“大清”会没落消亡,想从立宪中得到解脱。

阻挡不住日益强烈的立宪呼声,清室开始安排执政的王公大臣,陆续到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载涛并不是首批出国的,在考察欧洲军事的同时,他也奉旨考察各国政体。比较之下,他还是对高度集权的德国政体感兴趣,认为只有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室手中才能政权牢固,富国强兵。所以回国叙职,他除了介绍军



事,并没有在这方面发表更多的意见。而先期出国的载泽等人,认真考察了英、美、俄、日等十余国,历时数月,回国后认为有善可从,奏请立宪。其中,载泽还单独给慈禧上了一个“密折”,说立宪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等。

慈禧死后,载沣监国摄政。他总揽朝廷大权,仍然不急于行宪。虽然他与慈禧有很多不同,也作了不少改善,却偏偏在立宪上,两人同样顽固。载涛理解哥哥的行为,在各方面给以支持。在他们所把握的军政大局下,立宪更加举步维艰,遥遥无期。

后来,各省相继成立咨议局,呼吁加快立宪。他们集合十六省代表,云集北京,四处演说,散发资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这一行动,策划早、联络广、时间长、影响大,非同反响。然而,惯于敷衍应付、优柔寡断的载沣,丝毫不为所动,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松动,反而下令禁止再为此上书请愿。

与哥哥一样,载涛当时头脑中的民主意识实在是太差了。如果及时沟通,交换意见,共商办法,总是会有共识和出路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采用这种形式。载涛当时所作的,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立即加强京城保卫,维护社会秩序,防止请愿代表渗透到民众中去,杜绝动乱的发生。

载涛当时难以想象,他如此辛辛苦苦地安排保卫工作,不但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反而火上浇油,促发了立宪的进一步高涨。请愿代表长期驻京,活动不断,从初夏一直延续到深秋。最后,取得资政院支持,又一次上书载沣摄政王,“遍告当道,痛哭流涕”,力陈行宪不可不即办之理由。资政院立即通过此案,“高呼万岁,即日上奏”。

迫于形势,载沣无奈第一次作出让步,同意召开国会,并先行组织内阁。同时,他又想以此小小的让步封死人们的嘴巴,不许再说立宪的事情了。同时下诏说:“此后,如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由此可见,载沣把行宪要求同“煽惑”、“破坏”等联系起来,特别



是把行宪视为“愚氓”，并扣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而加以惩办，就更是大错特错，错上加错了。

于是，载涛为此采取了强硬手段，为确保“京师安宁”，下令遣散了各地在京的常设机构和请愿代表，“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更有甚者，东北三省召开万余人群众大会，并推出上京代表十余人，上京请愿，要求加快行宪。

载涛毫不容他们在京停留，下令军警将他们押解回境，同时下令京外各官，“如有同事，弹压拿办”。后来，天津各界代表三千八百多人联名上书，也遭到载沣的斥责。天津学生上街请愿，遭到军警镇压。载沣下令，如果再有来京请愿和在各省“聚众闹事”的，“必定严惩不贷”。

载沣按照自己的承诺，首先推出了精心设定的责任内阁，不料却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所谓内阁成员十三人，主要位置让八名满人占全了，点缀的是其余汉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这八名满人中，又有五人是皇族。其中海军大臣，仍然是载涛的六哥载洵。人们平时抨击最猛烈的就是臭名昭著、七十高龄的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竟摇身一变而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后来，人们索性称这个内阁为“贵族内阁”、“皇族内阁”。

此时，从慈禧到载沣，假立宪真专制的真面目，已彻底暴露无遗。人们对清朝皇室立宪行宪的最后一丝幻想，完全破灭了。此路不通，人们只好转而寄希望于革命，就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清政府失信于民，顽固不化，也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

随后，武昌起义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拉开了摧毁清王朝的序幕。载沣这才被迫下诏取消皇族内阁，然而此时已经全然晚矣。任何措施，都挽救不了清王朝的必然灭亡。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载涛晚年回忆此事，仍然感到十分的不安和强烈的自责。他甚至觉得，这可能是自己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尽管后来他激流勇退，并未参加皇族责任内阁，但对清朝皇室开



始拖延、玩弄立宪时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痛心不已,久久不能宽恕、原谅自己。

对于载沣当年在此事上的长时顽固不化,前后矛盾,有不少人不理解,并产生争议,加以强烈的抨击。而载涛认为,载沣当年作为监国摄政王,一身关系大清王朝的安危,一要挽救危机,制止革命,二要防止内乱,确保王室绝对权威,只能在拖延、玩弄立宪上要手腕了。而且在当时紧急危险、错综复杂的时刻,不仅起用汉人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另用满人也未必比老人更可靠,这也是载沣责任内阁中多是原来满人、老人的主要原因了。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载涛对此事的认识,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胡绳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又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编 练 校 阅

载涛确实治军有方,不负众望,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还真把禁卫军编练出了个样子。

为了真正能带兵操练,载涛对于官长的选择,十分注重。他突破传统观念,不分满汉,认真擢拔那些兵学优长、操法娴熟的官长。担任步、马、工各标营的官长,主要从全国各地的讲武堂中按科精选,另外也挑选一部分各旗官长先行加课教练,然后再带队训练。

担任禁卫军最下一级职务的各棚正副职,必须经过考试,单科包括算术、绘图备考、军队内务、卫生学、初级战术学等。术科包括徒手教练法、持枪教练法以及口令等。

对于技术性较强的兵种,载涛要求更加严格。炮队统带及各官长,要先出洋留学,并监视选炮,考求操法。一般官长要先入陆军部炮队专科学堂研究炮队战法、内务、操场打靶等专科学术。待统带等回国后,再一起合练。



交通营也是如此,选择工科成绩优秀的陆军学生,作为可担任管带的培养人才,先到邻近国家专门研究交通学术。一般官长则分赴铁道、电报、电话各处实习,待毕业后再合编训练。

由于要求严格,训练十分艰苦。为保证训练正常进行,提高射击水平,载涛制订了一套奖惩制度。他规定:在奖励方面,一是对射击优胜的目兵,按照等级颁给射击徽章佩带,以资鼓励;二是对查拿逃亡目兵有功的官兵给予奖赏。在惩罚方面,主要是对查拿逃亡目兵不力的部队长官和地方长官进行惩戒。

载涛当时写道:“禁卫军虽然饷精装服给养极优厚,但仍然有逃亡,行文查拿百无一获。”这是因为,有些士兵不愿为封建统治者卖命,而以逃亡作为一种反抗的手段。这个道理则是载涛当时所根本想象不到,也无法理解的。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训练,载涛终于宣布:禁卫军已正式编练成军,并奉请监国摄政王亲临校阅。新军包括部队四标,马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机关炮各一营,军乐一队,警察一队,全军总人数达一万二千多人。

宣统三年(一九一—)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德胜门外两黄旗校场战旗猎猎,军号齐鸣。身穿战时服装的禁卫军,在载涛的亲自指挥下,全军整列队伍接受校阅。

当载涛作为监国摄政王大驾亲临校场时,全军均按阅兵式队形举枪致敬,军乐队同时高奏《崇戎谱》。载涛等禁卫军训练大臣上前参拜,并呈送全军名册。接着,两协统领率掌旗官、卫旗兵来到阅兵台前,恭请摄政王上台颁发标旗。

标旗是禁卫军的军旗,这面旗帜也是载涛主持设计的。标旗平面分黄白红蓝四色,黄色格内绘火球彩云及五色飞龙;白色格内正书满文标数。旗边均编缀金色长穗,旗杆旁还有一条更长的红色飘带。

载涛授旗后,在载涛的引导下开始阅兵。在摄政王临座的阅兵台前,载涛手持指挥旗,统领全军进行演练。阅兵结束后,



队伍仍按阅兵式队形集合。载沣离开校场的时候,全军欢呼,举枪致敬,乐队同时奏乐。

校阅后的第二天,载沣下谕嘉奖:“该两协官兵均精神振奋,动作如法,颇能仰体朝廷整军望武之意,成效昭著,深堪嘉许。所有两协,各官长著载涛事择优以军官拟补,其补有军官者著按其职任酌量提升,以示鼓励。”

载涛训练禁卫军有功,受到特殊荣誉。为此载沣特奏上谕:“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郡王衔贝勒载涛、辅国公衔镇国将军载涛训练有方,不辞劳瘁,均著加恩赏穿黄马褂。”

当然,载涛也有遗憾的地方,原定一九一一年深秋,调集禁卫军各部举行永平府大操,由载涛代表监国摄政王亲临监军。载涛深知,载沣要举行盛大的军事演习和检阅,目的在于大鼓士气,振奋军威,既为皇帝增光,也为家族添彩。但后来形势日益紧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发生后,载沣首先泄气,他下令停止永平大操,从而使载涛失去了最后炫耀自己的一次机会。

多少年之后,载涛还不无遗憾地说:“其实,永平大操的地点在河北东部,离武昌还有两、三千里的路程。而且从策略上讲,正因为武昌有事,才更有必要进行大操,为的是稳定军心、民心嘛!”当然载涛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维护当时的载沣政权,因而又是十分不明智的。

除袁未成

载涛虽然军权在握,却不敢丝毫大意。他清醒地知道,自他从政后,宫廷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其中,最令人感到头痛和威胁的是袁世凯。

载涛弟兄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的兄长光绪帝因袁告密出卖而被慈禧软禁瀛台,直至含冤而终。这件事一直使他们耿耿于怀。



载涛永远不会忘记五岁那年,也就是载沣承袭王爵的第二年的元宵节,他与两个哥哥进宫参加光绪皇帝的宗亲宴。二哥找到三个亲弟弟,蹲在地上跟他们说了一阵尽是逗乐的话,还用手拧载涛的小脸蛋,使他感到不是和皇帝在一起,而是和大哥哥在一起,备感亲切自然。

后来听说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出于对光绪皇帝的骨肉之情,从此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当时外面曾有传说:光绪帝临终时,曾拉着载沣的手托付过心事,让他一定杀掉袁世凯。还传说,隆裕太后整理光绪遗物,发现在他的砚台盒内有“杀袁世凯”的四字御笔,便亲手将朱谕交与载沣来办。

当然,这只不过是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传说。当事人载沣也从来没向外人透露过内幕,在他凡事必记的日记上也没有一点记载。熟知载沣的载涛也说过:“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讲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但后来为什么人们总是提起这些事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确实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载沣当政后的愿望以及同情光绪的那些人们的心声。袁世凯在进入民国时代后,还搞洪宪皇帝那一套,是历史的倒退,特别是他卖国求荣的行为和丑恶嘴脸,深深激怒了全国人民,人民从心理上相信和希望袁世凯应该被杀掉,全国共诛之。

当时未能及时杀掉袁世凯,载涛晚年曾著文分析了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清朝宗法的制约。他说:“清朝宗法最严,尤其是近支王公更不能稍有轨外行动。所以每一代皇帝死亡和继承的时候,从未有如过去历史上各个朝代所发生的那种变故。当辛亥年冬,丁士源曾问过善耆:‘王爷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时候,为什么不帮助摄政王将袁除掉?’善耆说:‘你不知道,我们宗族王公,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我虽是御前大臣,怎么敢在宫内乱来。’这段回答,曾见丁自著笔记。这是实在情形,载沣究竟不是皇帝,其不能作断然的处置,此亦原因



之一。”

载涛兄弟恨袁世凯的另一个原因是，载沣摄政时，担任军机大臣要职的袁世凯，凭借其影响，采取各种手段，在军界培植了一批私人势力。近畿陆军将领以及数省督抚不是为袁所提拔，就是与袁暗中勾结，已造成对清廷的极大威胁。

因此，载涛兄弟如今执掌大权，为了替兄长光绪报仇雪恨，也是为了自己彻底实行皇族集权的计划，他们都不能容忍这个集军、政、外交实权于一身的汉族大臣袁世凯。尽管他们当时日理万机，仍把除袁作为第一要务。

载涛极力主张杀掉袁世凯。他认为，慈禧死后，世上怕无人再控制得住袁世凯。今日不除，一旦袁羽翼丰满，大清江山必沦他手。在当时的满族王公大臣中，主张杀袁的绝非载涛一人，而是大有人在。其中既有掌握军权的铁良、良弼等人，又有皇族亲贵善耆、载泽等人。

为促使载沣早下决心除袁，恭亲王溥伟竟找上门来，捧着祖先传下来的御赐白虹刀，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持御赐宝刀亲手除掉袁世凯这个元凶大慝！然后向天下公布袁的罪状。

为了促使载沣狠下决心，彻底解除袁世凯兵权，全面掌握全国军事大权，载涛不仅自己反复陈述，而且联络其他有志之士一起活动。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那里辞行，载涛便专程陪他进宫，委托他再次向载沣建议除袁。

但李经迈很快就出来了，他失望地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只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说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完，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常使载涛摇头叹息，无可奈何。

然而，载沣却没有当年康熙帝擒鳌拜的智谋、决断和魄力。他优柔寡断，迁就妥协，不但杀袁不成，反而加速了他们兄弟的早日下台。他本想先取得元老重臣的支持，再下手杀袁，但却遭



到了完全受袁支配的奕劻、张之洞的强烈反对。

袁世凯颇有自知之明，过去仗着慈禧保护，尚无性命之忧，现在，载沣当政，杀机在所难免，因而千方百计寻找逃生之计，暂时保全性命，待有时机，再图进取。于是，他以骑马摔伤为由，自动提出辞职。

此时，很多被袁世凯买通的人，包括一些驻华外国公使，纷纷出面为他说情。无奈之下，载沣最后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将原来请诛袁世凯变成了“开缺回籍养病”。岂不知这又埋下了一个祸患。

其实在这件事上，载涛也有难言之处。他晚年曾向族人透露，当时如以先帝遗诏杀袁，固然有利于载沣执政，而且会得到同情光绪帝的满汉人民的拥护。但同时，必然涉及到变法维新，而得罪慈禧又是载沣所根本不敢做的。

袁世凯虽被解除职务，但他的势力并未随之散去。在暗中，他与朝廷中倾向于自己的政治派系又开始了新的勾结。纵虎归山，自贻后患，这也是载涛兄弟终生一桩憾事。载涛曾反省和自责，如果当时果断地除掉了袁世凯，以后的历史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自然，那时的载涛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了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的。

袁世凯是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实际上，他自退隐之日起，与外界的联系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远在千里之外，却对载沣的活动了如指掌。他与旧部下属随时交换信息，与各国公使也经常沟通联络。

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一直伺机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乘清廷惊慌失措之机，伸手向载沣要权。袁的亲信，此时也一起鼓噪：“非官保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本不愿这个冤对头复出，但又苦于毫无良策，只得含泪屈从，被迫起用袁世凯，组成了以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

载涛亲自执掌驻扎京城的禁卫军，对于新上台的袁世凯无



疑是个心腹大患，他下决心首先解除这一重大威胁。他向皇室提出：“当此干戈扰攘之际，皇族必须亲自出征，以为各军表率。”

这一招，使得只练过兵而从未打过仗的载涛，只好被迫自请解职，拱手交出指挥兵权，并奏请禁卫军听由袁世凯任便调遣。接着，袁世凯又着手夺取禁卫军的全部大权，委派冯国璋充任禁卫军总统官，令原训练大臣载涛务须妥为交代，再行离任。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载沣颁布重要诏书，即为挽救封建王朝危机而发的“罪己诏”。在山穷水尽、万不得已之时，载沣指望“罪己”能为朝廷带来一线生机。然而这只是流于形式的一纸空文，缺乏扭转局面的信心和应付事变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载沣预定的保国保位的目的，反而加速了他的下台。

“罪己诏”颁布后的第三天，载沣被迫授权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与此同时，载涛的军咨大臣一职也被免去。

载涛交出了刚刚编练成军的精锐之师——禁卫军，固然意味着他的失败，而大权在手的袁世凯，同样挽救不了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清王朝。

载涛正式被免职不到一个月，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载沣，在各方面重压之下再也无心贪恋这个既无实权、又无效用的高官，终于下定决心，正式向隆裕太后缴还监国摄政王大印，返邸归藩。两个月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国最后一代皇帝宣统就宣布退位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载涛这位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军咨大臣，从上任那天起，到清王朝被推翻、下台为止，前前后后两年时间，却没有打过一次仗。“军咨大臣”也实在是徒有虚名。

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各省督军疲于应付，急电朝廷派兵增援，而载涛却无兵可派，也指挥、调度不了部队，甚至连必要的枪支弹药也增援不了。无奈之下，有时只好让地方自行招募兵勇，以解燃眉之急。如此仓促成军，既



没有训练,又没有精良武器,哪里谈得上作战呢?而且,当时形势瞬息万变,电报又常常受阻,一切军事行动都要集中通过军咨府转达,则根本行不通的。在对清廷皇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载涛作为皇帝之叔、摄政王之弟,肩负最高军事领导之职,本该亲临前线指挥,至少也应在二线督师,然而,他却只知当官,不会作战。

溥仪事后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辛亥年在革命党威逼清室的情况下,皇室内部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

一次,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听取各派的意见。和、战两派,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载涛却始终一言不发,没有拿出任何对抗革命的办法,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抵抗,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态度。太后则于打与不打之间,难以作出决断之时,便回过头来问跪在一边的载涛:“载涛,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一听,连忙趴下叩头,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

在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载涛确实说出了心里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状况。他根本不知道清廷军队的战斗力,也无法预测士气如何。太后见此情景,实在泄气,说了声:“你们先下去吧”,就散了御前会议。

对此,人们众说纷纭。皇族中有人说载涛是一个窝囊、无能的书生,作为军咨大臣却没有保住大清王朝,应该是列祖列宗的罪人。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载涛头脑清醒,审时度势,没有成为阻拦历史车轮前进的障碍。最好还是让历史对载涛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辅佐溥仪

择定帝师

载涛与溥仪的关系比较特殊，一则因为他是皇上的亲叔，为宗室近亲；再则因为溥仪的父亲载沣生性懦弱，政治上缺少见识，很多事需仰仗载涛周旋。

也许主要由于这个原因，溥仪在小朝廷时代，甚至被赶出皇宫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多事情都要让载涛去办，或找载涛商议。宫内的婚丧嫁娶以及他个人的一些事情，溥仪都主动征求载涛的意见商议处理。

当时，宫内外，溥仪与王公大臣之间的隔阂相当突出，包括一些近支王公，甚至于生父载沣。父子之谈，机会很少，时间也很短，不外乎天气冷暖、日常生活上的饮食起居等小事情，很少涉及时事及其他重大问题。

所以，溥仪与载涛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在当时王公大臣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有时，载涛主动进宫，报告时事、见闻以及建议。更多的是被溥仪召进宫，对于他个人的某些问题，例如宫内的开支、人员、婚丧嫁娶等，互相商量处理。遇到急事，或不便谈的时候，便叫当时在宫内伴读的载涛之子溥佳，来回传递信息。

载涛当时颇以此为荣。而六哥载洵虽也与溥仪是叔侄关系，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其他王公，也很少见面。当然，这也与宫廷制度有关。如不经皇帝召见，王公不能轻易进宫。对于王公的礼节限制，则比其他大臣更为严格。所以王公视进宫为畏途，怕成“失仪之罪”，还是不召不见为好。后来，溥仪出宫后，



王公则无任何职守，大都在各自府邸之内养尊处优，彼此之间的来往就更少了。

曾一度对溥仪产生过影响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就是经载涛一手安排请进皇宫的。

辛亥革命以后，溥仪仍深居宫中。但自从张勋复辟失败，时局对清室日益不利。这时候李鸿章的第四个儿子、精通英语的李经迈向载涛建议：让溥仪学习英文，以便日后一旦有变，或出国留学，或到海外做“寓公”，这对皇帝、皇族都是极为有益的。载涛对李经迈的建议十分重视，同时他也看到溥仪不可能久居宫中，学点外文，未雨绸缪，将来兴许有用。

说起载涛同李经迈的往来，得回溯到溥仪登极的时候。那时，载涛被委任为军咨大臣，朝廷派他到欧洲考察陆军，李经迈曾担任他的首席随员。其间，他同载涛多有接触。辛亥革命以后，李经迈匿居上海租界，每年都到北京来两趟，每次来总要拜访载涛，在载府逗留几天。

由于这些渊源，载涛确认李经迈建议溥仪此时学英文是可行的。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溥仪的父亲载沣和溥仪的两位汉文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协商，又向几位太妃作了游说，决定为溥仪请一位既有学问、又有外国政府关系的洋师傅。

聘请英文老师的事，载涛请李经迈代劳。李经迈原本同外国人就有特殊关系，又受载涛之托，很快就正式聘请了庄士敦做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任香港英总督府秘书，是一个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风土人情的英国人。庄士敦于一九一九年从上海来到北京，首先拜访了载涛，商量的进宫的时间、教授的具体安排等事项。

然而，就在庄士敦入宫执教的消息传开以后，宫廷内外发生了一场争吵。不仅是皇室成员、王公大臣，就连一些满汉遗老，也纷纷表示不满：

“中国皇上学洋人打哪噜，祖宗家法哪条规定过？”

“洋人来中国教皇上，准是别有用心！”

.....

可以想象，在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中，与闭关锁国的经济同时存在的还有闭关锁国的文化。那些盲目排外的统治者，依然陶醉于祖宗的遗训之中。同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外国人要进中国皇宫给皇上教书，引起一场震惊，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场纷纷扬扬的争论，最后仍然是载涛平息的。他一方面给他胆小的哥哥载沣打气出主意，不能后退；一方面理直气壮的援例祖制，说：“目极太妃群臣，当年世祖章皇帝和圣祖仁皇帝都请过洋师傅，学习历法、天文；顺治皇帝向德国人汤若望请教过望远镜、天象仪等天文学知识；至于康熙皇帝更是开明，他曾经陆续向比利时人南怀仁了解过算学，向法国人白晋、张诚请教过几何、地理、天文等。”

载涛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直说得当时噤若寒蝉的端康太妃也壮起胆子作了有力的补充：“当年德宗景皇帝也提过，要找个洋师傅学学洋文呢！”

其实，载涛还有一个埋在心底的愿望没说出来，那就是少年时代他曾经十分敬仰为中国变法富强不屈不挠奋斗终生的胞兄光绪帝；青年时代他自己又亲赴欧洲考察，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强盛，经济上的迅速崛起，都曾激励他立下富国强兵的志向，他确实为之奋斗，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他热心为溥仪聘请洋师傅，也是希望为溥仪创造些条件，扩大他的眼界，增长一些新的知识，以完成长辈们未竟的事业。

经过一番周折，这件事总算办成了。庄士敦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多年，走遍内地各省，游遍名山大川。他熟悉中国历史，了解风土人情，对孔孟之道和唐诗宋词尤其欣赏。他对溥仪，不仅传授英文，更注重将他教育成亲英国的绅士那样的人。特别是





后来,庄士敦教育的内容,更多的是课外的课题。溥仪从中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强盛,各国政体国情及王室生活、自然科学和经济技术的发展,还了解到中国内部的复杂以及与西方文明的关系。

由此,溥仪当时确实学到了一些国内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为了帮助溥仪学习英文,载涛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推荐了两位伴读。一位是载涛的次子溥佳。一位是载沣的次子,溥仪的亲弟溥杰,但庄士敦只选中了溥佳。当然,载涛后来又安排溥杰做了汉文伴读。

载涛接到溥佳派在“内廷行走,伴读英文,赏在紫禁城内骑马”的上谕后,十分兴奋,当即教授儿子朝见皇上的礼节。第二天一早便带着他进宫去“谢恩”。在高大的宫殿和森严的气氛中,叔叔向侄子跪下,以额触地,连叩三个响头,并高声说:“奴才带领溥佳叩谢皇上天恩!”

伴读的作用,开始十分明显。淘气的溥仪,终于能够坐在书堂里读书了。对于他的过失,老师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办法,即惩罚伴读以代皇帝受责。起初拘束,后来彼此熟悉了,溥仪又恢复了他那顽皮淘气的本性。他不仅敢偷偷拔老师的眉毛,还公然脱下鞋袜,放在正讲课的老师桌上。老师当然不能责骂皇上了,只好把气出在伴读身上。伴读把一切看在眼里,却连口大气也不敢喘,忍气吞声,代为受责。与其说是入宫伴读,不如说是入宫当代罪羊。

在庄士敦的循循善诱下,溥仪开始了解了他的苦心,逐渐地明白了,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更注重的是要他成为一个像英国绅士那样的人。于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糖果中的化学反应,茶会上的礼节,这些所谓的西洋文明,逐渐融入了溥仪的心灵。他甚至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庄士敦正是西洋人中最有学问的人。能在溥仪身上产生这样的魅力,恐怕连庄士敦本人也未料到。

在庄士敦的努力下,溥仪打开了对外的“眼界”。紫禁城里,



出现了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他们恭敬地称溥仪为皇帝陛下。

载涛经常为溥仪处理一些难题，如为溥仪请理发师。说来话长，清兵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曾强令全国男子剃发梳辫，布告中说：“遵依者为我朝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从此，清代中国男子的头上便拖了一条辫子，一拖就是二百多年。

清朝末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汹涌澎湃，很多志士仁人为表示推翻清朝之志，率先剪去发辫。辛亥革命后，全国人民纷纷易服剪辫，但逊清皇室及八旗族人，仍袭旧制。民国政府内务部曾多次函照清室内务府，劝导旗人剪去发辫，以便昭示大同，统一风俗。京师警察厅甚至经常派员巡视各王公府第，催促剪发，直至强行剪发。

溥仪就曾接到辅国公溥葵的报告，“近有总厅差巡捕沿户催问剪发之事，如不剪者，官长去职，食饷人扣免”。还说：“不料近日巡警无日不来催问。更有葵使人上街买饷，突来四五巡警勒令剪薙，现业有二名已被勒剪者。”

针对这种情况，逊清皇室曾千方百计地提出种种理由阻止剪发，甚至作出规定，出入禁门一律要检查辫子，没辫子的不能进宫。这样，在宫中服务的满籍人员，为保证生计，的确不愿剪辫。最后，双方争执一直打到民国总统徐世昌那里，徐不得不亲自写信给内务府大臣，温语劝导说：“门禁稽查，不一定以辫子为准，可发给特别标志，以便随时辨认。”虽经民国政府一再催促，紫禁城内依然是辫子的世界。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特别是庄士敦入宫后，常向溥仪讲到辫子如何不好，讥笑是猪尾巴。而溥仪的英文伴读、堂弟溥佳恰恰没有留辫子。于是，溥仪执意要把辫子剪掉。大清国皇帝居然要剪掉辫子，违反了祖制，那还得了！自然又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尤其是太妃和师傅们更是苦苦劝阻。



但这对于固执、任性的溥仪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个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还真有个拗劲，终于让“下人”找来剪子，自己动手把辫子剪掉了。这下子，在宫内外引起了震动，上上下下议论纷纷：“皇帝剪了辫子，还成个什么样子！”端康太妃一见皇上成了“秃尾巴”，气得浑身颤抖，直翻白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他太妃也是又哭又闹，认为此举大逆不道，辱没祖宗。为了撒气，她们下令把侍候溥仪读书的几个太监，痛打了一顿，然而对溥仪，还是毫无办法。

最后还是由载涛出面在街上理发店找了个师傅，到宫里来给溥仪理了个“学生头”。上行下效，从此，常在他身边伴读的弟弟溥杰、侄子毓崇等也相继把辫子剪掉了。

在载涛的说服下，连最古板的摄政王载沣也很快接受了这一现实。世续和陈宝琛两位老臣对此颇为不满，他们曾在回忆录中描写了载沣的新装束。清朝的王爷，接见他们时突然穿了一套崭新的藏蓝哔叽西装，脚上却是纯粹古典的粉底皂靴。

看到他们惊讶的目光，载沣不好意思地说：“自从奉了家慈恩准，剪去辫子。辫子既失，也得顺乎潮流，配上新式服装，七弟载涛介绍麓记西服店，就订制了这套衣服。瞧，这条领带还是载涛亲手给我系的。”

短短几天之内，紫禁城内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这是小朝廷内部一次大的移风易俗。最后，只剩下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留着辫子，直到拖着辫子进了棺材。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人们无不佩服载涛的远见卓识和精明果断。

张勋复辟

逊位后的清室，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时刻刻在政治风云的旋涡里挣扎。载涛欲干无力，欲罢不忍，为此煞费苦心。而张勋复辟一幕更令他胆战心惊。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凌晨，熟睡中的载沣被太监从床上叫醒，说载涛有紧急电话相告。搅了好觉，载沣颇不情愿，但又不能不接七弟的电话。他披着内衣，拿起电话还埋怨：“深更半夜不睡觉，有什么事白天不能说吗？”载涛急声厉语，一下子惊醒了载沣的睡意：“五哥，张勋率兵进宫了，您有什么高见吗？”

载涛见载沣毫无思想准备，电话里又一时说不清楚，急得扔下话筒，风风火火地赶到载沣家。

与此同时，载涛的六哥载洵也闻讯赶来。这位前清的海军大臣，近几年来无所事事，沉浸在鸦片和酒色之中，听到张勋复辟，好似注射了一针吗啡，又挺起了精神，来向曾任监国摄政王的五哥要官讨封来了。

这时，载涛头脑十分清醒，他稳定了大家。他讲，在这复杂多变的历史关头，不要急于动作，先摸清各方面底细再行动。

载涛是了解这一形势的。自清室退位之后，不少人不甘心服从这一历史命运，妄想重新恢复大清江山，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遗老遗少，纷纷付诸行动。他们密谋串联那些取代清王朝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利用其手中权力，以恢复祖业，“还政于清”。这些年来为大清复辟而奔波的人不少，但没有任何一人能成气候。

例如，肃王善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满洲建立了军队；恭王溥伟和旧臣升良、铁良等人在青岛、旅顺以及日本等地加紧了复辟活动；蒙古贵族巴布扎布打着复辟勤王的旗号，组织了军队，曾一度打到张家口，但也很快失败了。

在复辟大清的鼓噪声中，前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张勋最为活跃。他曾亲自入宫朝见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祝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并声嘶力竭地讲道，“办了五年共和，民不聊生，海内沸腾，人心久矣思念故主，唯有恢复我大清，才能拯斯民于水火。”

事隔半月，张勋率辫子兵入京，发动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身穿全套大清翎顶袍褂、蹄袖皂靴的张勋，朝见坐在养



心殿正殿宝座上的溥仪，大声喊道：“……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臣代表二十二省军民、北洋军全部将领，盟誓效忠皇上重登大宝……”

“宣统又坐龙庭了！”随着报童的叫卖声，北京城又热闹起来，到处都挂上了龙旗。估衣铺里的买卖最兴隆，很多人抢着买清朝的袍褂。另外，戏装铺也挤满了人，很多剪了辫子的人，又纷纷用马尾定做假辫子。难怪报童这样唱道：“俩铜子儿，买古董；没辫子，马尾充；满街跑祖宗。”

那天早晨，还是民国的警察，竟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改换悬挂大清龙旗。早已成古董的龙旗，上哪里去找？可又不敢不挂，无奈之下使用纸糊了个旗子，找人用毛笔画上五色龙形，挂在门上应付。

各家报馆还抢先出了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复辟的消息越传越快。报童无不卖力地吆喝：“宣统上谕，六个大子一份。这玩艺过不了几天就变成古董，六个大子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在这种气氛下，十一岁的溥仪第二次登上帝位，穿着明黄色的金丝龙袍，外罩带有日月星辰的团龙补褂，端坐在毓庆宫的龙椅之上，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之后，紫禁城内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大摆酒宴，酬谢群臣，共贺溥仪重登帝位。

但是，好景不长，最后还是应了载涛的话。首先，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通电全国讨伐逆贼张勋。原来支持清室复辟的民国将领们，也纷纷责斥张勋，明确表示“誓死维护共和”。各地讨伐张勋的通电、文章，也陆陆续续出现在北京的报纸上。到后来，各省督军拥戴复辟的越来越少，变调而维护共和的越来越多。

载涛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曾不无遗憾地说：当时清室及朝廷的一些遗老遗少们，利令智昏，热昏了头脑，一味只想着重掌大权，甚至没有街头报贩的眼光，不可能预料到后来辫子兵的命运。

他们在开始那几天，是如此的忙活，进进出出紫禁城，排着



队地叩见溥仪，有的请安，有的讨官，有的谢罪，“上谕”满天飞。据说头一天，奏事处一气就下了九道“上谕”。说来好笑，张勋复辟第二天，发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于是，他们聚集在醇王府，计划推举载涛为代表，要找张勋算账，还打算请溥仪做主。其实，亲贵干政，早已为历史所否定，同样是不得人心的。自知孤立的王公们不甘死心，还整天聚在一起思谋对策。就在这时，形势发生巨变，讨伐张勋的呼声占了上风。这倒成全了他们，使他们摆脱了承担复辟的责任。

在全国讨伐声中，张勋的辫子兵溃不成军，割下的辫子丢得到处都是。张勋被迫逃进荷兰使馆，冯玉祥、段祺瑞的部队占领了北京城。又当了十三天皇帝的溥仪，第二次颁发了“退位诏”。

只是由于载涛兄弟的争取和协调，以张勋复辟后第二天发出上谕“禁止亲贵干政”为由，遍访原北洋系的几位元老，取得了他们的同情，从而没有正式公布溥仪的“退位诏”，只是草草发出了内务府的一个声明，由原来自认“临朝听政”，改变为“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如何”，转移了外界的关注，掩盖了清室的责任。

由于载涛的谨慎和周旋，清皇室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并且摆脱了参与复辟的责任。段祺瑞等在讨伐张勋的同时，也不得不宣布对清室优待条件不变。载涛的审时度势和处变不惊，又一次得到了清室和家族的认可。

为嫂治丧

载涛一生，曾为家族很多重要成员办理过丧事。然而，最难忘也是最遗憾的是受五哥载沅之托，为五嫂瓜尔佳氏治丧。

瓜尔佳氏在成为醇亲王载沅福晋的前一天，曾由额娘陪同专程来到颐和园向慈禧皇太后请安。慈禧很希望这个荣禄的女儿，能够成为自己的亲侄媳妇，拉着她的手，不断地嘱咐她要待



奉好醇亲王载沣。慈禧最后竟打破常规，给了她特殊的赏赐。

瓜尔佳氏也确实没有辜负慈禧指婚的愿望，全心全意辅佐丈夫为大清效力，起到了一个特殊女人的作用，即使辛亥退位诏书发出后，她也不像心灰意冷的丈夫那样，决不轻易认命，而且明确表示：“失掉的东西一定要追回来！”

她不屈从命运的安排，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复辟狂热。首先，是对子女进行恢复祖业的教育。她告诫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让孩子知道，“咱府上，最大的事情是推翻民国，恢复祖业。”

为此，她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父亲荣禄的旧部以及有野心的军阀身上。她不惜使用重金，买通他们为其服务。花钱如流水，有时王府钱用光了，她甚至动用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

她曾一度把赌注押在张勋身上，即使张勋复辟失败之后，仍然痴心不改。听说张勋生病，便对天磕头，祈求苍天保佑，甚至打算让溥杰与张勋的女儿结婚，搞一次复辟的政治联姻，后因家人强烈反对，才不了了之。

瓜尔佳氏同许多清朝遗老一样，幻想有一天大清能够复辟。她把这种希望完全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在她的耳濡目染、血和泪的浸泡下，初涉世事的溥仪、溥杰，心中的复辟之火越燃越旺，他们政治理想的全部内容，就是“推翻民国，恢复祖业”，为重建爱新觉罗王朝而奋斗！

为实现复辟的梦想，瓜尔佳氏甚至与端康太妃联合，通过荣禄旧部袁得亮与奉系将领取得联系，给张作霖送去大量古玩珍宝字画。而一向表示忠于大清的张作霖也多次派人来京，向瓜尔佳氏传递信息说，日本支持奉系方针已定，只要奉系军力财力充足，复辟指日可待。

只是随着这个喜讯而来的还有一桩怪事。奉系方面对端妃、瓜尔佳氏捎去的珍贵礼品竟毫无所知。相反，却传说这些珍品在地安门古玩铺出卖了。端康太妃对此十分恼怒，严厉训斥



瓜尔佳氏：“咱娘们没有对不起你的，可是，咱交你拿去赏张作霖的字画，怎么在地安门古玩铺卖出去了呢？咱知道你会花钱，手总是紧的，你跟咱说明白，咱能不帮帮你吗？……”

这对瓜尔佳氏来说，有如五雷轰顶，钢刀刺心。复辟无望，面子又失尽，她觉得人生之道已到尽头了，终于在一九二一年吞服鸦片自杀了。

她在留给载沣的遗书中，曾有一段是专门写给儿子溥杰的，仍然不忘复辟：“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像你阿玛那样没志气，要好好念书，好好地帮助你哥哥，这才不负我生你一场，共同完成复辟扶清大业……”。

消息传开，极大地震动了清室和整个爱新觉罗宗族。载沣懵住了，尽管他平素对瓜尔佳氏颇为不满，但福晋的死亡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他本来办事能力就不强，又遭此磨难，就更不知所措了。还是载涛体贴兄意，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为兄嫂办理丧事的重任。

经过载涛的精心准备，丧礼很快按期举行。为了悼念生母，溥仪平生第一次乘汽车离开紫禁城，到醇王府送瓜尔佳氏入殓。

府前临时搭起了两座扎得高高的挂满白花和蓝花的牌坊，两边跪着身穿孝衣的人们。以唢呐声为主调的哀乐声，响彻云霄。在门外跪迎溥仪的是赐头品顶戴的御弟溥杰，门内立迎他的是皇帝本生父醇亲王载沣。穿过两旁跪拜的人们，溥仪直接来到银安殿本生母醇亲王福晋瓜尔佳氏的灵前。在吹鼓手的哀乐声中，溥仪行了跪叩礼，并按礼叩了四个头。

在一阵高似一阵的哀乐声中，溥仪亲自送母亲遗体入殓。当陀罗经被蒙上遗体时，一阵悲痛从心底升起，他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

豪华、奢侈的丧事竟办了多日，天天银烛高燃，颂经不绝。出殡当天达到了高潮，仪仗队打头，送殡的队伍排出了一里长。载沣兄弟及家人，分乘几十辆马车，护送瓜尔佳氏灵柩。一路吹



吹打打,直至晚上十点多,送殡队伍才到达西郊妙高峰,将其安葬在醇王府的故莹。

从始至终负责治丧的载涛,对此作了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又颇为深刻的概括:“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

此后,载沅侧福晋邓佳氏的丧礼,也是载涛全权操办的,而心情和感受却跟上次大不一样。

邓佳氏长年陪伴载沅,主持家务,一直是他生活中的依靠。夫人之死,对他刺激很大。“老来鸳鸯失伴飞”,使载沅“哀感弥深,悲恸不已”。他不得不又唤来七弟载涛,代为操办丧事。

载涛很佩服这位平民出身的嫂子。她很能吃苦,也很能干,自嫡福晋去世后,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是经她一手拉扯大的。王府内部事务,后来也是由她一手操办。她善于动脑筋,务实精神尤其突出,这在贵族家庭的主妇里是很少见的。

例如,载沅在天津的住所,由于溥仪要结婚,住房紧张,她竟亲自设计,接盖了两楼两底,一时在家族和亲友中广为流传。她提倡勤劳和节俭,个人开支力求节省。尽管有仆役,有些事情她还是宁愿自己去做。衣服开了线,她从来都是自己拿起针缝几下,从不让裁缝去做。晚间做事,也不让仆役在外间守侍。有时甚至和仆人一起打扫卫生,动手料理花草。

念及邓佳氏在王府三十年的委屈和操劳,载涛将丧礼安排得十分风光。一切都按旧礼进行,花园里,又搭起天棚,请来高僧念佛,作法事,放焰口,样样认真而周到。尽管当时正是酷暑,死者的病又有传染性,载沅还是决定停灵二十一天。载涛评价这次丧礼,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都超过了早年嫡福晋瓜尔佳氏的丧礼。

承办大婚

载涛作为溥仪的叔父,不仅在皇室的地位特殊,在溥仪的心



目中,也很不一般。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传统的宗族观念决定;另一方面,还有个重要因素,即载涛广交往、善言辞,处事谨慎。因此,溥仪的对外事宜,多由载涛办理。就连溥仪选皇后,也离不开载涛的周旋。

一九二一年,溥仪十六岁时,醇亲王载沣、贝勒载涛、帝师陈宝琛等商量:“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并奏明溥仪及太妃们同意,由载涛办理选后事宜。消息传出,涛贝勒府门庭若市,举荐名门闺秀的络绎不绝。王公贵族、满蒙世家纷纷托人说情,表示一定要“玉成”婚配。

后来,连外地的张作霖、徐世昌也派专使上府提亲,只是当时选后仅限于蒙古王公或满蒙大臣的女儿,其他均被婉言谢绝了。据说那个时期,载涛桌子上的照片,几可装订成册。经过几番淘汰,仔细挑选,婉容最终被选为皇后。

以往“钦定”候选的姑娘,是由皇帝当面挑选,中意者递个玉如意,或把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进入溥仪时代,他们也觉得把人家闺女们摆来挑去不妥,于是便改为挑照片的办法,即中意者,由溥仪用铅笔在照片上画一个圈儿。

最后集中到两个人。一个叫文绣,又名蕙心,是满洲额尔德氏端恭的女儿,那年才十二岁。她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而端康太妃又不满意了,认为文绣家境贫寒,长相不美。她极力推荐婉容,字慕鸿,那年十五岁,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

为选后,载涛甚至不惜与六哥载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溥仪事后记述了这一过程:“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位强调海军,一位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况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奔波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载洵推荐的是端恭的女儿文绣,并得到了敬懿太妃的大力



支持。而载涛权衡利弊,极力推荐荣源的女儿婉容,也争取到了端康太妃的支持。本来关系不错的哥俩,几乎为此事吵翻了脸,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矛盾越来越尖锐。

为打破僵局,载涛拿着婉容、文绣的照片,亲自进宫,让溥仪自己选定。可能溥仪出于对载涛的信任和尊重,朱笔一圈,定下婉容。就这样,以溥仪的最后“圣裁”结束了皇后竞选。当然,为了顾全敬懿太妃和载洵的面子,载沣等人建议溥仪纳文绣为妃。

溥仪亲自颁“上谕”命载涛总办大婚典礼一切事宜。为使婚礼办得风光和体面,载涛查阅了《大清会典》以及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决定一切礼仪均按大清朝惯例来办,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民国以来的新花样。

长于“算学”的载涛经过反复计算,认为婚礼费用至少不能低于四十万银元。按当时价格,这笔钱可买面粉二十万袋,足见奢侈浪费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而按载涛的本意,这还是尽量避免“过于铺张”的。

当时,载涛还顾虑民国政府的态度,生怕他们对婚礼排场生加干涉。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第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政府,不仅没有任何反对,反而主动给予大力支持。民国财政部致函内务府,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中拨出十万元来,其中两万作为民国贺礼。同时,民国政府军、宪、警机关还主动提出派官兵担任保卫的计划,如下: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东安门、神武门及沿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及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一十六名(其中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及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军乐队官员三名),士兵四百五十八名(其中军乐队官员四十二名,号兵六名)。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两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及沿途站哨步军统领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六十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礼。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一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沿途站哨。警察厅官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管区，加派警察保护。

溥仪的大婚典礼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举行。这次较之已进行的纳彩礼、大征礼、册封礼三次仪式，规模更加巨大，宏伟壮观。婚礼共三天，第一天举行大婚典礼，迎皇后婉容入宫。皇妃文绣于同日入宫。第二天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第三天帝后在乾清宫受贺。

婚礼在第三日帝后于乾清宫受贺时达到高潮。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轿车停得满满的，神武门额扎有彩棚，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民国大总统特派的专使，有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阔少，还有十四国驻京公使团，共计中外来宾一千多人。

国内来宾一律在养性殿赐宴，在漱芳斋听戏。宫中演戏三天。外国公使及夫人，在乾清宫设酒会招待。会上由葡萄牙公使作为代表致贺词。溥仪用英文致谢词。然后，各公使向帝、后行三鞠躬礼，溥仪答礼，并与各公使及夫人一一握手。这次外国客人共一百四十九人，其人数之多，场面之盛，是辛亥革命以后紫禁城内从未有过的盛况。

很多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迎亲凤舆进入广场时的情景。乾清宫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仪仗队前的军乐队，奏起欢快的乐曲。欢迎队伍排列出全副卤簿仪仗，旌旗如林，牌伞如云，为广场增添了无限威严。两旁增设的各一百对牛角号和大鼓，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身穿蟒袍补褂的庆亲王和郑亲王,作为册封正副使,骑在高头大马上,耀武扬威,手中执节。身后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就是龙凤旗伞、鸾驾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副,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

此时,迎亲队伍将凤舆抬进广场,使大婚典礼达到高潮。整个京城为之轰动,平民百姓都感到新奇、古怪,连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拥到神武门前凑热闹。幸亏载涛临阵不乱,调度有方,方使婚礼进行的井井有序。

经载涛过目的贺仪,也纷纷登记入册。大总统黎元洪的礼物最引人注目,共八件奇珍异宝,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前总统徐世昌送贺礼两万及许多礼品。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錕等军阀政客也送了贵重礼品。王公大臣、清朝遗老遗少更是蜂拥而至,送上现金、古玩等贺礼,声势之大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吃惊。

这一壮观场面,不仅使原对婚事不大感兴趣的溥仪大为感动,也使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淌下虔诚兴奋的泪水。溥仪兴之所至,传令载涛演戏三天,以示庆贺。酷爱京剧的载涛,这下又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经他一手操持,几乎所有来自京沪的名角都参加了这一盛大的堂会。戏连演三天,戏目安排得十分精细,演员唱得也特别出色。观戏中,载涛看出了溥仪的兴趣,临时增加了武戏,特别是杨小楼、梅兰芳、李万春等名角反串的《扒蜡庙》,使溥仪兴奋异常,竟一反宫中常规,带头鼓起掌来。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从而突破了宫中看戏历来不许叫好、不许鼓掌的传统惯例。

溥仪对大婚颇为满意,事后“论功行赏”。载涛也因这次筹办大婚有功,被退位的小皇帝著赏穿亲王补服。其实,一向注重俭朴的载涛对这场极度铺张浪费、耗资超过白银四百万两的大婚典礼,常常感到一种内疚。

阻侄出洋

载涛为辅佐年幼的皇帝，可谓尽心竭力，不惜肝脑涂地。然而，随着溥仪的逐渐长大，却愈发令载涛操心费神。

溥仪成人之后，开始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用他的话讲，“即使做不了皇帝，也要亲政”。特别是结婚前后这一段时间，他的一些想法和举措，愈发显得离谱，让人无所适从。

当时，溥仪在宫内，一会儿传令内务府，立即购买高达三万大洋一粒的贵重钻石；一会儿又严厉申斥内务府贪污浪费，收不抵支。安排活动也混乱无序，上午传令大臣清查宫内古玩字画，当天立等回报；下午又撤下大臣而不顾，自己叫上车辆去游香山。对皇室惯例，逐渐产生厌恶，有时连金顶黄轿也不爱乘坐。自从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为了骑车便利，竟下令将已经存在几百年的宫内宫门门槛，一夜之间统统锯掉。

他任意而为，胡乱猜疑，怀疑太监对其不忠，常常找出莫须有的罪名整治他们。对于王公大臣，更是训令百出，前后矛盾，一会要励精图治，要重整宫廷内务，要全面盘查财务；一会又想入非非，要出洋留学，离开紫禁城。

一石激起千层浪。溥仪要求出洋留学，震惊了整个皇宫，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都表示强烈反对。在所有的反对理由中，只有一条最现实：只要溥仪离开紫禁城，就等于自动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尚未取消，为什么偏要自己放弃呢？按当时规定，溥仪虽然退位，但“帝王尊号仍存不废”，每年享受“皇室优待四百万岁费”。

载涛是十分理解溥仪的，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所有王公大臣中最同情溥仪的。但是，即使这样，载涛也不敢轻易表态，更不敢公开贸然支持溥仪出洋留学。他的思想是极为矛盾的。首先他愈来愈清楚，所谓民国优待条款，不可能永远存在，





军阀混战，内乱不止，令他更多忧虑的是安全问题，而不是优待条款。更何况，当时一些民国议员已经提出了取消皇室优待的主张。

瞬息万变的政局和连绵不断的混乱，随时可将溥仪送上断头台。古今各国，历朝历代，最后一位皇帝的命运，几乎都是很悲惨的。所以，溥仪何去何从，究竟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载涛当时则是根本无力左右的。此事之后，溥仪第一次开始对载涛表示失望，关系有所疏远。

由于载涛等人的全力阻止，溥仪未能顺利出洋留学。但他内心依然如故，仍然渴望出国，只不过不再轻易向家人张口，而在等待新的时机。

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增多，特别是庄士敦的入宫，溥仪接受了不少西洋文明的知识，一天比一天不满自己所处的环境，觉得王公大臣因循守旧，自己受到束缚，难以发展。有时，也确实如此。一些新事物，对于有些王公大臣来讲是很可怕的，溥仪十五岁时，庄士敦发现他眼睛可能近视，奏旨请个洋医来检验一下，必要时配副眼镜。不料却惊怒了整个紫禁城：“皇上的眼珠子岂能让外国人瞅？春秋鼎盛的皇上，戴上眼镜不成老头子了吗？”后经溥仪再三坚持，才勉强得以解决。

总之，年事日长的溥仪，越发不安分，就越觉得王公大臣们迂腐不堪，又一次坚定了出洋的决心，并正式提出留学英国，从而与皇室的冲突达成了最高峰。

然而此时，皇室上下死也不肯让步，绝不同意溥仪出洋。最后，连一向同情他的载涛，也仅是表示可在天津英租界买一套房子，以便政局有变好去安身。

失望的溥仪，知道公开离开紫禁城是不可能的，便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做好私逃的一切准备。他请庄士敦帮忙，与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取得联系，安排汽车在神武门外接应，负责安排留学英国的一切事宜。



如何离开紫禁城，溥仪也费了一番心思。当时，他身边有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守卫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岗哨，神武门外还有原禁卫军改编的“内城守卫队”。为此，溥仪一方面花钱赏赐身边及宫门太监，打通宫内几道关节；一方面以巡示护军为名，表示嘉奖。

当时的场面，十分滑稽。护军不过二百人，其中还有很多空额。演习分列式时，这些老兵们一个个气喘吁吁，队形散乱。所用步枪，多为铁锈侵蚀，内外已成一体，只有站岗用的几十只枪还略有枪形。子弹与弹匣，也锈成一体，勉强抠出几枚，也看不出子弹的模样了。巡视就这样草草收场，由此可见当时紫禁城内的腐败达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溥仪自认为万事俱备。一切安排就绪，就在预定出发前一个小时，内务府接到太监密报，传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面进入戒严状态。溥仪还未走出养心殿一步，留学英国的计划就这样彻底破产了。

照料后妃

溥仪先后有四位后妃。说来也巧，这四位后妃，不论“玉成”，还是别离，载涛作为溥仪的亲叔，都曾经尽过心，出过力，做过周旋。

尽管她们每个人的遭遇不同，却都是同一个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婚姻不仅没有唤起她们对生活的热爱，而且留下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

先说皇后婉容。这是经载涛极力推荐，甚至为竞争不惜与六哥载洵撕破脸皮，最后才登上皇后宝座的。但她晚景的极度悲惨，却是载涛所始料不及的。

这位末代皇后，出身世袭贵族家庭，其父是后来荣任内务府大臣的荣源。她自幼长于深闺，姿质天然，谈吐文雅，仪态不凡，



在名门闺秀中是有名的才女。如此青春年华的婉容，在隆重仪式中进入皇宫。开始与溥仪相处还好，但不知溥仪有什么想法，未曾与婉容同房，害得皇后哭肿了双眼，跑到端康太妃面前告了状。太妃便传话给载涛去劝溥仪。

载涛也认为这是有关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件大事，巧妙地对溥仪说：“皇上即使将来出洋，也不能离开皇后。世界各国都没这个规矩。如果帝后分居，报界会编造谣言，有损皇上威严，也不利今后的大事。”他还投其所好，说皇后从小在天津租界长大，见过大世面，还懂英语，同她多接触、多谈谈，断无坏处。果然，载涛一席话，使溥仪回心转意，与婉容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谁知，婉容的虚荣心越来越强，竟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排挤与她争宠的淑妃文绣。于是又失去了溥仪的好感。寂寞和苦闷，使婉容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后来又与溥仪的一个侍从私通，竟然怀上了孩子。事情败露，溥仪震怒，下令要“废”掉这个皇后。

然而日本人出于政治考虑，怕由此影响伪满皇帝尊严，不让这件丑事外扬。溥仪只好将婉容打入冷宫，软禁起来，下令不许任何人进宫探望。载涛那时即使有心也无力相助了。伪满垮台后，婉容旧病复发，结束了抑郁、痛苦的一生。

曾与婉容竞争皇后的文绣，落选后被溥仪纳为淑妃。册封淑妃的仪式，比起迎娶皇后的大典来简单得多了。既无纳新，也无大征，更没有乐队仪仗，连家里也未得到任何恩赐。为此耿耿于怀的文绣，曾多次与婉容争宠，终因相貌等原因未能成功。她在宫中“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她把自己比做牢狱中的犯人，写文倾诉了对自由的渴望。

最后，文绣在亲友的支持和帮助下，断然采取了果敢的行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离开溥仪在天津的“离宫”张园而出走了。随后，她由胞妹文珊陪同，自请律师，毅然到天津地方法院投诉，要求与溥仪离婚。



当时，“皇妃离婚”、“清废帝闹婚变”的头条新闻轰动了海河两岸，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笑料。文绣的要求，激怒了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皇室成员认为此事太丢面子，有辱祖宗家法。为了捍卫封建礼教，他们利用各种形式施加压力，迫使文绣屈服。文绣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同溥仪据理力争，搞得他焦头烂额，收不了场。为此，双方僵持不下。

在这关键时刻，载涛以长辈身分出面调停。他专程到天津见了文绣，提出了一个方案：由溥仪每年支付文绣生活费六千元，使文绣寄居于北京太妃处。如文绣愿意寄居天津，则另由溥仪在日租界为她找个相当的住所。这个方案，遭到了文绣的拒绝，载涛的调停终于失败了。

但载涛事后却感到庆幸，幸亏自己当时没有能办成此事，否则文绣很可能成为婉容第二！文绣离婚后，自食其力，当上了小学教师，过上了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三月，在长春，溥仪又娶了“祥贵人”谭玉龄。她是北京一位满族旗人的小姐，原姓他他拉氏，性情温顺，入宫时年仅十七岁。她以温柔的性情，善良的心地，对溥仪体贴入微，得到了溥仪的钟爱。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这位祥贵人因病去世。溥仪决定利用皇帝特权，追封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并依《大清会典》，按贵妃规定举行隆重丧礼。主持丧礼活动的就是载涛。

谭玉龄死后，溥仪传谕，命载涛为“承办丧礼大臣”。载涛特意从北京赶到长春主持了丧事。载涛到长春后，搞了一个庞大的治丧机构。按照《明贤贵妃丧礼关系文件》上规定的祭礼程序和典礼程序，从八月十三日谭玉龄死去到九月二日，前后大肆张扬了三十来天。

祥贵人的死至今仍是谜，载涛在长春作了一些了解，但直到他返回北京时也没搞清死因到底是什么。据说，祥贵人发病后，原由皇宫中医为其诊脉、开药单，每次至少两位大夫参加，经



溥仪亲自过目后,再抓药煎服。中医治疗未见明显效果,溥仪曾请西医诊治,也曾采用过针灸。

后来,日本人强行安排日本医生为其诊治。负责医疗的日本医生开始十分热心,一会儿打针,一会儿输血,时刻守护在身旁。但那个“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破例搬进宫内府的勤民楼后,竟亲自“监督”治疗,莫名其妙地下令停止了打针、输血。

次日清晨,这位二十二岁的祥贵人便香消玉殒了。溥仪刚听到死讯,吉冈就送来了关东军司令官表示吊唁的花圈。难怪他日后曾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痛哭流涕,控诉日本人从中捣鬼。因为吉冈安直一向认为谭玉龄有“反日思想”,怕影响“皇上”,所以才借治病而除掉她。

溥仪对谭玉龄始终难以忘情,即使被俘去苏联后,仍嘱家人将其遗体火化,骨灰捎到北京的族人家中。特赦后,在载涛的支持下,又将骨灰接到自己家里,妥为安放起来。

溥仪的第四个妻子,也是从照片中择定的。在吉冈带来的上百张照片中,溥仪随意“圈定”了一位。她就是尚不满十五岁的平民姑娘李玉琴。不同于前三位妻子,她不是满族人,更不是清朝皇族贵胄,只是生活在吉林长春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子。于是,她在禁锢般的生活中,成为溥仪的特殊玩物,直至伪满崩溃为止。

如果说,载涛对溥仪的前几个后妃都尽到了做长辈的责任的话,那么他对“福贵人”李玉琴却未免有点薄情了。

日寇投降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把李玉琴留在了东北。之后,李玉琴几经周折,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家里呆了两个多月,感到一天到晚失魂落魄,百无聊赖,曾想出家做尼姑。但当时已经解放,提倡破除迷信,解放妇女,尼姑庵都不再收尼姑了,只好在家里呆着。

为表示对溥仪的忠贞,李玉琴决定到北京投奔溥仪的父亲。她先来到天津溥仪族兄溥修家里。溥修为了此事,往北京先后



跑了几次,先是找到摄政王载沣,他不肯收留。后又找到七叔载涛,他也不便收留。

无奈之下,溥修只好留李玉琴在天津暂住。李玉琴一直盼望溥仪归来,并多次打听溥仪的下落,但始终得不到确实的消息。她经过一段颠沛流离,放弃了能够获得解放的机会,又投入了封建的牢笼。不仅吃不饱饭,还要干很多家务活,又苦又累,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在这个家前后七年,只做过一身衣服,而裤子仅穿了几天就破了。她住在一间靠平台的屋子,因没钱生炉子,很冷,厨房的水管都冻裂了。有一次端热水上楼,不小心全洒在脚面上,连肉皮都烫掉了。因无钱上药,烫伤又变成了冻疮。半个月后,烂得脓血淋漓,几乎快见骨头了。后来,她随溥修一家搬到北京,十几口人挤在两明一暗的小房子里,晚上睡觉可热闹了,这里一块布,那里一个帘,隔成几个睡觉的地方。生活依然困苦、潦倒。

新中国成立后,她逐渐走上社会,参加缝纫学习班,帮职工织毛衣,参加文化补习班,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开会、游行、宣传抗美援朝,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成了深受街道欢迎的积极分子。

一次闲谈中,溥修说:“听说七叔当了共产党的官,何不找他打听溥仪的下落呢?”这些话引起了李玉琴的注意,后来,她专程去找载涛,请他帮助打听溥仪的消息。当时载涛确实不知溥仪到底在什么地方,也不好去问,即使有心也无力相助,只能遗憾一场。

深宫救火

一九二三年盛夏的一个夜晚,紫禁城建福宫的德日新殿突然火光冲天,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半个北京城。

当晚,载涛正兴致勃勃地带领全家去大栅栏广德楼(前门小剧场)听戏。在宫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溥仪,被太监叫起来以后,



立即给载涛打电话,连打几次找不到人,便更加惊慌失措。散戏时已临近午夜,载涛行至景山东街,发现宫内火光冲天,人声嘈杂,慌得连家也顾不得回,直奔宫中。

载涛来不及与溥仪商量,便亲自打电话给当时担任京畿卫戍总司令的王怀庆,让他立即派消防队前来救火。为牢靠起见,他同时又给警察总监薛之珩、步兵统领聂宪藩打了电话,让他们也速来设法救火。

经过一番紧急布置,大批军警陆续进入宫内。来自全城各处的消防人员几乎携来了全部消防器材。开始因宫内水源缺乏,救火十分缓慢。急得当时实际担任紫禁城大总管的载沣一时没了主意,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着边际的整话来。

后来,还是担任现场指挥的载涛,听取一些人的建议,命消防队汲取紫禁城外御河水扑救。幸好随后又来了一批消防技术比较熟练、有经验的意大利使馆卫兵,大家一起拆除房屋,隔断火道,直到次日清晨七点,才将这场烧了十个小时的大火扑灭。

说来好笑,救火的时候,乱七八糟,忙成一团,到火灾停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却又有不少人前来争功。一位外国老太太,也说自己前来救过火,不知何因还与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连手中的扇子也溅上了血。最后这把扇子转送到溥仪手上,为表示感谢,他还在上面题了诗。总之,为酬谢各方救火者,清室又送出了六万茶点费。

位于紫禁城西北角的建福宫一带,包括静宜轩、延春阁、广生楼、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池、积翠亭、凝辉楼、香云亭等,是一组宏伟壮丽的建筑群,里面珍藏着各种金佛、金塔、金质法器和藏文经版,还存放着清代九位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以及历代名人字画、古铜器、古瓷等稀世珍宝。

据溥仪回忆,十六岁那年,他驱于好奇心,打开过建福官的一间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几十年没有开过。只见满屋都是大箱子,堆到顶棚。随便打开一个,竟全是珍贵的古玩玉器和



手卷字画。原来是当年乾隆的珍爱，后来嘉庆下令收集，封存在这里，还贴上了封条，而且仅是其中的一间。

在养心殿后面的一间库房，溥仪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好似书箱一般，每层分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放一件珍奇玩物，金石、玉器、牙雕、字画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实则一个小型的匣子就有几百种，大型的便上千种之多。另外，溥仪大婚前后的全部礼品，也都存放在这里。可以说这是清宫存放珍宝最多的地方。

可惜，这场大火一下子烧去了三四百间房子，损失物品不计其数。除延春阁的全部收藏毁之于火外，广生楼、吉云楼、凝辉楼的全部藏文大藏经、数千件大小金佛和金质法器、无数历代名人字画，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载涛最心疼的是四座钻石顶、景泰蓝座的金亭，华贵精美，无与伦比；此外还有数千块大藏经经版，是明朝景泰年间刻制的稀世之物。

建福宫，历来是清宫中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这场大火，究竟烧毁了多少珍宝，恐怕至今也还是个谜。当时，内务府发表了一个糊涂账，说大火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连载涛也不信。

大火的损失之大，还有一事可以证明。京城一家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了火场废墟的处理权，从熔化的金块金片中又提炼出了一万七千多两。最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分装在许多麻袋里，送给了内务府的人们。

事后，一个内务府当差告诉载涛，他从中提炼出两座一尺上下的黄金“坛城”，分别施舍给雍和宫和柏林寺，这还只是其中的两袋灰烬，足见当时损失的严重。

这场大火，烧得溥仪焦头烂额，盛怒之下，下令关押了负责看守建福宫的七个太监。载涛等人奉命进宫追查起火原因。那天晚上，天气晴朗。当晚建福宫又无人居住，属于自然原因引起



火灾的可能性不大。

当时,宫内太监偷盗之风盛行,常与内务府官员以及宫城护军们勾结,盗卖宫内的珍宝文物。据现场救火的许多人说,他们开始曾闻到一股强烈的煤油气味。因而,这场大火很可能是宫内太监看守自盗,特别是在溥仪有所察觉的情况下,为了消灭证据而有意纵火的。

载涛虽已花费极大精力,失火原因也大体查明,但终因“查无证据”,使这场当时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宫廷大火事件不了了之。

这里,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就是笔者修订此书的时候,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世人瞩目的建福宫花园修复工程,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本着“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古建修复原则,由全市各地抽调而来的优秀古建修复工作人员,全面展开了细致的工作。

特别是这次首先大量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粘结材料,粘结的石质文物在不受外力“破坏”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一百年以上。残缺的石刻、石座、石饰、石墩上,大量使用粘结拼补技术,最终能够使建福宫花园最大限度地再现七十余年前被大火焚毁前的宏大、壮丽,从而确保建福宫花园的“原汁原味”。

遣散太监

在载涛的印象中,宫廷办事历来拖拖拉拉,从无效率概念。惟一的一次例外,并曾震惊宫廷内外的是溥仪一声令下,两日之内,将近千名太监全部遣散出宫。

建福宫救火,载涛出了大力。从此,溥仪和载涛之间的往来接触也多了起来。在溥仪的心目中,他的这位七皇叔要比六皇叔载洵好,甚至比自己的生父载沣还好。这恐怕不是没有缘故的。溥仪偷偷剪了辫子,太后和王公大臣们痛哭流涕,载涛却不



以为然,还带来一位理发师给他推了一个学生头。

推荐庄士敦这位洋师傅后,载涛又送给溥仪一套沙发和一套钢丝床等西式家具,这和洋师傅教洋文的气氛就更协调了。听说溥仪嫌穿长袍马褂麻烦,载涛便给他订做了一套西服送进宫来。载涛甚至还派人去上海为溥仪运来一架钢琴,供他消遣。特别使溥仪感到不一般的是,每与较为开明的载涛谈话聊天,常能听到一些新事物,增长一点新见识,要比同载沣谈话有趣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载涛对于建福宫失火原因的分析,使溥仪深信不疑,以至使他本来对太监的嫉恨,变得更加深恶痛绝。他想起祖宗圣训:“古来太监善者少。”他想起前不久,听从庄士敦的建议,专门聘请美国摄影师进宫,把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作为保存。不成想只拍了几张,竟找不出来了,气得溥仪亲自进入建福宫,也没找全。一怒之下,溥仪下令追查。可能监守自盗的太监怕暴露真相,不得不放火以销踪灭迹了。其实,此前宫内偷盗之风已愈演愈烈。

仅一九二二年一年之中,寿皇殿就丢失百余斤重的两个金钟,宁寿宫丢失金器、玉器、古铜器四十余件,毓庆宫库房的门锁被砸,甚至乾清宫的后窗也被人打开了。他还想起亲自查到的太监设立赌局烟馆、冒领官款、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一桩桩恶行,越发怒火难遏。

加上庄士敦师傅曾对他说,看到拖着猪尾巴辫子的太监,心里就感到厌恶。还不止一次地对溥仪说:“现今世界,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太监和发辫,恐怕只有紫禁城才有!”这些,都影响着溥仪对太监的看法。

再加上当时宫中丢失珍宝日益严重,使溥仪深感不安。为了整顿内廷,同时也是为了煞住愈演愈烈的宫内偷盗之风,溥仪下定决心,立即裁撤全部太监。

溥仪主意已定,就在建福宫大火之后的十几天后,带着载涛之子溥佳突然乘车来到载沣居住的醇王府。他开门见山对他父



亲载沅说：“立即赶走全部太监！”并说：“太监们狂抽滥赌，甚至当着我的面动刀子打架，早晚会的由贼变成杀人犯。与其让外国人笑话我们野蛮，还不如统统赶走他们！”

载沅听到溥仪作出的决定，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看到他父亲那手足无措的懦弱样子，溥仪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不得不传令又把载涛叫来，当即交给他一道亲笔谕旨：“将宫内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

闻讯赶来的众王公大臣，纷纷以祖制不可违背的大道理进行劝阻。然而此时的溥仪，已不可能回心转意了。他甚至厉声威吓说：“如果宫内再发生第二次大火，谁敢负责？”并坚定地表示：如不立即裁撤太监，他将永不回宫。说得大家谁也不敢再表示反对意见。

接着，溥仪让载涛进宫奏于众位太妃，详细说明原委。太妃更是极力反对，但终因溥仪已经降旨，大势已去，也就无可奈何了。经载涛再三向溥仪说情，除太妃身边必不可少的服侍太监一百七十五名外，其余七百多名太监便在第二天全部遣散出宫。

溥仪下旨后，自己却不敢立即回宫，生怕被裁减的太监们与他拼命。当天晚饭后，宫内太监集中到乾清门内，听到这个断绝生路的消息，一下炸了营，嚎啕大哭，十分悲惨。他们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平时与家人联系很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几小时统统离宫，叫他们向何处投奔？为避免矛盾，内务府筹措了一笔遣散费，让无家可归的太监，暂时住在地安门内大街雁翅楼内，然后再各归乡里。

最初那一段日子，载涛操心费神，忙得头脚朝天。为了紫禁城的正常运转，他请内务府派来一些官员和几十名护军，除了看守各处宫殿，还临时代替殿上太监的差事。可这点人手哪够啊，一切仍然都是杂乱无章。待溥仪吃饭时，连摆桌盛饭的事也没人干了。

载涛只好叫儿子溥佳临时充数，手忙脚乱，闹出不少笑话。



为了溥仪的安全，载涛召集全体王公，每天分两班，轮流在宫内住宿。为了壮胆，还给溥佳配了一支手枪。经过了一个多月忙活，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员，情况才恢复了正常。

原来以为裁撤太监以后，宫内的偷盗风就可以绝迹了。不料一九二四年春，溥仪放在养心殿的一颗大钻石又丢了。紧接着，内库、御膳房、四执库也丢失了一些金银器皿。遣散太监没能煞住宫内的偷盗风，只不过是太监会的监守自盗变成了护军的监守自盗。而溥仪把太视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奴隶，也引起了太监们的极大怨恨。

载涛对于遣散后的太监，是十分同情的。那么多离开皇宫的太监，举目无亲，又缺乏工作技能，只能流落街头，乞讨度日。尽管他无力挽救众人，但只要有机会还是尽量给他们一些帮助。从他事后对待溥仪命他缉拿私逃太监的两封信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的惻隐之心。

一封信是：

涛贝勒爷钧鉴：

敬稟者：兹有当差太监郭顺德一名，于八月三日私自逃走，祈在北京寻找。伊住后门内安乐堂胡同路西门，或在外门外钟楼后宏恩观庙内，前列未能找着，此次郭顺德务必找着，如将伊所带宫内徽章寄来，或有便人带来，亦可。然后派人将郭顺德送京为要。专此敬请钧安。

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

另一封信是在十天之后：

涛贝勒爷钧鉴：

敬稟者：顷接来函，敬悉一切。查太监郭顺德，太监宋德安荐举。今将相片一张随信寄去。如找着伊时，或派人带京。若路途不便，亦可在北京拘留些日，然后释放，以戒。如寻得伊时，如何办法，随时来函为盼。专此敬请台安。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载涛对当时还身穿“康德皇帝”龙袍的溥仪是颇为了解的。在皇宫内，“殿上一呼，殿下百诺”，特别是对地位低下的太监，更是说使唤就使唤，说驱逐就驱逐，说召回就召回，受罚挨打是常事。那些由于生活无着，被迫应召前来当差的太监，不堪溥仪的虐待，常常私自外逃。载涛对此深表同情，即使接到溥仪下旨写来的信，也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运宝出宫

载涛十分理解年轻的溥仪。他对这位退位的小皇上在大婚以后一段时间里所采取的一系列励精图治的举动，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以至溥仪当时竟发自内心的感激说：“只有我七叔载涛最同情我，真正为我着想。”

溥仪在整顿内务府、清查宫内财产的时候，发现大量奇珍异宝、文物古籍、名人字画失散宫外。当时曾计划偷偷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的溥仪，在下令追查的同时，不禁也萌生了偷运一部分财宝出宫的想法。他用赏赐给溥杰、溥佳的名义，把宫内一些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陆续运出了宫外。

自一九二二年起，溥仪开始把秘密收集起来的奇珍异宝、古籍字画，分批盗运出宫。小的好说，大的就麻烦多了，特别是古籍字画，数量很多，大部分又是宋版手卷，由宫内运出，颇为周折。因为当时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均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需溥仪使用，不但要在各宫账簿上记载，还要到司房载明出处，然后再开一张单子，方能携带出宫。于是，溥仪便用赏赐给伴读的溥杰、溥佳为名，利用每天放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去。开始，还真掩过了宫内一些耳目。

这件事，很快被载涛察觉了。他考虑到时局艰难，战乱不停，溥仪一旦离开内宫，生活及其事业必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未雨绸缪，及时筹集一笔经费，倒也不无益处。但他又毕竟



比溥仪考虑得更深了一层,看形势溥仪迟早要离开皇宫,而一旦出走,到哪里去好呢?他当时认为,只有到受洋人保护的天津租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载涛面见皇上,从运宝出宫,说到皇上如何才能出宫,将来又怎样利用这笔财产,直至最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落脚之处。一席话说得溥仪茅塞顿开。

载涛的具体主张是:由他亲自出面,在天津英租界为溥仪购买一处房子,把运出宫的财宝安全存放起来。然后寻找机会,在外国公使的帮助下,悄悄住进天津英租界,以图再举。

一直急于离开紫禁城的溥仪,看到载涛如此精于事理,善于谋划,又提出了周密可行的方案,高兴极了。原来,他只直呼载涛的名字,现在竟忘掉了自己至尊至上的皇帝身分,兴奋地叫起了“涛贝勒”、“贝勒爷”。

受到如此礼遇的载涛自然受宠若惊,更加卖力。他第二天便奔赴天津,很快将房子买下。一张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上一栋洋楼的照片,立即交到了溥仪手中。

就这样,溥仪加快了运宝出宫的活动。他利用当时清查宫廷财产之机,从中挑选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分别赐给溥杰、溥佳,他们每天放学出宫都要带走一个大包袱,连续不停地几乎干了大半年。共运出手卷字画一千余件,挂轴和册页二百余种,宋版书籍二百种。其中,属于稀世珍宝的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马远等人合笔的《长江万里图》等。

偷运出宫的珠宝文物,足足装了近八十个大木箱。为运往天津,载涛又费了一番脑筋。箱子又大又多,出入火车站有诸多不便。上税不说,最难防的是还要接受检查。他听说担任全国税务督办的孙宝琦,是他的朋友载抡的岳父,便让溥佳通过载抡说情,以载沅和载涛两家的名义,办了一张免验、免税的证明,才将这批财宝安全运往天津。

但事情的最后结局，完全出乎载涛的意料。这批巨大的财富，不仅载涛未能派上用场，连溥仪也失去了控制。伪满洲国破灭后，几经辗转的这批珍品，也下落不明了。

继任宗令

溥仪帝逊位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依然存在，虽几经裁减，但其机构、官员及一切活动，仍沿旧章旧制进行。尽管紫禁城外飘扬着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但皇宫以内，照旧是皇上臣下，龙袍补褂，宫女太监，叩头嘘嘘。

载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正式出任宗人府的最高长官——宗令。

谁都知道，宗人府地位特殊，权势赫赫，但又最难执掌。作为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清沿明制，于顺治九年（一六九二年）设立，主要掌管皇族属籍及纂修皇室玉牒等事宜。宗人府居内阁、六部等国家机关之上，也是为了抬高皇族的地位。

按规定，皇族享有许多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权，如：宗室、觉罗自小就享用养赡银两；可时常得到大量名目繁多的恩赏，诸如银两、书籍、珠宝、古玩等；保送进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授封一定的爵位，逐渐踏上做官的阶梯。

在重要的国家机关中，都设有固定的宗室官缺，以保证皇族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另外，宗室犯罪，比一般人要减轻处理，甚至杀人者都没死罪。总之，宗人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皇族的这些特权能够贯彻执行。

载涛被宣布署理宗人府宗令后，会同左、右宗正各一人，掌管全府事务；依例设汉人府丞一人，掌管校理汉文册籍；其他还有主事、供事、笔帖式等官吏，以分办各项事务。府内仍设有经历司，管收发来往文书；左、右二司管理左、右翼宗室、觉罗事务；银库掌银钱出纳，黄档房掌书写黄册、红册。





载涛曾在宗人府内设立一个清理王公田产调查所,但最终不得其所。按照中华民国与清廷签订的优待条件,即“皇族私产一体保护”。这就是说王公田产、庄园仍属王公所有,耕种庄地的庄丁、佃户必须继续交纳庄租,不得抗租,也不能占地。如果发生这种行为,民国政府就要保护王公的庄地所有权,保护王公的征租权,将抗租霸地的庄丁、佃户依法惩办。

但民国初年的王庄,广大佃户、庄丁,乘王公贵族政治权力被剥夺的机会,拒不交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租夺地斗争。

据当时宗人府函称:

“准王公府第清理财产事务所呈:自共和成立后,各庄佃对王公时生野心,抗租不交者有之,私自税契者有之,听地方团体主使附和观望者有之,甚至有为王公府户已划归国所有者,一唱百和,殊于秋收地租大有窒碍。……现据奉天各王府经理人纷纷报告,谓于景瀛等在奉散布通告,私结团体,竟欲将各王公田产地亩,概行注销,似此混淆视听,不但王公府产租项大受影响,且恐酿成意外风潮,惟有呈请转行内务部迅令奉天民政长官赶将前参议院议决待遇清皇室私产保护条件转飭行政官厅重申布告,……庶各王公秋收地租得以照常征收。”

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辛亥革命以后王公贵族被剥夺了统治人民的权力,不能领受俸银禄米,担任要职,支取官俸,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不能收取贿赂,在经济上失去了特权,而且由于没有权势,租银收不到,庄地被盗卖,特别是庄农、佃户们联合起来进行抗租夺地,加速了王公权势的丧失。

载涛作为宗人府的最高长官,不但不能挽救庄园田产,连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保护不了。据《宗人府堂稿》记载,载涛在奉天省锦县、义县、兴城、绥中、盘山、锦西等六县,有很多庄地,一部分由高振兴、高振奎承领,按年交租。辛亥革命后,他们连年拖欠租银三百八十二两,“屡催不纳,刁狡玩梗之极”,又将王府出



卖锦县庄地的地价六百余元“侵吞肥己”。

另外，载涛在直隶乐亭县蔡各庄、韩家坨等村，有地一千九百五十亩，派蒋岐山当庄头。蒋连年积欠租银一千二百八十两，并将部分庄地暗中卖给佃户。载涛鞭长莫及，即使有心，也无力回天了。

载涛执掌宗人府的主要任务，仍是管理皇族属籍、纂修玉牒等事宜。所谓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清皇族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作宗室和觉罗。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本支为宗室，其叔伯兄弟旁支为觉罗。宗室腰束金黄带子，觉罗腰束红带子。

凡宗室、觉罗所生子女，其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补、降革、死亡等事，由各王公门上或各族册报宗人府。宗人府根据所登记档案，宗室登于黄册，觉罗登于红册。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按辈依序。存者朱书，殁者墨书，载入玉牒。

按照《宗人府则例》规定，每十年纂修一次玉牒。清朝最后一次纂修玉牒，于一九〇五年开始，至一九〇七年完成。一九一五年又届重修之期，宗人府于是又提出编纂玉牒的任务。但由于经费困难，一直拖到一九二〇年，才正式开始编纂工作。

载涛亲自负责掌握玉牒处，下设编辑、收发、校对、会计四科。章京朴厚充任总办，章京定秀充任会办，具体负责玉牒处事务。这次编纂玉牒的正本，按照寿皇殿所藏正本尺寸式样，副本按照宗人府所藏玉牒式样，经过两年多的编纂，花银五万四千余两，到一九二二年全部完成。

玉牒修成以后，载涛亲自护送正本至乾清门，再由宫内太监送至乾清官，放于黄案之上。接着举行隆重的恭进玉牒仪式，在溥仪阅览后，便放入龙柜贮藏起来。玉牒的副本，照例仍存于宗人府。

载涛能在艰难时世，将中断多年的玉牒编纂成功，溥仪为此“龙颜”大悦，发出谕旨：“玉牒告成甚属妥速该宗令能允宜著



加奖叙著加恩赏给载涛之子溥伸头品顶戴……钦此。十四年十月。”

曾经有一段时间，载涛根据溥仪的旨意，又把工作目标转到了整顿内务府方面。然而这次就不那么顺利了。

众所周知，内务府一向中饱私囊，营私舞弊。每年开支，毫无节制，即使四百万的优待费全部照付，也会入不敷出。荣源经手的一次抵押，更为荒唐。重达十一万两的十六个金钟，仅抵押了四十万元，等于当荒金折卖，其余的几乎白送。载涛等几位大臣，辛辛苦苦提出以裁减入手，裁减人员，减少开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是行不通的。包括溥仪本人，就是首先自相矛盾，一方面指责内务府浪费，一方面又挥霍无度。溥仪心血来潮，喜欢上了洋狗，便叫内务府从国外购买，连同狗食也要定期购进。狗病了请洋医治，花的钱比人病了医治的钱还多。御膳房好不容易将厨师由二百名减至三十七名，溥仪又让内务府添设“番菜膳房”，令载涛哭笑不得，大伤脑筋。

生产自救

载涛在爱新觉罗皇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并享有良好的声誉。这与他在执掌宗人府时，努力筹划皇族生计，解救落魄子弟，有着很大关系。

当时民国政府给予清廷的优待条件规定：“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与私权与国民同等。”这样，皇族的特权就被彻底取消了。过去，他们依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享尽了荣华富贵，饱食终日，弹筝击筑，衣绣策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现在，这些一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贵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毫无谋生的技能，一旦罢官失位，停薪不支，生计顿时产生了困难。

陷入困境中的皇族们，起初靠变卖家产为生。一旦家产吃



光了，便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或转手沟壑，甚至冻饿而死。例如，皇族中有一个叫桂顺的人，因家境贫穷，由京去天津谋生，行至杨村，不幸病倒店中，身边又无一文钱。

无奈之下便直接向溥仪发了一封告急禀文：“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全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当时皇族有三万余人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救不胜数，无能为力。

载涛执掌宗人府时，常年经费只有七万四千余两。这点费用当时仅能维持宗人府的一般办事活动，根本无力补助皇族生计。为了帮助衰落中的贵族子弟，载涛联合当时知名的王公贵族共六十八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宗族生计维持会，由四十六名皇族组合而成。

其宗旨是：维持皇族现状，筹划将来生计，增进自治能力，共享共和幸福。凡皇族男子年在二十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入会为会员。维持会设会长、副会长、审议部长、干事部长各一人，均由大会选举产生。

经载涛再三请求，为解决宗族的生计，清室首先将东陵荒地一百九十五顷拨给宗人府，分给无业宗族，招商开垦，作为谋生的手段。之后，载涛又倡议，利用东陵地亩的租金，试办教养工厂一处，以为无业宗族养生之备，使皇族贫寒子弟能学习工艺，自谋衣食。

为筹集办厂资金，载涛指示宗人府要广泛募捐。募捐启文中说：“兹因近年以来，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为数计耳，耳闻目睹，情实堪怜。虽经前守护大臣奏明，先后拨交本府养赡无业宗族地亩一款，宗支繁衍，势难普及。初拟交各族按户分给，所得亦只能图数日温饱而已。左思右难，惟有以此款设立工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庶几



款不虚靡，咸沾利益。”

“现由宗人府借定内务府三旗操场房屋地基以之为工厂之用，尚属合宜。常年厂中工食经费，通盘核计，筹备之款尚属开支。惟开办之费无著。如建盖工室，备办使用家具等项用款繁多，不得不借资挹注。此系公益之举，伏望仁慈善士资助，俾得早一日成立，则无业宗室得早一日免于冻馁，是皆出自诸公之所赐也。”

当时很多王公贵族，还有一些民国政府官员及各界社会名流，响应募捐启文，纷纷捐款，解囊相助。

宗人府亲自创办的教养工厂，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在载涛的亲自主持下，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正式开办了。教养工厂章程规定，该厂“以维持宗族贫寒子弟之生计及养成高尚风格为宗旨，专收无业宗族子弟入厂，学习工艺，俾出厂后，得自谋衣食，以为教养兼施之基础”。

开办后的教养工厂，暂收工徒一百名，凡宗室年龄在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壮者，持各族图片证明，都可入厂。工厂分地毯科、织工科、木科、席科、筐科。工徒半工半读，除半日做工外，还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国文、数学、图画、体操、体育、音乐等课程。工厂设总管一人，由宗人府直接委派，总管厂内一切事宜。另设庶务司事二人，监察司事若干人，分管厂中财务、工料及监督工徒事宜。

此外，还聘请了几位工科工师和教习，分别讲授工艺和有关知识。工徒全部住宿，每日二餐，每人布衣一件，医药、剃头都由厂中开销。学习三年后，凡工艺及各门功课均合格者，都发给毕业证书，任其自谋出路。考虑到就业的困难，宗人府又很快开办了第二个工厂，以生产地毯为主，从而为教养工厂的毕业生安排了合适的工作。

当时社会一致称赞，宗人府办的教养工厂，为皇族子弟学习工艺，自谋生路，找到了一条出路，不仅挽救了陷于危际的贵族



子弟,而且创造了有可能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必要条件。他们中的很多人,较快地掌握了工、农、商等生产经营的技能,而且以其聪明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为发展祖国的经济和文化做出了贡献。

此外,载涛还为解决八旗生计,四处奔走,颇有建树。八旗军是清朝开国的武装力量,他们多为满洲贵族,娴于骑射,驰骋沙场,骁勇善战,但后期养尊处优,日益腐化堕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为保持旗兵的来源,清廷规定旗人不许从事农、工、商业,只能当兵应差,坐吃钱粮为生。

乃至辛亥革命后,八旗的俸禄钱粮断绝了,又缺乏生活技能,生计发生严重困难。据当时统计,无职无业、无衣御寒、无米下炊的旗户占十之七八,约十万余户。

为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载涛除积极向溥仪反映,还组织有关社团,多方筹款拯救贫苦旗人,组织旗人生产自救,不断提出解决八旗生计的建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京城贫苦居民,载涛也尽其所能,作了一些善举。他拨出部分资金,与社会有关部门合作,不定时开办粥厂,施舍灾民;给街头流浪人员发放棉衣;收养部分无家可归的残疾老人;组织技术讲座,传授一些专门技能,帮助他们重新走上谋生之路,自食其力。

对于各处发生的灾荒,载涛更是十分重视。灾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遇到瘟疫流行,路有饿殍,家破人亡。他除了视察灾区,四处慰问,还尽量挤出一点钱来赈灾,然而灾多赈少,特别是经过大小官吏的贪污克扣和层层盘剥,又有多少能用到灾民身上呢?

载涛对吸食鸦片也是深恶痛绝的。清朝后期,鸦片的流入、种植和贩卖更加猖狂,烟毒泛滥全国。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甚至士兵,吸毒都大有人在。他是赞成严令禁烟的,在其工作范围内,也作了不少努力,却难见效果。他本人绝不吸食一口,但皇

室贵族中吸食者却比比皆是，最后连六哥载洵也染上了这一口，这不能不是对他禁烟的一个讽刺。

经营两陵

满族对祖先格外敬重，皇室人员尤为如此。所以载涛在其担任宗人府宗令时，主持“两陵承办事务所”是最为尽心尽力的。

由于职务的关系，载涛经常巡视东、西陵，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是清皇室的陵墓群，埋葬着五帝、十四后、一百三十六个妃嫔和公主。这座始建于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的陵墓群，以留瑞山为中心，陵区南北长约一百二十五公里，东西宽约二十公里。

十五座陵寝依山筑于留瑞山南麓，东面丘陵起伏，西为黄花山，南面天台、烟墩两山对峙，中间是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开阔原野。孝陵坐落在主峰脚下，以孝陵为中心，诸陵分别两侧，神道和桥梁纵横交错，黄绿琉璃瓦顶，画栋朱垣，汉白玉石殿陛栏杆，构成一幅绚丽宏伟的图画。

清西陵坐落在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河北易县城西的永宁山下。与清东陵一样，是我国现存规模宏大，建筑体系完整的皇家陵寝。四周层峦叠嶂，形势高爽。西有紫荆关，南有易水，与狼牙山隔水相望，东为燕国古下都遗址。因清朝有诏定父子不葬一地之制，所以继东陵之后，又修建了西陵。

整个陵区范围达一百余公里，内围墙长达二十一公里，内有帝陵四座，后陵三座，妃陵三座，王公、公主园寝四座。陵内殿宇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刻百余座，建筑面积达五十万平方米。各陵的规制和建筑形式，都严格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后陵小于帝陵，园寝又小于后陵。

在建筑形式上，帝、后陵和喇嘛庙是红色围墙，黄琉璃瓦顶；妃、公主园寝是红色围墙，绿琉璃瓦顶；行宫和衙署则是砖墙，布





瓦顶。泰陵居于永宁山下中心位置,是西陵的主体,其余诸陵分别在东西两侧,建筑形制除无泰陵的圣德神功牌楼、石像生等建筑、石雕外,大体相同。惟道光的墓陵别具一格,形制特殊。陵区内林木茂盛,空山鸟语,常令人流连忘返。

即使后来溥仪去了东北,载涛仍然负责主持“两陵承办事务所”。照料、修缮两陵的费用,照例由溥仪按月拨给。据《内廷汇款簿》所载,“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和三月,各汇款四千元。其修葺陵寝费用,则另由永济、筹备两库动支。按收支表,从“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到九年(一九四二年)度,永济、筹备两库租款收入每年计一万三千元,几乎都用于两陵的修缮。

载涛在承办两陵事务中,也曾遇到棘手的事情,这就是当时曾轰动一时的“保圣夫人承祀案”。保圣夫人园寝位于清东陵,是康熙皇帝赐给保姆瓜尔佳氏的葬地。

为重谢乳母教养之恩,康熙亲题御碑,上书:“惟古保姆之设,盖择其可者,必宽裕慈惠温良敬慎亚于女师方称德选。其有懋著,乃劳章追录尔劳,用表双碣。呜乎!铭辞报功,礼亦兼重,而赐尔二人尚碑,知我国家之妇官有足媲美葛覃之师氏,而尔亦与有令闻,以宠尔之子孙,不亦休与。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立。”

保圣夫人墓原由东陵守护陵寝大臣督率景陵衙门管理。到清末民初时,由拜唐阿恩荣奉祀陵墓,并配有园丁十名,以管理陵地庄田。陵园里自乾隆以来,陆续栽植树木三千余棵,松柏参天,挺拔茂密。清亡后由于管理不严,乱伐盗卖,到民国六年只剩下二百六十多株。

当时规定凡八旗王公世爵世职的庄田地亩允归私有,并丈量陵寝地亩,以划清界限。然而,内务府堂笔帖式善保突然提出,他是保圣夫人的九世孙,要求承祀陵墓,继承陵园树株财产及祭田,并通过内务府带人强收陵地。于是,遭到恩荣等人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大打出手。



载涛当时也无法判定谁是保圣夫人的后裔，便令双方族长查证族谱，具结验证。不料双方族长都很快呈来禀结，各说族人是保圣夫人的后裔，连载涛一时也无法判断真伪。

最后，还是善保多方活动，特别是以内务府大臣作为后台，经东陵守护大臣溥钊出面判定：“拜唐阿恩荣所呈次序行辈图式不能成为证据。”“笔帖式善保系属保圣夫人瓜尔佳氏嫡支第九世孙。”“善保返怀宗祖，孝行可嘉，准依庄田地亩赏归私有。”最后，报告呈到溥仪那里，御笔一挥“依议”，总算了结了旷日甚久的这一案件。

巧治奕劻

庆亲王奕劻是清末朝廷掌握实权的显赫人物。他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滥用权势，横行无忌，连皇宫成员和王公大臣都躲让三分。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在他死后，载涛却向溥仪奏了一本，使这位世袭亲王失去了他应该获得的谥号。

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庆禧亲王永璘之孙、道光皇帝之侄。作为皇族亲贵，他爵封庆亲王，而且一向官位显要，权倾朝廷。他曾和大卖国贼李鸿章一起，在庚子八国联军之乱以后，与各国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他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出任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财政部、练兵处等重要部门。后又任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亲掌军国政务。

载沣开始曾想杀袁世凯，后来因受到奕劻反对而被迫改变。他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结果纵虎归山，自贻后患。

袁世凯组阁后，他又被授为弼德院总裁。这个没落贵族，一朝飞黄腾达，便滥用权势，广受贿赂，集聚了亿万资财，暴露了贪婪本性。

他声名狼藉，不断有人对他提出弹劾，他所领衔的军机处，



因为残酷剥削老百姓，搜刮各种不义钱财以及出卖中国的主权而被朝野讥讽为“庆记地皮公司”。

奕劻与卖国贼袁世凯勾结，干了一系列贪赃卖国的罪行。他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大宗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这就算交易成功。对于他公开贪污受贿的丑恶行径，不少人上本参劾。

御史蒋式理参劾奕劻父子说：“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是以前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

载涛曾撰文揭露：“又据人说，吴禄员之得第六镇统领，亦曾花了运动费二万两，其过付为谁，现尚有人能指实。吴是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易放过，则其他更可想而知。……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在当时的朝局，已成公开之秘密。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

至于清廷退位，也是袁世凯使用的阴谋。“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依从退位，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

更有甚者，奕劻的福晋竟多达六位。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后妃数量并没有限制，而清朝的亲王福晋却规定最多不许超过五位。由此可见，奕劻的奢侈腐化达到了顶点。

奕劻府邸在北京安定门外定阜大街，有厅堂房屋六七百间，另有承泽园、泄水湖、苦水井等地的花园三处，还有几十所铺房。他散在各地的田庄多达六万余亩，每年收取巨额租金和田赋。几十年的接受贿赂和多方经营，庆王府中聚敛了大量的珠宝玉器、金银财物。



其中很多来源于袁世凯。庆王府中,无论生孩子或是死人,甚至过生日以及嫁娶妆奁等项费用,都由袁世凯管辖的直隶总督衙门全部包下来,代为开销,这是长期、大量的行贿纳贿。在奕劻就任领銜军机大臣的前夕,袁世凯又派人一次送来白银十万两,贡奉银两之多令人吃惊。

奕劻于一九一七年病死,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涛、载沅,为分家打得不可开交。不得已,他们只好请载涛来帮助分家。载涛因嫌分给他的财产少了,便对载涛说:“辛亥前所送的金银财宝就不用说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早日发布,就向父亲和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我怎么才分配这一点?”

由此可见,奕劻收受的贿赂是很多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北京的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首饰详单,估计价值现金一万万两以上。蓄积如此之多,真是骇人听闻!

奕劻临终前,曾有一封遗折给溥仪。按旧制和惯例,清室应根据奕劻一生的事迹,授予其谥号。但此时,各界舆论突起,民情沸扬,纷纷指责攻击奕劻。载涛也抓住时机,结结实实地奏了奕劻一本,他说:“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

在载涛的劝说下,溥仪对奕劻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当奕劻家人递上奏折请求谥法时,他完全撇开内务府送来的拟谥法号,另写了几个坏字眼,如荒谬的“谬”,丑恶的“丑”,幽灵的“幽”,乞丐的“丐”等,作为恶谥,让内务府发下去。

他认为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的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最后,否决了内务府大臣拟谥号“哲”,仅授谥号为“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为“密”。奕劻的葬礼,也仅由载涛带领侍员十人前往奠醑,只送去陀罗经被和三千元治丧费。

说来好笑,此事竟在当时遗老中间称颂一时。有文记载:



宣统九年正月初七日,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遣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指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

开放禁苑

民国以后,清室已无力管理和维修供帝后游玩的苑囿行宫。为解决经费来源,载涛曾多次建议溥仪采取开放、出租等办法。这不仅增加了皇室的收入,而且使广大平民有机会欣赏到我国古代丰富灿烂的文化名胜。

天安门,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作为皇城的正门,是警卫森严的禁区,即使品位高显的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的特许也不能进入,一般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可能出入这里。清室曾规定,除太后、皇帝舆驾出入外,只有皇后大婚日由此门进,文武状元传胪后由此门出,其他官员一律禁行。平日里护军层层把守,严禁百姓靠近。

清亡后,百姓强烈要求开放东、西长安门,以沟通东、西城的交通,要求开放天安门广场,以便游览集会。当时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开始向清室交涉,将中华门及东、西长安门移交民国管理。

在载涛等人的说服下,溥仪又慑于当时的压力,被迫同意了内务府的要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底,工程队将中华门及东、西长安门的石栏拆撤,清理了道路,安置了路牌。次年一月一日正式开放。

接着,天安门广场也开放了。最后,随着交通的发展,中华门和东、西长安门也逐渐拆掉,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颐和园是清代著名的帝王行宫花园,后经慈禧太后重资修



建,颇为雄伟壮观。民国初年,这座皇家园林仍为逊清皇室所有。但广大平民百姓强烈要求将这座用劳动人民血汗建造起来的颐和园,辟为游览场所。起初,北洋政府不得不允许有限制性的参观,但园林管理仍由清室负责。

据载涛回忆,颐和园的第一位“管事”,竟是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还是皇帝亲下谕旨钦定的。不知是赏赐,还是照顾,总之这位颐和园的第一任管理者,既不懂经营,也不善管理,只知自己游玩赋诗、饮酒作乐。他花费大把银子,买来两艘快速游艇,供其游玩,还把溥仪请来“游幸”,把颐和园还是当成了他们的私人花园。后来由于管理混乱,无力再经营下去,庄士敦只好灰溜溜地离开颐和园。

这样,人们仍然不满,进一步要求颐和园对社会开放。当时正值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之时,皇家经费逐年短欠,清室财源日渐枯竭。无奈之下,内务部、前军统领衙门和清室联合商定,索性对社会开放颐和园。

经载涛出面,与内务部确定了门票收入的分配比例及用途。门票三分之二归清室,三分之一归前军统领衙门,作为维修西郊马路及其他公费的专款。人们记得,当时门票每张收大洋一元二角,入园内参观也逐渐加费,排云殿每张五角,谐趣园每张二角,南湖每张三角……园内太平船及洋轮一律开渡,每人收价大洋二元。最初每月门票收入约二千元,以后逐年增加,各方反映都好。

另外,钓鱼台、紫竹院等帝后皇室的苑囿行宫以及内务府所管辖的官房,由于经费严重短缺,早已无力管理和维修。有的年久失修,有的长年闲置,杂草丛生,半已倾圮。

于是,载涛多次向内务府提出用出租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内务府采纳了载涛的建议,向溥仪报上了奏折,“置此经费拮据之时,既无款兴修,若不权宜办理,殊于事实无济。”

最后,经溥仪决定,将这些行宫和官房出租给有关部门或个



人,按期收缴租金,并说明今后如皇室需要收回,则立即交还,不得有误。

当时出租的地方和租金如下:

陈懋桐租钓鱼台行宫,每年票洋二百元。

王敬玺租紫竹院行宫,每年票洋三百元。

徐绪直租鸣鹤园、镜春园,每年票洋四百元。

农商部租西山来远斋,每年票洋六十元。

教育农业学校租望海楼,每年票洋三百六十六元三角。

高祖佑租景山西门果房原有官房,每年现洋二十元。

.....

这里说一下紫竹院。

这座位于海淀白石桥的清帝行宫,是帝后去颐和园游玩途中的主要休息场所。民国以后,清室由于经费困难,已无力管理和维修这座仍属逊清皇室财产的行宫。

经载涛说合,清室将紫竹院内的部分房屋、土地出租给王敬玺一家,每年出租三百元。后来,清室为了讨好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便把紫竹院无偿赠送。当时共有官房一百三十四间,庙前水旱地五段,共一顷九十六亩九分。又庙西旱地一段计二十六亩。但是,战乱不断,人民涂炭,这座帝后行宫几乎荡然无存。

解放后,人民政府拨出重款精心维修,将人工美与自然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栽植片片幽篁,使紫竹院得以名副其实,人们也饱览了这座皇家园林的秀丽景色。

苦心周旋

载涛平生颇好交往,门下总是迎来送往酬酢不绝。在溥仪离开紫禁城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惊变突发,险象丛生,也多亏载涛四处周旋,多方交际。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载涛应接不暇。



一九二四年的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局的演变,对小朝廷越发不利。当时正负责端康太妃丧礼的载涛,听到冯玉祥要驱逐溥仪出宫,并没收王公府第的传说,也沉不住气了。

溥仪为此两次召开王公、帝师参加的“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些王公贵胄,世代享受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突然听到行将危及生命财产的消息,无不惊慌失措,哪里能找到什么灵丹妙药呢?

载涛虽一时也提不出什么主张,但却有些自信。民国初年从军执政的达官显贵,大多与清室都有点旧的关系。曾任训练禁卫军大臣和军咨大臣的载涛,就与其中不少人有着幕僚、袍泽的关系。一旦临危有难,这些关系可能会发生些作用。还是骑驴看唱本,走一步看一步吧!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通过了“修订清室优待条件”,并由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紫禁城执行了驱逐溥仪出宫的命令。

当时修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是:

一、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之权利。

二、自本件修订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后,暂时住进了醇王府。在如临大



敌的冯军守卫下，溥仪以为出了皇宫又入虎口，无奈载沣比溥仪还要惊慌，一点办法也没有，令他感到莫大失望。只好派人捎信给载涛，让他务必急速设法搭救。

经过载涛再三周旋，终于得与溥仪见面，并由他作为清室代表，亲自会见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

载涛之子溥佳，幼年曾作为溥仪的伴读，共同接受学习和教育，经常出入宫禁，是溥仪出宫前后这段经历的直接目击者。他随父亲参加了谈判，并详细记录了父亲提出的八项要求：

一、溥仪自到北府后，他们三个人（指溥杰、溥修）同住一室，实感不便，能否调一间较大的房子居住；

二、能否撤去屋门外的岗哨，并让溥仪到祖母院自由走动；

三、溥仪在北府已居住四天，不但衣服没有换的，连卧具、洗漱用品都没有，能否派人去宫内取回；

四、能否找回几名外随侍（即太监裁撤后找的男佣人）和厨役，以便照管溥仪起居和日常生活；

五、能否允许本族人和师傅们（指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来北府拜见溥仪；

六、溥仪出宫匆匆，未带出现款，能否从内务府存款中暂拨一部分使用；

七、能否撤消禁止一切人外出的命令，允许厨役到外面采办米面蔬菜及日用品。临时居住北府的人，也要回家看看，换换衣服，允许外来人和厨役自由出入；

八、对瑜、晋两位太妃迁出官外的问题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她们都是年老体弱的老人，一旦离开居住几十年的皇宫，很可能产生意外。还是先把外面的房子找好，再劝她们迁出官来。

这些要求，由于载涛从需要和可能出发，言辞恳切，事后陆续都实现了，有些甚至从当日起即可照办。



在这次谈判中，因一事险成僵局，幸亏载涛设法排解，方才化险为夷。随同鹿钟麟前来的警察总监张壁，在要求皇室交出全部私产之后，又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已宣布取消皇帝尊号的溥仪，应立即交出那块传国玉玺。

溥仪当时一无所知，只得说：“我确实没带出什么玉玺来，如果有的话，留着也是无用，一定把它交出来。”这个回答显然使张壁等人极不满意，甚至怀疑迟迟不肯交出玉玺的溥仪，一定会别有他图。

还是载涛有经验，连忙上前解释：“据我所知，按清朝制度是每换一位皇帝就重刻一次玉玺，从来没有什么传国玉玺。”这时缓过劲来的众王公，才纷纷帮腔：“清朝历代皇帝所用的玉玺，确如载涛先生所说的那样。张总监所说的那块玉玺，大概指的是秦代李斯所篆的那块和氏璧吧？不过，早在清朝以前就已失传了。如果张总监要玉玺，请到宫内交泰殿，清朝历代皇帝所有的各种玉玺都在那里存放。”这样，才勉强应付了张壁的追问。

接着，张壁继续要求溥仪交出皇室私产。主管此事的大臣为难地说：“内务府所管的皇室私产，除盐业银行的存款可很快交出，还有很多房产、地产，多少年来也没有清查过。如果查契约、合同，每天用筐子从库里来抬也得抬上几天。”足见皇室私产之多，而又管理无能，载涛在旁不禁又恨又急，无可奈何。

当时，紧张和不安充斥着整座王府。溥仪被逐出皇宫，给清室和家族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其中尤以载沣最为惊慌，精神几乎完全错乱了。自溥仪进府，载沣就坐立不安，不仅对溥仪毫无安慰鼓励的言语，反而把空气搞得格外紧张，让溥仪感到极大的厌烦和失望。

这时的醇王府成了溥仪的大本营。王公贵族纷至沓来，展开了五花八门的营救。载涛当时代表着多数王公的意见，积极向奉系首领张作霖求援。他与张作霖是老相识，关系颇为密切。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张作霖曾在北京居住，常请他吃饭看



戏。另外，他与其他奉系大将吴俊升、汤玉麟等人也很熟识，时常到天坛骑马，也很谈得来。

于是，他伏案疾书，起草了一封信，以全体满族王公的名义，请求张作霖设法营救溥仪，主持正义，速解倒悬，即日致电冯总司令切实保障宣统逊帝安全，恢复自由。信写好后，载涛亲手交给曾与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拜为盟兄弟的醇王府大管事张文治，令他星夜奔赴奉天求援。

在此之前，当时担任内务府大臣的郑孝胥，极力主张效申包胥哭秦庭的办法，求救日本使馆派兵保护溥仪离开北府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载涛等人强烈反对，认为如果日本派兵来，与驻守北府的冯军冲突起来，不仅载沣一家不保，连溥仪也会受到威胁。

载涛还想了一些办法，竭力周旋于各国使馆之间，设法进行营救。他先拜访了荷兰公使，因为这位公使当时是驻华外交使节团团长，在北京居住多年，与载涛十分熟识，还常到他家做客。了解来意后，这位公使深表同情，当即共同商订了两个办法：

一是先以各国驻华公使的名义，口头通知冯玉祥将军，切实保障溥仪的生命安全；二是由各国公使致电本国政府，以各国政府的正式名义请中国政府即日恢复溥仪的自由。随后，载涛又陆续拜访了英、法、比、意等国驻华使馆，相继征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载涛亲往国民军总司令部周旋，是这一段日子中最惊险的一幕。为了溥仪的安全与自由，载涛决定面见冯玉祥，直接提出清室的要求，使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在旃檀寺冯军司令部，载涛坐等不走，使得当时态度游移的冯玉祥更不想见他了。冯以开会脱不开身为借口，传话给他，“有什么事可向黄郛总理去谈。”听说可见黄郛，载涛心里就有底了。他们早就认识，当年载涛任军咨府大臣时，曾保送他去日本留学。他回国后任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时，还专门拜访过载涛。



于是,载涛当即拜会了黄郛。经过再三说明,得到了黄郛的肯定答复:“溥仪的安全,绝无问题;恢复自由,需待段祺瑞、张作霖到京后才能解决。”

这样,在载涛的苦苦周旋下,醇王府内外军警林立的局面缓解了,人员可以自由出入,他从此可以舒适而安心地睡几个好觉了。

叔侄反目

载涛为了溥仪的自由,竭尽全力,四处奔走。但他没想到,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溥仪与他完全不同,叔侄之间第一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还在溥仪最初住进醇王府的时候,一些亲日的王公大臣就曾主张向日本使馆请求派军队保护溥仪到东交民巷避难。载涛当即明确表示反对。他感到,一旦发生冲突,不仅溥仪安全得不到保障,醇王府及其王公大臣也会遇到很大危险。

但一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郑孝胥、罗振玉等人,仍然不断找上门来与溥仪秘密私语。为防止他们引来日本军队挟走溥仪,载涛建议载沣,要监视并牢牢掌握住溥仪在醇王府的一切活动。

惊慌不安的载沣,仿佛这时才有了主心骨。他冷静下来,十分坚决地执行了载涛的建议。为了防范亲日派对溥仪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前来拜见,他不是加以阻挡,便是立在一边守着,因而也确实使郑、罗等人的阴谋一时难以得逞。

然而,时间长了,这招就不灵了。平素胆小怕事而又不善于应付事变的载沣,哪对付得了那帮老奸巨猾、玩弄谋术的人呢?气得载沣只好作罢,无可奈何地告诉载涛:“我去了他们就不谈了,简直没法儿办。”

面临着对于历史的选择,受着阶级局限性影响的载涛,是无力提出正确主张的。他只是坚决反对“借外力谋恢复”,但除此之外,并无良策。他和载沣等为首的王公大臣,当时还幻想复号



还宫，一心一意地争取恢复原状。他们奉劝溥仪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皇帝的尊号，但不能阻止他在家里做皇帝啊！随着形势的缓和，他们对一切主张出府、出洋的人，加大了攻击，一度还占了上风。

其实，所谓恢复原状，不过是重新恢复民国优待条件。只有恢复了民国优待条件，才能保住他们的名衔和待遇。例如，醇王府就可以每年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载涛的六哥载洵，指使一个叫吴锡宝的门客，上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主张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追究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以弥补皇室受到的损失。

亲日派软硬兼施，从未停止活动。郑孝胥在日本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对各方面进行拉拢。在王公、帝师、遗老、御医中，他尤其愿与载涛交往，常借机与载涛接近。但载涛嫌他“酸气”，不愿与他来往；偶然相遇，也只是敷衍一下罢了。载涛还常提醒别人不要与郑孝胥多接触，使很多人提高了警惕，没有上他的当。

开始时，载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只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亲日派的活动。但以后事情的发展，越发由不得载涛了。溥仪的命运，完全被亲日派一手控制。这帮野心勃勃、奸诈阴险的野心家，千方百计劝说引诱溥仪离开醇王府，以便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阴谋复辟的活动。

当时，对外事务大多由载涛亲手处理。他们对此格外眼红，以为要想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首先离间溥仪与载涛的关系。

果然，由于亲日派投其所好，不断拉拢利诱，再加上溥仪少不更事，胸无主见，处在当时那种险夷莫测的环境之中，使得他们的阴谋活动很快顺利进行。溥仪的天平日益倾向于他们，而对载涛却愈来愈疏远，甚至在公开谈话中也表示了不满的意思。

他当时就曾对载涛的儿子溥佳说过：“你阿玛（满语父亲）和



载泽他们总是叫我看一看，等一等，不知要等到何时为止。夜长梦多，将来说不定又起什么变化。”

当时，载涛也无计可施，与载泽合作产生了一个所谓“久安长治”的办法，由他们两人牵头，分别各率几名王公大臣，轮流在北府值宿，认为一切问题即告解决，无论郑孝胥等亲日派进行什么活动，也不会发生其他意外之事。

日本人早就认为溥仪是“奇货可居”，为了实现侵占中国的目的，又加速了促成溥仪出走的计划。他们使出惯用的手法，以编造骇人听闻的谣言来蛊惑人心，借此达到目的。他们纷纷传言，冯玉祥即将第二次进京，要对溥仪采取彻底行动。这一吓，使当时态度还有些游移的溥仪，最后下定决心，立即逃离醇王府，躲进自己认为安全的东交民巷。

溥仪曾对溥佳说过：“日本使馆武官已经亲自来访，他们对我继续住在北府也感到很不安全，最好是先到东交民巷，他们一定帮忙再给我找一个安全地方居住。我也考虑过，张作霖的话也不能使人全信，一旦再有变化，再想走也走不成了。我打算在这两三天内，先到东交民巷。你们暂时还留在北府，等我有了一定的住处时，你们再找我去”。

一个黄沙飞卷、寒风凛冽的冬日午后，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溥仪以出府查看新租房屋为名，乘车前往东交民巷，辗转住进日本使馆。临行前，他对溥佳再三叮嘱说：“这件事非常重要，在我未走之前，千万别对你阿玛说。如果泄露出去，不但我走不了，生命还有危险。”

事后，载涛果然十分愤怒，当即把溥佳叫了去，再三追问溥仪的下落：“你终日与皇帝在一起，为什么事先也不和我说一声？”溥佳十分害怕，但又不敢说明真相，只能继续欺骗父亲。载涛此时已经无可奈何，他自言自语地说：“已经被遗老们所包围，到了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溥仪自进入日本使馆，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阴谋霸占中国的一粒棋子，从此不能自拔。

龙颜盛怒



皇
叔
載
濤

在溥仪后来辗转迁入日本使馆后，载涛为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庆贺他的二十岁寿辰。那一天使馆礼堂装饰一新，地板上铺满豪华地毯，临时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垫子座垫，作为朝贺之用。墙上贴着黄纸，仆役们清一色佩带清朝的红缨大帽。

届时，从各地赶来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达六百多人。下边是分班朝贺的礼单：

- 一班，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
- 二班，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
- 三班，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
- 四班，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赵琦领衔；
- 五班，前清遗臣，郭曾忻领衔；
- 六班，外宾，庄士敦领衔

溥仪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群臣的朝贺。那天，他的装束焕然一新，穿的是蓝花绿葛长袍，黑缎马褂。群臣们也大体是这种装束，除此之外，便和宫内礼仪无此差别了。

在群臣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溥仪不禁伤感万分，冲动地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惟有静以俟之。”

就在这次祝寿之后，社会舆论开始严厉抨击溥仪投靠日本人，阴谋复辟清王朝。溥仪利令智昏，忘乎所以，更加变本加厉地与日本人勾结。而载涛面对社会的正面指责和善良忠告，头脑却逐渐清醒起来，不再作无劳之举了。

溥仪离府出走后，载涛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用心，从此对日



本人再无好感。自然,为此又加剧了他与溥仪之间的矛盾。

在溥仪寄居日本使馆的日子里,载涛陪同载沣曾数次探望,劝他转回北府,说段祺瑞、张作霖已作了安排,确保北府安全。但此时溥仪在日本使馆的待遇,已是空前热情了。不仅日本公使芳泽、日本兵营竹本大佐表示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确保生命财产及其随从安全,还让出了整整一栋楼房,专供溥仪使用。于是,“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值班房在日本使馆又恢复了,内务府大臣各司其职,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又都忙活起来了。

溥仪后来在天津居住期间,与日本人的勾结越来越密切,为复辟活动忙得不可开交。载涛听到这些事情后,十分担心,他不愿卷入新的政治漩涡,更不甘心溥仪充当日本人的“儿皇帝”。考虑到溥仪已对他存有戒心,载涛便请载沣转告溥仪,切实注意外界广为流传的有关溥仪和日本勾结的传言,要慎重处事,不要上日本人的当。

溥仪听完载沣的复述,很不高兴,再三追问这话是从哪听来的。当他得知这是载沣鹦鹉学舌,而话出自载涛之口时,不禁恼羞成怒,大发脾气,拍着桌子喊道:“载涛有话可直接对我说,为什么还要通过王爷?”直吓得载沣战战兢兢,连忙解释:“载涛不敢说,才让我来转达的。”

最后,叔侄俩完全闹翻了。有些人乘机起哄,不断在溥仪面前告载涛的状,以至溥仪盛怒之下,发了一道“训斥”载涛的手谕:

“载涛不但不以祖宗之事为念,反同诸臣以及载沣、溥忻、宝熙等闹意见。今日所说的话实属目无君上,狂言悖语,忻、熙、煦、杰均在座,无不鄙笑而痛恶之。彼则扬言自若。涛居然大言谓,所有皇上及办事处及北京载沣等一言一动,彼皆有密探无不知晓。彼今日因受众攻击太甚,故羞恼变怒,而溥忻、宝熙等殊藐视之,溥忻尚与之争论数事。”

天津避难

溥仪悄悄逃离北京后,载涛在徒唤奈何之际,曾一时感到当叔父的可以喘口气了,全身绷紧的神经也有所放松。

最初几年,尽管时局依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但载涛看到在掌握军政大权的北洋军阀中,有不少前清的旧臣和部属,对清室和皇族怀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往往通过自己熟悉的途径表示敬意和问候,给予各种形式的关照。因此,尽管清室及皇族的前景暗淡无光,但载涛总觉得多少还有点希望。

待到一九二七年以后,蒋介石依靠血腥的屠杀夺取了政权,很快向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北方,杀气腾腾地反扑过来。此时身居北京的载涛,大有一种山雨欲来、大难临头的感觉。他以极大的震惊和不安,注意着未来局势的发展。他最担心的是,由于他和载沣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友好关系会遭致祸灾。

他想,自己与张作霖来往较多,几次联名写信吁请张作霖保护清室财产及其安危,都是他的主意。载沣一家在西什库天主教堂躲住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载涛出面向张作霖写信,吁请其予以保护,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重又搬回亲王府的。

至于清室人员与奉系其他人的联系就更多了。如今蒋介石联合各路军阀北上讨伐奉系,载涛及清室人员很可能受到连累。

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载涛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带领全家人随五哥载沣、六哥载洵,急匆匆乘火车奔赴天津避难。

载涛认为,当时的天津,有不少外国租界。中国的阔佬都在这里购买房屋,被当作安乐窝、藏身室。后来,许多达官显贵退休后,携妻带子以及搜刮民脂民膏也住进了租界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接受外国人的特殊保护,他们觉得生活得既舒适又安全。

但是载涛怕受制于日本人,设法说服五哥载沣,坚决不住溥仪及日本人早为他们准备好的日租界房屋,最后选中了位于其





他租界的两座房屋。

载涛赴天津乘坐的火车，是张学良临时加派的用以安排奉军将领及其家属撤往关外的军列。当时奉军抵挡不住南来的凌厉攻势，接连受挫，只好退回关外老家。兵败如山倒，士气低落，秩序混乱，整个铁路沿线都是撤退的奉军。当兵的坐不上车，一路骂骂咧咧，总想乘机扒车赶路。

载涛等人乘坐的火车，一过丰台，麻烦就接踵而来。这是一台旧式机车，时速不快，而且开开停停。每逢停站，总有不少士兵扒窗子向车厢内张望，讨要食物和水，甚至手持长枪向车中人比划，吓得女眷哇哇乱叫。载涛也很紧张，吩咐大家不要紧靠车厢窗口，也不要随便打开窗子换气。

当时盛夏初临，车内人多拥挤，又缺少饮用水，又热又渴又挤，一个个叫苦连天。好容易车到杨村，又停住不走了。当时已是夜半时分。生性胆小的载沣，害怕乱军劫车，一夜不敢合眼。幸亏载涛多方排解，并随时打探消息，才使他逐渐安定下来。

第二天，前方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被炸，张当场身亡。载涛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谋杀，一阵慌乱之后，更加关注自己的命运，急切盼望尽早到达天津，拖下去必定凶多吉少。

怎样才能脱离险境呢？载涛见同车厢的一些奉军军官悄悄下车，拦截卡车、小汽车，改由公路奔往天津。他立即建议载沣也走这条路。无奈他们三家老少几十口人，截了几辆车也满足不了要求，急得载沣直跺脚。

载涛只好亲自出马，在烈日蒸腾的公路上，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截住了两辆载重汽车，塞给司机不少钱，三家人总算登车上路了。本来从北京到天津，火车不过四个小时，但他们几经辗转，历尽艰辛，足足用了两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此时，溥仪派去迎候载涛兄弟的汽车，还耐心地停在天津火车站。后来，由于家人通告，溥仪才急冲冲赶来探望。“王爷总



算到了！”对于溥仪的问候，载沅甚为欣慰，但回想起两天来的逃难，仍然十分后怕，像苦熬了几年似的，喃喃自语：“要是被劫就完了。”载涛瘫在沙发上，满面倦容，一句话也说不出，连晚上溥仪请全家吃饭，都借口生病推辞未去。

载涛到天津后，一反常规，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此时的载涛，已别无他求，只求生活安稳了。除了和五哥载沅有些走动，连溥仪的张园他都很少去。由于载涛隐瞒了真实身分，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已来到天津。即使邻居，也不知道这位深居简出的人物到底是何人。

他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天早起早睡。平时除了看书读报，很少外出，更不参加任何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做到这一点开始是很难的。因为不少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清朝的遗老遗少和达官显贵，特别是那些企图复辟封建王朝并从中渔利的人们，闻知载涛已到天津，便千辛万苦赶来，表示慰问。

载涛坚持自己的主意不变：能推就推，能挡就挡，既无谈兴，又无好脸。几个回合下来，人们也就自然了解了他的用意，谁也不愿意再自讨苦吃了。载涛对自己设计的隐居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颇为得意。这是载涛为清室服务以来，过得最轻松、最自在的一段日子。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载涛仍很关心子女的成长，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要求他们上学读书，掌握知识，增长才干。他不仅送自己的子女上学，同时又建议载沅也送子女上学。

载沅可不像载涛那样开通，他历来认为，读书就要读四书五经，教师只能郑重其事地从北京请，天津这样的地方哪会有什么饱学之士。

他原在北京醇王府，聘请了一位叫赵世骏的老先生，是个有名的学问人。他曾指导溥杰书法，自幼临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再临唐代褚遂良帖，集诸家之长，后来形成了溥杰独特的书法风格。其余的弟妹，也随赵先生授读。后因年老多病，介绍了另一



位汉学功夫同样深厚的魁忠老先生,继续教导孩子们。但因天津逃难,未能同行。

载涛可没少做载沣的工作,经他一再建议,终于使载沣下了决心,送两个大一点的女孩子拜师学英文,另送三个最小的孩子到英国工业局所办的耀华学校去读书。孩子们终于第一次走出紧闭的公馆大门,欢天喜地的来到学校,开始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

这是一所天津十分有名的学校,学生都是达官显贵的千金、公子。袁世凯、吴佩孚、曹锟等人的子女也有在此读书的。他们倚仗家势,大摆架子,即使离校很近,也从不走路,都以汽车接送。

而载沣出于隐居的考虑,却从不主张孩子用车接送上下学。溥仪此时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已在东北登极,令载沣惊恐万分。他深知,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民抗日反满呼声极高,对卖国求荣的溥仪深恶痛绝。他和他的全家,可能由此受到株连。

为了确保家人生命安全,载沣这次再也不听载涛的劝阻,毅然中止了三个孩子的学业,把他们重新关进公馆。但这段学习,给孩子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提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能够自食其力,很快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并能有所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学习及所受到的教育。因此,他们事后曾开玩笑说:“七叔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比父亲还要好!”

在津期间,载涛还协助载沣妥善处理了曾张扬一时的“溥杰出走”事件。当时溥杰年已十八岁,正当青春年少,友结四方,广为交际。特别在与奉系军阀的不断接触中,使他曾一度冷落下来的复辟野心,又得到新的发展。他觉得,清朝灭亡是屈服于“民军”的武力,它要复兴,同样也需要寻找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这些仅靠遗老们的“读书复国”是办不到的,只有弃笔从戎、武力复辟,才能达到“恢复祖业”的目的。

于是,他主动结交了张学良,两人都是思想性格开朗豁达,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的人,一见面谈话十分投机,如同故友重逢。



张学良很欣赏溥杰的志向，当即举荐他上东北讲武堂读书。他们来往日渐密切，很快结为莫逆之交。

经张学良的精心安排，溥杰轻身简行，乘坐奉军派来的汽车直奔码头，搭日本“天潮丸”货轮驶往大连，悄悄离家出走了。临行前，他通过心腹小太监分别送给溥仪、载沣一封信，无非又是表明心迹，从军习武，拯弱救危，发誓还清复国，光宗耀祖。

载沣毫无思想准备，接到溥杰出走的信件，顿时慌了手脚，只觉得头眼昏花，两腿发颤，气得直骂人。战乱之中的载沣，把儿女的安全看得很重，他已无力影响陷入政治旋流中的长子溥仪，因而寄希望于年轻有为的次子溥杰。所以，溥杰的突然出走，不辞而别，是对载沣心灵上的一次沉重打击。

载涛当时也在场，他同样很着急，担心溥杰会遇到新的危难。因为张作霖死后，奉军与日本的矛盾日益激化，很可能会殃及溥杰，这时候去东北，弄不好会成为日本人的出气工具。

看着悲痛欲绝的载沣，载涛急中生智，连忙向他建议：“此时只有一个办法，立即让皇上亲自出面办交涉，让日本人把溥杰给截回来。”于是，载沣气势汹汹地去见溥仪，又哭又闹，逼着溥仪一定要把溥杰追回来。

溥仪也已经看过溥杰的信，由于以前他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所以对他父亲的想法并不感到多么吃惊。但他没想到父亲会如此怒气冲冲，泪流满面，逼得他无可奈何，只好出面到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请求日总领事吉田茂设法将溥杰追回来。

当时正积极拉拢溥仪及其皇室家族的日本人，怎肯让皇弟溥杰被自己的敌对势力拉过去呢？于是作了个顺水人情，通过大连日本宪兵队，待溥杰一下船便扣住了他，以后又辗转将溥杰送回天津。

见到溥杰安全返回，载沣方才放心，止不住又流下了热泪。而溥仪却乐了，颇为欣赏皇弟学军的志气，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作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校，并可以聘请日文



教习……”果然，两年后，博杰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看到此景此情，载涛内心已经十分清楚，大势已去，任何人也无力拉转溥仪了。他后来对家人说清了自己的想法，同时，就在这个时候，下定决心，不再让家人踏入政界了。

溥杰出走而引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了。从此载涛也更加看重家庭的团聚和儿女的安全，他不愿再看到孩子们遇到什么危险。

此后，载涛拜见溥仪的时候，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也不管是否有别人在场，他都不谈所谓“国事”。溥仪也早就觉察到载涛不赞成他投靠日本人，对复辟活动始终不热情，便认为他软弱无能，不具备参与决策的能力，因此，也不愿意与他共商“国事”。所以，叔侄二人在这段时间内，接触不多，在一起也就是谈家常，报平安，相处融洽，相安无事。

但是，载涛实在不希望溥仪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而鉴于以前的默契，又不好明讲，便灵机一动，鼓动载沣去劝说溥仪，注意社会传言，三思后行，切勿上日本人的当。载沣当然很着急，听后立即去找溥仪，将载涛的话又重说一遍。

溥仪此时已无力自拔，听后很恼怒，特别是他得知此话出自载涛之口，更是大发雷霆：“载涛有事可直接对我讲，为什么还要通过王爷？”从此，叔侄关系又一次出现危机。

“静园”不静

载涛在津期间，头脑十分清醒。天津是暂居之地，也是逃难之地，为不使其再重新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他一律闭门谢客，与外界断绝了往来。只是溥仪在天津的住处，即位于日本租界的“静园”，载涛还不时应召而去，目睹和经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变化。



溥仪初到天津,先住进了张园。这是一座占地约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八楼八底的楼房。原为前清武将张彪所有,为显示忠诚,张彪不仅免费请溥仪居住,甚至每日清晨拿着扫帚来扫院子。后随着溥仪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很快又搬到了规模更加宏大的“静园”。

他在这里,公然挂出了“清室驻津办事处”的招牌。前清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又将此地称为“行在”。进入“静园”,似乎又进入了紫禁城,清室旧臣谒见溥仪,礼节一如皇宫。外国人来访,也是毕恭毕敬,礼仪有加。

开始在“静园”生活的日子里,溥仪似乎觉得十分满意,有时甚至觉得比在紫禁城还舒服。因为在这里,他有了可以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不能干涉。虽然不再穿皇帝的龙袍马褂,但并不妨碍旧臣给他叩拜。说话做事,可以为所欲为,再不受老规矩的限制了。而紫禁城的威严,在“静园”却依然存在,而且发扬光大了。

载涛去“静园”,一般是周末的下午,溥仪还往往派车来接,同时还有受邀的载沣一家。此时相见,已无昔日如此的君臣大礼,而只以家人之礼亲切相处,还是颇为轻松、随便的。

溥仪很喜欢与家人相聚,尤其喜欢与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在一起玩。为家人准备的饭肴,也十分精美。有时是中式大菜,有时又是西式西餐,美味佳肴,令人食欲大开。此时,溥仪受外界影响,生活更加奢侈,不仅超过了父亲,甚至超过历朝历代皇帝。家里设中西两厨,不仅是清室御膳房的正统,全国各地风味佳肴,尽尝于口。

溥仪退位后,在财产上遭受巨大损失,但手中仍然掌握大批价值连城的国宝,在外国银行还有巨额存款。另外,在北京、天津等地占有大量房产,山海关内外还有大量地产。如此雄厚的资财,除了用于政治上的复辟活动,就是挥霍在静园的日常生活上了。

然而,“静园”不静,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是快乐的。一九三



一年，溥仪的淑妃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她曾同正宫娘娘婉容争宠，后失宠被打入冷宫，单独住进了后楼，有时都不能与家人一起吃饭。她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十四岁入宫，“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但在当时提出离婚，应该说是很勇敢的。载涛当时除了积极调解之外，对文绣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静园”的生活，不仅笼罩着家事的阴影，而且充斥着政治上的不安和动荡，愈演愈烈。载涛在那里，见到了原出身清朝仕学馆的高友唐。高友唐以国民党监察院委员的身份对载涛讲，国民党政府给他拍来电报，请他转告溥仪，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并希望溥仪最好选择住在上海，如要出洋也可协助。

载涛没想到他是蒋介石的说客，因对蒋介石毫无好感，对高友唐也就不客气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现在恢复怎么让人可信？孙殿英挖了我们的祖坟，蒋介石怎么不管，我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也不愿意多管闲事。”

没有载涛的引见，后来好不容易见到溥仪的高友唐，据说也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溥仪对蒋介石印象更差，根本不信他的话，背信弃义，只会欺软怕硬，特别是当时日本人正积极拉拢他，承诺了很多条件，所以更不管理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了。

令载涛最为震惊的，就是东陵事件的发生，对于“静园”，对于溥仪深刻的变化。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军阀孙殿英擅自炸开东陵乾隆、慈禧的陵墓，窃取大量随葬珍奇宝物。

此事震动了全国，更激怒了清室成员和前清遗老遗少，他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天津“静园”“行在”，祭祀受辱的先人，慰问爱新觉罗族人。

溥仪反应最为强烈，绝不忍受这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他在“静园”中设立了乾隆、慈禧的灵位，带领家人每日亲自三行跪拜大礼。对着先祖的画像，他不禁放声痛哭，捶胸顿足，发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并且从此席地而眠，大有卧薪尝胆之势。东陵事件的发



生,又一次坚定了溥仪复辟的决心,更疯狂地加紧了复辟活动。

后来,溥仪便十分重视对于祖宗陵寝的保护。一九三八年前后,身在长春的溥仪,为保护西陵,经与日本关东军、华北日军接洽同意,招兵买马,成立了华北西陵守备队。

队长是载涛第三子溥仪,与溥仪是亲叔伯兄弟,溥仪先去长春投军,起初不过是一名中尉,后在黑龙江虎林“剿匪”有功,很快提升为中校。这支300人的部队,受制于华北日军,但军费则由溥仪“帝事费”中支出,军情军务也直接向皇帝报告。

一九四〇年秋天,溥仪曾从西陵所在的妙高峰,专程到长春向溥仪汇报:“西陵附近的土匪很多,经常袭击祖宗陵寝,但我们防范很严,统统把他们杀退了。”溥仪对此十分满意,当场赏赐给他一台当时最高级的照相机,还夸他:“你真不愧为太祖太宗的好子孙啊!”

载涛和五哥载沣一样,不赞成溥仪投靠日本人以谋复辟,对他的复辟活动顾虑很多,当然更谈不上支持了。但是,从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溥仪“安分守己,以求自保”。而溥仪此时有了新的目标和靠山,也不再器重他的“涛七叔”了,甚至认为他懦弱无能,不可参与大计。他们在一起,即使家人团聚,也没有原来的淳朴亲情了,只是双方早已满意地约定为“莫谈国事”。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也加快了逼迫溥仪离津去东北的阴谋。两个月后,日本发动了所谓“天津事变”。

溥仪先是在礼品中发现了两颗炸弹,后又收到恐吓信,信中措词很吓人,“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紧接着,日本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租界之外的华界流氓滋事,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静园”门外,甚至开来了担负所谓保护职责的日军装甲车。

当天下午,溥仪破例提前派车将载沣一家及载涛接进“静园”,安抚父亲:“近来时局有乱,为安全起见,特请‘静园’一避。”



善良的载涛，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他和溥仪在天津的最后一面，更不会想到溥仪从此将抛弃家人，为恢复梦寐以求的爱新觉罗氏统治人民的祖业，而投向日本人的怀抱。

那天夜里，“静园”附近枪声不断。难以安寐的载涛，一早就去溥仪住处打探，被日本守卫挡回。直至中午，才辗转看到溥仪留给载涛的信，知道他已于昨夜去东北了。载涛读信的手直颤，多少年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溥仪跌进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险恶阴谋之中！

祝节“万寿”

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夜，溥仪从天津逃往营口起，他就完全落入日本关东军的肱掌之中了。先是在长春出任“满洲国执政”，后又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当了“满洲帝国”的皇帝。

载涛曾去过长春溥仪的住处，留下如此叙述：既不似北平皇宫那种封建性的宏伟壮丽，也不似近代建筑那么现代化的明快潇洒。宫前空地里是假山，水池和溪流，给人一种可怜的狭窄感觉。人们进出的叫来熏门，通过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左边是溥仪的护军营房、马棚、车库，而右边则通过兴运门，算正式进入帝宫了。

这是一座并不高大的水泥门楼，正上方有一圆洞，内镶时钟，下面又雕有二龙戏珠的图案，这一切都在四根圆形立柱的支撑之下。有时，溥仪就在兴运门前临时搭起的高台上，举行重大庆典和集体的接见仪式。

溥仪登极，先穿龙袍祭天。在长春郊外杏花村，用土垒起“天坛”，他穿着龙袍举行了告天即位的大礼，然后回府换上大元帅正装，举行登极典礼。

勤民楼的大厅，富丽堂皇，铺着大红地毯，北墙跟用丝帷幕装饰起来，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面刻着作为“御纹章”的兰花。溥仪立在椅前，两旁是文武大臣，接受列队三鞠躬礼。随



后,日本特使向他递交国书并表示祝贺,最后,他又坐在椅上,接受北京来的清室成员、遗老遗少们的三跪九叩之礼。

溥仪在东北当上了伪满皇帝,可不像逃出紫禁城,躲在天津租界时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摆起了皇上的威风,神气十足了。这期间,他几乎年年做寿过生日,这就是强加于全东北人民头上的所谓“万寿节”。为宣扬皇帝的声威,他还传命载涛率领北京的近支王公世爵,前来长春祝寿。

溥仪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正月十四日,但是万寿节定于正月十三日,这是因为正月十四日是道光帝的忌日,照例避免喜庆,所以提前一天。

关于溥仪生日的神话,载涛作为长辈记得很熟,说得也活灵活现:一九〇六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元宵节的前夕,人们似乎发现泔水桥西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位于什刹海北岸的醇亲王府上空,白雾弥漫,云霞缥缈。开始,人们怀疑王府失火,但仔细观察并非如此。醇亲王载沣见此情景,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不少人竟看见他躲在后花园小桥底下求神保佑呢!就在这时,所谓一位“真龙天子”在醇亲王府诞生了。

每逢万寿节,关内外臣民照例进表祝贺。在这个强加于全东北人民的所谓“节日”里,日本占领者要借此宣扬他们的傀儡政治,而溥仪的目的则是运用“康德皇帝”的身分扩大他的社会基础。所以,祝寿仪式几乎年年都是两套体制。一套是清朝袍褂,三拜九叩和内宴;另一套则是由关东军司令官规定的日本式仪式了。如果前一套属于“秘密做寿”,而后一套才是“公开做寿”。

参拜“万寿节”,这是载涛与执掌伪满十四年的溥仪之间所发生的惟一的联系。此时的载涛,在日益陷入日本魔爪的溥仪眼里,已丝毫不存在“贝勒爷”的尊严了,他所得到的只是无穷无尽、越来越严厉的训斥。

往常春节过后,载涛只是出于爱新觉罗家族,特别是叔侄之间的情分,带着居住在北京的皇族王公,前往长春,为溥仪祝寿。



随行的还有“四爷府”的贝子溥侗、溥忻、溥佐，“五爷府”的溥修，贝勒载润之子溥仲等人。

祝寿大典正式举行的时候，溥仪身穿黄袍马褂，以“康德皇帝”的身份，高高地端坐于宝座之上。载涛领衔率众向皇上献上如意，行三拜九叩的大礼。男性先叩拜，待全部退出后，女性族亲再入殿，磕头如仪，直到溥仪发话：“起来吧！”才敢起身，鱼贯而退。

历行的祝寿宴会上，事先由伪宫内府典礼部专印信封，发请柬、入门证和赐宴单。开席前，亲属及来宾按桌上的名片入座。一般设西餐，十几道菜，均由名厨制作。开席时，全场起立，用香槟酒为溥仪祝寿。餐桌的盘子是特制的，中间有一个“寿”字。这天所用的香烟，也都有“御赐”的字样，每盒十支，盒上印有兰花图案。平时不轻易沾酒的溥仪，在家族聚会上，是少有的轻松、高兴，往往也喝一点绍兴酒、葡萄酒。

当晚，溥仪还一定要身穿龙袍，亲至祠堂，叩拜列祖列宗，也照例要在红脸美髯的关公塑像前拜上一拜。之后，就是年年要搞的家族宴会了。一般情况下，这往往是溥仪最得意的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时刻处在紧张状态中的载涛，才敢稍稍放松一下。

在长春祝寿的日子里，载涛仍然按照过去在紫禁城里的惯例，几乎每天率亲属去向溥仪请安。此时的溥仪架子很大，总要让载涛他们在候见室坐上一两个钟头冷板凳，才吩咐传见。见了面，照例又是那套干巴巴的问候。高兴了就留他们在宫中就餐，不高兴就下令逐客。

由于载涛常常往来于北平、长春两地，因而还要不时完成溥仪交办的各项旨意，如下列电文：

涛贝勒爷台鉴：今奉上传，在北京急速找妈妈（即女仆）三、四名，岁数在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均可。找忠厚、守旧、根本人家才好。如找妥，急速来信为盼。

涛贝勒爷：传前在养心殿当差太监陈献贵来京，伊由北京先至津园，即由津园与伊起一入国证，以便来京。

无故受斥



皇
叔
载
涛

在载涛记忆中,“万寿圣节”与政治形势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少有过得十分痛快的。只是一九三五年的万寿节,过得还算有些特色。那是溥仪登极作为“康德皇帝”后的第一个生日,而且又是他的三十岁生日,溥仪穿着两排扣大衣式的军礼服,佩带着两只醒目的大肩章,腰眼和衣袖上有显眼的深色条带。头戴一顶有大红缨子的头盔,腰挎日本军刀,耀武扬威地来到勤民殿接受参拜。上午九时,长春与东京电台同时播送为庆贺溥仪生日而编排的专题节目,互换祝贺电,然后溥仪开始接受各级文武官员的朝拜,并一一赐酒。

同时,各地也进行拜贺仪式,主持者对朝拜者赠送“奉祝月饼”。在日本高级文武官员祝寿后,中午便在勤民殿的“赐餐场”中开怀畅饮。当晚,两地电台又开始播送祝贺溥仪生日的专题文艺节目,有吹奏乐、诗朗诵、歌谣曲、奉调大鼓、相声等。最后,以侍从武官长张海鹏的《万寿节放送辞》为结束曲,也使祝寿活动达到了高潮。

这篇陈词滥调,却真实地道出了日本人宣扬“万寿圣节”的宗旨:“我满洲民众积困于水深火热之中者,十有九年矣。幸赖大日本帝国之同心协力,多方援助,我皇帝得以肇造新邦,诞膺天命,以王道主义为治国之本图,除苛剔暴,布惠施仁,遂使三千万颠连困苦之疲氓,熙熙皞皞,如登春台,所以逢兹庆典,莫不鼓舞欢欣,同声颂祝,此实出于人心感戴悦服之至诚,断非有所勉强而能然者也。”

载涛慢慢发现,别看溥仪表面威风,实际上他处在日本人严密控制之下,日子颇为难过,行动毫无自由,即使在所谓的“万寿节”中,溥仪也不能从容会见远道而来,专程拜寿的亲属。

因为当时实际执掌皇宫大权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亲



自开列了一个范围很小的名单，吩咐伪帝宫内务府大臣熙洽严格照单执行，除此之外一律不许溥仪会见。结果，溥仪能够会见的只有远道而来伪满的家族成员，如弟弟、妹妹、侄子以及载涛等最亲近的族人。

据溥仪后来自己回忆“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贺队伍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他们随便来见我。”这样，溥仪在日本人名曰“保护”的幌子下，实际成了帝宫之内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值得讽刺的是，在吉凶安直严格限制溥仪的同时，日本人却可以随时见到溥仪。其中，一个自称为“外臣”的日本人，名叫林出贤次郎，献上了一首带有明显捉弄溥仪的“祝寿诗”——

恭值满洲国皇帝三秋晋三圣寿敬赋俚句为颂：

一曲薰风媲舜弦，吾皇揽揆敞琼筵。

三多遥祝无疆祉，万象宏开大有年。

地接东瀛联与国，民瞻北斗庆中天。

旧邦新命诚明圣，海外微臣贡南笺。

连一向忠厚的载沣，都看出了其中的名堂，而身在其中的溥仪，却毫不觉悟，依然幻想依赖日本人支持，妄图复辟大清王朝。载沣对他说：“日本人又不是傻子，凭什么花那么大力物力，替你打天下？今天的情况不过像古代的石敬瑭、朝鲜的李玉一样，让你做一个‘儿皇帝’罢了！”

他第一次到长春，就感到了日本人的气焰和压力。还未安顿好，溥仪就告诉他：“昨天我派护军到车站列队欢迎王爷一事，日本关东军已提出抗议，声称南满铁路，不准中国武装军队进入，是条约所定，今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日本人还称载沣一家为“旧清室关系者”。他十分反感，说：“什么‘关系者’？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从此，他对日本人再没给过好脸色，还断然拒绝了每月可得一万元的“日满文



化协会”总裁一职。之后，甚至拒绝了溥仪留其居住长春的请求，毅然回到了当时还很动乱的天津。

载涛十分赞同哥哥的作法，同时也深知溥仪的处境，因此，每次“万寿节”，在长春逗留的短暂期间，为了避嫌，一般不去找溥仪，而且得过且过，得躲且躲。但一次却因躲闪不当，犯了溥仪“君前失礼”的忌讳，受到他的训斥。

这天傍晚，载涛饭后在帝宫内的西花园散步，偏巧溥仪也来这里散步。按规矩，不管是谁路遇皇上，都要就地磕头的。可出来躲清闲的载涛，实在不愿这个时候与这位“康德皇帝”多事，便闪入旁边一条小径，想一走了事。

不料溥仪早已发现一条人影，大声斥问：“那是什么人？不下跪！”一旁的随侍报告他乃是皇叔。这位年轻君王却立即沉下脸来，依然照章办事，大喝一声：“家法何在？”吓得载涛只好抢上一步，伏在又是水又是泥的小路上，向当皇上的侄儿谢罪。

随着时局的发展，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摆脱不了日本人控制的溥仪，生怕日本人在垮台之前杀人灭口。于是，他一面对日本主子伺候颜色，谄媚逢迎，一面又对家人打骂成性，肆意凌辱。

他甚至立下这样的“家规”：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不准互相包庇袒护；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如有违背，甘心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这种蛮横狂妄，不仅对下人，对家人，对长辈也是如此，而且愈演愈烈。伪满的日子越发难过，溥仪过万寿节的兴致也逐渐淡漠，而脾气却越发暴躁。

还有一次，载涛受到溥仪的训斥就更严重了。那是伪满洲国灭亡前夕的万寿节，溥仪为欢庆生日，特意请来了日本滑冰队入宫表演。当时，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载涛当溥仪之面与外地来京祝寿的几位老朋友打招呼，表示礼貌。

这事，本来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极为平常的。可是在溥仪那



一群人中，却成了“大不敬”的失仪行为。因为“天子”乃是“至尊”，在“天子”面前没有谁更尊贵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礼的表示。

了解溥仪的人，特别是他的家人，都知道溥仪绝不容许如此事情发生。按溥仪要求，凡发现这类不敬行为，应立即向溥仪报告，否则视为不忠。

因此，“按照溥仪的教诲”，这桩在皇帝面前是“失礼”的事件，在晚上家宴时，溥仪之侄小瑞便悄悄向溥仪报告了。溥仪当时并不想责备载涛，也没发脾气，只叫小瑞退下去。而载涛却毫无觉察，又问小瑞：“你方才说些啥？”

这一下，使溥仪勃然大怒，猛拍桌子，大声喝道：“给你脸，不作脸，你还有个够吗？你眼睛里还有我吗？”皇帝的盛怒，吓得载涛双腿跪倒，惶恐谢罪。溥仪越说越气，索性离席吼叫起来：“你的眼里还有我吗？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

载涛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平生更未受过如此喝斥，吓得双腿跪倒，惶恐请罪。旁边族人侄辈们，看到七爷都跪下了，更吓得魂不附体，不欢而散。

自然，这一切绝非只是载涛的“君前失礼”。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伪满败局已定，瞻念前程不寒而栗的溥仪，无非是借机发泄罢了。

溥仪的失态，使全场鸦雀无声，真是大煞风景。到了伪满后期，日本的失败也已注定。无论是吉冈等日本人直接流露出来的颓丧心理，还是从国外传来的各种消息，也都日益加深了溥仪的末日情绪。因此，溥仪的情绪日益败坏，在家门里发的威风日益凶狠，连载涛也不能不成了溥仪发威风的对象。

载涛算过，溥仪打三岁起，一生中共度过了三十七个“万寿圣节”。而一九四五年伪满洲国那个最后的“万寿圣节”，则是留给后世的一大丑剧了。

平淡天真

三拒出山

载涛在日寇侵华期间，闭门不出，表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这是他在旧时代，颇为难得的刚强之举。对日本人，或横眉冷对，或沉默以待，倔强地表现着自己的民族精神。

到过载涛家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幅横匾，上书“平淡天真”四个大字。这是载涛亲笔手书，既表明了他的心迹，也是他这一时期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载涛闭门思过，扪心自问，比谁都清楚这一历史的变迁，给自己、清皇室及王公贵族们带来的后果。解放后，他曾经在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上，分析了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

其一，数百年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养成了王公贵族的寄生、腐朽、庸懦无能。权势丧失后，仍然摆排场，收入减少，开支照旧，只有坐吃山空，变卖家产，日趋没落。

其二，北洋军阀及其反动统治实行排满政策，把满族人和清王室等同起来，侮辱满族人是“臭旗人”、“破旗人”。满族人找工作，或从事工商业活动，处处受到歧视。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许多满人改名换姓，隐瞒满族身分，以致冒充汉族。

有位满族人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自从民国到如今，民族沉冤似海深。民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包括那些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王公，也逃不脱被排挤、歧视的困境，成为封建军阀敲诈勒索的对象。

其三，辛亥革命以后，王公贵族被剥夺了统治人民的权力，



不仅不能领受俸银禄米,而且由于没有权势,租银收不到,庄地被盗卖,加上王府的管事、庄头,也乘机盗取王府财产,吞没租粮,偷典庄地,严重地损害了王府的利益,这也是加速王府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载涛生活日益贫困,度日如年,但他始终坚定地执行自己的人生原则——“不发国难财”。他虽出身皇族,却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在日寇侵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他原来所持的复辟清室的愿望开始淡化,更不赞成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复辟。

早在溥仪最初与日本人勾结的时候,他就极力反对。溥仪逃往东北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说过:“溥仪完全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只能充当俯首帖耳、为人所用的儿皇帝。”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解决前夕,载涛有多次“出山”的机会,而且可以高官厚禄,重享荣华富贵,却都被他拒绝了。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成立卖国的傀儡政权即伪满洲国,重新当上了“皇帝”。前清贵族中的许多成员纷纷投奔伪满洲国,一个个都捞了个一官半职,连载涛的二儿子溥佳也投奔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宫内务府的“侍卫处长”。

这期间,溥仪曾托人带信、派专人专程来京劝说载涛,到东北“满洲帝国”去任职,以壮大他的威风。完全可以相信,载涛这位当年大清王朝的“军咨大臣”,堂堂皇叔,到了伪满,必定是官职显赫!

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载涛坚不受命,每次他都是冷冰冰而又坚定明确地说:“我不去当亡国奴!”便把来人给打发走了。但溥仪仍不死心。一次,溥仪又派了一个名叫“田中”的日本人来游说载涛,照样被载涛倔出去了。

载涛的第二次拒绝“出山”,是在日寇投降前夕华北伪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载涛当年的老朋友、伪华北政务委员长王揖唐,



鉴于时局多变，宦海沉浮，于是他想到了载涛，希望载涛能出山帮他一把。

一日，他坐上小汽车专程来到载府拜访载涛。两人坐定，王揖唐开门见山地说：“涛贝勒，你是政界、军界名流，有主政、主军的经验和才干。我老了，干不动了，你来帮我吧！”并声称每月可付给高薪，以帮助载涛立即摆脱生活的困境。

载涛一听，吃了一惊：“这位老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心里说，现在日本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你看形势不妙，想拉我去替你们当垫背的，我才不干那种傻事呢！他双手一抱，向王揖唐作了个揖，风趣诙谐又认真地说：“你饶了我吧，我可坐不了那小汽车，还是骑我的自行车自在！”王揖唐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然离开了载涛家。

第三次，是在解放前夕，蒋介石的监察院委员、立法委员高有唐，奉命专程来京拜见载涛。这个人原来出身前清仕学馆，与清室、王公都有一些老关系。他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请载涛在多事之秋，为挽救危局，能承担些重任，哪怕出面呼吁一下也好。载涛却一点也不给他面子，坚辞不受。

后来，蒋介石亲临北平，曾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招待宴会，款待各级军政显要及社会名流，载涛竟也在受邀之列。然而他拿到请柬后，却淡然一笑，随手弃之一旁。

事后，蒋介石的随侍要员陈其彩、李书城亲自上府拜访，双手呈上一封蒋介石亲手署名的慰问信。由于陈其彩、李书城是载涛当年主持军咨府时的老人，载涛不好不见，但也只是叙旧而不言政治。

治家理财

辛亥革命以后，载涛深居简出，停止了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或在府邸演戏、养花、养鸟、养鱼，或到马场赛马，或骑上自



行军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转悠。生活上,开始主要靠“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清室家用补助”。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废除了优待条件,在北京的皇族们也断了生活来源,载涛的家境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万般无奈之下,载涛只好直接出马,亲自理财治家。他能掌握运用这套本领,在当时皇室成员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清朝从康熙以后,至少从嘉庆起没有一位皇帝学过数学。庄士敦曾建议为皇上开数学课,结果受到中国师傅们的好一阵嘲笑,到底也没有开成。载涛因为向当差的打听照相机的价钱,也为亲友们所轻视,认为那是有失王公贵族的身分,最后只能在管事们的蒙混舞弊下,专靠当卖,过着坐吃山空的生活。

就连皇上溥仪也是如此,当时他下令清查宫中财产,以便励精图治,东山再起。然而中饱私囊的内务府大员却早有对策,捧上一大堆账本让他过目。数不清的账本和数字,终于使溥仪头痛生厌,在数字攻势战中败下阵来。

载涛在后来就读于贵胄学堂时,对于新开设的“数学”却颇感兴趣。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并认真钻研这在一般学校不曾开设的课程,较好地掌握了数学运算能力。庄士敦不止一次地说过:“载涛是王公里惟一懂得理财治家的人。”

说治家理财,载涛还真是会精打细算,对家里的开支管得很严,柴米油盐酱醋茶,事事都要过问。孙女们上学,需要买支铅笔,买块橡皮,不过几分钱的事,也得写张条子,写明铅笔几支几分,橡皮几块几分,给载涛过目,他认为开支合理才按条给钱。

载涛当时习惯记流水账。每天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到晚上都一一记下来。起初,家里有账房专管这件事,他只需把每月所要支出的生活费一并交到账房,每晚同账房核对一下支出账就可以了。后来断了俸禄,家里又没有正式收入,生活比较拮据。为节省开支,就把账房撤销,把账房先生辞掉了。



从此，记账的事就由载涛的三儿媳担负。而他本人则要亲自过问。每天晚上，三儿媳到载涛房子里一笔笔记下当天花的钱，一笔笔用算盘算好，钱物相符了，这天的账就算结了。

载涛对账目一丝不苟，一分钱也不能错。如果哪一天有一笔账对不起来，就是说花了钱见不到东西，或者虽有东西但同花的钱数不符，载涛都要追根究底，直到钱物相符为止。

一次，载涛给夫人钱上街买东西。晚上夫人向载涛交账时，钱物对不起来了。经反复查对，原来是少了一包味精钱。但是，这包味精无论怎么翻腾也找不出来。载涛问：“你好好想想，到底买了味精还是买了别的什么？”夫人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载涛仍坚持让她再想想。

夫人心里盘算，这两角钱的东西如果找不出来，今晚就甭想睡安稳觉。于是她灵机一动，转脸悄悄从自己衣袋里掏出来两角钱，撒了个谎，对载涛说：“这不是嘛，钱找到了，装在里边衣兜里，忘记了，快上账吧！”载涛高兴地笑笑说：“以后可要经心点！”这才了却了这桩“财务案”。

第二天，夫人在她的短大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包味精。原来买好了东西，顺手装进了口袋，回到家又随手脱掉了外衣。待到晚上报账时，这件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夫人把这包味精交给载涛，载涛说：“写上账，买味精一包，算今天的开支，给你钱。”

看起来，载涛很吝啬。其实不然，他认为该花的钱也是非常慷慨的。如载涛爱骑自行车，家里的人，无论是谁，只要学会骑车，每人都给买一辆，连喂马、赶车、管账的也不例外。

变卖“破烂”

“皇帝的叔父卖破烂”。这话也许有人不相信，但载涛摆小地摊，变卖“破烂”，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清王朝灭亡后，昔日执掌军政大权，高高在上的王爷，一下



子被剥夺了特权，全被打入凡间，降为“公权私权与国民同等”，成为国民之一员，成为他们过去所蔑视为“村野草民”、“蚁民”、“小民”中的一员。世道一变，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昔日有权，百官恭贺奉承，王谕、府票在京城内外通行无阻；今朝失势，就完全颠倒过来，逢迎新贵，纳银兴贿，求得官僚军阀的保护。他们缺乏谋生的技能，只好靠变卖家产为生。原来家产颇丰的载涛，也很快走上了这条路。

那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北平解放前夕的一段时间里，载涛的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时期，载涛同他的五个儿子、儿媳及孙儿女生活在一起，加上保姆、管家、“下人”，全家近三十口人。

维持这一大家人口的生计，对早已断绝了俸禄、又无任何进项的载涛来说，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先是把前海附近的“涛贝勒府”卖掉了。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购买了山老胡同二号一处较小的住宅，其余的钱留作生活开支。

然而这笔有数的钱没有几年就又花光了。抗战后期，载涛陆续把山老胡同的一部分房子出租，全家人主要靠房租作为生活来源。大陆解放前几年，北平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的“关金票”、“金圆券”像废纸一样不顶用。载涛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一时间，全家人连吃玉米面的局面也难以维持了。

载涛终日在家里转来转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一天，他听到胡同里有打“小鼓”的，就悄悄地把走街串巷打小鼓收买估衣的叫到家里，挑一些陈旧衣物、杂物变卖掉。这倒也算是一项“进钱”的门路。但是，打小鼓的并不经常来，这又给载涛带来了难题。

好在载涛生性豁达、乐观，不管遇到什么天大难事，他也善于利用事情的积极一面，自行排解，为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由于与走街串巷的估衣匠接触多了，他从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自言自语地说，“干脆，我也去摆小地摊，不是可以每天进一

些钱花吗！”

从此，他找到了新的“进钱”门路。每天晚上，他都在屋里翻腾，凡是他认为用处不大，或者暂时用不着的旧衣旧衫，都一一挑出来，打点包好。次日一早，载涛就同夫人一道，骑上自行车，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



皇
叔
载
涛

这一带，明朝时候是豪门显宦的府邸之一。清朝入主中国，“随龙入关”的宗室王公，作为赏赐，接受了这些府邸。晚清最显赫的恭、醇、庆三大王府也都在这附近。另外，这里还住着不少内务府官员以及有身份的宫监宗室。

因此，这一带的店铺，大多与内务府有着特殊联系。特别是古玩铺，很多财东就是内务府官员或上层宫监。总之，凡在这一带常露面的，一般都有些来历。载涛就看准了这一点，以此作为摆摊之地。

开始时，夫人总感到堂堂皇族，摆地摊卖破烂，实在抹不开脸，载涛很认真地说：“我们一不偷，二不抢，卖自己的东西，有什么可耻？你看这几十口人都冲我张嘴，不卖东西吃什么？”夫人听后哭笑不得，但又苦于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每天都陪着载涛一道去卖破烂。

上早市，必须早起。不然，占不上好的位置，行市就不会好。若是夏天，还好对付。到了冬天，凛冽的西北风，刮起来像刀子似的，那味道可真不好受。为了糊口度日，已近花甲之年的载涛，不得不咬牙挣扎着上路。

他们很早就出发，来到市上，把带来的包袱放在自己通常落脚的地方，打开包袱铺在地上，破旧衣服一件件摆开，恭候顾客光顾。卖掉一些以后，就顺便在鼓楼大街买点杂合面，回家做“疙瘩汤”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如此。

由于经常到小市上去，载涛同那里的小贩们混得很熟。只要载涛和夫人一到，周围的人都热情地打招呼。这个说：“七爷摆到这儿来！”那个说：“七爷靠近我旁边！”常在这儿摆摊的小



贩,几乎无人不知道,“如今的涛贝勒爷,也和咱们混得差不多,靠卖破烂糊口了。”

卖着,卖着,找不到东西可卖了。一次,载涛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东寻西找,找不出什么可卖的东西。最后,从柜里拿出一件皮大衣,夫人一见就急了:“这是我的心爱之物,况且时常穿用,怎么能卖掉呢?”载涛无可奈何然而又和颜悦色地劝夫人道:“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人,将来再给你买一件好的。”

在这里,载涛无意中还创造了一件“奇迹”。起初,皇叔设摊卖“破烂”,知道的人并不多,更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搞得满城沸沸扬扬,险些使载涛收不了场。

原来,他在无意之中,错将一只珍贵的明代瓷器当作一个普通的旧瓷瓶卖掉了。买主赚了个大便宜,不禁心花怒放,由此就盯上了载涛的小地摊,几乎每天都要来看上一看。

消息传开后,载涛一下子出了名,不少人听说皇叔在这里摆地摊卖“破烂”,都纷纷赶来凑热闹。霎时间,他摆的那个小地摊,由原来的门可罗雀,变成了门庭若市,又由原来他等买主,变成了买主等他。

于是,载涛的生意开始热闹起来。很多人希望在载涛的小摊上,再寻出一二件稀罕物件。当然,为此颇为惋惜甚至痛责自己的载涛,断然不会允许这种奇迹再出现了。

这样,载涛以摆小地摊卖“破烂”为主要经济来源,度过了解放前夕的最困难的几年。

移居马厩

解放前夕的载涛,思想已日益趋向平民化。历经沧桑,面对现实,他也不例外地沿袭着中国人随遇而安的传统,以安于现状而告慰自己。是的,他没有卷入政治旋涡,更没有卖身投靠日本人,这足以使他庆幸一辈子了。



载涛思想的演变,与他后期经济状况的演变,特别是客观上逐渐靠近平民百姓阶层有关。我们从他的“三易其居”,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个演变的过程。

载涛出生在诞生过清朝最后两代皇帝——光绪和宣统的醇亲王府,并在这里渡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说起醇王府,准确地说,北京城应该先后有三座。第一座位子于故宫正西,美丽的太平湖畔。奕譞在十九岁那年,作为醇郡王,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按咸丰惯例,应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就成了第一座醇王府。

后来,因光绪在这里诞生,承继同治入宫嗣位皇帝。按雍正立下的规矩,凡有皇帝出生的府第,要作为“潜龙邸”保护起来,应缴还给皇室,或升为宫殿,或改为供奉神佛菩萨的庙宇,不再有人居住。

于是慈禧另赐王府给载涛的父亲奕譞,并拨出白银十六万两重新修缮。这就是坐落在什刹前海北岸的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北府。

一九〇八年,溥仪登极为宣统皇帝,父亲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这比前两次搬迁的理由更充足。于是,隆裕太后赐旨,决定给载沣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地址确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然而后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建造第三座醇王府的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载涛对老醇王府的印象是很深的。这是一座清朝典型的贵族王府,威赫严森,富丽堂皇。在两只石狮守护下的高大府第里,耸立着绿色筒瓦的正殿,雕梁画栋,回廊曲折,院落重重。府内,青山绿水,奇花异树;湖畔,湖水涟涟,花香鸟语。

载涛曾在父亲的墨迹中,看到过描述王府景致的诗句:

滂沱猛势挟奔霆,梦觉推窗倦眼醒。

树外云堆排幃态,城边虹影卧桥形。

石为几榻篱为院,蕉作栏杆竹作屏。



俯察仰视皆自在，悠然意趣入青冥。

慈禧赐给奕譞的新醇王府，坐落在什刹后海的北岸，离紫禁城不过十余里。在此之前，此府最初为康熙时太傅、大学士明珠的府邸。他主编《大清会典》，重修《太祖太宗实录》，深为康熙器重，位居傅相，权倾满朝。后来，他武断专行，结党营私，被康熙罢职回府，隐居度日。

明珠死后，权相和珅垂涎其府邸和所藏珍宝，多次派人勒索。未达目的，便私定罪名，抄没家产，霸为己有。好景不长，和珅因罪被赐自尽，嘉庆帝将此府赐于成哲亲王永璘。他仕途不畅，却满意这府邸花园，度过了晚年的岁月。然而，他的子孙后人，却吃喝玩乐，行为不检，家藏万贯家财，逐渐变卖一空，最后终成空府一座。

这样，传来传去，最后转到了奕譞手中。奕譞搬来后，曾设计了庞大的修缮方案，可惜工程未完，他便寿终正寝了。

本来，如果将全部银两用于修缮工程，王府无疑会比现在更宏大、气派。但监工太监以及施工的厂商，欺继位的小醇亲王载沣年幼无知，相互勾结，挥霍巨款，将工程草草交工。

载沣长大成人后，作为第二代醇亲王，很快又筹集了一笔费用，请来京城一批能工巧匠，在当年遗留工程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设计和组织施工，终于完成了老醇亲王的宿愿。尽管没有完全实现预定的修缮方案，但毕竟使醇王府的建筑风格达到了统一。

即使这样，当时在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心目中，恐怕除了故宫以外，再没有可以比得上醇王府的了。在这占地近一百亩的建筑群中，有房屋殿堂上千间。府邸面对什刹后海，四周绿阴掩映，景致幽雅，风光秀丽。周围是绿色琉璃瓦封檐盖顶的高大院墙。东西南北各开有朱漆铜铆的大门，门口对坐着两只石狮，气派十分威严。

整个王府共分三部分：正院、中院、西花园。进入镶有朱漆



铜铆的大门楼，正院里依次排列着银安殿、神殿和遗念殿。穿过正院便是中院，由此向北的中轴线可贯穿号称三大堂的宝翰堂、九思堂、思谦堂。

这“三堂”颇有讲究。宝翰堂是靠近中门的第一座建筑，主要是醇亲王读书的地方。九思堂是醇亲王母亲刘佳氏居住的地方，堂匾为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所书。思谦堂是载沣夫妇的卧室和客房。

穿“三堂”而过，两旁是排列井然的古代官府平房，为醇王府服务的管理处、回收处、庄园处、随侍处、司房等一系列办事机构都设在这里。另外，随时听候呼唤的太监、女佣、护卫、仆役等也居住在这里。

经思谦堂，可直接进入醇王府的西花园。这是一座不寻常的花园，它精美无比，综合吸收了故宫御花园及其他王府花园的长处，精心建造，趣味无穷。绕湖一圈三百多米的抄手曲廊，错落有致的假山叠翠。园内有观花室、听鹂轩、畅襟斋，湖边有恩波亭，山上有扇面亭、听雨屋，整个花园湖水环绕，石林耸峙，花木掩映，碧草如茵，别有一番风韵。

西花园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堪称醇王府的精华。通过花园拱门，引来什刹海后海的湖水，形成了烟波浩渺的小湖泊。湖水在垂柳、修竹的掩映下，流畅于太湖石的夹缝之中。

与王府正宅不同，花园内的建筑更为精巧。幽静小巧的听雨屋，玲珑别致的扇面亭，葱郁喜人的假山石，彩绘精美的百米长廊，在绿水绕抱之中，更显得优美动人。

醇王府的规模、风格、色调，无一不是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当时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醇王府的祖坟——妙高峰坟塋地上，有两棵硕大无朋的白果树，而老醇亲王就葬在这棵大树底下。“白”和“王”字合起来，恰好是个“皇”字。

光绪作为醇王府的后代，后来进宫当了皇帝，更使那些相信天命的王公大臣确信不疑：醇王府切到了“龙脉”，先祖为自己的



后代造下了“风水宝地”。

这里的特殊位置，也令那些王公大臣神思遐想。什刹海后海是“卧龙潭”，那么醇王府就自然是“潜龙邸”了。特别是当溥仪在这座王府诞生后，人们对醇王府无不刮目相看。

如今，西花园作为宋庆龄故居，已正式对外开放。正院、中院则是卫生部的办公场所。王府马圈经过改造修建，已辟为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最有趣的是，闻名中外的北海幼儿园，竟是原来的王府宗庙——龙华寺。

载涛成家立业后，住进了位于北京什刹海后海的一座豪华府第里。这就是老北京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七爷府——“涛贝勒府”。这是一座清朝典型的贵族府第，由正宅、随侍房、家祠、花园、戏台、马圈等部分组成。

后虽历经多次修整，增建了一部分设施，但总体布局上基本还保持着乾隆晚年的规模形制。穿过两只威武石狮守护下的高大朱门，途经载涛亲自设计的狮子院，便来到他们一家居住的王府正宅。住房内青砖墁地，屋外前廊都设有炉炕，冬暖夏凉，又干净又舒适。住屋之后是花园，亭台楼榭、山石荷池，应有尽有。园内还植有各种树木花草，以供游赏和宴客之用。

为了生活得更舒适，载涛在建筑和设施上，搞了不少新设计，实际上比那些王公显贵生活更为便利。这里虽然不能与皇帝宫殿相比，但也是一个小小的皇宫缩影。

载府鼎盛时期，曾一度使用男女仆役五六十人。他们各负其责，多按专业分工，有厨师、马夫、花匠、木匠、裁缝，后来又增设了电工、司机等。要求十分严格，男仆是绝对不能进入内室及女宅的。

然而随着历史的无情变迁，载府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威风。高大的朱门，败落不堪，狮子院里，杂草丛生，甚至载涛居住的房屋，也冒出了一团团蒿草。

曾经是上百人居住的府第，绝大部分成了空房。载涛家人



带着可怜的几个佣人、保姆，只能住在其中的一个小院里。即使这样，不要说随时修缮以维持住房不塌不漏，就连日常必要的生活开支都难以维系了。

辛亥革命之后，载涛逐渐断了生活来源。用他的话说：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其间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是由清室优待费补助家庭生活的。但优待费停发后，生活就困难了。他坐吃山空，开始还能变卖些东西，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物价飞涨的时代，日子越过越吃紧，最后陷入窘境。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走卖府这一条路了。

于是，载涛将龙头井豪华的涛贝勒府全部房产，以十六万现大洋卖给了辅仁大学。随后又购置了宽街附近的山老胡同二号房院，加上修理费，约用去八万元。这里虽比不上昔日的涛贝勒府气派、舒适，但在当时也还属比较阔绰的。尽管如此，离开了主府，载涛似乎开始意识到，漫漫人生中的一个长阶段结束了，他要迈向一个新的里程。

载涛在这里居住的年代，也正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军阀混战、兵荒马乱、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年代。当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以至载涛的“金圆券发行存款全部损失无存”。他以“出卖衣服物品作小本经营，亦因赔累，生活无法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载涛不得不为生活所迫，第二次变卖房产，又“将山老胡同二号房产，卖给清管局，得价二千二百一十匹布，按当时布价合十三万元。合人民币（旧币）二亿八千七百三十万元。除中间费、工友遣散费、房客迁移费四千二百万元，修建西扬威胡同住所及搬家费约一千五百万元”。余下的“将家族分居按股均分”。

从此，载涛带着原配妻子、庶夫人及小儿子住进了西扬威胡同戊六号——自己原来的马厩，开始了平民式的生活。

枯木逢春

助侄办学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古老威严的醇亲王府，第一次启开沉重的大门，向着高墙外面的平民世界开放了。几十名平民人家的子弟，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上学读书的学校，竟是平时根本不得入内的王府。朗朗颂书和欢声笑语，使沉寂多年的王府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此设立的北京私立竞业小学，载沣以金静云的名字担任学校的董事长。他的小儿子溥任，以金友之的名字担任学校的校长。尽管在学校教职员工的花名册上，未见载涛名字的记载，但溥任对七叔的主动相荐、鼎力助学，仍然念念不忘，赞不绝口。

此事话长，事出有因。

自载沣一家天津避难重新回到北京之后，醇亲王府就一天也没有安静过。日本人为了更加严密地控制溥仪，一直没有放弃对载沣的争取。他们千方百计地逼迫载沣迁往长春，要把爷俩拴在一起，方可制约儿皇帝老实听话。于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同时又是“满洲国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亲自来到北京劝说载沣。

那时载涛常来王府，老哥俩商议好，以不变对万变，均以“年老多病，不宜搬家”为由，婉拒长春之行。吉冈安直多次携带重礼求见，软硬兼施，毫无效果。一次，吉冈安直纠缠不休中，竟表示了非带载沣去“新京”（长春）不可的意思。惹得载沣怒从心生，竟一反常态，摆起王爷架子，拍桌喝骂，让载涛在旁吓得出了



一身冷汗。

吉冈安直不敢硬来，便又生诡计，派车来府接载沣去吃饭。载沣托病不出，委托载涛带几个孩子去赴宴。在翠明庄，他们吃了烤鲈鱼、鸡素烧等日本名菜，抹抹嘴，扬长而去却什么也没有答应。气得吉冈安直掀翻了桌子，灰溜溜地无功而返。

后来，又一位日本少将突然带人闯进王府，说奉岗村司令官的命令，前来借房存放军火。被载沣家人断然拒绝之后，他气红了眼睛，一下子握住了腰挎的战刀，咬牙切齿地说：“你，你，可气，可气……”无奈之中，载沣又抬出了溥仪，才勉强支走了这些日本人。

载涛闻讯赶来，一面安抚受惊的哥哥，一面让溥任给长春溥仪写信求援，尽力周旋。虽然日本人未再来捣乱，但也提醒了载涛，要保证醇王府免受骚扰，一定要有个“万全之策”。

后来，他在一次读报中发现：“政府重申，所有学校的房屋一律不得强行借占！”便与载沣商量，如果利用王府的空房，建起一座学校来，不仅可以造福社会邻里，又可免去外人侵占王府的威胁吗？

几经商议，久卧病床的载沣终于认定载涛的建议，是保全王府的好主张。他们谋划，拿出王府正宅的部分闲置房屋。另外，把王府东路宝翰堂东院的空屋全部腾空作为校舍。

在这个新选好的校址上，载沣起初为这所学校起名为北京私立净业小学。而溥任却不同意，又不敢言明，说附近还有一个净业寺，我们建净业小学，给人家的感觉听起来似乎是一座寺名。后讨论再三，溥任忽然觉得，取其谐音，把净业改成竞业，既避免了寺名，又包含着兢兢业业育人的意思，岂不两全其美？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学校很快建立起来。说来也巧，正在这个过程中，一支国民党后勤机构连续几次闯进王府，要求把王府东院改成野战医院。溥任对他们说，王府空房已办成了学校。见他们仍然不信，便带到现场，工人们正在用王府的旧木料打造



第一批桌椅,从而使这批人断绝了借房的念头。

历经磨难,终于保住了王府。载沅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再三嘱咐溥任:“这个小学校来之不易,千万要办好!”

学校开始的规模不大,只设了两个教学班,四十多名学生。为了鼓励学生,扩大生源,载沅同意溥任在开学之初就提出的减免学费的条例:如学生家庭生活困难,可由家长写信说明情况,酌情减免交纳学杂费;另外,期末考试成绩为前三名者一律免交学费杂,以示奖励。

王府办学,毕竟不同,溥任全力以赴,聘请的几位教员都很卖力,连载沅身边最小的女儿韞欢也常到学校来帮忙,处理一些学校的杂务和经常发生的事情。载沅无事也常到学校来,尽管他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办,但听听孩子们的读书声,也感到心满意足。后来,他特意将其少年时代学习用过的地球仪,用作天体运动演示的三球仪,以及他精心留存的物理标本、设备等统统翻找出来,送给学校作教具用。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得到了发挥。

在解放前夕的混乱和困难之下,经载沅家人的共同努力,竞业学校建立了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质量,口碑越传越广,在校学生人数最后竟很快达到二百多人。尽管学校开支日益加剧,减免学杂费的学生又很多,入不敷出,但载沅总是设法解决,从未有停办之意。

后来,载沅授意溥任,在王府内又成立了第二所学校——竞业初级职业学校。两所学校同时开办,声势也就更大了一些。当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郊外的炮声不绝于耳。载沅家人也十分恐慌,不知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正在此时,载涛雪中送炭,送来一份油印的宣传材料,上面明确刊登着解放军的入城政策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仔细看过材料,载沅方才心神安定下来。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发生动乱就要到王府以外避难了,全府上下一如既往。两所学校也



按部就班,一切按正常秩序进行,一个学生也没走,一堂课也未停,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受哥哥溥任热心于教育事业的鼓舞,韞欢后来走出的步伐更大。原来一直被闭锁在王府深闺里的七格格,开始仅是不耐王府的寂寞和无聊,义务性地帮助学校抄抄写写,照料一些杂事,但这毕竟是她第一次以独立的身份接触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教育。

她接触到平民的儿女,看到了贫富的巨大差距;她看到了实际,体会到了社会的真实状况;特别是熟悉了学校几位年轻的女教师,深深敬佩她们的才华和为人,更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渴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开始向她们靠拢,一切向她们学习,越来越不像王府的格格了。

在这些进步女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下,韞欢不再满足于帮哥哥抄抄写写,她要开辟自己独立的人生。经过一段筹划和准备,她们办起了“坚志女子职业学校”。

为办好这座当时还很特殊的学校,她一下子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变卖了所有的首饰和值钱的东西,购买了课桌椅、教学教具、缝纫机、织袜机等。没钱请更多的教师,她便自己登台讲课,还请朋友来义务讲课。

和其他学校不同,坚志女职免收一切学杂费,实行半工半读,深受社会欢迎。女生多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贫苦人家,家境贫寒,父母劳动收入很差,有些无固定职业,甚至不少人是被迫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大多生活艰难,女孩子就更没有上学的可能了。

因此,她们十分珍惜上学的机会,知道刻苦用功,再加上自小劳动,能力很强,无论是学缝衣服,还是练织袜子,进步都很快。随着文化学习程度的提高,劳动产品数量的增多,学校的收入也在逐渐增加,竟然除了发给学生一些学习用具,还能每周发点零用钱。一个由女子兴办的学校,当时竟能做到这一点,不能



不说是一个奇迹。

后来，韞欢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除了共同的学习和劳动，还走访学生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她向往革命的热情愈发高涨，脱下绫罗绸缎的衣服，换上布料的列宁服，戴上八角帽，学唱《东方红》，大跳秧歌舞，真正成了劳动队伍中的一员。

对于韞欢的所作所为，皇族和亲友中的很多人颇不以为然。办学做事也就罢了，而她以前朝御妹、公主的身份，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就更是惊异不止，难以理解。

载沣对于韞欢在学校的表现，起初也抱着明显的保留态度。但他没有责怪女儿，更没有制止女儿，只是冷眼观察着。看到父亲的忧郁担心，韞欢一面继续亲近父亲，照料他的身体，主动叙说外面世界的变化，一面又搬来“救兵”——七叔载涛。

载涛理解和支持侄女的行动，不断向载沣介绍坚志女职在劳动人民中引起的良好反响，讲清这是新社会的现实，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沟通的增多，误会、隔阂在减少，父女俩的关系又一如往常，亲密无间。

特别是后来，载涛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全国各个方面的代表共商国事。听弟弟叙述了会议内外的所见所闻，载沣深受感触，满族人不再像以往抬不起头，为避免政治迫害而隐瞒民族成分，现在又敢于承认自己是满族人了。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在新中国实现了民主，把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火海中解放出来。

载沣对新中国有了认同，同时也更加信赖自己的七弟了。载涛又一次成为哥哥晚年认识世界的重要使者。

策 婿 起 义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载涛的女婿——达理扎雅，古老而悠久的内蒙古阿拉善霍硕特旗第九代第十位亲王，致电北平毛



泽东主席，郑重宣布“全旗起义，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束缚，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起义之后，达理扎雅历任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他，一生坎坷，在历史长河中几经沉浮，最终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国各民族的大救星，带领家族和全旗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抚今追昔，无限感慨，他深切怀念和感激岳父载涛，在起义前夕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给予他及时、有力的教诲和指导。

载涛对这位女婿历来是十分爱护和关注的。早在达理扎雅二十岁的时候，载涛就把自己的爱女金允诚嫁给了他。因为双方都是位高爵显、大富大贵之家，当时婚礼举办得十分豪华、隆重，一时轰动京城。

当时，阿理扎雅还未承袭王位。老王爷为了迎娶载涛之女，特给儿子拨款两万大洋，还将王府总管、副协理、副章京各一人，听差、婢女各四人，其他各色差人三十人调到北京差遣使用。另外，还专门运来大批内蒙古土特产品，如奶皮子、奶豆腐、细羊毛筒子、苻蓉膏、锁阳、枸杞等，以供婚礼及馈赠皇亲国戚、亲友之用。最后，专门给新娘准备了极为珍贵的首饰。

载涛给女儿的陪嫁也很贵重，真是应有尽有，最后一共装了四十抬。当时的退位皇帝溥仪，很满意载涛的选择，对堂妹嫁给阿理扎雅也很高兴，大笔一挥，赏赐了更为珍贵的礼品。其余皇亲国戚也纷纷效仿，慷慨解囊。

婚礼当天，达理扎雅、金允诚各穿着华丽的民族礼服，在双方家长的陪伴下，出席婚礼盛典。达理扎雅乘坐的是典型的内蒙古大马车，金允诚乘坐的是八抬大轿。前有执事乐队开路，后有马队执旗护送。最后，则是双方送亲和娶亲的人所乘坐的马车，一共四十辆，每辆车内乘坐成双的夫妇二人。参加婚礼的各



方宾客多达一千余人。娶亲的队伍,长达数里,吹吹打打,沿途观者如潮,热闹非凡。

金允诚自幼读书,识书达理,喜爱作诗绘画,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她严遵父训,相夫教子,对达理扎雅十分尊重,对丈夫帮助是很大的。有一事可说明。本来丈夫作为长子,可顺理承袭王位,但因福晋宠爱次子,老王爷也很为难。丈夫心情不好,便终日约了王公子弟喝酒打猎、赛马球,聊以自慰。金允诚不甘丈夫堕落,她一方面关心、体贴丈夫,一方面规劝他自珍自爱,以事业为重,方能使他猛醒,重新振作。

同时,金允诚严格按照满族贵族的礼教,每天早晨陪丈夫去给老王爷夫妇请安,晚间又去聆听双亲教诲。于是,逐渐得到福晋的喜爱,从而保证老王爷顺利完成了久悬未决的王位继承问题。

婚后一段时间,达理扎雅夫妇仍然居住在北京,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经载涛介绍,聘有名师张煜教授四书五经等汉文古籍,请人教授英文、法文、满文,还从阿拉善旗请来俞世珍先生传授蒙文。载涛出于对女婿的喜爱,常常鼓励他,也对他在汉文、满文方面,给予了一些指导。达理扎雅进步很快,学业有成,应该说是与载涛分不开的。

另外,载涛交游广泛,常常宾客满堂。达理扎雅拜见岳父时,也从中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他们谈古论今,提倡新学,推行革新,对于加速突破封建家庭的封闭思想,开阔视野,丰富阅历,走向执政,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受岳父的影响,达理扎雅的兴趣也是十分广泛的,尤其喜爱名马。他自幼练习骑术,六岁就能单骑纵横,其后读书期间,也兼习骑射,从而对马愈来愈喜爱。家中畜养名马三四十匹,雇请名骑师为其调教、驯养。

他承袭王位后,也时常领下属及随从去郊外骑马。平时一有空暇,便到马厩去爱抚他的爱马。为此,他在养马、识马、驯马方面,也没少得到载涛的指点。



在载涛的鼓励下,达理扎雅于一九三二年,毅然离开已生活二十多年的北京罗王府,返回阿拉善旗执政。他不愿像父王一样,长居北京,安享荣华,不理旗政,致使旗内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为改变旗内陈腐落后的面貌,达理扎雅倾其所学,决心鼎力革新,全面整顿,他在政治上,选拔了一批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官员,充实到各个机构的领导岗位上,精简了机构和冗员。在军事上,将王府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保安大队,统一着装和武器,加大了防卫能力。

在财政上,加强了盐湖、储煤的开采,促进了商业流通,改变了畜牧业生产单一经营的落后局面。在教育上,设立完全小学,分蒙汉文两个部分,在王府内又设立初级女子小学,由夫人金允诚亲自担任校长。由此,阿拉善旗出现了前所少见的人心安定、生产发展的新局面。

一九四九年春,全国政局大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向全国。全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新生和民主的曙光,纷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

早已看透国民党腐朽本质的载涛,让回京过春节的女儿金允诚迅速返回阿拉善旗,向女婿转告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国民党一败涂地,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北平的和平解放,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给人们指明了今后应走的道路。

北平各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他都很熟悉,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些人都是很有见地的。他们既然自动站在共产党一边,那就充分说明共产党是很深得人心的。载涛请达理扎雅务必慎重考虑何去何从,时时刻刻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走上和平解放的光明大道!

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达理扎雅也在认真考虑自己的何去何从。当时,只有两条选择:一是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站到人民方面来;二是携眷外逃,抛弃故土,追随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尽



管他在思想上偏重于第一种选择,但仍然举棋不定,犹豫彷徨。

得到载涛及时、明确的建议,达理扎雅像吃了定心丸,心中有了主心骨,从而沉着冷静地面对形势,应付各种事务。他及时召开王府扩大会议,诚恳地指出:“我们阿拉善旗,从未与共产党交恶,而且多年饱受国民党的欺压凌辱。广大民众,以牧为生,无处可跑,也没有必要跑,只有争取和平解放,才是惟一出路。”从而澄清了各方面的疑虑,统一了王公大臣、各方面上层人士的思想,达成共识,确立了阿拉善旗的前途和对策。

最后,他作出两项决定:一要努力稳定局势,必须坚守定远营。迎接共产党的工作,要注意保密,不能走漏风声。二要继续加强与北平的载涛保持密切联系,听一听北平方面的动静,随时调正行动计划,沿着冷静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但是,此时阿拉善旗仍然处于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美蒋特务及民族分裂分子,纷纷大造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蒋总统绝有神策,已重新整顿军力,三月内反攻”;还说什么:“美国要出兵了,英国军舰已开进了吴淞口”;还有人拼凑成立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企图对抗共产党。

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金允诚充分发挥了贤内助的作用。她遵照父亲载涛的要求,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不知疲倦地走访达理扎雅幕僚、部属家中,做他们夫人的工作,晓以利害,安抚人心,支持丈夫起义的光明之路。

同时,金允诚还破例经常奔走于国民党官员及其他达官贵人的夫人之间,上门探望,陪她们吃喝玩乐,投其所好,节衣缩食用来应付各种礼仪酬酢。这对当时改善达理扎雅的处境,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六月,马鸿逵新任西北地区副长官,要求达理扎雅紧急支援适于作战的军马三百匹,配有鞍具的骆驼一千峰,被其以“牧区正值放养、抓膘季节,难以集中收集”为名,巧为拒绝。

七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亲自飞来银川,要求达理



扎雅在贺兰山以北设防,开展草原游击战。最后动员他去台湾,甚至说:“如不去台湾,人身、财产都不安全。”达理扎雅婉言谢绝了“当局的关照”,并表示“容与家人商议后再定”,又渡过这一难关。

达理扎雅经过认真的观察和思考,政治态度愈发坚定,相信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牧民更需要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环境,对自己而言,也渴望和平。走和平解放之路,确为上策。

于是,达理扎雅派出代表,赶赴兰州,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晋见彭德怀司令员,递交了他的亲笔信。彭总十分欣慰,欢迎达理扎雅站到人民方面来,同时表示人民解放军不向阿拉善旗进军。

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之中,达理扎雅向毛泽东主席致电:“我谨代表阿拉善霍硕特旗各族人民向您致敬,并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天,达理扎雅就接到了复电,盛情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当时,达理扎雅因为急于做大量稳定、安抚工作,未能及时赴会,但他仍然对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兴奋。他为自己从此成为人民的一员,开始走上了新生之路,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喜悦!

解放后,达理扎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旗人民努力奋斗,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畜牧业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提高的大好局面。一九六六年春节前夕,达理扎雅携妻进京,拜见岳父,回忆起当年起义前后惊心动魄的变化,仍然念念不忘载涛的谆谆教诲和再造之恩。

人大代表

大陆解放,建立了新中国,长期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爱新觉罗·载涛,这位封建王朝的遗老,也同他的家族一起,同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道,开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以后,载涛作为满族人民的代表,当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全国普选,载涛又以满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着二百多万满族人民,参加管理国家大事。这件事使他感到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他也成了国家的主人。

跨越三个历史时代的载涛,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深为能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一称号而感到万分光荣和自豪。他深深地铭记着自己第一次行使公民权利的投票,以至日后不辍津津乐道地向儿孙们讲述其中的详情细节。

公民投票前,一般先由街道组织一系列的预选活动。每次活动只要街道干部通知到载涛,他都必定前往,而且总是最先到达会场。在居委会,通过街道主任的介绍,他明白了公民选举的意义。

经过公民投票,要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如实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真正地为人民说话和办事,并参加讨论、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他还了解到投票选举代表,一定要慎之又慎,要真正选那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卓越贡献、精明强干的人。

他对本选区拟提名的候选人十分满意,因为这是区委及政协、团委、工会、妇联等单位,综合全选区选民的意见提出来的。载涛对行使民主选举权利很认真,也很细心。有位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他没有听清楚,会后他又去找知情人了解,直到完全清楚为止。举行正式投票的头一天晚上,载涛兴奋得难以入睡,想到明天就能够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心里的高兴劲就别提了。次日一早,载涛很快起身,像过节一样,穿上整齐的制服,赶往选举会场。随着长长的选民队伍,越接近投票箱,载涛心里越激动。

在庄严的票箱前,他郑重地投进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行使公



民权利的神圣一票。在这一刹那，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和亿万同胞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与以往所有的珍宝相比，此时此刻所获得的权利才是最为珍贵的。

还有一次选举。当时载涛刚出院，病后的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听说街道召开选民会议的消息后，仍要马上去参加。家人以其身体有病，医生也不让他参加社会活动，劝阻他赴会，并表示代表他去开会。而他说：“作为公民，我应该行使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是任何人所代替不了的。”

于是，载涛在家人的搀扶下，抱病参加选民大会。他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的介绍，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候选人多为基层的干部，每人都是本行业的优秀代表，体察民情，完全可以反映人民的意愿，完全应该得到选民们的信任。

最后，载涛投出了赞成票，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他深知手中选票的来之不易，激动得说：“能够投出这一票，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是真正的尊严和富有！”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载涛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第一次拿到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过上了幸福愉快的晚年生活。

那是一九五〇年的秋天，毛泽东主席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定为行政十三级，每月发工资近二百元。接着又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月还有车马费五十元。载涛的生活，也同解放前过着艰难困苦生活的中国大多数人民一样，一步登天了。

随后，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四年，载涛又继续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的信任，人民的委托，使他激动，使他自豪，也使他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他立誓在有生之年，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增添一砖一瓦。

载涛对新中国、对共产党是非常感激的。他经常对人说：“新社会给我带来三大好处：第一，当上了人大代表，政治上有



地位；第二，当上了马政局顾问，专长能得以发挥；第三，有了固定工资，生活有了保障。”所以，“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毛主席好”这两句话，经常挂在他的嘴上，记在他的心中，直到他去世为止。

主席关怀

载涛在解放后，得到了党和国家许多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特别是毛主席对载涛的信任和支持，更使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解放后，载涛担任的第一个重要公职，就是毛主席亲自签署任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对载涛的任命状，是载涛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第一天起，这位曾任过清宣统朝军咨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得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

事后，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真是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亲贵大臣，竟激动得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载涛的哭，绝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主席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陈腐为新生。他更喜新社会好，连自己这株枯木，又能逢春，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满腹心思，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

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诉他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如果说这件事是他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标志，那么再一件事就是在生活上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



顾,使他感受到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

这也是五十年代初的事。载涛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炮兵司令部马政局机关上班,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又吃惊,又担心:“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让他骑车跑那么远去上班呢?”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即致函载涛:

“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

接到这封信后,载涛深感党和政府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久,他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就开始在政协办公了。

一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家里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得回去修,可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子去了。

这件事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二千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里了。

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他深情地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载涛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他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终日筹划国家大事,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家里的小事呢?毛主席真是伟人啊!我载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为人民干点事,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于万一。”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

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

国庆观礼

在载涛精心保存的文件、资料、信函中，尤以印有庄严国徽的一张大红请柬最为珍贵：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七年国庆节，定于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与群众游行大会。届时敬请光临。”

那一年，载涛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的。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盛大的节日，第一次目睹这个热烈壮观的场面。此刻，他心潮起伏，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今天竟然成了现实。

披着节日盛装的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旗和鲜花的海洋。晨时的朝阳，把天安门城楼映照得金碧辉煌。由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文体工作者以及市民们所组成的游行大军，在《歌唱祖国》的雄壮乐曲声中，川流不息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空，迎风飘动的大气球，高悬着巨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工人队伍中展示了各种各样劳动成果的巨大彩车模型，新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模型，农民队伍中则行驶着康拜因，由金黄稻穗、大红高粱穗、金黄玉米穗等组成的彩车。人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奔放的激情，倾注对新中国的热爱，表达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念。

站在观礼台上的载涛，沉浸在欢快和幸福之中，他也仿佛随着热情的游行群众一道前行。令载涛最为激动的场面出现了：当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整个广场沸腾了，万众欢呼，惊天动地。排列在广场上的数千名少先队员，手持彩带和花束组成绵绣般的国徽图案。





霎那间，载涛觉得自己已成为世界上最幸福，也是最有力量的的人了。因为他明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扬眉吐气，再也不会像旧中国那样任人欺侮和凌辱了。党和祖国已在他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的印记，并成为支撑他新生命的强大精神支柱了。

观礼结束了，但载涛迟迟未曾离去。仿佛眼前还排列着壮观的队伍，耳边还回响着士兵坚定有力的脚步声，他为祖国的伟大英姿所深深陶醉了。他屏住呼吸，抬头仰望天安门城楼。这座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饱经沧桑的城楼，好似一件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在清朝的封建统治时代，这座庞大、坚固的城楼，未能抵挡住八国联军的枪击和炮轰，留下了无数耻辱的痕迹。只有新时代，才能使天安门城楼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摧残和蹂躏！只有新中国才能保护人民，造福人民，保护这伟大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载涛再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欣赏壮观美妙的焰火。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高悬的八盏大红宫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广场四周的高大建筑物上，装饰着串串彩灯，光彩夺目。巨大的探照灯光柱，拔地而起，刺破长空。五彩缤纷的礼花，当空怒放。有的似钢花飞溅，有的如金黄的麦穗，有的像孔雀展开美丽的羽屏……广场中的人们，花团锦簇，载歌载舞，形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在一阵阵礼花和焰火中，载涛感到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是的，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无疑向载涛展示了更加美好的前景。

和睦家庭

从皇叔走向平民，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情。但载涛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封建，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他力求尽可



能地更新自己，靠近人民。

由于历史的原因，载涛有四位夫人，他的一家也是一个拥有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但在载涛的主持下，全家人和睦相处，尤其在四十年代后期勤俭为生，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过着普通人家那样简朴的生活，也有着一般百姓的辛酸苦辣、喜怒哀乐。这里要说一下载涛的四位夫人。

载涛的嫡配夫人叫姜婉贞。她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名门世家，为载涛明媒正娶。姜婉贞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谈吐文雅，文采过人，尤其喜爱绘画，其中又以擅长画扇面而著称。平素无事，她便在家里画画，以至画好的扇面装满了一箱子。凡有亲戚讨要，她便送上一幅。载涛也很欣赏她的画，还给每个孙女在画好的扇面上题字，留作纪念。

姜氏为人机敏，处事果断，是载涛的好帮手。最使她露脸的是在溥仪大婚那一次。当时，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筹备处”的主持人，虽然总办大婚典礼的一切事宜，但在内廷出入却有诸多不便。姜氏便挺身而出，照料内廷的事务。

当皇后乘坐的凤舆来到坤宁宫时，姜氏上前迎接。按满族老规矩，新郎要在新娘下轿后，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以赶走所谓黑煞神，确保平安。溥仪对此颇感兴趣，接过了箭就要射，不料却被姜氏挡住。原来，姜氏说溥仪是近视眼，射不准怕伤了新娘，临时便把这道仪式免了。

进入新房后，溥仪接过一杆秤，用它揭新娘的大红盖头。细心的姜氏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新娘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秤杆，让他用手揭下盖头。这样，溥仪任由姜氏摆布，从迎轿、揭盖头、吃酒、行礼，一直到受朝贺、祭神灵、拜祖先，十分顺利，皆大欢喜。溥仪自然满意，姜氏也感到得意。

姜氏生有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大女儿不幸夭折，二女儿远嫁了内蒙古阿拉善旗的王爷达里扎雅。达里扎雅在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四个儿子，除两个早死外，一个叫溥佺，



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经日本关东军培训,任伪华北绥靖总署兵器科长,一九四四年逝去。

另一个是溥佳,与溥仪关系密切,早年曾在皇宫为小皇帝做英文伴读,后追随溥仪在伪满洲国任宫内府侍卫处长,解放后曾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工作,一九七九年逝世。姜氏于解放前夕得了半身不遂症,卧床数月,于一九四九年去世。

载涛另外还有三位庶夫人。周梦云,原为载府的一个丫鬟,后被载涛收房。周生有一子,名溥禧,亦名金岱宾。因金岱宾排行第五,所以孩子们习惯称周梦云为“五叔娘”。金岱宾毕业于北京大陆汽车学校,解放后为北京市运输公司汽车司机。周梦云性格怪僻,脾气极为暴躁。解放后,载涛同她离了婚,但仍然照顾她的生活,直至周去世。

金孝兰,原也是载府一个丫鬟,同载涛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因排行第六,金孝兰被称为“六叔娘”。她的儿子叫金从政,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毕业,现年四十八岁,在北京市第八十中学任语文教师。金孝兰胆子很小,为人十分拘谨,一见生人就浑身冒汗,见不了大世面。因此,她只在家里管理内务,很少随载涛外出,被称为“内务夫人”。

她有一桩心病。解放前夕,家里有一位姓赵的厨师,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偷偷往回带了一小袋白面。金孝兰发现后,便吓唬他说:“你为什么拿我家的面?我要告诉老爷!”赵厨师经不住这一吓,事后上吊自杀了。

后来从他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二姨太太逼死我!”警察要用手铐把金带走,多亏载涛给警察塞了一把钱,才算了结此事。

这件事,直到她一九六七年去世,始终使她感到不安。

陪伴载涛时间最长的还是王乃文。她原是一个艺人,三十年代同载涛结婚,时年二十岁。载涛当时已届“天命”之年。从那时直到载涛去世,他们夫妇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

王乃文原来身体不好,又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在家人的劝说



下,开始了有规律的锻炼。她一年四季身上总带着两张“票”:一张是乘坐公共电、汽车的月票;一张是进北海公园的入门年票。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她都于清晨五点钟准时起床,乘车去北海公园。

在五龙亭,她同长期以来结识的游伴——退休工人、退休干部一道练太极拳,做健身操。然后,这群老人在公园漫步,天南海北,边走边聊,悠然自若,别有一番情趣。

王乃文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载涛的影响下,她也加入了民革,成为民革北京市委社联组的成员。后来又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经常到民革、政协参加集会,学习文件,讨论国事,她还是市民革戏曲组的骨干成员。

早年载涛曾一句句地教她唱京戏,手把手地教她练身段,使她在京剧演唱方面有着相当深的造诣。她年轻时,曾多次上装登台,演出全本《打金枝》、《凤还巢》、《霸王别姬》等。至今《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戏,她仍能从头至尾唱下来,而且吐字清晰,行腔圆润,颇见功底。每逢节日、假日,她所在的戏曲组还要为民革的同志们专场演出节目。她的清唱,总能得到大家的喝彩。

载涛与邻居相处也很和睦,大家都很敬重这位“涛贝勒”。他最后住的西扬威胡同戊六号,原来是个马圈。这里有十五间房,养着五匹马,两匹是拉车的,三匹是乘骑的。还有两架马车,一架敞篷车,一架轿子车。解放前几年,马和马车卖掉了,大部分房子都空了下来。

一些穷苦市民没有房子住,找到看马圈的听差,希望能让他们住一住。听差的不敢做主,找到载涛禀告。载涛慨然应允。他说:“谁爱住就住吧。反正我也不收房钱。只是有一条,我也不管修理,谁住谁管修。”

这样就陆续地搬进了一些住户,有赶大车的、开汽车的、拉三轮车的,还有妓女、唱大鼓书的、唱莲花落的,以及原来在王府中当听差的。



解放后,载涛把山老胡同的住房卖给了国家。他就和夫人、儿子,还有两个佣人搬到马房院,将其中的三间北房收拾出来作为住房。他和大院里的人相处得很好。不管是哪家的,只要一见面,他都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包括见到那些拉三轮车的,总是要问:“今儿拉了几趟?”“挣了多少钱?”有时还拍着人家的肩膀,亲热地问:“生意怎么样?”他亲切地称人家“老张”、“老王”,大家依然尊敬地称他“老爷”。

男女平等

载涛曾是位地道的封建王公。但是他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却并不像一般王公贵族那么浓重。他往往不拘于旧制,常能比较快地接受一些新事物。

他爱看书读报,注意随着时代潮流一道前进。就拿对待妇女来说,他不但不轻视妇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涉及妇女的一些事情上,他颇为开明,而且尊重女性。

载涛有十几个孙女。平时她们向载涛要零花钱,他吝啬得很,轻易不愿给。但是孙女们上学念书,买纸墨笔砚,向他要钱,他总是有求必应,大方得很。

说来也怪,在他的十六个孙子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相反,倒有三个孙女是大学毕业生。载涛夫人善画扇面,给每个孙女画了一把折扇,载涛高兴地一一题了字。

新中国建立初期,载涛的四个孙女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载涛对此很引以为自豪。他常常拿出孙女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兴致勃勃地向来访的亲朋宾客们夸耀说:“看看,这是我孙女,当了人民解放军,多精神!”

载涛的三儿媳妇生了五个姑娘,他不但没有因而歧视这个儿媳妇,相反地,还对她十分客气,十分信任,他家的收支账,常常是由这位儿媳帮助算的。



然而,事情也有例外。这位三儿媳妇不幸早丧。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丈夫娶他们家里一位女仆的女儿为续弦。这件事,虽没有经过明媒正娶,也生米做成熟饭,造成了既成事实。但是,载涛对这桩婚事,始终坚决反对。无奈,这位姑娘只得离开了载府,靠载涛的儿子悄悄地接济为生。

不久,载涛的儿子也因病去世,姑娘的生活随即陷入了困境。此时,载涛反而回心转意,产生了侧隐之心。他感到很过意不去,便把大孙女找来,让她给女仆母女送去二十元钱。接着又让孙女送了一次面粉。对这件事,载涛讳莫如深,再三嘱咐他的孙女:“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如果说在三儿子的续弦上毕竟反映了载涛的某些封建思想意识的话,那么,对待他的最小儿子的婚姻问题,却是大大地开明和进步了。

那是解放初期的事。载涛一家由原来的山老胡同大院搬进了他家的马房院。这里在他住进之前,早已住了十多户人家,成了个大杂院。

除载涛一家之外,其余都是平民百姓。载涛的小儿子同大杂院里一位汽车司机的女儿,慢慢地互相倾慕,有了感情,暗暗相爱了。后来发展到难舍难分,公开申明,双方要登记结婚。

女方家长深感这桩亲事门不当户不对,“败多成少”,因此,动员女儿“拉吹”。大院里的住户也都唧唧喳喳,纷纷议论,认为这一对青年男女是“瞎掰”,他们两家根本不可能联姻。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载涛不仅没有反对这门亲事,还热情支持,成全了儿子的婚事。

军 旅 新 篇

马 政 顾 问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状：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主席毛泽东”。

这是载涛精心保存的由毛主席亲笔签发的委任状。

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主席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他不仅又有了骑马的机会，而且使他在军马训练、马种改良方面的知识和专长能得以施展。他勤奋工作，为军马改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还亲自到军马场检查工作，传授知识和技术。

载涛所以能够担任这一要职并为之作出贡献，得益于李济深的举荐和支持。说来话长。载涛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有很深的交往。李济深长载涛一岁，载涛却曾经是李济深的上司。溥仪登极以后，载涛出掌军咨大臣和专司禁卫军训练大臣，李济深曾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辛亥革命以后，已经担任北伐军第四军二十二师参谋长的李济深，又进入移至北京的陆军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当了五年教官。在此期间，李同载多有来往，并成为莫逆之交。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清党以后，已经担任国民政府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李济深再次来到北京。此时载涛早已“平民化”，但这并没有成为李、载交往的障碍。相反，他们之间的情谊更深厚了。



大陆解放以后,载涛同李济深有了更多的接触,关系也更加密切了。如果说过去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朋友感情的话,那么,在新社会,载涛从李济深那里得到的则是政治思想上的关怀、照顾和帮助。

一九五〇年六月,当时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向周恩来总理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当即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十分高兴而又颇有歉意地对载涛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

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邀请载涛向政府提出议案,为建设新中国出谋献计。载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他的信任非常感动。但是他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好像提不出什么对国家有价值的议案。他怀着无能为力的心情找到李济深、蒋光鼐商量,李、蒋便对他说:“发挥你的专长。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

载涛听了,顿开茅塞。他高兴地回到家里,认真做了思考,很快就拟定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

李济深、蒋光鼐一致认为载涛的议案写得好,并愉快地接受载涛的邀请,两个人一同签名,交给了周恩来。提案全文如下:

案由: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案。

理由: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甚多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需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要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如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提案人:载涛。

副署人:李济深、蒋光鼐。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交给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批阅了这个提案,对载涛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欣赏,提议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把这个议案批转给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欣然同意,并批转炮兵司令部安排落实。

不久,载涛即以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身分到西北、东北军马场视察,指导军马改良工作。在远离京城的边远地区,他也惦记着李济深。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载涛视察东北牡丹江军马场时。

一天中午,他同军马场的工作人员登上了扎兰屯的一座山颠,看到满地的牡丹花、野芍药花和野牡丹花。载涛恍然若有所悟,精心地每样选择了几棵,挖下来,根上带着泥土,严严实实地裹好,放在自己的枕套里。陪同载涛视察的人不解地问他有何用,载涛告诉他们:“挖几棵带回去送给任潮先生(即李济深),他喜欢花。”

由此可见,载涛与李济深先生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

抚今思昔

一九五〇年九月,载涛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不久,他听取了负责东北牡丹江军马改良工作的郑新潮同志的一次汇报,使这位清朝的皇叔深受教育。

载涛请郑新潮谈谈军马场的建立、发展及以后的打算。

郑介绍说,东北军马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筹建的。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那是多么艰难困苦的岁月啊!我军对军马的需求量很大,而且日益增加,而当时我军却没有一个军马场。斯大林曾指出:“炮兵是战争之神。”毛主席高度重视军马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军马是炮兵之足”。



于是,东北炮兵司令部后勤部的领导同志,负责组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马场。场长即郑新潮,干部即郑的夫人邵清廉。他们没有一分钱,就是郑新潮夫妇带着六名伤病员,带着两匹种马,白手起家,在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起了全军第一个军马改良场。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这个改良马场共繁殖种马两千多匹,为部队输送军马三万多匹,还给部队联系购买军马两万多匹。在当时缺乏人力、财力、物力的情况下,他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开创了愈来愈好的工作局面。

其中一事,给载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军马场接受了六名日军俘虏,其中三名是兽医,有较丰富的养马经验。军马场既改造他们,又充分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使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大量繁殖军马的同时,还特别加强了军马的改良工作,源源不断地培育出军队驮载骑乘全都合格的新型军马。

随着战争的需要,军马场也在不断扩建,又增设了两个分场、三十六个军马配种场以及若干军马牧草基地。载涛听了,频频点头称赞说:“你们的精神可敬可佩,共产党、解放军团结全国人民打天下,建设国家,实在了不起。”

周恩来对东北军马场的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牡丹江军马场胜利完成了军马改良任务。建国前是全军改良军马的出发点,建国后是全军军马建设和军马装备的总基地。”

听了郑新潮转述的周总理的这一番话,载涛十分激动地说:“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什么人都想到了,什么事都考虑到了,他真是一个伟人。”

抚今追昔,载涛这位当年因爱马而名扬京城的王爷,打心眼里佩服解放军在如此短期内创造的这一巨大奇迹。同时,他也深深认识到清廷的颓败和荒唐。

溥仪时代,当时养育“御马”的叫上驷院,虽说有马一百四五十匹,但绝大多数都是弱马残马。这是上驷院营私舞弊的结果。凡满蒙王公每年照例向朝廷进贡良骥,上驷院的人便以次充好,先把好



马高价卖出,再用低价买匹劣马,还从中克扣,以大饱私囊。

深知其中黑暗的载涛,却也无可奈何。以至溥仪真要骑马的时候,竟连一匹像样的马也寻不出来,只好临时去马店买来一匹小黑马,暂时充作“御马”。这匹马毕竟未受过训练,走得很不稳重,颠得溥仪很不舒服,最后皇上破口大骂,弃鞭而去。

载涛听了郑新潮谈的有关军马场建设的情况,感慨万千。他回想起自己在清朝负责陆军事务时,也曾提出过在张家口的张北建立军马场,以便改良军马。清朝政府也曾拨出大批白银筹建军马场。

但是军马场建成好几年,花了不少银子,军马改良也没有搞成。抚今思昔,前后对比,载涛不胜感叹地对郑新潮说:“你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创建东北军马场,真是奇迹!”

东北扬鞭

载涛当上马政局顾问之后,立誓要报毛主席的知遇之恩,勤奋工作,为改良军马作出自己的贡献。

载涛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到马政局上班以后,为了尽可能多干点事,平日住在机关,只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一次。虽然当时他已年近花甲,机关距他家又有二十多里路,但他坚持骑自行车往返,而且在两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迟到过,也从没有请过假。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决定立即从蒙古购进二万五千匹军马,支援前线战争。朱总司令给载涛先生打电话,约他第二天面谈有关事宜。载涛当即邀请军马专家郑新潮、技术兽医王祥等同志,一起商量汇报提纲。他谦虚地说:“过去我只知道玩马,不懂相马,究竟怎样才能购买更好的军马,你们还得多提建议啊!”

在载涛的精心组织下,一份全面的汇报提纲很快就整理出



来了。他兴奋地说：“写得好啊，我是马政局的顾问，你们就是我的顾问。”

为了迅速熟悉解放军军马改良的情况，载涛开始视察东北各军马场。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载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作战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了牡丹江军马场。

载涛一到军马场，就看到一个土疙瘩上建成的“阅马台”，上面悬挂着“欢迎载涛顾问来场指导工作”的横幅，他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当看到军马场职工自力更生在山坡上盖起的五间平房招待所时，载涛笑着赞扬说：“你们修的房子还真别致，解放军里能人多，还真有土木建筑工程师哪！”场里的人请载涛在门首题词，他欣然挥毫，写下了“牧马山庄”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傍晚，载涛兴致勃勃地登上“阅马台”，观看万匹骏马奔腾归来的壮观景象，赞叹不已。

次日清晨，载涛起了个大早，又登上山颠，兴致勃勃地观看出牧壮观。只看此处群山环绕，绿草茵茵，万马奔腾，追逐而食，好不气派！他不禁脱口而出：“牡丹江军马场是我们中国的‘高加索’，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六月九日，载涛来到小兴安岭的扎兰屯视察。他对这个军马场早有所闻。当年“张大帅”曾把这里作过军马场，日本侵略中国后也把这里作为军马场。抗战胜利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把这个军马场拨给解放军作为炮兵军马基地。

载涛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附近有条卧牛河，在冬季零下30℃的严寒下，仍不结冰，照样可以饮马。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他说：“俄国顿河流域的卡莎喀马，改良的就好。好的，我们就要学习嘛。我相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马种改良工作，才会取得新的发展。”

在骑马视察过程中，郑新潮建议，请载涛来个双手持缰伫立姿势。载涛高兴地说：“能骑善射是我们满族的传统，也是我的



拿手本领。来，咱们比赛一下。”他们扬鞭疾驰，年近六旬的载涛，兴致勃勃，一直遥遥领先。指战员们看到载涛的高超骑术，无不钦佩。

此后，载涛还分别视察了谢家沟军马场、肇东军马场、沧武配种站等单位。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有不解的时候。他看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全是妇女，便问其原因。负责人解释说：“这里的马匹多，男人外出牧马，妇女在家照顾母马、幼驹。而且配种员由妇女担任，当地的牧民妇女就会牵着马匹来马场配种，这样既破除了封建旧习，又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载涛无不点头称赞：“好，你们想得真周到。”

巡查夏季牧场，别有一番情趣。载涛了解到，肇东牧区现有民马一百二十万匹，占黑龙江省一半以上。他思量着提出建议：“如果购买几万匹海拉尔蒙古马，在此繁殖幼驹，可以大大地改善这里的马种。”当知道军马场缺乏经费时，便又说：“我看可以先贷款，用发展后的幼驹供给部队，当贷款偿还。在这一点上要不惜代价。回京后，我要向朱总司令、周总理汇报一下，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视察中，载涛看到膘肥体壮的军马，非常兴奋，饶有兴趣地拿起卷尺测量军马的高度、长度。他量了一匹马的步度便断定说：“这是阿拉伯改良马。”他看到地上一匹马的蹄印又说：“这是安格鲁诺尔曼的马种。”

接着，载涛还滔滔不绝地谈到法国良马的特性。他说：“法国相马专家菲利斯一生相马约五万多匹。”牧场的人称赞说：“载顾问也称得上是我国的伯乐，比得上法国的相马专家菲利斯了。”载涛却十分谦逊地说：“可不能这样比，我既没有菲利斯的眼力，更没有伯乐的素养。”

在卧牛河边，载涛兴致勃勃，偏要脱鞋蹚河。大家担心他年纪大，水又太凉，纷纷阻止他下河。然而，他却说：“不下河，哪里知道水的深浅和冷暖啊？！”于是，他挽起裤腿，慢慢走下河。到



河中心，他捧着清凉的河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伸着脖子自语道：“真甜啊！去找个瓶子灌点水，我要带回北京化验一下，为什么零下 30℃ 不结冰？”随行人员当即找瓶灌水，帮载涛带回来。

后来，他们发现河里有鱼，便又逮起鱼来。中午，他们为节省时间，未回驻地，便把逮来的鱼炖了。载涛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没想到卧牛河的鲫鱼胜过江南武昌鱼，多鲜嫩啊！这是考察军马场的战利品。”

傍晚，载涛一行又登上了扎兰屯的山巅，登高远望，群山环绕，满山遍野的杜鹃花、野芍药、野牡丹，散发着阵阵清香。山谷清幽，野鸟鸣唱，载涛深深地被此情此景所陶醉。

载涛在牡丹江军马场视察了一个月，深深被新中国军马事业的发展所感动。

祁连并辔

马政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指导军马驯养，选择优良马种装备部队。载涛不顾高龄，愉快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的各项工

作，不知疲倦地视察军马生产，传授改良马种的知识和技术。当时的军马场都远在边疆地区。载涛为了尽可能多做工作，不辞辛劳，曾先后到东北牡丹江、西北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军马场视察和指导工作，传授改良军马的知识。如今的甘肃山丹军马场，草肥马壮，一派生机，这里也浇灌着载涛当年的心血和汗水。

最使载涛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是他到山丹军马场的一段经历。那是一九五一年冬天，他和马政局干部郑新潮等一道去西北山丹军马场视察。一路上翻山越岭，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异常艰难。

然而，载涛满怀兴致，十分愉快。到达军马场后，他热情地向大家讲解着培育军马的知识和选配优良马种的技术，受到军



马场指战员的热烈赞扬。

此间,载涛还专程去塔尔寺,看望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堪称历史的会见,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这次视察过程中,有件事给他印象很深。一次,他和郑新潮走到一个小村庄,天黑了下来,他们就住在这个村的惟一的旅馆——大车店里。这个店十分简陋。在此落脚的多是附近的农牧民。晚上大家都睡在一个大炕上。第二天起床,满身都是虱子。后来回到北京,家里人把他的衣服用开水烫了几次,才把虱子清理干净。

每谈及此事,载涛不仅不以为“苦”,反而引为骄傲。他感到能同平民百姓在一个炕上睡觉,是他平生一大光荣,是他新生的开始。他饶有风趣地把身上的虱子称为“光荣虫”,说是他这次远行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虱子是“光荣虫”,给他增添了乐趣,那么小店里的老鼠,却给他带来极大的扫兴。原来这位逊清的武将,驯服军马很有一套,但一见到耗子就会全身瘫软,解除武装。

那次在小店里安歇,炕上的耗子到处乱窜,吓得载涛简直无处容身。他感到,此时此地,若能有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那才舒心呢。无奈何,他只好用皮大衣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把自己裹起来,一动不动,战战兢兢地蜷缩在炕上。而耗子则示威似的在他旁边爬来爬去,害得他一夜没有睡好觉。

一身“光荣虫”、一群耗子,成了载涛和亲朋好友茶余饭后聊天闲谈的两段趣话。

情深谊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工作期间,载涛与他的同事们,同甘共苦,呕心沥血,不仅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而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载涛与郑新潮结识最早,接触也最多。他们在业务上互相切磋,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成了非常要好的忘年之交。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当时主持东北军马场工作的郑新潮,接到上级命令,要他进京向新任马政局顾问载涛汇报工作。他当即从东北赶到北京,住到前门外炮兵司令部临时招待所“天有旅店”。

载涛闻讯后,于次日午后和夫人金孝兰来到了旅店。当时北京的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太阳火辣辣的,天气显得十分闷热。郑新潮对这位“涛七爷”的驾临,颇感意外,有些大不好意思。载涛揣摩到了郑的心理,便笑笑说:“你初来北京不熟悉,我找你方便。”

工作之暇,载涛特意邀请郑到他家做客。开始,郑新潮很拘束,不敢惊动载涛。后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苏进等领导同志知道了,爽朗地答复道:“载顾问相邀,不能不去啊!”这样,他才解除了顾虑,欣然前往。

郑新潮一进载涛家,即看到门首悬挂一幅匾额,上写“平淡天真”四个大字,十分醒目,落款是载涛手书。郑新潮好奇地笑着问载涛:“您是不是想隐居?”

载涛直率地说:“是的,解放前我是隐居的,解放后我也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

载涛回忆了解放前的隐居生活,清宣统帝退位后,他一度隐居在北京小汤山大柳村的先人墓地,做个市隐。这要算个大隐,因为市隐即大隐也。在繁华富庶之都,风花雪月之市,修身养性,不受其阻者,可谓大隐;而那些和尚道士,在隔绝人世的深山幽谷之中,静听清泉叮咚之声,受其环境所限,而不受其扰,此乃小隐。他们越说话越多,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载涛摆家宴,款待了郑新潮。载涛告诉郑新潮,他在清帝退



位后,有几次出山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次政府任命他为马政局顾问,却使他再也不能平静了。载涛说:“任命我为马政局顾问,论职务,说句笑话,也不过是个‘弼马温’的官职。但就是这样的差事,我也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是人民的信任,干好这件事,也算对人民作出的一点贡献。”

由于工作繁忙,郑新潮从东北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再回军马场去。载涛看到郑新潮在深秋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就同夫人商量,要为郑买点衣服。

一天,载涛和夫人带着一包衣服来到旅店,对郑新潮说:“你离家远,孩子又多,天这么冷了,你穿得那么少,我给你买了几件衣服,你穿上吧。”

郑新潮百般推辞不成,穿上载涛送的衣服,非常合身。一个清朝的“王爷”,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如此关心体贴,使郑新潮十分感动。他深深感到载涛虽贵为“皇亲国戚”,从旧社会过来,但他热爱祖国,信服中国共产党,待人热情,光明磊落,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时光易逝,很快到了这年的中秋佳节。由于工作忙,郑新潮未能回家,也未去载涛家。没想到,载涛携夫人一起来到旅店,给他带来了月饼、苹果,还邀他去家里吃饭,待他十分热情,好似一家人一样。

一九五七年秋,总后有位领导提出要取消全国所有军马场。理由是,今后现代化战争要靠机械化、靠汽车,用不着军马了。当时郑新潮批驳了这个论调。

不料到一九五八年初,郑新潮被以“反对党的领导”为由,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一年九月一日,他被宣布下放劳动改造。

在郑离京的当天,载涛和夫人专程到郑的住处为他送行。郑新潮见到载涛到来,百感交集,难过地哭了起来。载涛也以信赖的目光,含着眼泪,坚定而明确地对郑新潮说:“老郑呀,你没有错,我相信总还会有一天要把军马场重建起来的,他们认为你



是‘右派’，我却不这么看。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

时过二十年，曾陪同载涛并辔祁连，视察山丹军马场的郑新潮从外地来京，特意到西扬威胡同拜望载涛。不想，载涛早已作古了。

他不胜凄怆，满怀深情，写了一首七律《悼载涛顾问》。诗曰：“彻夜车骑盛帐仪，风餐露宿顾相依。祁连并辔千山雪，古堡携观万马迤。霍卫边墙烽墩老，汉朝关月物星移。草滩巡礼河西静，狼啸边声逐马蹄。”

在这首诗的后面，郑新潮加了一大段说明：“我到京后，晋谒载老旧居，蒙载夫人王乃文同志亲切接待，相与话旧，忆述别情，惊闻载老已离人间两年多了。感故交零落，与载老共事二十年间交情，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忆与载老对桌办公，于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期间，我们曾同路到了甘肃西北产马区视察工作。一九五一年冬我们同路去检查山丹军马场。回首往事，不禁凄怆，因赋七律一首聊当悼念！”

参政议政

庄严议席

载涛作为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次会议。在这神圣的庄严议席上，几乎每次会议都留下了他的发言记录。他联系自己的经历及其所见所闻，言辞恳切、生动、感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注意。

一九五七年七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正在外地考察的载涛，提前赶回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在这个全国各族人民代表聚会议政的地方，他高兴地见到了一些老朋友，也愉快地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任务，使他们相见恨晚，畅叙情怀。

在这次会议上，载涛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来自全国各方面的人民代表，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抑制不住兴奋心情的载涛，一反过去很少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惯例，竟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就这样，这位末代封建王朝的重臣、皇叔——载涛，第一次走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神圣讲坛。

载涛在发言中，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周总理所说的关于国内外形势、今后任务及方针政策。对过去成就的取得，他作了深刻的分析：

“若没有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祖国就不会站起来得到今天的国际地位；若没有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是不可能这



样胜利地走入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小地位，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六亿人民的如天之福，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果实，是历史上的奇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载涛联系自己的切身经历，充分运用在视察中的所见所闻，热情歌颂了党和政府的英明伟大，表达了对广大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

“广大人民的生活，无论在政治、文化、物质上，都随着生产的发达，得到显著的提高。”

“我在视察中看到，无论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教育下，生产日有提高，因之生活日有改进。即以我们满族人民的情况来说，比起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的被压迫、歧视，任其自生自灭的悲惨遭遇，真有天壤之别。”

“现在我们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欢欣鼓舞的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劳动，学习先进技能，提高生活，衣、食、住、行和政治、文化，都有显著的增进。各地满族人民在见到我的时候，都表示了对感激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对于党的伟大、正确的政策，都表现出衷心的拥护。”

“现在，我们各地的满族人民在政治生活上，都热烈地要求学习马列主义，像成都已经和当地汉民一同组织起学习会；在文化教育上，广州成立了满族小学；各地历次的参观团，也都有满民参加。大家看到飞跃的建设成绩，更增加了绝大的信心，更提高了要求进步的热情。”

“我谨代表我们全体满族，说出衷心的的话：今后永远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前进，为建设更光辉、更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庄严议席上，载涛尽情地倾诉着自己的心声。从此，他觉得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重返政界使他焕发出新的激情，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

加入民革



皇
叔
载
涛

载涛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已是六十九岁高龄。从极力远离于政治风潮,到主动成为我国这一重要的爱国民主党派的光荣成员,无疑又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载涛在国民党内有许多老友知己,李济深、楚溪春、张联芬都是他的好友。全国解放以后,政治上安定,生活上安逸,心情也舒畅,他们过往更密,经常促膝谈心。

载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他们更是常在一起聚会,或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或学习时事政策,各抒情怀。特别是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德高望重,平易近人,载涛仰慕尤深。

在朋友们的热情介绍下,载涛对民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他知道,民革主要是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而组建的革命政党。他们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建国后,民革参与了对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全国人民大团结,促进祖国的繁荣、强大和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于是,载涛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第一次提出了申请加入民革的要求。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载涛坐下来精心地、认真地填着这样一张表,每个栏目他都一字一字地填写,一点也不马虎。“姓名:载涛;别号:堃云;性别:男;年龄:六十九岁;信仰:佛教;民族:满族。”“家庭出身”一栏,他填了四个字:“清代贵族”;“现职”栏内,他工工整整地写了三个职务:“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家里人看到载涛那么认真地、聚精会神地填表,不解地问



道：“你填这个干什么？”载涛笑了笑，高兴地说：“我要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他的夫人颇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大岁数了，还加人民革干什么？”载涛自豪地说：“我也要革命啊！”他这话说得那样纯朴，那样豪迈。

是的，这位曾在大清国“统掌军令”的“军咨大臣”，“保卫近畿”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一个皇亲贵戚，也要革命了，而且确实在革命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了。请看载涛的入党介绍人李济深、张联芬对他作出的评语吧：

“本表申请入党人虽系清代贵族，从辛亥革命后，已为平民化。解放以后首先加入全国政协，后任马政局顾问，对改良马种的建议，尤多献策。后又当选为人代会满族代表，有代表性。思想上有进步要求，特为介绍加入我党组织。”

载涛作为新成员参加到民革以后，常常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国民党最初是为推翻清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成立的，他的革命锋芒曾一度使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为之胆战心惊。但终未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它的右翼成为压迫人民的敌人。

而同在这一历史变迁中，载涛却由末代王朝的重臣、皇帝的亲叔，一个原被国民党消灭的对象，逐渐成为革命的主人，并成为新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历史性的变化，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会见战犯

载涛从未结识众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没有机会同他们攀谈。然而有一天，他竟同讳莫如深的这些人们握手言欢，开怀畅谈。这次会见，是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

那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会见第一批



特赦的溥仪和国民党战犯。为更好地做他们的工作，特别是怕第一次会面的溥仪紧张，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载涛陪同接见。溥仪把周总理视为自己的伟大指路者，把周总理的第一次接见看做是新生的起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难忘的情景：

“我坐着国务院派来的汽车，从前井胡同六号到了国务院西花厅。我的七叔载涛也在那里等我。我一进屋门就看见周总理了。总理起来和我握手。我心里是如何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不知不觉地说：‘呀！周总理！’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会见前，周总理把载涛介绍给陈毅、习仲勋副总理。当时参加接见的还有屈武、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知名人士。载涛与第一批特赦的战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等十人，一一握手致意。

载涛被周总理坦率的热情和宽阔的胸怀所深深地感染了。总理和这些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一握手，幽默而风趣地打着招呼，并祝贺他们，“你们过去是战犯，可今天都是标兵哟！”

当问到溥仪时，他十分紧张，连忙拱手而立，一句话也说不出。总理不禁乐了，和他开起玩笑来：“过去，我们都是你皇帝管制之下的臣民啊，见了你可是要给你致礼的。”说着，与他聊起满族的繁琐礼节，“你们族人的习俗和礼节，实在是太多了，走在大街上，一看到这特有的姿势，准能认出他是满族人。”

话题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展开。周总理谈古论今，广征博引，使获得新生的每一个人都在认真思索：怎样回顾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怎样迈开新生的步伐？总理谈到了爱国、阶级、劳动、群众等四个观点，这就是至今仍被特赦人员尊称为“四训”的基本内容。

周总理明确地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所谓特赦也是根据人民的利益决定的。说到民族立场，人民立场，也就是民族的利



益,人民的利益。一百多年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对于周总理谈述最多的爱国观点,载涛感慨良深,联想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这的确是在每一重大历史关头不容回避的问题。周总理开宗明义:爱国就是说,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又爱谁呢?

总理对溥仪说:“清末登极当皇帝,你那时才三岁,显然不能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要负责。”他以国破族亡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批判狭隘的民族观念。朝代既亡,族也有变,这在历史上往往是惯例。

清朝就是这样,不仅亡了国,也亡了族。总理讲道,宣统年间他到沈阳去还蓄着辫子,可北洋军阀时代一过,情况就不同了。多数满族人不敢报自己的民族,甚至一些人干脆更名换姓,改为汉民称呼。连著名作家老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也是这样。这就是受狭隘民族主义歧视的表现,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嘛!

今天的新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满族成员不再受到歧视,因此到建国后第二次填报族籍时,就没有多少人隐瞒自己的族籍了。自报满族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作为满族的人民代表,载涛对这一历史变迁比任何人都感慨万千。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搞得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亿万人民颠沛流离。国民党统治了二十多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只有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人民才从此站立起来,当家做了主人。满族也随之亡而复兴,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兴旺发达。凡能亲眼看到这一事实的人,又怎能不热爱这样的国家呢?

周总理亲切地勉励众人:“你们是新人了,不再是过去的皇帝、总司令,我们是以朋友相待,是以新人的资格相见。当然,现在社会上还有落后现象,希望大家努力把它消除。我们不仅要



有经济建设,还要有精神建设、政治建设。我们的时代,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嘛!”

载涛对于周总理接下去谈到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也是感触极深。这些话经总理提出,就像和老朋友谈心,既有原则,又有方法,联系实际,切中要害,他不仅受到深刻的教育,而且得到极大的鼓舞。

总理鼓励大家,要通过不断学习和讨论的方法,逐步确立劳动人民的立场,从而真诚拥护党的领导,真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新生以后,要特别注重经常参加劳动锻炼,常常过集体生活,善于在人民群众中巩固自己在改造中不易得来的劳动成果。

周总理再三叮咛大家:“一定要走自食其力的道路,做新人才有奔头!另外,你们也不要现在想得太多,现在还有困难,有问题。全中国建成现代化还要很多年。所以,你们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这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你们要树立集体观点,克服个人主义的毛病。否则,十年所得会抛于一旦啊!现在,你们已经树立了一定的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可要坚持啊!”

坐在陪同席上的载涛,虽然不是周总理此次谈话的主要对象,但他觉得总理的话仿佛也是对他讲的。总理的话不仅讲出党对国民党特赦战犯的希望,而且还讲出了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希望。

从中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光明远大的前途。抚今追昔,谁又不思绪万千,感慨奋进呢?载涛发现,溥仪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杜聿明听入了迷,竟停止了手中的记录。这是多么神奇的力量啊!

会谈结束时,总理特意嘱咐溥仪,说:“你不要自卑。第一,要相信国家信任你们;第二,社会还不会令人样样满意,如有意见,可写信给我。你们在旧社会生活了四五十年,与旧社会不可能没有联系,拒绝他们不可能,让社会改造他们更好。你可以起我们起不到的作用。”



面对总理的神采飞扬,倾听着总理气势恢弘而又寓意深刻的谈话,溥仪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在内心发出誓言:“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祖国改造了我,它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一生。”

周总理一席话,为载涛的政治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把总理的希望,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努力向人民学习,不断改造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满族首领

载涛的政治生活,充实而卓有成效。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位出自满族的人民代表,不断创造条件,使他的优势和特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一九五七年九月,载涛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万万没有想到,只有从军经验而素无从政经历的自己,竟在年逾古稀之时,第一次承担了如此重要的政治责任。这是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体现!他强抑着激动的心情,甚至立下为党的民族事业献身的志愿,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维护祖国的民族大团结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每日清晨,载涛准时骑自行车上班,从东城西扬威胡同到西城区西单附近的民委机关办公,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机关多次派车接送,都被他婉言谢绝。看到载涛身穿马裤,精神矍铄,人们很难相信他竟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

在工作中,载涛与大家相处极为融洽。他待人平和,亲切自然,毫无一点官架子。凡有同志到他办公室来,不管是外来的客人,还是机关内部的其他领导或一般干部,他都热情地起身相迎,亲手递过一杯沏好的热茶。

工作之暇,大家都爱找这位前清王爷聊天。有人求他写字,



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人知道他京戏唱得好,总想听他来一段,他也从不拒绝。有时来了情绪,甚至在办公室里表演一段猴戏,还真见功夫。

在民委工作期间,载涛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的园地里辛勤耕耘。通过学习和讨论,他对党的民族工作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在机关全体干部学习会上,在全市民族工作会议上,他多次表述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感受。

他充满激情地说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国土上,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辛勤劳动,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文明,发展了共同的经济和文化。很多中外闻名的少数民族成员,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医药家,对我国以至世界的历史进步起过重要作用。”

载涛联系切身经历,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他说:“我国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创造和贡献,也就没有多民族统一的伟大祖国。新中国建立后,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团结、友爱、平等、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共同奋斗!”

载涛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位民族专家的作用,有关方面又安排载涛担任了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他联系满族人民生活的变化,深感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被推翻,满族也遭到歧视。如果说全国各族人民因军阀混战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么满族人民则更增加了一层政治上的压力。那时候,许多满族人为了政治上的安全及生活中的出路,改名换姓,登记在册的满族人口急剧减少。到解放前夕,全国登记的满族人不到八万。

新中国建立后,短短几年时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政治安



定,人民生活提高很快。满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也兴旺发达起来,很多人重新报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为此,载涛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全国政协民族组工作期间,载涛曾多次参加有关会议,还亲自主持过民族组的一些学习讨论会,带头发表学习体会和工作建议。

中央档案馆留下了这样一些记录:

一九六〇年一月八日,座谈讨论陈毅副总理所作国际形势报告,载涛发言:形势好而又严峻,还应艰苦努力。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载涛主持民族组会议,讨论本组工作计划。他强调这一计划是好的,今后工作要更加生动活泼,注意认真总结经验,特别要与全国民委联系,多搞一些活动。要多演出一些反映民族生活、有特色的文艺节目。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学习有关国际问题的三篇文章,结合南朝鲜问题,谈支持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斗争,打击帝国主义。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载涛主持民族组会议,讨论通化等地区民族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载涛主持民族组会议,请卢汉谈参观访问云南感想,并作重点发言,谈云南新成就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与以前曾去过的云南,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主持民族组会议,载涛讨论制定新的工作计划,主张参观新疆等民族自治区,全面考察了解民族问题。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座谈精简下放问题,发言拥护这一政策调整,但讲群众中还有一些疑虑和误会,应加强宣传,多做工作。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载涛主持民族组会议,针对



蒋介石派特务窜犯大陆，他发言要提高警惕，全民皆兵，建设强大的国防。

.....

十分遗憾，我们只查到以上这一组不完整的统计，但仅此也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此时已年届七十五岁高龄的载涛，不顾年迈，热情忘我地参加着民族组的各种学习和活动，如饥似渴地从中学汲取着丰富的营养，自觉和严格地锻炼、提高着自我，为人民奉献上自己的赤子之心。

一九六〇年三月，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载涛专门就民族问题发言，既表达了全体满族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他说：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照耀下，我们满族人民普遍地得到温暖，得到和各兄弟民族所受的同等待遇，得到有力的鼓舞，请容我首先代表我们满族人民表示衷心的、共同的感激！”

“我们满族人民大部分分布在全国各地，在各处虽然有小部分聚居的，但是究竟比较散漫。几十年来反动统治的大民族主义，施行种种压迫和歧视，使得满族人民受尽苦痛。因此，大部分人隐瞒起自己的民族成分，同时在生产上，在工作机会上，在文化教育上，都受到相当的损失。”

“到了解放后，人民民主政权胜利的建成了。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亮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照亮了每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角落，全中国各个民族空前的团结，成了一个亲热的大家庭。这是所有中国人民所共同感到的，更是每一个满民所欢欣鼓舞而感激涕零的。”

“现在广大的满民的要求，无论是生产上，还是文化教育上，党和政府没有不十分重视和迅速予以解决的。从原则的措施直到细小的情绪问题都受到重视，这是我们满族人民从来未曾受到的真正平等的待遇。”



“我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连续视察了满民居住区域。近的从京郊四周围，远到广州和成都，见到极多的满民，他们那种兴奋而热烈的情感，我是无法用语言来描写的。在许多地方，感到满民多起来，并不是人口突然增加，而是许多人说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心里的话也敢向亲人说了，有建议也敢提了。存在的问题，我向中央汇报和向当地省人民委员会反映，也都获得采纳。因此，党和政府对满民的关怀，在每个满民身上都成为积极的发动力量，也成了满民和每个兄弟民族之间亲密友爱的黏合力量。”

“最近，成都的满族和蒙古族人民共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写信来说这是一件喜事，并且说：‘大家鼓掌欢呼，称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广州也成立了满族小学。只有‘无微不至’这个语汇，才能在这里表达满民们内心感受的温暖程度。”

“我谨代表满族人民向党、向毛主席、向政府保证：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学习，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一切！”

载涛的发言，不时被代表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不少人发出感慨，称载涛是“不可多得的民族专家”。载涛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已存入中央档案馆，成为国家正式收藏的珍贵史料。

“冤家”重逢

载涛一生中，并未有意树敌。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为保全小朝廷的安危，确实曾与一些人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其中，与当时逼小皇帝溥仪出宫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的矛盾冲突最为尖锐。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想到，随着历史的变迁，二人竟又走到一起，握手言欢。



一九六一年十月,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金桂飘香。在这里,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庆祝活动。辛亥老人及有关人士被热情地邀请进京,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同时参加了这些纪念活动。

载涛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十三日上午举行的纪念大会。休息时,经朋友介绍,载涛见到了专程受邀来京参加纪念活动的鹿钟麟先生。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睛里放射出惊奇的目光,仿佛依稀可见对方当年三十多岁的英雄英姿。继而,他们又哈哈大笑,热情地握着双手,兴奋地交谈着,就像一对老友久别重逢。

是啊!他们这一重逢是历史性的一幕。载涛与鹿钟麟,分别作为当年的革命对象和革命者,确实曾是历史上的一对敌手。然而,曾几何时,当年的敌手,如今又变成了亲密的战友。

鹿钟麟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北洋组组长。而载涛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任政协民族组副组长。他们都是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代表人物,都在为加强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载涛当年与鹿钟麟的敌对及争执,主要是从鹿驱逐溥仪出宫开始的。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决定把清逊帝溥仪赶出紫禁城,而执行这次任务的就是当时担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鹿钟麟。他带兵将溥仪驱逐出宫,从此废除了溥仪的皇帝之尊,结束了末代皇帝的小朝廷生活。

回首往事,他们两人都十分感慨,不了解当年的历史,是理解不了今天这一深刻的历史变迁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鹿钟麟作为西北军的重要将领,遵主帅冯玉祥之命,督促黄郛摄政内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溥仪出宫



后的一切事宜。

第二天，鹿钟麟亲率一批军警驱车前往故宫。为避免更多冲突，同时不给外国使馆以借口，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值班护军全部缴械，直趋溥仪住所。他当即出示了“大总统指令”，上书“派鹿钟麟、张壁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为了吓唬溥仪等人，他从怀中掏出两枚手榴弹，用力扔到负责出面谈判的绍英面前，并说：“景山上已架好大炮，如溥仪不按时迁出宫禁，二十分钟之后就要开炮轰击。”吓得众王公大臣胆战心惊，东躲西藏。溥仪也没了主意，只好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字。

载涛闻此惊变赶到故宫，溥仪已被鹿钟麟派车送往醇亲王府。八日中午，载涛设法进入军警林立的王府，对溥仪说：“等鹿钟麟来时，我们先商量一下都和他讲什么？”在之后的正式谈判中，由载涛全权代表，向鹿钟麟提出了有关调房、撤岗、会亲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八项要求，而且还灵活地解决了追查所谓传国玉玺这一棘手难题。次日，鹿钟麟答复载涛，所提要求基本上得以批准。

载涛清楚地记得，鹿钟麟当时还主动提供了一些方便：一派人到宫内去取东西，只限于日常所用的衣服、器具等物。养心殿内的古玩、陈设、木器等一概不许持出；二准许溥仪会见外来之人，但绝对不许外国人来见；三许可内外人自由出入，暂时还不许可年轻人出入（当时虽未说明何意，大概是怕溥仪混出北府）；四是两太妃迁出宫外，最迟不允许超过二十天。为了特殊照顾她们，准许把她们宫殿内的陈设木器以及日常一切用品带出宫去。这些答复，以及后来提供的条件，使载涛等人十分满意，从而也放心了。

至此，载涛结束了与鹿钟麟的谈判。但当时，他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冯玉祥、鹿钟麟的“逼宫”之举的。然而，历史令人公正无私地作出结论。三十七年后，载涛重与“敌手”相逢，高度赞扬了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的革命行动，同时也反映了他追随时代、



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

在和载涛的亲切交谈中，鹿钟麟详细介绍了自己辛亥革命以后的非凡经历，引起了载涛的兴趣和敬佩。三十七年前，鹿钟麟作为北京警备司令，奉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之令，将清朝逊帝溥仪赶出故宫，并迁至醇王府。之后，更受冯将军器重，先后担任很多重要职务。

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部中将、国民党政府兵役部长、河北省主席等职，奋战于疆场。同时，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军政部长。八年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功臣被授为“华北按抚使”。

但是，生性耿直的老军人，实在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一怒之下，辞去高官厚禄，在家图个清闲。全国解放后，他在天津老家热心为邻里服务，还被群众选为街道干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历史作出贡献的爱国老人，先后被委以国防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的重任。

难忘的过去，诚挚的交流，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载涛称赞鹿钟麟的历史贡献，鹿钟麟则祝贺载涛在新时代取得的可喜进步。——午餐时，这些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人们，共同举杯为这充满历史性的幸福会面，开怀畅饮！

酒酣身热，谈兴正浓，载涛还为大家讲了当时发生的一件笑谈。溥仪被鹿钟麟驱出紫禁城，搬进北府后，一个名叫溥儒的皇室成员，立即赶来拜见。

见大书房人多，他称有密奏上报，请溥仪来到隔壁的“宝翰堂”。随即，他跪在地下痛哭流泣，还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直比划，说：“奴才见皇上到了这般地步，心中实在难以忍受，要用这把匕首刺死冯玉祥或是鹿钟麟，以雪此恨。”溥仪见状，又惊又怕，急忙把匕首抢到手中，安抚他说：“你的忠心固然可嘉，但你要知道，我正在患难之中，如果你不顾一切做出此事，不但对我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更要加深我的苦难。今后,你千万别这样任性胡为。”

经再三劝说,溥儒才善罢甘休,低头拭泪而退。待溥仪后来静下心,拿出怀中的匕首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不过是一把书案上寻常所用的裁纸小刀而已。

众人听后,无不哈哈大笑,鹿钟麟更是惊奇不已。

一位当事者记下了这样的感受:“过去,武昌起义的老人们是捏着枪杆子的。鹿钟麟进宫驱逐溥仪时,手里还捏着一颗空心炸弹。今天,大家端起注满美味葡萄酒的高脚杯,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干了温暖幸福的一杯……”

此时举杯敬酒的载涛,心境已经十分坦然,思想感情完全变了,不再是以往那种历史上的负债愧疚心情,而是充满了一种自豪。今天,他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而且,作为辛亥革命的推翻者,正与当年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经历着共同的生活,都在为建设新中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痴情爱国

历经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载涛,热爱新中国。他时刻铭记着周总理会见时说过的话:“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并以此作为座右铭,鞭策和鼓舞自己不断前进。

早在解放初期,载涛就开始把自己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结束了动乱、贫苦生活,走上安定、幸福之路的载涛,深知祖国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懂得如何报效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当国家发生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自觉地为国分忧。

我们从载涛亲笔撰写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购买胜利公债一千份约合人民币二百万元,捐献飞机大炮五百万元,兴业公司入股五百万元,水灾捐



款两次约四百万元。”

一九六〇年，我国开始遇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国际反动势力乘机破坏，人民生活一度发生困难。载涛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与艰难中的祖国同舟共济。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街道居委会，他都热情、主动地作宣传，鼓动大家发扬我们民族勤劳节俭的传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当时他自己困难也不少，家里人口多，工资也不高，还主动负担了久病工友的生活费，有时正像他在自传中所说的连“伙食费也成了重大问题”。但他节衣缩食，节省一切暂时不必要的开支，把从嘴边抠下来的一些粮票和钱，交到街道，献给国家。本来供应就不充分，家里人口又多，捐出钱和粮票后，生活就很难安排了。

幸好载涛精于家事，善于理财，家里生活勉强还能对付，但仍然有时候孩子们喊吃不饱。有关方面发现这些情况后，几次表示要给他一些生活补助，都被载涛婉言谢绝。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窘况，他又一次出卖物品以渡难关，没有接受组织上的一分钱补助。

载涛生活在人民中间，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又有特殊经历的载涛，奔波于祖国各地，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和群众谈心，他始终这样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是在列强蹂躏、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我们的前辈也没有抛弃她，而是为了解除她的苦难，前赴后继，忘我牺牲。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就不懂得人生的价值，更不会热爱人民。”

“如今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的祖国由过去的东亚病夫变成东方巨人，一个新的爱国主义浪潮正在兴起。我们决不能因为祖国目前还比较贫穷落后，就嫌弃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振奋爱国斗志，含辛茹苦，用劳动的双手为祖国增添荣耀。”



他因此被人们热情地赞誉为“爱国老人”。

当民族团结遭到摧残，祖国利益受到破坏的时候，载涛更是挺身而出，义愤填膺，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西藏农奴主发动叛乱的时候，载涛公开发表文章义正辞严地说：“西藏从清代以前历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这次西藏一小撮坏分子想要破坏我们祖国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真是令人愤恨已极。但是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反而促进了迅速实现西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同时也说明西藏人民将从此脱离了黑暗落后的农奴制度，而实现民主自治，西藏成为人间乐园，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事。”

迎着社会斗争和自然斗争的风风雨雨，载涛与祖国一同经受考验，一同走向进步。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载涛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定了。

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载涛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主题只有一个，即以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热情，讴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这里将载涛的发言节录如下，他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激励人心。他说：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我感奋兴起。”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已经克服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树立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在工业方面，出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新面貌。许许多多现代化建设工程，全能够由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建设。过去自己从来不能生产，全靠进口帮助的现代化最尖端的机器和设备等，现在都能成批成套的生产出来了。无论是产量、质量和品种，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许多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农业方面的发展，不但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巩固了伟大的工农联盟，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基础。



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方面，名副其实地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废俱兴’的大好形势。”

“例如对于后辈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对于今后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又一个飞跃的需要，对于现代化生产、现代化国防的迫切需要方面，都作出了光辉而伟大的成绩。特别是我国这次原子弹的制成和爆炸成功，这不但对于祖国的国防安全是个惊人的伟大成绩，就是对于反帝反修的整个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也是一个无法估量的伟大成绩。”

“十五年来，我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关怀、照顾之下，亲眼看到了我过去几十年中无数梦想不到的新人新事，使我觉得现在的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过得起劲，一天比一天感到光明。这些，使我觉得事事都让我欢欣鼓舞，真觉得越活越显年轻。”

“还有，这次我的侄子溥仪，也光荣地被特邀为政协委员，更使我不能不衷心地感谢伟大的党，不能不感谢伟大而英明的——敬爱的毛主席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的改造政策。溥仪不但在党的伟大改造政策下，得到了新生而由鬼变成人，现在居然也能够参加到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行列中来，除了在我们的新社会、新制度下，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事。”

“我在这庄严、伟大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席上，真说不出我的心中有多少欢欣激动的事情，我现在把我心中的话说了出来，虽然在纸上写出文字，还表达不尽我心中的全部情感。但是我想在这个光荣的大会上，先表一表自己的感奋的心情。我并保证今后一定把这种感奋的心情变成实际行动，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速自我改造，惟有这样，才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十五年如一日、有加无已的温暖情思和期待。”

这篇发言，是迄今为止有案可查的载涛在重大政治场合发

言最长的一次,也是载涛晚年最后的一次长篇发言。而以爱国作为贯穿全文的主题,既是载涛对自己的鞭策,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视察各地

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载涛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分,到全国各地进行视察。从北京的城区和远郊县城,一直到广东、四川、东北的城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古稀之年的载涛,兴致勃勃,四处奔波,热情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尽职尽责。

载涛在视察中,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都使他感到高兴、欣慰、激动不已,自己也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一九五六年五月,载涛来到广东视察。一天清晨,载涛来到国光小学,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当少先队员代表把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一角的鲜艳的红领巾,系在他的脖领上时,他激动不已,思绪万千。

回来之后,他常对亲朋故交们说:“新中国使我枯木逢春,这条红领巾则使我感到返老还童。我就像这些儿童一样,在新中国开始了新生。”载涛对这条红领巾十分珍惜,直到他一九七〇年逝世之前,一直珍藏在他的身边。

这条红领巾上用墨笔楷书,工工整整地写着这样几个字:“献给亲爱的载涛伯伯留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广州国光小学大队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载涛最后一次外出视察,是在一九六三年的秋天。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陪同下,载涛第一次来到福建视察。当地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战胜了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使载涛受到深刻的教育。





他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夸一路，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整整记了半本子，对新闻媒体作了很多介绍。回京后，在十一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载涛就自己福建视察的所见所闻和感受，作了一个专题发言。

首先，载涛生动具体地介绍了福建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和巨大成果。他说：“福建今年连续遭受冻、旱、虫、风、洪五种自然灾害，同时又二百多天没有下雨，受灾面积达六百余万亩，可见灾情的严重。省委及时提出了‘重灾少减产，轻灾不减产，无灾大丰收’的口号，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旱运动。农民、干部、解放军干劲冲天，终于战胜了这次大旱灾，获得了丰收。”

“早年丰收，这是奇迹。而重灾区如漳州、长泰等市、县，早稻不但没有减产，而且一般增产一二成，多的增产五六成，还出现了亩产八百斤的高额丰产片。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对于胜利，群众总结为三句话：‘今年是五灾俱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载涛的生动介绍，深深地吸引着与会代表。他对福建人民抗灾胜利原因的分析，更令大家信服。载涛总结了三条，他说：“一是党的领导的胜利。群众提出，天旱地不旱，靠人不靠天。说明在党教育下的人民，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同时农民普遍反映：‘过去干旱泪涟涟，只知求神与拜天，今日有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天。’说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就有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有力量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二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群众已经说出心里话：‘政策值万金，条条动人心，人人出勤干，黄土变成金。’三是人民公社的胜利。”

载涛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注意。这位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在视察中亲自掌握的大量事实，发言有理有据，生动感人，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热情讴歌了党和人民的伟大力量，同时也展示了载涛当时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水平。

皇族“族长”

手足情深

载涛作为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的叔父，在爱新觉罗家族中也同样享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热情为家族成员办事，因而被大家尊称为家族“族长”。

在这个家族中，载涛与五哥载沣相处最为融洽。在共同经历的漫长人生岁月中，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既享受过荣华富贵，也遭遇过穷困潦倒。载沣虽然在年龄、阅历、爵位上，均长于载涛，却颇为信赖自己的胞弟，认为他性格活跃，社交广泛，思想开阔，遇有要事需办，常托付与他。

载涛也十分敬重自己的兄长，对载沣的评价也大有与众不同之处。除了人们常说的性情平和、优柔寡断、才能平庸之外，载涛坚持认为，载沣是个有头脑、懂时势的人。这些在封建王公、皇室成员中是鲜为人知，也是难能可贵的。

人们多次听到载涛这样介绍载沣：辛亥革命发生后的第二个月，载沣主动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高位。当他归藩回到醇王府的时候，神情不变地说：“这下可好了，我可以抱孩子了。”并在府内亲笔写下“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对联。他最喜爱书写的大字横幅是“端正和平”。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载沣为人宽厚，性情平和，对犯错的仆人，最大的惩罚也不过申斥而已。他不善言辞，特别是与能说会道的载涛在一起，那就只有听，而少有说话的可能了。宣统帝退位前，隆裕皇太后多



次主持召开御前会议，载沣却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淡。他和主持军务的载涛一样，根本就没想过抵抗，因而从未拿出过任何抵抗革命的办法。他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抵抗，避免了一场流血大战。

他没有积极参与清室复辟活动，也不赞成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谋求复辟。他反对溥仪与日本人勾结，认为所谓“康德皇帝”不过是“石敬瑭”，是日本人的儿皇帝。他多次拒绝了伪满洲国以及日本代表高官厚禄的利诱，宁肯卖府卖物，过着清贫寒苦的生活。

载沣中断天津的隐居生活，回到北京，并未住进醇王府，而是搬到了西侧的王府花园。这主要是他从节约的角度考虑，既省钱又省事。如果再像以前那样铺张浪费，他可没这个力量了。这里面积有限，房屋相对集中，稍加调整和改造，也够六口之家居住了。就这样，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

当时，北京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房屋。载沣理解和支持国家发展教育的需要，主动将王府出售，高高兴兴地搬到东城魏家胡同四十六号。之后，他又将这所宽敞的宅院售给更为需要的政务院，迁往利溥营十三号。

载涛事后得知，载沣顺利出售王府，得益于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关怀。中途曾收到市清查房产管理局下达的关于房产产权归属待定的通知，并告知余下房款暂停支付。事发突然，载沣十分焦急，拿不到房款，就搬不了家，真是进退两难。后来，彭真市长对此明确批示：醇亲王府邸属载沣私产，售房款如数付给。

载涛知道晚年的载沣惟一惦念的是在外四散飘零的儿女们。于是，他在一九四二年，借为载沣庆贺六十寿辰为名，连续发信，邀请其子女来京。

载沣历来不喜欢搞应酬讲排场，自己每年生日都不办庆典。尽管家族中不少人前来祝贺，行完礼也就告辞而去，从不摆宴留客，充其量自己家里人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饭，权当过了生日。



而这次，非同一般，六十大寿啊！

本来毫无庆寿之意的载沣，见到清寂寥落的王府突然又热闹起来，这么多的子女，意想不到地突然来到他身边，真让他感激载涛的情意。

在载涛眼里，六十大寿，可非同小可。子女为父亲祝寿，理所当然。按王府规矩，不要说整寿，即使一般生日，也要提早准备。生日当天，孩子们要一个个献上精心置办的礼物，佣人也要上礼，不在贵贱，而在心意。这是一个用黄纸糊好，中间贴上大红寿字的长方形盘，里面放着寿桃、寿面等喜庆的寿礼。如果是整寿，王府的佣人还要凑钱买寿礼。

记得载沣过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他们凑钱买了一套“鉴意轩”的瓷茶壶、茶碗以及烧印载沣半身像的插屏一个。再有，王府还要重金聘请名厨到府里举行丰盛的酒宴，全府内外红灯高悬，人人身着新衣，像过节一样。

此时，全府上上下下张罗得最忙活，无疑当数载涛，他是公认的办交际的专家。

醇王府上下动员起来，在载沣的住屋摆设了寿堂，正中高悬着老寿星的大幅正像。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家族、好友敬赠的寿联。人们纷纷前来拜寿，献上贺礼，表示祝贺和敬意。

溥仪派特使送来四份寿礼。溥杰夫妇、二女夫妇、溥任夫妇、六女、七女以及载涛、载洵家人也全都来了。远在日本的三、四、五女夫妇，因学业未归，也托人送来四件寿礼。王府送礼，从来都是四件，寓意“四平八稳”、“四季平安”。

其中，最令载沣欣赏的是四女婿赵国圻亲笔书写的一副寿联：“云鹤翩翩寿最高，苍松郁郁福绵长。”

这一天，醇王府宾客盈门，高朋满座，一向寂静的后海北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满心欢喜的载沣竟打破常规，亲自邀请几十位至亲老友同席欢宴，共贺畅饮。载涛以及专程从长春赶来祝贺的溥仪特使溥杰及夫人嵯峨浩，也参加了陪宴。



载沅寿诞,在堪称交际专家的载涛亲自主持之下,进行得十分圆满,主客无不称赞。其中,最盛大的一幕是,隆重迎接第一次来府给公公拜寿的溥杰夫人嵯峨浩。

对这位出身异国贵族家庭的儿媳,载涛、载沅都很重视。欢迎仪式,从王府宫殿庄严的大门开始,迈过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狮子门,只见几十个佣人跪在地上迎接,全部行三跪九叩大礼,非常壮观。

然后从正宅的内门,穿过一重又一重的厅门、走廊、小桥,终于来到花园。她在铺着大红地毯的畅襟斋,拜见了载沅,对公公屈膝行了一跪三叩的古礼之后,又献上了自己精心准备的寿礼。载沅喜欢彬彬有礼的儿媳,更喜欢其中儿媳亲笔书写的贺联,甚至当场让家人把它挂在墙上,让其他客人欣赏。

她在府里受到了特殊的优待,以至全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其他子女作为晚辈则必须依照旧礼站立着,只有她一个人破例被允许坐下。这些,都令她感叹不已,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为了热闹,载涛又亲自出面,请来了在北京梨园久负盛名的马连良和孟小冬。他们俩看在载涛的面上,一人唱了一出折子戏。马连良唱的是《游龙戏凤》,孟小冬唱的是《盗宗卷》。载沅全家聚在一起,足有五十多口。锣鼓一响,附近居民也赶来凑热闹。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变化。

王府已非昔日的王府,邻居也非昔日的大清顺民了。正在兴头上的载沅,欣然允诺,请邻居进府一道听戏,同贺同喜。另外,还演出大鼓、相声等祝寿的节目,出场的都是当时著名的艺人,不但技艺精湛,而且特别卖力,以表示对载沅的祝贺。

行走不便的载沅,坐在轮椅上,观看了整场演出,欢欢喜喜,兴致勃勃,带头鼓掌。这是载沅最后的一次祝寿,也是载沅与家人最后的一次团聚。

解放以后,不曾出过王府大门的载沅,在载涛的劝说下,特意雇了一辆三轮车,到鼓楼大街转了一圈。他冷眼观察着面前



这个天翻地覆的新世界，亲自领略到新中国的巨变。

他看到接替国民党部队的解放军，严格遵守明文公布的“约法八章”，受到了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纪律严明，对居民秋毫无犯，同前清、北洋军阀、日伪、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载沣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从未有过的新鲜感。

从此，他第一次有了和平安定的感觉，心态平和下来，对共产党逐渐产生了好感。在此心理作用下，体弱多病的身躯，似乎也慢慢康复了。

在载涛的陪游下，载沣得到了全新的见闻和感受。以往他当摄政王时，鼓楼大街是每日上朝理政的必经之地。车队所过之处，路人都要驻足礼让，而端坐车中的载沣，也目不斜视。而今，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重又经过这里，却伸直脖子探望四周街景。只见人流熙熙攘攘，看到的是一张张欣喜的笑脸，听到的是列队而过的学生们的歌声。铺面商店，买卖兴隆，市场稳定，交易公平。人们为面临新的生活而兴奋，又为创造新的生活而忙碌。载涛陪着载沣，在鼓楼转了一大圈，兴致勃勃，游兴不减。回家的时候，载沣在一个专卖冰糖葫芦的小店里，亲手买了十支山楂糖葫芦，说要慰问身边的十个孙子、外孙！

从此，载沣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消除了对解放的疑虑，心情也好起来，甚至突然对家人宣布：自此免去老祖宗那里沿袭几百年的请安礼节！原来一贯刻板、机械的载沣，不管外界形势如何变化，家中老礼从未停过。他在解放之初，主动宣布取消老礼儿，说明载沣已经走上新的生活。惹得孩子们一阵欢呼：“我们家里也解放了！”

载沣与载涛住处相邻，老哥俩经常在一起聚会畅谈。特别是后来，载涛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共聚一堂，共商国家大事。更使载沣猛醒：共产党不仅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了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



放当了国家主人；而且还消除了种族歧视，使满族人不再像民国时代那样抬不起头来。不少为避祸求生而隐瞒民族成分的人，重新恢复了满族成分。

素爱儿女的载沅，平时只有溥任与他同住，其余六个女儿都分住在外边。总是孩子们前来看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去过女儿家。他趁着心情好，决心要挨家看一遍，表示父亲的一片心意。按着年龄顺序，载沅走访了二女、三女、四女、五女、六女家，最后到了七女韞欢家。

韞欢虽然最小，却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上社会，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而且还是第一个自主婚姻，与一个从老解放区派到北京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来自山东的平民子弟相识并结婚，看到她的进步和幸福家庭，载沅心中感到无限的宽慰，再三鼓励韞欢夫妇，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坚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一九五〇年的腊月底，载涛登门请载沅去吃别具风味的“菊花火锅”。一家人说说笑笑坐定，载涛端上开得哗哗作响的火锅，十几种山珍海味摆上桌面，依次将鹿肉、海参、鱿鱼丝、鸡片、鱼片投入火锅，最后再放上白菊花瓣，不仅色、香、味俱全，且有祛寒解毒、强身健骨的功效。

载涛不时为哥哥添酒加菜，并以酒助兴，妙语连珠，把用餐的气氛搞得很活跃。载沅平生不沾烟酒，但这顿饭却开怀畅饮。他怀着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精神上的欢快，品尝了人世间最后一次的美味佳肴。

醇亲王府出售以后，载沅一家迁往东城区一处普通民宅。随着昔日王府的远去，无疑象征着载沅在漫长的人生中，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里程。新院子不大，远无王府奢华，但很实用。房内设置全部西洋化，居室均为木地板，各房间都装有暖气。卫生间安有澡盆和抽水马桶等。

载沅对此十分满意，加上后来出售王府的款项很快全部付



清,他很感谢政府对自己的态度,能够过上清静舒适的生活。看到当时报纸宣传购买公债,支援国家建设的号召后,他未与家人商量,一下子就认购了胜利折实公债八千股。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字,而且以前载沣本人是根本不动钱款的。

还有一事,令载沣十分骄傲,在当时传为美谈。醇亲王府出售以后,载沣主动将自己保存多年的宝贵文物,捐赠给了国立北京大学。要知道,载沣以前即使日子过得再清苦,也绝不卖书。一些他视为宝物及祖传之物的文物,如书前所提到的欽器、和硕醇亲王金印、朱批谕旨等,能够得以保存至今,不能不说是载沣的一大贡献。

载沣捐赠给北京大学的文物共十种:

- 一、大清实录一百二十函;
- 二、大清会典八十二函;
- 三、畿辅通志二十四函;
- 四、爵秩金览四十八函;
- 五、金石拓片两包;
- 六、大理石大插屏一件;
- 七、大铜炉一件;
- 八、大铜瓶一件;
- 九、大瓷瓶一件;
- 十、海军军舰模型一件

北京大学收到了这批珍贵的文物,作为北京解放以后收到的第一批捐赠,学校十分重视,对载沣以金静云的名义捐赠文物的行为,广为宣传,并用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的名义,特别复函表示敬意。

复函原文记录如下:

本校承

先生惠赠书籍及古器物十种,此项文物,皆极珍贵,蒙先生慨然惠赠本校极为感激,除分别安置本校图书馆、博物

馆,俾便保藏展览,公诸社会,永志纪念外,特此具函申谢。

此致

金静云先生

.....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载沅后来因患重感冒卧床不起,不久便病故了。

载涛曾多方求医抢救,甚至重金请来朱广桐、汪国铮两位京城著名中医,但始终未能见效。他十分悲痛,但同时又感到庆幸:哥哥载沅,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生父,度过了悔恨、哀伤,忧愤的一生,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宁之地……

载涛惟一感到欣慰的是,载沅弥留之际,除了溥仪、溥杰尚在关押之中,其余的七个子女全都在身边伺候。载沅平静谢世后,载涛及家人、子女的意见是一致的,丧事按旧礼安排办理。载沅的灵柩,先停于什刹海西岸的嘉兴寺,后于当年仲春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侧福晋邓佳氏于一九四二年病逝后,就安葬在这里。一九二一年去世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原葬西山妙高峰醇王府的故莹,后于一九五八年也迁来在此安聚。

对于历史上有一定进步作用,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党和人民政府是不会忘怀的。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厅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在京的家族主要成员载涛和溥仪的弟妹们时,对载沅作了客观的评价:

——载沅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而无法选择地当上监国摄政王的。慈禧为了大清朝和皇族利益,无可奈何地作出了这个选择和决定。不是因为载沅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实际上,载沅根本不具备这个才干和能力,也无法承受历史的重责。

——载沅为保大清和家族,竭尽全力,亲政亲为,但到底也未能阻止封建王朝的灭亡。谁能抵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呢?这不





是载沣个人的是非,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载沣后期对革命作出了不少妥协,特别是在武昌起义后,主动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高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既不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抵抗,也无意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态度。这些情况和表现,客观上对革命是有利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

——载沣本人始终没有积极参与复辟大清王朝的阴谋活动,这在贵族和遗老中是少见的。他尤其反对借助外国的力量进行复辟,特别反对溥仪卖身投靠日本人当“儿皇帝”。在日伪统治下,他顶住了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未去东北任职,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同溥仪去当“儿皇帝”不同,同溥杰等人去“满洲国”也不同。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载沣在晚年的成功,表明了自己的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

——载沣带头取消王府的旧礼节,实在不易。原来醇王府的封建礼节,多而繁琐;成天里又叩头,又请安,规矩很多。然而,解放以后,载沣很快取消了前清的旧礼,不能不是思想的开通进步。

——载沣精通满文,国学底子十分深厚。我们现在研究用满文写的文献资料,迫切需要满文专家。然而,像载沣如此精通满文的专家,现在不仅在外面很难找到,就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中,恐怕也不一定有第二位了。他只活了六十八岁,在一九五一年就去世了,很是可惜。

——载沣是清末民初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他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在天文学方面,作过一些有效的研究。如果不是因为他病倒了,卧床不起,政府是要安排他出来工作的。

——载沣一方面学了点科学,另一方面却又不尊重科学,相信命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病不请医生,看了病却又不吃



药,甚至把药扔掉,这就是迷信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否则完全可以多活几年的,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载涛是当面聆听周总理的诚恳分析和谆谆教诲的,不禁深深为总理对载沣情况了解得如此详细、全面,分析得如此准确、深刻,而大受教育,大为感慨,留下了激动和感激的热泪……

听到周总理对载沣精通满文的称赞,载涛禁不住插话:“确实是这样的,到了晚清,满族中也很少有人去学满文。我当时虽然学过一阵,到现在已经全忘光了。”

溥仪更是惭愧,他后悔地说:“我当初也学过满文。但那是我学得最糟糕的一门功课。现在是一点也看不懂了。”

周总理一席话,使载涛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载沣这位末代封建王朝的监国摄政王作出如此客观公正的评价,难道不是对自己及家族成员的莫大鞭策和鼓舞吗?

此书修订即将完稿之时,作者欣喜地获悉:我国已开始抢救满语。曾被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定为“国语”并通行全国的满语,在清王朝灭亡八十九年后的今天,已成为濒危语言,会讲者竟不足百人。

最新调查显示,中国一千多万满族人口中,能讲本民族语言的只有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偏远村屯,他们的后代也基本上不讲满语。

为此,我国政府已开始着手下大力抢救濒危满语,主要措施如下:

加大满族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组织专门人才抢救和挖掘现存满语,调查掌握大量语言材料以及独特的文化习俗;在满族聚居地举办满语班,使满族少年得以接受民族语言的早期启蒙;加紧制作保存现存满语口语的录音、录像资料等。

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民族大学将联合开办“满文历史文献”本科班;黑龙江大学也计划在历史、中文等专业的

本科生中开设满语课程。在满族自治县、乡，政府也大力推广“双语教育”，并坚持满语的法定语言文字地位。

满语有救，满语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得以发扬光大。一切热爱和关怀满语的人们，都会为此而感到欣慰！

抚顺会亲



皇族「族长」

载涛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叔父，排行第七。溥仪自从三岁被慈禧抱进皇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叫过载涛“七叔”。非但如此，进宫不久便登极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连载涛见了也得张口闭口“皇上”，还要三跪九叩行君臣大礼，哪里还会叫他“七叔”！特别是载涛后来反对溥仪与日本人勾结，叔侄反目，关系越来越疏远，除了遭到皇上不断的训斥，再无亲情可言。

新中国建立后，世道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载涛和溥仪之间也由君臣关系恢复了叔侄关系。不过，溥仪再次唤载涛“七叔”，其间却经过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载涛作为满族人民的代表，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大会休息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见到了载涛，热情地同他握手，亲切地问候：“载老好。”

随后，总理又把载涛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总理对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并对他说：“现在你与溥仪还有来往吗？”

对此询问，载涛有些紧张，连忙答道：“他是战犯，我怎能与他来往呢？”

毛主席笑了，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你们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

载涛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聆听毛主席诚挚亲切的话语，激



动得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他连忙答道：“好，好，我去看看他们……”

在这次难忘的会见中，毛主席谈笑风生，指着旁边的周总理，笑着说：“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

毛主席的风趣，使载涛很快消除了紧张和顾虑。在和毛主席的谈话中，载涛还坦率地提了一个意见，说：“我认为，满清的提法不合适，应该修改。”

对载涛的意见，周总理当场表示说：“清朝就是清朝嘛，为什么不提元蒙，单提满清呢？”

毛主席沉思着，点点头，然后明确表示：“说得有道理嘛！”同意了载涛的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专程来到西扬威胡同载涛的住所，对载涛说：“毛主席给了你一个任务，去看看你侄子吧，多年不见了。”并且告诉他，溥仪的三妹、五妹也跟他一块去。

原来溥仪的三妹夫润麒、五妹夫万嘉熙都是伪满洲国的中校，同溥仪一起成了战犯。市政府领导同志还具体为他们安排了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等人的事宜。

临行前，载涛带着两位侄女去市政府拜访彭真市长。彭市长一再叮嘱：“那边天冷，要穿暖和了。”并给每人发了一百元钱添置衣服。还说：“你们是去看亲戚，可以买点吃的带去。买点儿点心，政府可以给钱。”

载涛怕给政府增加负担，决定不带吃的东西。本来彭市长让载涛带两位侄女去抚顺，但载涛认为还是由政府派人带着去更好。彭市长采纳了载涛的意见，派公安局丁科长一路陪同，照顾十分周到。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载涛携三侄女、五侄女，穿着政府发给的崭新皮大衣，带着亲人们的心意，来到抚顺，住进了当时招



待苏联专家的饭店，条件十分舒适。

当天，他们就去了战犯管理所。这是一个高墙大院，坐落在高尔山下，浑河北岸，空气很好。正面是一座二层楼房，从楼门进入院内。

载涛对所长孙明斋说，“毛主席派我来看看溥仪等人。”所长接待十分热情，并说：“溥仪、溥杰等人学习得都很好。”

载涛和两个侄女坐在所长接待室里等候着溥仪的到来。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很不平静。他想：本来是亲叔侄，转眼间，他坐上宝座南面称孤道寡，我北面称臣自认“奴才”，真是天上地下。辛亥年他被推下宝座，又背叛中华民族当上了“满洲国皇帝”。现在，他成了人民的罪人，我来看望他，我们是叔侄关系呢，还是君臣关系？他该想些什么，我又该说些什么？……

载涛沉浸在对过去历史的回忆之中，溥仪及其三妹夫、五妹夫及三个侄子一起走了进来。因为所方事先没有通知溥仪等人谁来探亲，他们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此，当溥仪见到面前站着的是他亲属中在世的惟一长辈、离别了多年的“七叔”和自己的两个妹妹，一下子愣住了。

他感到似乎进入了梦境，又感到像没娘的孩子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悲喜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顷刻，他突然大步跑了过来，紧紧抱住载涛，脱口叫了声“七叔”，便呜呜痛哭了起来。

此时此刻，载涛也感慨颇多，他想到，不说在朝廷，即使辛亥革命以后，见到溥仪，仍然张口闭口“皇上”，常常请安叩头。哪有什么叔侄关系，哪里谈得上人伦？现在还是那个溥仪，倒叫起“七叔”来了！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么一声“七叔”又是在战犯管理所里叫的，真是富于戏剧性。

这是溥仪一生中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也是溥仪第一次在长辈面前使用了家族的称呼。溥仪万万没想到，多次被斥责为“大不敬”、“失礼”的载涛，会千里迢迢来战犯管理所探望他。

载涛也很高兴，溥仪在学习期间有了很大的进步，终于打破



了家族中过去那种冷冰冰的宫廷礼节束缚,恢复了它应有的天伦乐趣。

仅此一点,在爱新觉罗家史上便可大书一笔。“变了,他是学习好、改造好了,这都归功于新中国啊!”载涛从这件事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载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滔滔不绝地向家族亲人讲述着,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他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都夸奖皇室成员在狱中的进步,并让载涛前来看望,关心一下溥仪等人的学习。

说到这里,载涛颤抖的语言淹没在哽咽声中,在场的家人全都感动得泣不成声,一位族侄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会见中,载涛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皇室家族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的进步,讲了载沣逝世前后的情况,讲了亲属们幸福安逸的生活,还讲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国家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王公贵族及其子弟,也从衰亡没落的绝境中获得了新生,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例如,庆亲王奕劻之孙金溥铭,原先家道衰落,无法维生,只有走大街串小巷,四处寻破铜烂铁,捡零残衣物,靠卖破烂来充饥饬口。解放后,他及时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安排了正式工作,全家生活有了保障。他说:“共产党真好,如果没有解放的话,全家早就完了。”

载涛还告诉溥仪,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只八万人,而如今却是二百四十万,是原先的三十倍。抚今追昔,他们感慨颇深。辛亥革命后满族人处境日益艰难,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如不冒称汉族,连职业都难找。包括爱新觉罗家族本身,也纷纷改姓。

溥仪曾在“东陵事件”之后,面向列祖列宗的灵牌发誓报仇。他的所谓努力不但不能扭转自己的种族走向灭亡的命运,反而加速了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有到了新中国,满族和爱新觉罗家



族才得到新生,并有了可靠的前途。

在满族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人民政府首先为他们的子弟,办起了专门的学校。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纷纷走进他们的家庭,拜访慰问,邀请他们作为地方政协的代表,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发表意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才能。

载涛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满族人民的代表,迈进中南海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大厅上,参与讨论制定共同纲领。

听了载涛介绍的情况,溥仪等人不禁发出感慨:只有共产党才是挽救爱新觉罗家族和整个满族的真正恩人啊!

载涛还向溥仪介绍了他在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工作的情形,他到西北军马场视察的经过,以及准备到各地视察少数民族工作的打算。

载涛谈得兴致勃勃,骄傲、幸福、愉快的神色溢于言表。溥仪听得津津有味,信赖、兴奋、欣慰之情融会于心。

如果说,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受到的教育,已经使他在接受改造的道路上取得很好成绩的话,那么,这次从他七叔、妹妹身上以及从他们的言谈中所感受到的整个家族,整个中华民族的深刻变化,又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溥仪通过学习和改造,确实有了进步,他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能够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检讨。就是在那次会面中,溥仪主动检讨了当年与七叔发生的不悦之事。他说,那正是自己大施皇帝之威,忘乎所以到了疯狂的病态之时。载涛大手一挥,“过去的事情了,还提它干嘛?”叔侄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重又言归于好。

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孙所长走进来,亲切地问大家是否谈得尽兴,还说:“别着急,时间多着呢,多年没见面了,把该说的话都说完。”是啊,这个家族的成员,旧时代四散飘零,新时代又获重逢,该有多少话要说,又是多么珍贵的机会啊!



在管理所,孙所长陪同载涛一行参观了食堂、图书馆、运动场、浴室以及溥仪等人居住的宿舍,到处都很干净、整齐,条件也很好。在食堂里,炊事员正在收拾一大桶虾,载涛夸奖伙食搞得很好。

溥仪介绍了学习、劳动和生活的情况。郭布罗·润麒说,他还是学习组的组长,经常编戏给大家表演。有一次,他扮演一个女角叫葛娃,受到大家欢迎。后来他在管理所的滑冰场上滑冰,有人还从背后指点他说,这就是那个演“葛娃”的人。

溥仪的妹夫万嘉熙说,他生病后,领导很关心,立刻安排医生看,即使在深夜发病,也从不耽误,还专门让他吃小灶,使他很快得以痊愈。

说来有趣,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听说前来探望的爱人,已经学会骑车和缝纫,不禁惊讶得连连摇头。他不相信是有根据的,这个溥仪身边最娇的“五格格”,打小连跑都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居然今天能骑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是奇迹吗?

而妻子的回答,是那樣的平静和坦然:“这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是的,过去她是不会这样做,更不会这样说的。因为,如此这样,不但家族亲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她也只会打扮,玩麻将,一切按着标准礼仪行事。而今,时代变了,她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成为自食其力的女缝纫工人了。

三妹的经历,更让人惊叹!这个过去生活娇贵,娇慵懒散,只知道向皇上讨赏谢恩的“三格格”,竟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伪满灭亡后,她一路辗转流亡回到北平,为了度日,她不得不变卖家产,还摆摊卖过香烟,卖过糖果,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过了四年不平常的生活,回到北平,她已能自己烧饭洗衣,照料孩子和家人了。

解放后,街道组织居民开会学习,她不断去参加,因为早在



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熟悉党的政策,十分积极和活跃,深得邻居们的信任,后来便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还担任了治安保卫委员。在宣传新婚姻法的时候,联想自己的命运,不禁痛哭失声:“我以前是什么?是摆设!”这是她工作中最成功,最有效的一段。

看着,听着,载涛和两位侄女完全信服了,感叹地说:“这里的一切都太好了,简直和学校一样。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们完全放心了。”

临别时,载涛以长者身分,一再叮嘱溥仪:“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溥仪则以晚辈口气,连连点头称“是”。

两个妹妹拉着溥仪的手,说:“大哥,我们立个约吧,我们回到北京一定要好好工作,你们在这里也要好好学习,咱们挑战——互相比一比!”

溥仪难舍难分地送走了七叔载涛,却留下了一段发自肺腑、永生难忘的教益。他这样总结这次“会亲”的感受:

“我感到,爱新觉罗族人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爱戴与感激。他们要求我好好改造。我的妹妹们原来都是‘公主’,自恃尊贵。现在也朴素了,懂得的事也多了,这也给了我一个教育。”

“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满族和爱新觉罗家族才有了可靠的前途。”

溥杰事后回忆了这个场面和感受,他写道:

“这个世代代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醇王府贵族家庭,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社会、人类的伟大改造政策下,人人有了脱胎换骨的机会,每个人都从剥削寄生的家传病毒中,逐渐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例如我现在惟一的亲叔父载涛,就光荣地当选为政协委



员、人大代表，代表着全体满族，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自己也和溥仪一样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弟弟、妹妹，有的在教育工作中，有的在服务行业中，有的在文化、政治、工业等等的岗位上，都各尽其力，各得其所，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忘我地劳动着，幸福愉快地生活着。”

“至于我们的后一代——我的侄儿甥女们，大多数加入了共青团，有的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在大学，有的在中学和小学，有的当上了光荣的劳动红旗手……这和过去当贵族的时代相比，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命运。”

“过去是在封建大家族的毁灭人炉中毁着自己，现在是在改造人类、社会的大熔炉中，人人有了自己的前途，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各个人成为伟大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大家庭中的成员，人人都在平等、和睦、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着平等、和睦、幸福的生活。”

以上是溥仪和溥杰在与载涛会见之后，对于满族人及爱新觉罗家族新生后的概括性总结。他们讲得很有代表性、普遍性，具体地、深刻地反映了王公贵族及其子弟摆脱衰落绝境踏上新征途的感受，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热爱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感谢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载涛归来后，专程向北京市市长彭真汇报了带韞颖、韞馨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溥仪、溥杰的经过，真诚地表达了他们主动认罪、积极参加思想改造的思想感情。

彭真市长听后十分欣慰，感谢载涛不辱使命，不负重望，并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准你们去探亲的，我相信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完成这一改造。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奇迹的发生吧！”

家族团聚

载涛作为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位长者，对侄儿的新生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溥仪获得特赦，从此他不再是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这是溥仪后半生的起点，也为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带来了新的希望。

特赦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颁布的：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溥仪特赦的当天，这则新闻便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传往世界各地，普遍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家的报刊，均以显要位置迅速刊载，认为：“满清的最后一个皇帝以及日本占领的满洲国前皇帝，在过了十年的监狱生活后‘被赦免’，这种行动是在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十年的稳固。”

这一消息在北京传开后，对满族人，特别是对爱新觉罗家族成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将信将疑，载涛在回答这些人的询问时激动地说：“出于历史关系和民族感情，大家对溥仪很关心。溥仪这次被特赦，对满族人是鼓舞。对这个封建皇帝本人，却体现了党的胸怀和期望。他的新生，完全可以为民族和国家作些有益的贡献！”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溥仪被特赦后乘火车回到北京，回到了他的亲人中。代表家族前往迎接溥仪的是他的四弟溥任、





五妹金韞馨夫妇、堂弟溥俭以及载涛之子溥佳等人。

望着离别三十五年的北京，联想当年在日本人安排下狼狈逃离北京的凄惨情景，溥仪心头涌起一阵阵热浪，双眼挂满泪珠，既有一种愧对故乡和亲人的悔恨之情，也有一种对新生活的热烈渴求。走出辉煌壮丽的北京站台，听着悠扬悦耳的报钟声，这位五十四岁的新中国的公民，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他的新生命开始了。

溥仪首先被接到五妹家中。他住的房子被粉刷一新，宽敞明亮。在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市民政局负责人王旭东的亲自安排下，为他准备了齐全的生活用品。床上的被褥，里外全新，都是亲人连夜为他赶制出来的。窗前的桌上，放着新的脸盆、毛巾、牙膏、暖壶，甚至连茶杯、饭碗，都置办下了。

这时，载涛与众多亲友族人都在西扬威胡同六号等着溥仪呢！于是，溥仪立即赶往七叔家。

在亲人面前，溥仪激动地说：“从今以后，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党和国家为了挽救我，不知花费了多少力量，如果不是新社会，像我这样罪过的人，早就死无葬身之处了。”

载涛更加激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抱着自己的侄子，欣喜若狂，止不住老泪横流，连声说：“祝贺你！祝贺你！……”

叔侄俩人相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周围的亲人们看到这一感人情景，无不落泪。这是一种真实的感情交流，溥仪和他的亲人们重新恢复了骨肉关系。这种情感，将昔日的“君臣之礼”冲得无影无踪。

如载涛的妻子，原是穷苦人出身，是被载涛收房的。溥仪以往是瞧不起这种人的，但如今却恭敬地称她为“七婶”。新的时代，新的观念，使溥仪彻底抛弃了以血统和贫富划分贵贱的旧思想。

载涛为溥仪接风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正在兴头上的载涛，为了显示自己高超的烹饪技艺，亲自下厨房，为溥仪做了一大盆香喷喷的“菜团子”。



吃着玉米面做的菜团子，载涛百感交集，深情地对溥仪说：“今天请你吃的是特种风味，菜团子不仅好吃，而且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们全家幸福团聚的象征。你说，这不比山珍海味更有意义吗？”

为庆祝溥仪的新生活和家族的团聚，大家举杯畅饮。而溥仪却心情沉重，他说：“在家族团聚的亲情中，想到那些被日伪杀害的人们，我追悔莫及，万分惭愧。”

席宴上，还险些酿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溥仪想起往事，异常悔恨，情不自禁地叙述起过去自己的种种罪孽……

为了调解这种气氛，在旁陪客的溥毅斋，同情地插言道：“你又没有直接杀人，当初在伪满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日本人逼迫的。”

此时的溥仪，早已通过学习改造提高了认识，同时又恢复了率直的性格，他放下酒杯，坦诚地对溥毅斋说：“你的观点不对头，你虽然是我的哥哥，但我也要反对。咱们得找个时间辩论辩论。”

家人无不大吃一惊，怎么为溥仪开脱的话反而引起他的愤慨呢？后来，还是经载涛协调，溥仪才逐渐冷静下来，态度和语气变得和缓如初。

他诚恳地对家人说：“过去我学习得也不好，你们还不太了解我的现在。班禅访问过我，我说我支持你，不是因为你是活佛，而是你参加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捍卫了民族的团结。而达赖却和我的过去一样，仍然毫不觉悟，借外国势力图谋复辟，这是反动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辞别的时候，载涛赠送给溥仪一些零用钱和衣帽，鼓励他安排好生活。怕他冷，又特意找出一件皮大衣，亲手递到他的手里，才肯放心。

事后，载涛感慨地对家人说：“过去是君臣关系代替了家族亲情，亲族不亲，叔侄不亲。现在到了新时代，把这个‘皇帝’改造过来了，我们也恢复了叔侄关系。”



从载涛口中,溥仪知道了家族最新的兴旺史。其中,他的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尤其令人欣慰。这些封建王朝的公主、王公,随着伟大的时代一道进步,现已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所建树的劳动者。

他亲眼看到了,二妹已经创办了一个街道托儿所,二妹夫担任邮电部门的工程师;三妹夫妇正在区政协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四弟是小学教师。

当然,溥仪能够与弟弟、妹妹们相处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载涛曾讲过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溥仪回家多时,却仍未见到最小的七妹。七妹的奋斗经历很独特,最先迈出封建王府的大门,自食其力,献身教育,成为社会所欢迎的人民教师。所以,溥仪既为七妹的进步感到欣慰,同时也为得不到七妹的谅解而苦恼万分。

在一次周总理参加的座谈会上,载涛、溥仪及其弟弟、妹妹们也都应邀出席。周总理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声笑语。他看到载涛与溥仪的几个妹妹坐在一起,而溥仪却单个坐在一边,便开着玩笑说:“好啊,你们还把他当皇帝呵?”

说得载涛也不好意思了,带头移坐,很快召集大家与溥仪坐在了一起。

开始,七妹韞欢并未认出溥仪,毕竟二十八年未见了,最后一次会面是一九三一年在天津静园,当时溥仪二十五岁,而韞欢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而今,韞欢已是三十八岁的中年人了。溥仪同样如此,兄妹俩谁也未认出谁来。

还是细心的周总理,发现了这对兄妹互不认识的怪事,便风趣的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呵,还是让我来介绍你们兄妹认识吧!”

其实,韞欢早注意到周总理身旁坐着一位身穿中山装的瘦老头,原以为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却不曾想这就是溥仪。在周总理的招呼下,她走到溥仪身旁,同他握了手,却没有叫出“大



哥”，就退回自己的座位上。原来叫“皇上”，解放后叫“奸贼”，现在恢复叫“大哥”，还真一时难以适应。

临别时，就更好笑了。溥仪来到韞欢身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大躬，连声说：“谢谢，辛苦了！”众人都很奇怪，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还是载涛首先看出了问题。原来，周总理介绍他们兄妹相认的时候，虽然双方握手，但并未说话，溥仪没有弄清楚她就是七妹。因此，他见韞欢穿一身列宁装，朴素庄重，还以为是政协工作人员，所以临别的时候特别有礼貌地向她致谢。

当载涛告诉溥仪，这就是七妹，而且她一来的时候，周总理就亲自给你介绍过，你们兄妹还握过手！溥仪这才恍然大悟，韞欢也顿觉不好意思，心中再无顾虑，主动上前叫了一声“大哥”，这是她三十八年来第一次这样称呼溥仪。

谈话中，周总理对溥仪的弟弟、妹妹们了解得非常深透，几乎每个人都作了介绍，特别表扬了刚刚出席人民大会堂群英会的七妹。

但同时又循循善诱地说：“溥仪刚有进步，你们要帮助他。一个家庭要争取先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你们家庭中也是这样。后进的要向先进学，先进的也要把帮助落后的当作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嫌人家落后，嫌弃是不对的。”

周总理告诫大家，“先进思想总是同落后思想进行斗争的，从而得到充实和发展。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如此，在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你们是一家人，但各人的经历不同，思想也不同。因此，有人进步快一些，有人进步慢一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你们应该互相帮助，也能够互相帮助。”

接着，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先进的要帮助后进的，不要嫌弃别人落后，更不要怕麻烦。你不是也有一个变化、提高的过程吗？先行了几步，就嫌弃人家，这不好。大家一起来，一起争取进步，人多力量大，人多进步快！”



七妹从周总理的谈话中，悟出了周总理的深情和期望。她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决心帮助大哥一道进步。以后，当他们再次相见时，七妹主动称溥仪为大哥，并一起亲切交谈，恢复了兄妹的骨肉亲情。

载涛欣喜地向溥仪介绍了家族的第三代，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一代，也是最富有希望的一代。在载涛家里，溥仪亲眼看到，十几位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内屋外。

在他的子侄中，一些已成为青年，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洪流中。他们中有工人、干部、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还有为祖国立下功勋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北京女子摩托车赛冠军、登山队队长。其中，有些子侄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的先进行列。

载涛特意把一个孙女拉到跟前，向溥仪介绍了她的英雄事迹。这位二十岁的文弱姑娘，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共产党员，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地立下功勋。

听着载涛的介绍，溥仪不禁肃然起敬。对着自己的小侄女，他感慨万端地说：“你是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而我则曾在历史上是中国人民最可恨的人，和你根本不能比。今后，大爷要向你学习！”

在载涛的陪同下，溥仪见到了家族中的一些老人，他们的心情和作为也是他原来所根本不曾料到的。这些“天潢贵胄”的皇族成员，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了安定、美满的生活，有的还被邀为地方政权的代表，参与协商党和国家的大事。

溥仪的堂兄溥忻，当选为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会长，还担任了区政协委员。他的另一位堂兄溥侗是位老画家，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曾为溥仪看管天津房产的溥修，已双目失明，但仍被聘为文史馆馆员，以他满脑子的活史料，为新中国作着贡献。

置身于伟大的新生活中，溥仪发现，爱新觉罗的家族正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他作过一个统计,从醇亲王这一支的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是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里,家族成员的命运竟是如此不同。他为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而感到庆幸,他为自己家族的兴旺发达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爱新觉罗家族的亲人为溥仪的特赦感到高兴,溥仪也享受到了人世间的天伦之乐。此时的溥仪不再是“六亲不认”之人,对亲属中的长辈也有了孝顺之心。

一九五九年以后,溥仪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看望载涛。他常说:“我就这么一个亲叔叔了。”溥仪同李淑贤结婚后的第一个新年,两口子一齐来到载涛家拜年。载涛仍然沿袭了对皇帝不能直呼姓名的旧礼,称溥仪为“大爷”,他对李淑贤说:“我们这位大爷改造得很不错了,原来穿衣服也要别人服侍呢!现在自己会生炉子,不简单啊!”

溥仪在北京似乎找到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载涛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香甜可口的饭菜,而且能够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

一个星期日的中午,载涛特意请溥仪吃饭。为了助兴,还叫上了溥俭和溥佳。精美的菜肴令人食欲大振,然而溥俭的言行却让人扫兴。他在回答溥仪的话时,常常使用以往应答皇上的专有字眼——“噫、噫”,令溥仪倒了胃口。

于是纠正他说:“我不是过去的皇上了,你那个称呼,实际上是对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他还发挥了载涛常说的一段话:“我们在新的时代,不但是叔伯兄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同志关系,我们应该提倡、欢迎这种新型的关系。”

载涛见话不投机,忙转移话题,说:“溥仪被特赦,是件好事,也是我们家族的喜事。来,为庆贺团聚而干杯。”

溥佳想为族兄开脱,说:“溥仪当初在伪满的言行,全是日本人逼出来的。”



然而，溥仪听后却面生愠色，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不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过去是出卖国家的，怎么能说是被迫的呢？”

溥佳见溥仪动气了，便想为他解围，说：“我说你不是血腥罪行，真正的血腥罪行是杜聿明。”

但谁也不曾想到，溥仪还是不退让，深刻地解剖自己：“当年我帮助日本人统治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不是血腥罪行又是什么？”

溥仪针锋相对，既尖锐又诚恳，说得在场的几个人，都抹不开面子，十分难堪。连载涛都感到此时空气紧张，不好多讲话。深知溥仪为人的溥佳，过去几十年跟随他，只好随机应变，立即改口道：“大哥说得对。来，我们为过去是‘君’，现在不是‘君’，为您成为公民而干杯！”

看到溥佳改口，溥仪觉得自己坚持对了，才又转怒为喜。听着溥佳的能言善辩，也看着溥仪有了笑意，载涛松了一口气，脸上重新现出了宽容的笑意。

在载涛的提议下，大家为新的关系，为新的观念，共同举杯畅饮。载涛意识到，时代变了，溥仪也变了。“皇上”随着消失了的时代一同消失了，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旧意识也逐渐消失了。溥仪的变化，难道不是时代巨变的缩影吗？

随着时间的推迟，溥仪对载涛的信赖日益加深。他以七叔为榜样，遇到难办的事或难对付的人，他就发挥七叔的观点，有时甚至干脆就搬出七叔来。

这里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一年“五一”节，同住一院的郎先生夫妇盛情邀请溥仪一道用餐。溥仪碍着面子，不便推辞，也就应承了。但饭前聊天的时候，郎先生却海阔天空地吹起来：“过去我最佩服的有几个人，头一个是谈虚和尚，他给我传过戒，可我没听他的话，落到今天这般田地；第二，我佩服江神童，五岁为《回书》作注，了不起！第三，我佩服汪精卫。”

尽管被溥仪“他是汉奸啊！”的话打断，但他仍然口若悬河，



话不停口：“可从历史的角度看，汪精卫也是了不起的，他虽说搞的‘和平救国’，毕竟也是救国嘛！”还说什么，陈公博也是个人物，自己给赫赫有名的张作霖当过秘书等等。

对郎先生的离谱之语，溥仪从内心感到厌恶，但顾及邻居关系，又不好发作。于是，他以上厕所为名，搬来救兵——六妹。六妹急匆匆地说：“大哥，快去，七叔来电话，有急事！”

这就是溥仪灵机一动而设计的“金蝉脱壳”计，让六妹谎称七叔来电话，才最终得以脱身，借用德高望重的七叔名义又一次摆脱了困境。

随着与载涛接触的日益增多，溥仪发现七叔身上仿佛有一股火热的力量吸引着自己，他思索着，探求着，最后终于明白：这就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坚定信念！他决心走七叔的道路，用实际行动写好自己的后半生。

教育子侄

爱新觉罗家族有着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至今在北京仍保持着庞大的体系。每逢年节假日，扶老携幼前往这个家族的最长者即载涛家里探望的人络绎不绝。载涛热情款客，平等待人，倾尽全身全力，关怀和提携着自己的亲人们。

溥仪回到北京后，跑得最勤的地方就是七叔载涛家。一见面，叔侄俩就亲亲热热、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此时的溥仪，早已恢复了青年时期的样子，凡遇有难题或苦恼的事，都要请七叔帮助排解一番。

有一次，溥仪气呼呼地告诉载涛一件事。当时住在崇内旅馆的溥仪，忽然接到服务员悄悄送上来的两个大信封，拆开一看，令人大吃一惊：只见大红纸上，用墨笔正楷字恭恭敬敬地表示着问候，落款则分别是“前大清翰林院编修陈云浩”、“前大清度支部主事孙忠亮”。原来，这是两张向“皇上”“请安”的红帖。



溥仪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污辱，十分恼火，大声说：“叫他们滚！我不见他们！”

载涛听后却笑了，从中他看到了溥仪的进步，也想到了人的思想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他诚恳地告诫溥仪，要继续加强改造，认真学习，巩固自己的思想进步。特别要注意克服外界环境的不利干扰，自觉坚定革命立场。

经过载涛的启发，对于如何处理好这类事情，溥仪就有办法了。当时在北京植物园上班的溥仪，周日进城到五妹家度假，又收到一封请安的信以及一大袋东西，其中有烟、酒、糖果等。原来，这个人曾在伪满宫内府当过学礼处礼官，还是溥仪“帝师”陈宝琛的儿子。

不能收这份念旧情的礼品，但他又未采取以往那种生硬简单的作法，而是第二天专程到陈家，诚恳地说：“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罪恶的旧关系，它早已完结了，我们不要恢复它，而要建立新的同志关系。”

载涛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们更为关怀，要求更加严格。有一次，他听到儿子溥佳与溥仪聊天，对溥仪的历史，溥佳竟发表了这样一些看法：溥仪少不更事，到东北是日本人的强迫所为；伪满洲国前后十四年，溥仪一切均不能自主；溥仪没有直接血债，与国民党战争罪犯不同。

这种看法令载涛震惊。溥佳是完全了解溥仪的历史的。他跟随溥仪几十年，自小就在宫中伴读，后任伪满洲国宫内务府侍卫处处长。看来，溥佳是想把溥仪和其他战犯从历史罪恶上区分开来，但他却不了解溥仪的现状和思想情感，更不了解应把溥仪的历史和现在区分开来。

载涛严肃地对他说：“今天的溥仪，经过思想改造，早与旧我彻底决裂了，连他也自觉地认识到，历史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罪恶，而且也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对他的过去表示同情，无异于替封建统治阶级说话。”



受到载涛的鼓励和启发,溥仪也当场明确表态,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批评了溥佳的错误观点,使他心悦诚服,端正了认识。

对于在外地生活和工作的亲属,载涛同样寄予了莫大的关切和支持。曾长期跟随溥仪的几个侄子,后来大多安排在北京工作了,只有毓嵒回到吉林老家,与分别十二年的慈母和妻、女团聚,并被安排到满族中学工作。后来,载涛听说他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思想上产生了反复,仍十分挂念。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载涛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吉林视察,下榻长春市宾馆。他抽出时间,专程去毓嵒家探望。七爷的到来,使毓嵒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载涛向侄孙儿介绍了满族和爱新觉罗家族解放后的深刻变化,说:“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咱们满族人民,同时对溥仪的改造也很关注。”使毓嵒听后,既受鼓舞,又受教育。

载涛还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毓嵒的实际困难,请他们给予关心和帮助。临别时,毓嵒带着爱人专程赶到宾馆,表示让七爷放心,一定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即使困难再大,也要把工作做好!

载涛回到北京后,还时常去信了解毓嵒的情况,不断鼓励他的进步。待溥仪特赦回京,载涛立即提醒他关心毓嵒这位追随多年的“宫廷学生”。

遵照载涛的嘱咐,溥仪马上提笔发出一信,深情地写道:“我的家族都和我见了面,就是我的嵒侄还没有见面,而且一直也没有相互通信,这是我最大的缺欠和遗憾,也是最不痛快的事。非常想你,见字后盼望速来信,告诉我你的近况,别让我心里着急啦!”

信中,他还热情诚挚地希望:“我衷心祝你在劳动中、学习中、工作中,争取成为一个光荣的红旗手。要坚决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事业中,建立越来越大的成就。任何工作岗位,任何劳动都是光荣,都要为人民服务。我们都要积极要勇敢、不断地检查自己,不断改造自己,



经常克服一切缺点，虚心向先进学习，帮助落后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追赶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我再一次衷心祝我亲爱的毓嵒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在工作中获得更多更好的成就。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生产建设的好战士，祖国人民的好儿女，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亲人们的关怀下，毓嵒安心本职工作，热爱教育事业，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受到人民的尊重，被选为吉林市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

退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参加文史撰写工作，最突出的是与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作，共同回忆四十年前的“帝宫”生活，留下了一本厚厚的文字记录，后来成为撰写《伪帝宫内幕》的珍贵而生动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一九七九年深秋，毓嵒被邀参加吉林省少数民族代表团进京参观。他专程来到载涛家里，对已故去的七爷表示了深深的哀悼和怀念。对于在困难时刻，载涛给予的教诲和支持，毓嵒是难以忘怀的，并永远成为激励他不断前进的动力。

对于家族中其他幸存的亲友，虽然在十年浩劫期间，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灾难，但又毕竟都度过了那段艰难困苦岁月，在拨乱反正后，又都为能享受到幸福的晚年而庆幸。

邀嵯峨浩

载涛领衔以爱新觉罗家族的名义，发函邀请嵯峨浩回国，不仅使离散十六年的溥杰一家得以欢聚，而且被誉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又一佳话，广为流传。

回忆此事，载涛深情地说：“溥杰夫妇的再次结合，红娘应是周总理。”

一九六一年除夕之夜，华灯高照，爆竹声声。周总理以个人的名义，邀请载涛等爱新觉罗家族的主要成员来家做客。当他



们乘总理的专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聚齐的时候,个个心情都十分激动,这是一次欢快而难忘的除夕聚会。

以平等的身分和人世间的亲情欢度除夕,这在以往的爱新觉罗家族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今天竟在周总理的家里实现了。载涛仿佛觉得这是一场梦,他平素的善交际和活跃也不知哪里去了,只顾坐在那里乐。

作为家族的最长者,载涛更是感慨万分,这是溥仪兄弟俩新生后的第一次家族全体聚会,发起人竟是敬爱的周总理,而且还在总理的家中举行。按常理,聚会应在自己家中举行才对呵!

周总理请大家喝满族人喜爱的“碧螺春”,热情地招呼每一个人,尤其是新到的人,“今年溥杰回来了,四妹也来参加,家族这次可是第一次真正的大团圆啊!”

载涛看着家人幸福欢愉的样子,感觉不像与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谈话,倒好似在家中与一位慈祥的长辈叙述家常。周总理对坐在身边的载涛,寓意深长地说:“你们家族里长辈没有别的人了,你就是家长了!”

周总理首先向大家拱手拜年,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并高兴地说:“今晚请你们来,是想和你们一块儿吃饺子,按你们北方人的习惯过除夕。”

说着,大家便围拢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包起饺子来。见溥仪、溥杰不会包而急得团团转,周总理笑着给他们解围:“溥仪不会擀皮,可是会吸烟嘛!溥杰不会包饺子,可是会吃糖嘛!你们看我,我也不会包,但我会摆。除夕之夜,家人欢聚,咱们各尽所能,各得其乐。还有谁不会干,请到外边放鞭炮嘛!”

饺子端上来了,殷勤好客的邓大姐还准备了几样精美的菜肴。另外,周总理家乡人送来的紫糖米饭,又好吃又有营养,也受到大家的欢迎。

总理一边不断地给大家夹菜添饭,一边不时风趣地说着各地不同的春节习俗,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大家无拘无束,



连刚被特赦回京的溥杰也很快适应了这一欢快的场面,忍不住讲了个袁世凯讨好慈禧太后的故事,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席宴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过去,你们家族是统治人民的贵族,溥仪还当过皇帝。而今,你们已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这个变化很大,也很重要,说明顺应了历史潮流,是前进而不是后退。你们现在都是劳动者,每人有自己的工作,都在为新中国作出自己的努力。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这说明你们愿意改造自己,追随历史进步,人民欢迎你们。”

接着,总理表扬了家族中在平凡工作中作出成绩的成员。他说,“七妹温欢最先走上社会,最先作为人民教师。原不会教书,也未受过师范的专业训练,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实践,现在成了一位优秀教师。作为学校教导主任,又当上了区政协的常委。我希望大家都来当先进,人人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做出更多的贡献。我愿意经常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看到饭菜准备得少了,周总理抱歉地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些下降。而我这个当总理的请你们吃顿年夜饭,可以说连老底都拿出来了,却还不管饱,心里不是滋味呵!可是,困难终究是要过去的,大家要有勇气,战胜困难!”

室外寒风刺骨,可总理的家里却温暖如春。吃过饭,大家品着刚沏好的碧螺春茶,心里感到暖洋洋的。总理微笑着望着大家,说:“今晚请你们来,还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看是不是邀请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从日本回中国来?让他们夫妻团聚。”

嵯峨浩原是一九四五年回日本居住的,听到溥杰获赦的消息后,便提出了回中国定居的请求。载涛当时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话,惊讶万分,他万没有想到,像这样涉及中日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居然还会听取家属们的意见。

作为家族的长者,他何尝不愿意侄儿重享天伦之乐,但他又深知溥杰“政治婚姻”的内幕,在中日尚未恢复正常邦交的历史条件下,谁又有胆量公开提出这个问题?



再说，在家族中占重要地位的溥仪，对此深恶痛绝，至今耿耿于怀，连做七叔的载涛也无力说服他。当年日本人一手操办了溥杰的婚事，企图以“偷梁换柱”之法，取代溥仪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为了缓和室内的紧张气氛，周总理首先让载涛发表意见。他直接点将：“载老怎么个看法呵？”他深知作为族长的载涛，对溥仪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载涛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嵯峨浩人很忠厚、贤惠。她前两次到北京的时候，都曾主动到家族设立的祠堂，拜见磕头。见了我也按满族拜见长辈的礼节，给我请安、倒茶，看她嫁给满族人倒是一心一意。皇帝都能改造过来，像她这样聪明的人，回到中国后，经过全家人的帮助，是一定会改造好的。但他同时又流露出担心的情绪，怕她又给家族带来政治连累。

周总理很赞赏载涛的一番话，认为应该对她寄予希望。总理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十分明确而坚定地说：“嵯峨浩不但是中国旧皇族的夫人，又是日本皇族，当然有落后的一面，需要改造。谁不需要改造？不进则退，推陈出新，不向前走就落后了。整个人类都要有这个认识。你们通过学习改造完成了这个转变，我看她也能。而且还有一点，她受了军国主义迫害，关东军看溥仪不听话，想通过她来利用溥杰，当然溥仪不放心，关东军利用她也没有成功，女儿又死了一个。要相信她，人是会慢慢起变化的。不然，这么一个日本人都不能容留，这怎么行呢？王昭君嫁给匈奴，还是老死在那里，也被同化了。文成公主在西藏立了功，她们都能做到，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做到还行吗？嵯峨浩现在的态度是好的嘛，愿意做一个中国公民，很诚恳，也很坚决，为什么不可以批准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有关方面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欢迎她来中国定居。你们不要把她当外人，她不是敌人，要以亲属相待，她是咱们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的儿媳妇嘛！”

听了周总理的话，大家解除了思想上的负担，一个个喜形于



色。连溥仪也感到心悦诚服,改变了多年的成见。大家愉快地商量起来,最后决定,由载涛领衔,大家都签名,以家族的名义,给嵯峨浩写一封正式邀请信,表达全家族男女老幼期待嵯峨浩早日归来的热切愿望。

这封信是万嘉熙在载涛指导下写成的。这件事在万嘉熙的日记中还清楚地作了记载:“二月十日,下班后到七叔家,又到溥佳家,为的是给浩写信的事。二哥和三妹等也来。”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精心筹划下,嵯峨浩终于冲破重重阻力,重又来到中国与亲人团聚了。

当天晚上,经载涛提议,以爱新觉罗家族的名义,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嵯峨浩一行。他显得十分兴奋,让溥杰夫妇坐在一起,高兴地说:“我们一家团聚了,应该感谢国家和人民!”嵯峨浩答谢说:“我们这次回到中国,日本皇室很重视,秩父宫妃、三笠宫妃、高松宫妃都为我们饯行,三笠宫要来中国射罪。天皇裕仁这次还为您带来了礼物。”

事后,嵯峨浩曾向日本亲友写信,最受感动的是家族的热情接待,尤其是溥仪既亲自接待又多次作陪,感到了望外之喜和望外之“荣”。家人因过去在东北见过溥仪,今昔对比之下,言谈举止已与过去完全不同。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这是载涛难以忘怀的一天。周总理接见了溥杰一家,载涛以家族长者的身分作陪。

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引大家坐在一张摆满糕点糖果的大圆白玉石桌前,风趣地说:“咱们围坐在这里,团团圆圆,图个吉利嘛!祝你们合家欢乐,永远团圆!”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会面中,总理侃侃而谈,从溥仪、溥杰讲到嵯峨浩以及她的两个女儿;从历史上的清朝又讲到今天的日本……总理强调中日不再战,两国人民应当友好相处。

今后,两国应捐弃前嫌,和平共处,发展多方面交流和合作。这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对东南亚的稳定以至世界和平也有很



大的影响。

总理特意来到陪同女儿来中国的嵯峨尚子面前，诚恳地说：“老人家，我十分敬佩你亲自来中国会亲。亲戚嘛，就应该这样相处，越是走动越亲热。总不能以仇相对，断绝往来。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和则两利，两和皆友嘛！请转告日本天皇、皇后，说中国总理向他们问候。”

此番话，说到了嵯峨浩母女的心坎上，备感亲切。十几年的亲身经历，她们深深懂得了这场灾难的根源，怎能不盼望尽快结束中日之间的敌对态度，而世代友好下去呢？母女俩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向周总理鞠了一个大躬，由衷地说：

“谢谢，您是我们全家人永生难忘的大恩人！”

周总理诚挚地对她们说：“你们回中国来，人人高兴，人人欢迎。溥仪不是也在以家族名义写的邀请信上签了名吗？当然，回来是你的自由，回去也是你的权利。如果呆一段觉得不舒服，不习惯，那还可以回去嘛！溥杰本人如果愿意，也可以去日本嘛！”

听到这里，她们全家人都落泪了。尚子夫人热泪盈眶地说：“中国有句老话，‘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女儿的丈夫在中国，我女儿的家也在中国。中国当然就是她的归宿了。从前，她虽然嫁给了一个皇亲御弟，可那时她来中国我是很不放心的，因为那时连接他们夫妻之间的纽带是政治。而现在她来中国，我是放心的，因为这是他们夫妻两人的共同心愿，双方谁也没有额外的要求。特别是有您这样的总理在管理国家，我女儿在中国会生活得更加幸福。”

当时，嵯峨浩的女儿嫣生因在日本生活惯了，又有了男朋友，不想与父母留在中国，家族正为此头疼。

周总理听说后，把她拉到身边坐下，亲切而又诚恳地说：“不要勉强嘛，要回去还是完全可以回去的，我了解年青人的心理，谁也不能强制。回去以后，又觉得中国好，可以再回来。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你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中国人，他们



能结婚,你当然也可以同日本人结婚嘛!不过,姐姐不在了,你是父母惟一的孩子,你可要经常来探望他们呵!我许可你常来常往!”

刚满十九岁的嫣生,被中国总理的胸怀大义感动得泪如泉涌,蓦地站起身,深深地鞠下腰,长时间地给总理鞠躬,以不熟练的中国话,反复说着:“我从心底里尊敬您!……”

此情此景,令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

这次会见,对载涛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因为,周总理第一次尖锐而诚恳地当面评述了载涛的历史功过。谈到历史,周总理说:“清朝统治中国很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宣统时期的责任,溥仪不能负,因为他即位时才三岁嘛。载涛做过清朝大臣,应负一部分责任。溥仪要负‘满洲国’的责任。但人又是可以改变的。溥仪、溥杰现在都有工作,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也是令人钦佩的。”

这是载涛与周总理的接触中,印象最深的一次会见。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仅一手促成了溥杰夫妇的团聚,而且为载涛及他的子侄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载涛又一次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高贵人品。周总理导师般的谆谆告诫,在他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再主“大婚”

如果说载涛当年承办大婚,使溥仪在前半生的爱情生活中充当了悲剧的角色,那么,为已届天命之年的溥仪再次主婚,则使溥仪“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感到人生原是充满了乐趣的”。

载涛常说,溥仪是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才建立了这个甜蜜的小家庭,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幸福婚姻。

溥仪被特赦以后,几年独居,不少人关心他的婚事,连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这件事。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就在溥仪回到北京的第二个月，周总理在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和他的亲属。总理就溥仪特赦后的工作安排问题征求了溥仪的意见，接着微笑着对溥仪说：“你现在一个人，没有妻子，也没有娃娃，岂能长期孤家寡人下去呀？你还得结婚啊！建立一个新型小家庭。”

说完，总理见溥仪难为情地低下了头，脸也红了，便观望了一下坐在一旁的载涛，风趣地说：“这件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啊！”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笑了笑，也开着玩笑，回答总理说：“让他婚姻自由吧！偌大个北京城，他还能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毛主席也关心溥仪的婚事，甚至提出了要求。那是一九六二年，全国政协三届三次全会召开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家里宴请溥仪和另外几位爱国老人。

见面时，毛主席盛情地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一询问生活起居，关心备至。毛主席指着溥仪说：“你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哟！”风趣的主席，开着玩笑，引起大家的开怀大笑。

毛主席对溥仪，是十分关注的。溥仪特赦后，毛主席经常以哲学家的观点谈到溥仪而论起阶级的改造，建议外宾去亲眼看看这位前皇帝的历史变化。

他气势恢弘地说：“被打倒的阶级，我们也要改造。其中，还有一个皇帝，他在北京，名叫溥仪。他从三岁到六岁的时候，统治全中国，统治我们，但他后来被推翻了。现在有进步，已经被特赦，不是战犯了，恢复了他的自由，他今年才五十三岁。他说，他现在真正解放了，自由了，他现在北京植物园工作。溥仪是改造得比较好的一个。”

毛主席还曾说到溥仪，“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每月只有一百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些了吧？……我想拿点稿费，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



终归是‘皇帝’嘛！”

那次吃的是湖南风味菜，主席连连为溥仪添酒加菜，说：“多尝尝我们家乡的风味菜吧。”主席关切地询问了溥仪的婚事，说：“‘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还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作为特赦人员中惟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溥仪，对这次会面极为珍重。他牢记毛主席的要求，后来当生活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爱钻死牛角尖的溥仪竟说：“毛主席让我慎重，如果没有条件合适的，我就不结婚了。”

作为溥仪的七叔，载涛又何尝不关心侄儿的婚事呢！特别是周总理当面重托他之后，他便开始张罗起来。他有意将自己的千女儿介绍给溥仪，便在政协礼堂请客，安排他们见面，除了载涛夫妇别无外人。

这位小姐未曾婚配，年轻貌美，打扮入时，仪态不凡。吃过饭，载涛邀请大家到三楼舞厅跳舞。小姐首先热情地邀请溥仪下场，溥仪本不大会跳，但又不好意思拒绝。尽管只是笨拙地跟了几圈，也足以使小姐出尽了风头。

后来，这位小姐便开始频频不断地找溥仪，一会儿求他写字，一会儿又教他学唱昆曲，一会儿又要逛街逛公园。见溥仪始终未开口，她便主动表示了自己的追求和心愿。

原来，小姐的爷爷是个穷孩子，后为老醇亲王收留，逐渐提拔起来，做了官，又发了大财。可是，此时的溥仪，对念念不忘皇恩浩荡的小姐却不以为然。

小姐如痴如狂地追求溥仪，几乎每天给他居住的旅馆打电话联系约会。以至溥仪告诉服务员，“如有女人打电话来，就说我不在”。

一次，小姐父亲来京，邀请溥仪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她被服务员电话搪塞后，不肯轻信，便亲自找来旅馆，正好堵上溥仪，但



仍被坚决拒绝。

载涛也感到奇怪,甚至有点不理解他的选择。后来,溥仪专门向载涛解释了自己选择爱人的标准,并说:“她所中意的人不是我,而是皇帝溥仪。我喜欢朴朴实实的人,但她给我的印象是轻浮虚荣,恐怕很难生活在一块儿。她也不可能真心爱我的。”

溥仪待人十分随和,还闹出了一场误会。一次,溥仪到五妹家中作客,见到了一对满族母女。母亲是婉容的姨娘,女儿是婉容的表妹,身穿绣花旗袍,满头珠翠耀眼,而且生得一表人才,绣得一手好花,练得一手好剑,可谓优越,才貌双全。认识之后,听说老太太是烹调高手,会炒一手好菜,便欣然应邀前去其家作客。

一来二去,彼此熟悉了,溥仪吃得高兴,谈笑风生,还颇有兴致与母女俩开上了玩笑。直到母女俩向溥仪提起了婚事,他才知道误会了。他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因为他早知道这位姑娘出身名门,娇生惯养,解放后仍不愿参加工作,还带着一身阔小姐的作风。他怎么能与这种人谈朋友呢?于是一口谢绝,从此再无来往。

载涛最后终于理解了自己的侄子,溥仪开始按自己选择爱人的新标准挑选合乎理想的伴侣。经过政协文史资料专员周振强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介绍,溥仪结识了一位银行职员的女儿、护士李淑贤。

当初,溥仪曾拿着李淑贤的照片,兴致勃勃地跑到载涛家,请七叔过目,并征求意见。载涛相信新生的溥仪,能够按照自己新的标准,选择理想的伴侣,便欣然同意。

其实,深深吸引溥仪的,不只是李淑贤温柔、善良而又好学上进的性格,还因为他无限同情李淑贤早年父母双逝的不幸遭遇。共同的思想情感,共同的兴趣追求和理解,使他们的爱情之花茁壮生长。

经过深入的交往,他们很快选定了婚期。按照惯例,他们于婚前专程来到载涛家“认门儿”。看到溥仪终于建立了幸福美满



的家庭，载涛感到无限宽慰。

他鼓励溥仪，能娶平民之女为妻，标志着溥仪又前进了一大步。他还竖起大拇指，夸奖溥仪：“满汉原来是不通婚的，现在溥仪能够带头与汉族人结婚，真了不起！”

载涛十分欣喜地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为之主婚。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晚，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张灯挂彩，热闹非凡。前来祝贺的有一百多人，除了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还有新郎、新娘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以及首都各界名流、各方面的领导和友人。

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北京市政协的领导申伯纯、沈德纯、平杰三、廖沫沙，各民主党派的朋友郑洞国、覃异之、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也专程赶来参加婚礼。

对于在这个日子举行婚礼，溥仪颇动了一番脑子，他大声地对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们讲：“‘五一’是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这个日子有意义！”

结婚典礼开始后，主婚人载涛首先致祝辞。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载涛，满面红光，声如洪钟，他兴奋地说：“我今天参加这个婚礼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在婚后新生活中相亲相爱，团结友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以报答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培养关怀。最后，预祝新郎新娘和衷共济，白头偕老。”

载涛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祝辞。他坐了下来，但思绪仍在飞快地翻滚。这位饱经历史沧桑的老人，怎能不产生无尽的联想？当年，他作为承办大臣，主持“大婚典礼筹备处”，全权操持了溥仪的大婚。而今，在新社会，他又主持了这次为世人所瞩目的婚礼！

几十家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活跃在会场，国内外很多报纸报道了这一盛况。尽管这次婚礼在规模、范围、花费上远不如昔日，但在影响上却是第一次“大婚”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一



个深刻的历史变迁,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溥仪在婚礼上,也大大方方地发表了即席讲话:“回想自己的前半生,那是一个剥削者、寄生者的可耻的人。经过十年改造,党的培养教育,今天我成了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我是一个园艺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而我的爱人是一个我最尊敬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正是在劳动者的节日里建立起一个劳动之家,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幸福,现在这幸福已在眼前,是党和人民给的,毛主席给的。”

“我愿意代表我的爱人,在今天的来宾面前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两人一定要相互勉励,随时克服缺点和错误,在各自的劳动岗位上,永远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把我们的一份菲薄的力量全部献给期待着我们的敬爱的党!”

一位有心的记者,趁爱新觉罗家族团聚的机会,替他们拍了一张集体照。载涛坐在新郎新娘的中间,四周围拢着喜笑颜开的族人亲友。载涛深为自己这个曾一度衰败而在解放后又获得新生的古老家族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汉族血统的南方姑娘李淑贤正式加入自己的家族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欢度“五·一”

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载涛也兴奋地应邀前往参加。

驻足全国政协的大门前,他凝望着这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似乎又陌生又熟悉,静静地深思着,百感交集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所从事的政协工作,才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对这座建筑的变迁,却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原来,这是清朝顺承郡王那勒赫的王府,后来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走向衰败。为了生计,主人曾于民国初年抵押给东方汇理



银行。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后，又以七万五千元银币的高价，一下子买下了这座赫赫有名的王府。而其中一个保人，竟是载涛本人。

往事沧桑。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王府才真正回到人民手中，从而成为全国政协办公的所在地，成为全国各界人民代表议论国是、参政议政的庄严殿堂，在全国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开会前，主持大会的郭沫若，见到载涛夫妇，高兴地上前握手，主动问候，谈起了家常。听说溥仪昨晚举行了婚礼，十分抱歉未能参加，很想见他们，马上请载涛将溥仪夫妇引到礼堂休息厅，表示一定要补上这个礼。一见到溥仪，郭老毋须载涛介绍，便双手抱拳，大声说道：

“溥仪先生，大喜大喜！祝贺你新婚大喜，有了一个新家庭！”

陪同郭老的包尔汉，也上前祝贺，并问李淑贤：

“新娘是哪里人？”

“浙江杭州人。”载涛见溥仪夫妇有些拘束，便主动代替他们回答。

“噢，原来是我们南方人哪。”

为了表示留念，郭老和包老还高兴地与溥仪夫妇合影拍照，还特意请载涛站在中间。后来，郭老还派秘书送来了贺礼——两条“双喜”香烟，既是贺礼，也预祝那将会带来新生命的幸福结合……

作为饱经历史沧桑的老人，载涛对郭沫若是十分敬重的。他告诉溥仪夫妇，郭老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也是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发展，有着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郭老对清史研究格外重视，与载涛会面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鼓励他注意加强研究清史，把历史告诉后人，从中得以借鉴！

消息传开，原来一些不知此事的代表，也纷纷赶来表示祝



贺，一时休息厅里人来人往，欢声笑语不绝。载涛里外忙活，又要接待，又要介绍新婚夫妇，最后兴奋地竖起大拇指，对众人夸起溥仪来：“满汉原来是不通婚的，现在溥仪能够带头与汉人结婚，真了不起！”

为欢度“五·一”佳节，全国政协专门设宴招待载涛及爱新觉罗家族。新婚的溥仪夫妇及弟弟、弟妹、妹妹、妹夫，全都应邀参加。政协的几位领导，亲自出席作陪，共同庆贺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同时也祝贺溥仪的新婚之禧。

宴会进行到最后，饭桌上摆了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精美点心。面对赏心悦目的各色点心，载涛不等别人发话，忍不住先吃起来，越吃越爱吃，自言自语道：“怎么吃起来像是以前的宫廷点心呵？”主持宴会的领导笑了，“涛贝勒不愧是美食家，还真吃出了名堂。”说罢，将厨师介绍出来。

原来，这位年已八十高龄的老厨师，就是早先清宫内专做点心的厨师，今天的点心全是他一手精心制做的，怎么能和清宫的点心不一样呢？

旁边的溥仪更是兴奋不已，连声说：“我十几岁出宫，四十多年没吃过这样地道的宫廷点心了。今天在这里吃到，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载涛叔侄纷纷上前与老师傅连连握手，感谢他把宫廷风味带到民间，发扬光大！

载涛十分高兴，对于溥仪婚礼安排选定在“五·一”前夕进行，真是喜上加喜，热闹非凡。特别是溥仪结婚新事新办，没有铺张浪费，婚后没有按老北京的习惯“回礼”，也没有大肆张扬，甚为满意。

可有一件事，载涛却听从了溥仪的意见。他盛情邀请载涛与其他亲友，同去北京植物园，不仅是游玩，而是拜谢他的领导和师傅们，回“娘家”。

溥仪捎去了喜糖，还带去了深深的敬意和感谢，他对领导和师傅们说：“在此之前，我有过三个娘家，这就是给予我新生的抚



顺战犯管理所、学会园艺劳动的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的文史资料委员会。我现在有了第四个家，可是，我绝不会忘了原来的‘娘家’！”

在溥仪的引导下，载涛在园内漫步游览。春夏之交，空气格外清新，鸟语花香，生机勃勃。这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占地五千多亩。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翡翠，镶嵌在西山脚下的万绿丛中，以四季常青和幽雅秀丽而闻名全国。

在温室里，他们长时间地欣赏着，目不暇接。这里种植着来自国内和五大洲的两千多种植物，品种繁多，五彩缤纷。最令人惊奇的是多浆植物，其中仙人掌就有圆形、扁形、椭圆形等多种，形态各异，大的比树高，小的竟如小手指一般。

有的上边嫁接着其它植物，还有的盛开着艳丽的花朵。最有趣的是含羞草，手指若稍稍触动，它便会迅速收蜷起身躯，不禁令人神思。

在一株名为“倒挂金钟”的花盆前，载涛停住了脚步，止不住问：“怎么这么眼熟呢？”

陪伴在旁的溥仪，则兴奋地说：“这是我参与试验成功的一个新品种，前不久还给您家送了一盆呢！”原来，这个品种很难成活。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溥仪积极参与试验，认真记录，分析研究它的习性和规律，最终摸清了它的特点：夏季开花，七月后休眠，秋天需要加肥，冬天注意保暖……有志者事竟成。在他们精心呵护下，“金钟”很快倒挂枝头了。溥仪兴奋地和老师傅在杰作前合影留念，还特意为载涛送去一盆。

对温室中的植物，溥仪如数家珍，能够一一介绍它们的来历。见载涛对一种大树般的植物感兴趣，便说：“这种植物是从外国引入的，对于它的管理，不但要浇水，还必须精心培养。它和含羞草差不多，是一种比较娇贵的植物。”

说着，他拿起一把松土用的小铁铲，熟练地松着土，又说：“必须经常松土，我刚来植物园的时候，连这种小铁铲也使不好



呢,哈哈!”

短短一天的植物园之游,很快结束了。然而,兴奋的载涛,却思绪不停,有着新的启迪和鼓舞:在溥仪获得新生的这块土地上,他也同时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尊严,获得了前进的源源动力……

精心照料

溥仪一生的最后时刻,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忍受着病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但他也得到了载涛等族人亲友无微不至的照料,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

本来身患肾癌的溥仪,经过周总理、彭真市长精心组织的著名专家会诊、治疗,身体已经复原。但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溥仪精神上陷入无法忍受的痛苦深渊。他跑到载涛的家里,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

载涛同样不理解,他和溥仪推心置腹地交换着意见。他的许多领导和同事,多么受人尊敬的共产党老干部啊!突然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惨无人道的体罚和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

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也不能理解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说来说去,谁也解不开那乱丝般的满腹疑团,最后只能长叹一声,别无其他任何办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确实是无功解释这一复杂的政治运动的。

溥仪的住宅前,是一条交通大道。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不少“红卫兵”经门前穿过,也不时闯进家来。经全国政协努力,由福绥靖派出所负责溥仪的保护工作。

再有“红卫兵”来,民警便及时赶来,耐心劝阻,明确告诉他们:“溥仪属于保护对象,这是周总理亲自交代下来的,未经派出



所同意,不能随意接触。”

此后,尽管仍有红卫兵闯进来,但因为派出所保护得当,均未发生任何意外。在抄家达到高潮的时候,为了保护溥仪,派出所还加强了夜间巡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溥仪由于突发尿毒症,被送往医院抢救。在他病重住院期间,署名“长春造反者”的来信攻势又升级了,以批判《我的前半生》为名,要与溥仪算老账。溥仪闻讯,仿佛感到泰山压顶,病情又加重了。

这时候,载涛急冲冲赶来医院,探望溥仪。为他带来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引用了周总理评价溥仪的一段话:“溥仪从苏联回来十六年了,他写了一本书,心情是沉痛的。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载涛传来的消息,对于重病在床的溥仪,胜似一副灵丹妙药。“周总理又一次肯定了《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好书”……溥仪连连喃喃自语,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望着哭成泪人的溥仪,载涛心里涌起无限感慨,还有谁比他更清楚周总理对这部书倾注的心血呢?当年总理审看《我的前半生》初稿时,曾与溥仪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载涛也在场,亲自聆听了这一教诲。

总理亲切地鼓励溥仪说:“短短几年能写出二十万字的书稿,很不容易,说明你确实进步了,令人信服地表明末代皇帝向旧社会宣战的决心。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也是吹自己。这部书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溥仪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被共产党改造好了。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溥仪能这样做,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事后,载涛总是十分激动地向族人亲友提起这段往事。是



的,党没有忘记溥仪,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忘记溥仪。处于非常时期的两位伟人,在全力保护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保护这位中国末代皇帝。

他们的指示通过公安部门层层下达,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即使处于那样的内乱之中,溥仪家未被抄,人未被斗,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上午,与溥仪离婚多年的“福贵人”李玉琴,带着一伙人找到医院,痛斥当年的“康德皇帝”。病体极度虚弱的溥仪,吓得浑身发抖,治疗又一次受到严重影响。

当天下午,载涛听说这一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他来到医院,建议立即向周总理写信汇报情况,以顺利解决矛盾,不应再增添无谓的纠缠。但溥仪未同意载涛的建议,他既不想以周总理的名望压人,也不想对李玉琴施加报复。

后来因为溥仪同病室的一位大学生,恰好是“三司战士”。他悄悄地对李玉琴及医院方面说:“溥仪是统战对象,是要受到保护的,不能随便召开批判会,不要把斗争目标搞错。否则,既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犯错误的。”他通过亲眼观察,客观得出的结论,影响事件向有利于溥仪的方面发展,才没有惊动周总理他老人家。

后来,“三司”派来红卫兵,向溥仪了解李玉琴的底细,打算“整”她。溥仪倘若落井下石,完全可以借红卫兵“整”她。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极力为她开脱,一再表示曾对李玉琴有压迫,是不好的,还主动写了长篇证明材料,说明了她与亲属们所受到的悲惨待遇。她们离家时,溥仪诚恳地要求自己负担她们的路费。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清晨,溥仪突然病重,再一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床位十分紧张,有人又强烈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当时,连全国政协也难以疏通,只好向周总理办公室反映。

总理闻讯很生气,亲笔批示“特殊照顾,一定要让溥仪住进



高干病房”，才使溥仪顺利安顿下来。而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医院关于溥仪病情的报告，立即分别报送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

另外，周总理当即指派著名的老中医蒲辅国，顶风踏雪，连夜赶到溥仪病床前，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很惦念，让我来看看……”握着蒲老的手，溥仪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载涛无视环境险恶，不顾年老体弱，几乎每天都来医院看望侄儿，说些宽心的话。然而，此时载涛纵有回天之术，对于病人膏肓的溥仪也爱莫能助了。

在此期间，载涛等众亲友，所能够给予溥仪的只能是精神上的慰藉了。他们抄大字报，拣传单，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溥仪的谈话，迅速送到溥仪的病床前。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说：“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对犯错误的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

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提到了溥仪改造的成功和特赦后取得的进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溥仪病逝。

新华社发布了消息：

〔新华社十八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十月十七日二时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岁。”

这条消息，显然过于简略了，甚至连评价和悼念的一点点痕迹也没有。然而，即使这样，也是周总理克服重重阻力，亲自下令，当时才得以见诸报端。

第二天，周总理立即派秘书前来，向载涛、李淑贤等亲友转达了周总理的慰问之意，详细了解溥仪逝世前后的情况以及亲友们对后事安排的想法。收到溥仪死亡报告后，周总理心情十



分沉重,他立即挥笔批示:“请富春告他们政协提方案,送批。”

对于溥仪后事的处理安排,周总理也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的意愿,可以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人民公墓安葬或寄存骨灰。

深知周总理当时处境的载涛,怎肯忍心再给他老人家增添负担呢?在处理溥仪骨灰安置这一难题上,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最长者,载涛主动说:“周总理也有难处,我们不能再给他老人家添麻烦,溥仪的骨灰还是安置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好。”在他的努力下,很快统一了全家族的意见。

就这样,载涛为溥仪这位末代皇帝寻找了一个永远同人民在一起的安宁之处。同时,这也是载涛一生中,行使爱新觉罗家族“族长”权利的最后一次机会。

事后,载涛将此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大家都赞成,溥仪的骨灰不放革命公墓,因他离‘革命’二字还差得很远。他是一个公民,放在人民公墓是最合适的!”

周总理十分尊重载涛的汇报和家族的意见,并在百忙中又作出三点批示:一、抚恤五百二十元,按规定办。二、溥仪上交政协的全部稿费交其妻子。三、根据家属意见,骨灰放入人民公墓。

是的,溥仪生前,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视为自己的无上荣光;死后,骨灰安葬在人民公墓,生生世世与人民同在,这也遂了溥仪生前的夙愿!

历史是公正的。溥仪去世十三年后,他与王耀武、廖耀湘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季方、刘澜涛、胡愈之以及各界代表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聆听了对溥仪的高度评价:

爱新觉罗·溥仪委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任职期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不断地参加学习,注意思想改造,对待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们生前都极为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神圣事业,并为此而努力做了些工作。”

幸福晚年

总理会见

有人曾这样向载涛发问：你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事是什么？他脱口而出：“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

这并非老人的随意之言，是总理一次又一次的谆谆教诲，似一股股沁人肺腑的清泉，注入载涛的心田，给他古稀之年带来幸福、追求和希望。

载涛也记不得到底周总理会见过他几次了。据溥杰、溥任及其他家族成员回忆，主要的有以下几次：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盛情邀请载涛参加这次会议，十分高兴而又抱歉地说：“没有请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

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载涛作为二百万满族人民的代表，光荣出席。周总理亲切会见了载涛，并将他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握着他的手，并建议他去探视正在学习和改造的溥仪。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国务院西花厅。周总理会见溥仪和其他十名第一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载涛陪同会见。总理谈了爱国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至今仍被特赦人员尊称为“四训”。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全国政协礼堂。周总理第一次正式宴请在京爱新觉罗家族皇室成员。载涛、溥仪及其七个弟



弟、妹妹均参加了会见。总理与每一个人亲切握手,仔细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热情勉励大家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更大进步。会见中,总理用一分为二的历史观点,全面评价了清朝及历代皇帝的功过。

一九六〇年五月,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会见载涛、溥仪及其弟弟、妹妹、弟媳、妹夫。主要就溥杰妻子嵯峨浩返回中国定居的问题,征求他们家族的意见。总理明确表示,中国方面同意嵯峨浩的请求,可以批准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总理强调,要开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东南亚的稳定和世界和平。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旧历除夕,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以个人名义,邀请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自己家里吃年夜饭。被特赦回来的溥杰第一次参加。溥仪兄弟姐妹聚集一堂,在家族史上从未有过,却在人民总理的家中实现了。总理谈论最多的是溥仪的婚事和溥杰夫妇团聚的事。总理当面委托载涛:“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啊!”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接见溥杰一家及其来访的日本朋友,载涛、溥仪及其弟妹均被邀请作陪。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日友好,强调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渊源流长,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两国都应记取不忘。两国人民应世代友好下去,并表示对日本天皇的问候和良好祝愿。总理的气魄和宽阔胸襟,使在场的人无一不受到教育和感动。溥杰的次女嫣生,告别总理时深情地说:“总理的话真是语重心长,我打心眼里尊敬您!”

.....

以上记录的仅是有据可查的几次周总理会见载涛的情景。在这期间,载涛还曾分别得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彭真市长、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和热情鼓励。



载涛从内心发出深深的感慨：周总理这样一位日理万机，重任在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竟对载涛、溥仪、溥杰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对爱新觉罗家族的兴旺和进步，倾注了如此巨大的心血，又是这样的深切和无微不至！非当事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载涛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总理的慈祥面容和谆谆教诲，仿佛永远在他脑海中萦怀。对于自己的生活，祖国的未来，载涛始终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即使到了垂暮之年，病卧在床，载涛也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宫廷忆著

载涛在晚年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回忆、访问和撰写晚清及民国有关史料。这位末代王朝的军事重臣，卸去战袍与兵器已多年，如今又重新找到了一门报效祖国的新武器——用手中的笔，记下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形成珍贵的文史资料。他的辛勤耕耘，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载涛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和写作。尽管对文史材料的挖掘组织，载涛还感到很陌生，但对其亲身经历的事情，接触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他还是一清二楚的。

载涛就在这座昔日王府，今日的全国政协机关，开始了紧张而又愉快的工作。一种特殊的情感冲击着载涛，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七月间，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撰写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这篇文章，真实而详细地反映了清廷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和争权夺利，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反动统治必然灭亡的趋势，有助于教育和启发青年认清中国的封建政治。有关方面对此极为重视，认为这篇文章“多系亲身见闻的第一手材料，内容翔实具体，叙事生动活泼，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载涛生于王府，自幼读书，交游广泛，阅历丰富，尤其熟悉宫廷王府生活，了解帝后王公贵族情况，通晓民国年间政局，特别是亲自辅佐过逊帝溥仪，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见证人。载涛充分利用自己具有“活资料”的特点，与恽宝惠先生合笔，发表了一篇长文《清末贵族之生活》。

这篇文章分上、下两篇，详细介绍了清代贵族的生活状况，从衣、食、住、行，说到婚、丧、嫁、娶以及家庭相见礼节、祭礼、娱乐习尚等，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那时候清宫贵族们的生活方式。

他欣然写道：“如今朝代改易将五十年，从前家家通晓，习为故常者，及今不谈，则后生晚辈，恐更无人知晓矣。”

对于这段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写作，载涛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虽然历史并不陌生，但如何做到正确认识和精确反映就不容易了。清末民初，政权不断更迭，几乎都关系到他的命运。那些清朝遗老遗少、北洋军阀、达官贵人，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与他有些联系。

别人懒于艰苦的挖掘，繁琐的校证，而载涛却乐于为此钻研。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后人介绍这段历史，使人们产生对旧制度的憎恨和对新制度的热爱，意义难道还不大吗？

载涛总说，能在史料撰写工作上有所成就，“这是得益于周总理的指导和教诲”。征集史料的工作，是在周总理的首先倡导下开始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总理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开会期间，第一次强调了文史工作的重要性。他还亲自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古稀老人，多次召开座谈会，大声疾呼：“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并建议全国政协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组织、落实这一工作。

之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很快成立，正式开始征集、整理、编写文史资料的工作。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申伯



纯等人担任副主任。溥仪是首批文史专员之一。接着,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也相应建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载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撰写文史资料的。

载涛以往很少动笔写文章,加之年高记忆力减弱,撰写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谁都知道,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统治者像走马灯似的频频变换,头绪繁多,错综复杂。载涛为此曾一度焦虑万分,后来他听到了周总理对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提出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心头才豁然开朗。

周总理在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次会议上,曾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对以后研究有帮助。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过去的经历遭遇写出来,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

载涛按照总理的要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第一手材料撰写稿件。遇到不清楚的问题,绝不轻易动笔,而是开展调查研究,求教知情人或有关专家,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

如果事实有出入或有争议,他宁肯搁笔不写,也决不人云亦云。他牢牢记住总理的教诲,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大有帮助,写出遗事是为了启发和教育后代,而不是哗众取宠,只让读者消遣。

为了提高研究和写作水平,载涛不断向有关方面专家、学者请教。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章士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章士钊是我国著名的法理学家,解放前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为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解放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他们常在一起聚会,无所不谈。除了共同探讨、研究有关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还经常一起携伴相游,饮酒赋诗,相处十分融洽。

载涛平素热情豪放,交友广泛,参加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工作以后,这种机会就更多了。

载涛在自己撰写史料的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提携家族亲



友共同进步。溥仪的三妹金韫颖,平时爱写些小文章,后来有些被收入《满宫残照记》一书。载涛听说章士钊先生对此很感兴趣,便主动带韫颖上门求教。

那天,在东四八条章老家中,章老夫妇设宴招待载涛及韫颖,当时在座的还有朱启钤先生夫妇、朱海北先生夫妇。章老高兴地对韫颖说:“你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我把《满宫残照记》呈给毛主席看了。”还说:“过些日子,你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

在载涛和章老的热情关怀及具体指导下,韫颖很快写出了自己的自传。章老亲手动笔修改,并取出自己精心收藏的一特制公文笺,让韫颖重新抄写。这样,一老一小,又抄又改,用了好几个半天,才终于抄成。

不久,章老兴奋地告诉韫颖:“毛主席来信了。”并让她看毛主席的亲笔信。后来,周总理受毛主席的委托,亲自安排韫颖担任了区的政协委员,为她的进步和提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在载涛的影响和带动下,爱新觉罗家族的很多成员,参与了文史资料的整理和写作。其中,尤以溥仪最为突出。他作为文史专员,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尽管发现患了肾癌这一绝症,仍然坚持工作,抱病四处奔走,甚至还到载涛家组织约请七叔写稿。难怪家人取笑溥仪说:“如今‘皇上’为了文史工作,倒反过来经常拜访‘大臣’哩!”

主要反映溥仪新生的电影《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很快摄制出品。试映期间,首先在全国政协礼堂播出。载涛应邀前往,先睹为快。他很兴奋,主人公是他的亲侄子呵,况且其中很多线索和资料,是他亲自向摄制组提供反映的呵!溥仪夫妇及其弟妹们也都参加了首映式。

看到影片中出现了新生的溥仪,在幸福的生活和工作,……载涛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但内心却笑了,笑得好开心!

影片公映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皇帝如何变成了一名普通公民?这个国内外许多人士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影片



迎刃而解。没想到溥仪对于成为一个公民，竟那么神往专注！中国把封建皇帝改造成社会新人，世所罕见！特别是影片在海外公映期间，以至在东南亚地区掀起了一股热潮，一些人竟不惜乘飞机前往观看，足见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载涛辛勤耕耘，奋笔不辍，尽管四处奔波，劳神费力，但他感到无限欣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见证人，历经两重社会制度的深刻比较，他写下了自己应该写的东西，为新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助出“奇书”

装帧精美，散发着油墨的清香，灰色书封，十六开的大字本样书，上下两册，五个大字赫然入目——《我的前半生》。

载涛捧着全国政协办公厅负责同志亲自送来的样书，兴奋而激动，止不住流下了热泪。他深深知道溥仪为这本书付出的心血以及寄托的希望，喃喃自语：“这是溥仪新生的标志呵，这是溥仪历史的转折呵！”

那是一九六〇年二月三日清晨发生的事。由于溥仪刚特赦回京，住处尚未确定，样书便立刻直接送到了七叔载涛家中。当时，他正患重感冒卧床发汗，但仍然不愿意耽误一分钟，唤来夫人王乃文，委托她立即亲自将此样书送到溥仪当时居住的崇内旅馆。

顾不得酬谢大汗淋漓的七婶，溥仪兴奋地将书一把抓到手心里，飞快地翻阅着。当时，居住于此的还有其它一些特赦战犯，他们闻讯赶来，纷纷抢先一睹为快。书，在杜聿明、王耀武等人手中迅速传阅着……

知情者无不感慨万分，载涛更是如此，“奇书呵”，奇在面世也奇。

那是一九五六年，载涛探望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之后，使之



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教育,他的思想开始由抵制转向悔过了。他开始自觉地学习起《什么是封建主义》、《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书,坚持天天听广播、读报纸,特别是参观平顶山万人坑,看到在伪满时代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的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终于认清了自己所犯罪恶的主要原因,懂得了如何正确地改造自己。在领导的鼓励下,由他口述,溥杰执笔,四五十年的经历很快写出来了,这就是这部书的初稿。

当然,书稿最初只像是一份检查,正如溥仪自序所言:“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前半生所走过的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我所以下定决心把它写出来的主要原因,……而是想从我这哭不得笑不得的‘哈哈镜’——说得文明一点,就是一面‘照妖镜’,把我当年的这副丑恶原形赤裸裸地展现在祖国人民面前,来表达我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忏悔的衷忱……”

后来,这部由伪满战犯轮流用钢板刻写的油印材料,辗转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中央统战部徐冰部长亲笔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负责同志。”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彭真同志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很快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修改意见。周总理对溥仪中肯地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后再改,尽量改得完善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你就站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改造好了。”

体会着总理耐人深思的教诲,溥仪豁然开朗,他决心要按历史事实来改写这部书,“让世人了解,一个过去剥削、压迫人民的皇帝是如何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的!”

经组织研究决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办公室和群众出版社派出了经验丰富的李文达同志,帮助溥仪共同修改此书。

载涛对重修此书,自始至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足遍京



城,通知家族中的亲友,将精心保存下来的有关历史资料,纷纷提供给溥仪作参改。他第一次就一下子给了溥仪上百张珍贵的历史旧照,这是他翻箱倒柜整理出来的。

这些早已绝世的照片,勾起了溥仪的记忆,那些早以忘弃的人物重又展现在眼前:“帝师”陈宝琛,胖胖的身材,一脸福相,像个不倒翁;另一位“帝师”郑孝胥,则高高的个子,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十分严厉。如此两位“帝师”,对溥仪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唤醒了对当时所发生事件的回忆。

经载涛动员和组织,溥仪所获得的资料极为珍贵。他搬来了父亲的日记,《载涛日记》从八岁记到北京解放,具体真实,颇具史料价值。四弟溥任捧出珍藏多年的皇室家谱——《星源集庆》,二妹夫郑广元收集来极为实用的《郑孝胥日记》。

此外,他的妹妹、族兄、侄儿及亲友们从四面八方收集到上百种历史资料,如,《大清会典》、《光宣小记》、《宣统政记》、《光绪朝东华录》、《远东军事法庭速记录》、《乾隆御批》、《宫中则例》、《翁同龢日记》、《胡适日记》等。最后,这些书竟形成了一个小小书库,用起来十分方便。

载涛虽未执笔,却是溥仪、李文达的“活辞典”。修改工作,十分浩大,繁琐而细致,对于一时说不清的事情,他们严肃认真,去伪存真。例如,书中涉及“热河政变”中恭亲王奕訢去承德会见慈禧一事,历来传说甚多。他们多次论证,最后还是听取了载涛的意见,抛弃了野史、演义中的不实之处,使全书更为真实可信。

尤其是关于慈禧,载涛是这样介绍的:母以子贵,因儿子载淳当上皇帝,慈禧立时成了太后。当时,有一御史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被肃顺以“本朝无此先例”为名驳回,从而使慈禧内心结下深仇。

她设计说服慈安太后,相信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秘密传信给恭亲王速来热河商议对策。于是,肃顺在护送“梓宫”返京途中,被奕訢捉住砍了头,从而开始了慈禧两代四



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

发动政变的两位主角，分别是载涛的六叔和父亲，曾清清楚楚地向亲人叙述了全过程。以此事实来修订这段史实，无疑不令人信服。

修书过程中，涉及宫廷之事较多，由于溥仪当时年龄尚小，回忆不清。而载涛当时也不能随便出入宫，也不太了解这些情况，但他建议溥仪，何不亲自到当时太监集居的兴隆寺去拜访一下呢！

受到载涛的启发，溥仪很快来到兴隆寺。这些陪伴他度过童年的太监，大多七、八十岁了，过去饱受宫廷的蹂躏，而今却安享晚年。他痛苦地自责，当年自己对太监肉体和精神上，都进行过凶暴专横的摧残，对自己扭曲的灵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最后，溥仪特意在书里增补了“太监”一节，写了皇上幼时在御花园捉迷藏的故事，写了溥仪前半生暴戾无常的性格，写了许多太监在宫中的悲惨境遇……这些鲜为人知的“宫内秘闻”，写得生动感人，往往令读者掉泪！

书稿成形后，载涛不但自己反复阅读，不断提出修改意见，还再三发动各界朋友，都来帮助此书润色、提高。

载涛专程把书稿送到了老舍家中。当时老舍因患高血压，正遵医嘱在家中休息，但盛情难却，抱病伏案，连夜挑读，不但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甚至对个别段落直接进行了改动，这又是极为罕见的。

载涛很快收到了老舍亲笔写下的修改意见：

一、全书甚长，似可略删节。应以溥仪为中心，不宜太多地描绘别人而忘掉中心。在所谓“别人”中，又可分为两种：（一）与溥仪有密切关系的满洲人、汉人、日本人；（二）和他关系不太大的。对前者（举例如他父亲、夫人等等）可以描绘稍详，对后者可以简单交代。

二、文字欠流畅，无法尽代润色——那需要很长时间。（略）

三、不顺当的句子很多,斟酌改正。(略)

四、书中重复的地方很多,可略删节。

.....

老舍的修改意见,令溥仪喜出望外。他和李文达以此作了修改,为全书增添了光彩,也成为后来文坛所流传的一段佳话。

历时两年,付出了想象不到的艰辛和努力,《我的前半生》终于最后定稿付排了。载涛似乎比作者还兴奋,他满意溥仪的表现,他感谢李文达的无私相助。

望着李文达日渐消瘦的面庞,同时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载涛欣然作画,挥毫泼墨,画了一幅仰天长啸的奔马,精心绘制好题赠李文达。以亲笔书画赠人,这在载涛经历中是很少有的,足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

《我的前半生》问世后,举世瞩目,立即产生了旋风式的巨大反响,概括海内外的舆论,也许就是一个字:“奇”!

“人是奇人! 事是奇事! 书是奇书!”

一位亲自采访过溥仪的海外记者,研读书稿后,概括为“三奇”:

“‘天下奇书’……为何是奇书? 历史上,一般皇帝自己从来不肯或不能写自传,溥仪写了,一奇;皇帝文过饰非,不肯认错,溥仪勇于认错,而且公之于世,二奇;末代皇帝或如元顺帝事败,消失在沙漠里,或如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煤山,溥仪则不然,他回到了民间,三奇!”

溥仪作为中国末代皇帝,可以和新中国并存,他作为一个有用的人,著书立说,不仅使人看到一个皇帝如何获得了新的灵魂,化腐朽为神奇,而且他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风貌和强大的生命力。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八七年,《我的前半生》在国内发行达一百七十万册。截至一九八〇年,《我的前半生》先后在日本、美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出版发行。



满堂高朋



幸
福
晚
年

众所周知,载涛生性豪爽,为人热情,历来善好结识各界朋友。尤其到了晚年,随着政治活动的增多,社会交往也愈来愈广,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堂,川流不息。交友联谊,互相学习,既是他工作中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的乐趣和动力。

谈起载涛的朋友,首先应该提及老舍。在一次全国政协举办的活动中,他们坐在一起,有缘结识,相见很晚,彼此之间,话题不断。从相互的工作、学习,谈到了家里的生活、居住、家人;从清朝的灭亡、“八旗”的没落,谈到新中国的建立、满族的新生;从满文的兴起、衰落,谈到当今文化的重要性,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投机。

老舍是个老旗人,又是个老北京,对载涛早有耳闻,素有敬重。从此,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无论是活动相遇,政协开会,或是别的场合邂逅,二人总是免不了亲热地叙谈一阵。他们彼此到对方家中作客,相互书画相赠。老舍曾对家人感慨地说:“虽然都是满人,但过去一个‘贵族’,一个‘穷人’,现在却平等地坐在一起,真是世道大变呵!”

周总理知道他们的交往后,甚感欣慰,说:“你们都是满族人的代表呵!”还勉励他们:“既然变化大,我们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后来,应载涛的邀请,老舍对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提出了中肯而详尽的长篇书面修改意见,一时在文坛传为佳话,获得各界的高度评价。

载涛事后专门为此事酬谢老舍,而老舍也坦率地说:“结识了溥仪这个新朋友,特别是审看了《我的前半生》一书,改变了很多看法,对人有教育意义。溥仪这个人的变化,真是了不起,真是不容易。”



后来,协助溥仪出书的群众出版社,将老舍的意见概括为:

“老舍是从文字和写法上提出意见的。他在书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修改),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号,并且指出可以删掉的地方……”

如此详细准确的修改和润色,不仅加快了《我的前半生》的顺利出版,而且为载涛与老舍的友情增添了新的光彩。

载涛年高望重,是清末民初历史的活见证。由于工作及各方面的原因,经常应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介绍有关情况,和史学界专家、学者接触很多,渐而交上了朋友。

其中,交往最深的当数白寿彝。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们会议上谈,活动中谈,还常常把话题带到家里。往往是一壶清茶,一谈就是半天。他们都很认真,遇到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总是争得脸红脖子粗。家里人以为他们吵架,赶紧过来相劝,他们才哈哈一笑,言归正传。

一次,载涛和溥仪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正巧碰上白寿彝,便高兴地给他们作介绍:“这是我侄子溥仪。”

历史博学的白教授,非常愿意结识这位末代皇帝溥仪,握着他的手,开着玩笑说:“溥仪陛下,您成为公民,实在是历史上的第一大奇迹!”

溥仪谦逊地说:“创造奇迹的是中国人民!今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果然,后来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定稿时,中央有关部门曾专门组织史学界专家审查此书。白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认真而严谨的修改意见,有些甚至直率而苛刻,特别是关于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溥仪侵略、控制中国,溥仪从复辟到改造的必然过程等重点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使溥仪受益匪浅。

经过白教授的组织 and 协调,当时国内一些最著名的历史学专家、学者,纷纷对《我的前半生》一书提出了修改意见,中肯而



深刻,令溥仪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启发。以下是溥仪记录下来的一些修改要点:

——注意不要强调过多的个人责任,把复辟说成完全是个人的愿望,好像日本帝国主义是自己请来的。要深刻认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而自己的愿望恰恰符合了这种要求。

——阴谋复辟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目的。当时英国也在同日本争夺溥仪,争得很凶。而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设下圈套,最后阴谋得逞。

——伪满洲帝国部分要加强,通过对东北人民的毒害和残酷压迫,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远东军事法庭一节的写法要注意,要符合国际法,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钻空子。

——改造部分要特别注意加强,线索准确,逻辑清楚,从复辟到改造,从改造到特赦,要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编故事。

——全书结尾要有力,应该写到特赦后的新生活,增写最近两年多的新内容。

.....

载涛为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得到专家们如此厚爱、润色而感到欣慰,更为自己拥有白寿彝这样的挚友而深感自豪。

载涛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报告会,邻座的一位老年妇人引起他的注意,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毛主席战友的夫人李淑一。

后来,在四川饭店的一次聚会中,他们有幸坐在一席。载涛主动打招呼,还向旁边的朋友作介绍。他说:“这是李淑一。毛主席答李淑一的词作,早已拜读,感人至深!”

那年,正值毛主席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刚刚发表,引起轰动。喜爱毛主席诗词的载涛,席间连声说:“毛主席的诗词,写得都很有气魄……”

一时间,吃饭变成了诗词交流,当有人向载涛建议,当场赋



诗一首,他连忙推辞,话头一转,对李淑一说:“还是毛主席的诗词好呵!”

载涛还有一位难得的忘年之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他作为军马局顾问,曾在一九五一年视察西北军马场的时候,专程前往塔尔寺拜访过班禅大师。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无话不谈,从此开始了神交二十年的亲密往来,留下了一段民族兄弟团结友好的佳话。

班禅大师凡来北京,必定到载涛家中探望这位年长的大哥。而载涛,也一定到班禅住处回访。后来,班禅常住北京,两家来往自然就更密切了。二话不离本行,他们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民族问题。

他们都是本民族的权威人士,也是国内著名的民族专家。

班禅说:“西藏历来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松赞干布时代,统一全西藏后,第一件事便是迎娶大唐文成公主。藏汉两族关系友好,接触日益频繁,有力地促进了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载涛接着说道:“到了清朝,统一全中国后,在中央设置理藩院,专门管理西藏事务。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辛亥革命后,民国历届政府都设有专门的蒙藏事务机构,并在拉萨设立办事处,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专门机构。新中国成立后,西藏也于一九五一年获得和平解放。”

他们欣喜地看到,西藏重回祖国怀抱,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有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班禅尤其兴奋,他告诉载涛,自己多次进京,每次都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还陪他与在京藏族同胞共同欢度藏历新年。他曾经多次带领藏族各阶层人士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有效地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调解了本民族内部纠纷,学习了内地经济建设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西藏建设。



班禅特别向载涛介绍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他的由衷赞赏。他认为: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自治权,是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迅速走向文明富裕、美满幸福的康庄大道。

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见解,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话题越来越多。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神圣殿堂上,在党和政府举行的重要会议上,他们共同为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献计献策、添砖加瓦。

在国内政坛上,他们被誉为“一对民族团结的好兄弟,一对难能可贵的民族专家。”

酷爱京戏的载涛,爱听戏,也爱以戏交友,与不少京戏演员交上了朋友。其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便是载涛家中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听着唱片,说说唱唱,比比划划,彼此都有享受和提高自己的感觉。

在马连良的影响下,载涛从喜爱京剧脸谱,又开始着迷似的收集京剧脸谱。每次到商店,看见有脸谱,就止不住地买上几个,什么关公、义士,什么大花脸、小花脸,应有尽有。外出开会、视察,有机会也逛市场找脸谱。光自己买还不够,有朋友外出还嘱咐他们往回捎上两个。最后,竟林林总总汇集了上百个。实在没地方搁了,家人提出意见,他才方可罢休。

有一年,他们分别应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的盛大酒会。相逢相知,令他们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地又哼起戏来,引来不少华侨驻足观看,也有不少记者拍下了当时这个极具纪念意义的合影。

.....

朋友,对于追随时代、渴望充实的载涛,无论是老友还是新知,无不成为他走向新生活的相知伙伴,良师益友。

宫苑重游



皇
叔
载
涛

熟悉载涛的人都知道，他生性好动，喜好游历，勤于思考。对待生养自己的故乡北京，就像孩子眷恋母亲一般，他深深地游历着北京，品味着北京，热爱着北京，宣传着北京。

在他的眼中，北京作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胜古迹、皇家宫苑而著称于世的文化历史名城，她的每一座宫苑、每一处山水、每一个典故，甚至每一个砖石、瓦片、草棍，都是宝贝，无不凝结着先人的心血和智慧，显示了中华民族渊远流长的灿烂文化。

斗转星移，大地沧桑。载涛一生都在走着，从未停顿，从旧时代进入新中国，从老北京进入新北京。他自己走，带家人走，陪朋友走，走遍了北京的每一处风景名胜。尤其是昔日皇家宫苑，留下了更多的感慨和美好的记忆。

载涛对北京作为文化古都，有着独特而丰富的理解。他多次向亲友作过介绍：明清以来，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将近五百年的历史中，她经历了二十五个皇帝，发展了北京都市的繁荣。

多次扩充的京城建制，反复营修的精美皇城，众多著名的名胜古迹，把北京这个帝王之都，装饰得花团锦簇。名目繁多的街道胡同，各有来历的寺观塔庙，以及岁时风俗、文化艺术、古老行业等，也使古老的北京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北京这些深刻的历史痕迹和迅速发展的现实，无疑在人们心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反响。

宫苑重游，次数最多，同时也是感慨最深的，还是故宫。

常常在家人的陪伴下，载涛来到故宫，走过一座座宫殿，伴随他的是一串串的回忆。

经天安门，通过笔直平坦的石板“御路”，到达故宫正门——午门。载涛说，我们今天走的正是昔日皇帝的专用通道，面对魏



峨壮观的重檐大殿，显示了封建皇帝的威严。进入清朝，皇帝曾在午门之上，检阅过卤簿仪仗和卫军，甚至举行过农民义军失败被俘的“献俘”仪式。而今，历史已经翻过了旧页，午门留给人们的只是戏剧性的嘲笑。

穿过午门后的方形广场，经金水河上的汉白玉单拱石桥，直接进入故宫的“内廷”部分。载涛介绍道，这是皇帝举行大典，接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

在乾清宫，他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出闹剧。民国二年的阳历元旦，退位后的小皇帝溥仪，重新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旁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御前侍卫们。

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代表，恭恭敬敬地步入大殿，连续几次鞠躬，然后向溥仪致新年贺词。接着，溥仪打开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木匣，取出事先写好的答辞，交与内务府大臣，答毕退回。于是，闹剧到此才算完成。

载涛无奈的自嘲道，经过袁世凯的祝贺如仪，民国元年间曾经销声匿迹的遗老遗少们，随之脱去便衣，又穿上了蟒袍补褂，戴上了红顶花翎，甚至恢复了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仪仗，以至午门前和紫禁城中来来往往，洋相百出。

来到故宫中心，这里有最为壮观的三大殿，建筑在汉白玉砌成的高大台基上，远望犹如神话中的琼宫仙阙。其中，太和殿是最富丽堂皇的建筑。载涛笑着告诉家人，这就是人们俗称的“金銮殿”。接着，讲叙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民国二年，隆裕皇太后的寿礼和丧礼都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元月十五日，隆裕寿礼，袁世凯派秘书长前来祝贺，国书上赫然入目：“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之后，国务院总理赵秉钧率全体国务员，前来贺礼。

七日后，隆裕去世。袁世凯更会来事，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通告全国下半旗志哀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在太和



殿上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参议长主祭，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军界也举行了全国陆军哀悼大会，主祭人是上将军段祺瑞。

紫禁城内，哀嚎阵阵，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一时熙熙攘攘，并肩出出进进，在当时成为一景，奇相怪声，以至在街头巷尾传为笑话。

穿过太和殿，就进入故宫的“外朝”部分了。在毓庆宫，载涛指着一处不起眼的房子，给家人讲了一个有关溥仪的故事。

从小在深宫的溥仪，脾气不定，尤其在八九岁之前，有时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他的侍卫太监往往作出这样的判断：“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罢，便把他推进摆放马桶的小房子。无论他怎样叫骂、踢门，也不开门。直到他哭喊够了，心里的火释放出来，才放人。

对于家人的惊奇，载涛笑着说：其实这种所谓的治疗，并不是太监的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孩子胡闹的原因是肝火太盛，哭闹一下有益于败火。醇王府的长辈们，也曾如此对待过载涛兄弟。自然，他们也是这样诊治自己的孩子了。

在毓庆宫，载涛停留的时间最长，他如数家珍：这里最早是嘉庆儿时的寝宫，后来成为光绪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溥仪读书的地方，先是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后来也转到这里。

书屋不大，没有豪华的布置，最醒目的是醇贤亲王亲笔写给光绪的诫勉诗条屏。这里最多的就是书，主要是十三经，其他辅助教材为《御批通鉴辑览》、《大清开国方略》、《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大学衍义》、《圣武记》等。另外，还有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侠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

载涛讲，当时为了促进溥仪学业的提高，他们设计了一个好办法，即为溥仪选配伴读的学生。经过挑选和竞争，有三人荣幸地选中。其中，除了溥仪的二弟溥杰，还有载涛的儿子溥佳，溥



抡的儿子毓崇,这在皇族子弟中,仍视为巨大的荣誉,不仅每人每月可拿到八十两的酬银,还被“赏紫禁城骑马”。

伴读还有另外一种责任,就是代皇帝受过。如果皇帝读不好书,老师就要教训伴读者。溥杰是皇弟,功课又最好,自然不会受责。溥佳主要是伴读英文,比其他之人英文好得多,所以也不会受责。因此,倒霉的总是毓崇。书读不好,要受罚;越受罚,就越没有积极性;最苦恼的是代人受罚。

一次,溥仪上课迟到了,而且还蹦蹦跳跳地跑进书房,老师便教训端庄而坐的毓崇:“看你何其轻佻!”溥佳回家对父亲谈起此事,听得载涛同情得直摇头。

载涛一行人继续北行,最后进入御花园。在此休息的时候,应家人请求,载涛又摆起了“龙门阵”,讲了宫内太监长期流传的一些鬼神故事。按照他们的说法,宫内几乎每一个物体,似乎都成过精,显过灵,更不用说那些雕塑而成的真武大帝、关帝菩萨神像了。

例如,储秀宫旁边立有一只铜鹤,左腿上有个明显的凹痕。据说在乾隆爷下江南之时,它成了精,自己跑到江南去护驾,无奈乾隆不领情,自讨没趣,反而被乾隆射了一箭,只好灰溜溜地又回到了原处,原左腿上生了红绣的凹痕便是乾隆射的箭伤疤痕。

载涛指着御花园五色池附近靠墙处的一棵古松,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这棵树竟给他遮了一路太阳。于是回京后,亲笔题诗一首,赐给这棵古松。不过,这首诗后来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

另外,载涛还告诉家人,御花园钦安殿西北角的台阶上,有一个脚印似的深痕。传说,有一年宫内失火,太监们久扑不灭,最后还是真武大帝走出殿门,就站在这个台阶上向失火的方向,挥手一指,才将火焰扑灭。这个脚印便是真武大帝救火时留下的痕迹。

说来好笑,载涛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总是津津有



味,百听不厌。因为当时他认为,先人是天子,天子自有鬼神相助,而今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甚至是骗人的鬼话。

每次游览故宫,抚今追昔,载涛总是无限感慨。他亲眼看到,随着清王朝走向灭亡,这座雄伟壮观的宫殿,出现了坍塌损坏的荒芜情景,深深地为其日渐衰颓而叹息。

而今,人们化悲为喜,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管理下,又得到了新生,使其全部恢复了原来庄严美丽的面貌。载涛为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伟大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为故宫得到全国人民以至国际游人的高度赞美而感到自豪!

除了故宫,载涛去处最多的地方就是颐和园了。气候好的时候,他常常蹬上自行车,兴致勃勃地前往。不过,此时能够伴他同行的,只能是那些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了。

进入颐和园,沿千米长廊前行,载涛一边欣赏沿途景致,一边向朋友讲述当年慈禧扩建颐和园的“内闻”:颐和园,历来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夏季行宫。到了慈禧时代,她垂帘听政,高度集权,更加穷奢极欲,肆无忌惮。她借重建海军的名义,大兴土木,修建毁于八国联军破坏的清漪园。

之后,又用光绪的名义,将清漪园正式改名为颐和园,以弘扬“颐养冲和”之意。扩建之中,慈禧先后数次挪用海军经费两千多万两白银,以至后来缺船少炮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说到这里,载涛在痛斥慈禧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父亲奕譞感到羞愧自责。奕譞当年负责创建大清新式海军,可为了取信、讨好慈禧,满足她的一己私欲,将其中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投入了颐和园的扩建之中。

后来扩建工程进入最紧张的时候,京师和直隶省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北泰怕为此激起灾民闹事,曾上奏暂时停工,因而激怒了慈禧“交部议处”,被罢官,削职为民。而此时醇亲王却未



发一言,继续不断地挪用海军经费,保质保期地加速扩建工程。颐和园于一八九〇年扩建完工,奕譞也很快去世了,但同时却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记忆。

来到仁寿殿后的漪澜堂,这是紧傍碧波浩渺的昆明湖畔的一处雅致院落。然而正在这里,发生了慈禧囚禁折磨光绪的人间悲剧。

载涛十分清楚这段历史,对自己的亲二哥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向朋友作了详尽的介绍。一八九八年,年轻有为的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后因袁世凯告密,而遭慈禧破坏。开始,慈禧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的瀛台,后因其常住颐和园,为便于监控,又将光绪、珍妃关到颐和园漪澜堂。

在漪澜堂西殿屋内,载涛指着一堵遗存的青砖墙说:“这是为专门囚禁光绪而后砌的,原本是没有的。”一堵厚厚的砖墙,把他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景物,他无限伤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孤苦伶仃的他,更思念同在患难中的珍妃。

光绪的凄苦,不敢向人吐露,但他的贴身太监领会了,便偷偷买通了看守珍妃的侍卫,将其引到漪澜堂与光绪会面。二人相见,抱头痛哭,说不尽的心里话,真是难舍难分。牛郎织女,天河相隔,每年还能鹊桥相会一次。而他们这次相见后,却不知何时才能会面,他们说了哭,哭了说,日过中午,还不忍离去,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每每说到这里,载涛无不表示出对慈禧的极大气愤。

来到颐和园中豪华绝伦的大戏台,一生酷爱京戏的载涛可来神了,津津乐道地说:“这个戏台非比寻常,是当时中国三大戏台之首,可以说与我国近代的戏剧发展史联系在一起。七十年前,最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等,都在这台上演过戏。”

戏台分上下三层,还有宽阔的后台和地下室,准备了各种机



关、道具和布景。例如表演孙悟空大闹天空或白蛇传水漫金山寺等戏目时,戏台能够喷水冒烟,演员也可借助技术设备,或腾空上升,或潜入地下,隐现不易捉摸。戏台面积要比一般剧场要大得多,因为这是专门演给皇帝看的。常常演员百余人在台上活动,而台下观戏的只有几十人,甚至几个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帝王独夫早已作古,而人民所喜爱的京剧表演艺术,却继续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经历湖的“云辉玉宇”牌楼,来到清宴舫,载涛说,这是人们俗称的大石舫,建于清乾隆年间,为了欣赏昆明湖的四季景色,也为了喻示清王朝如同磐石般的坚固。乾隆为此寓诗“载舟昔喻存深慎,磐石因思永莫安”。然而后来清王朝腐朽到了极点,慈禧甚至把颐和园变成了皇家的禁园,在大石舫上饮酒作乐,歌舞升平。终于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葬送了清王朝,也使这座昔日皇帝行宫重回人民之手,从而成为目前世界上造景最丰富、建筑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古典园林,受到全国人民和国际游人的瞻仰和欢迎。

而今,可以告慰世人的,颐和园又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在中国以至世界都是少见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拥有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大型的皇家文物遗存群落。

目前,颐和园现存文物达四万余件,其中属国家一级的九十三件,二级的一万七千件,三级的一万三千件。文物品类涉及铜器、玉器、瓷器、木器、漆器、竹器、乐器、书画、古籍、珐琅、钟表、根雕、杂项等,几乎包括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时间可上溯商代,下追明清,更有堪称“镇国之宝”的虢宣公子白鼎、三牺尊、缙丝长袖佛像图等国家级珍品,还有一些外国重要文物。

展示这些珍贵文物的“文昌院”,正式对外开放已于近年。颐和园的西南角,两扇森严的铁门背后,一座高大的仿古门楼赫然入目,“文昌院”三个隽永的鎏金大字,显示了皇家园林所特有的王者气度和儒雅之风。



在这里的千米展厅中,采用声、光、电等手段,对游人进行包括颐和园园史在内的科普介绍。在展室布局上,既照顾了宫廷陈设对称均衡的特点,也有创新的设计,包括用现代化手段描画的颐和园景物形象和各种纹样。

皇家宫苑,故地重游,载涛在向家人、朋友叙说昔日景观、典故的时候,从内心深处,为自己追随时代,走向新生,而感到庆幸,并引为自豪!

“故事大王”

载涛晚年,四世同堂,膝下子孙成群,生活其乐融融。特别是作为家族的最长者,他得到了后代的极大尊重。不仅本家子孙,连族里亲友的孩子有什么喜讯,也要首先报告给“七爷”。载涛出门少了,和孩子们的接触却多了起来。

他本来就是一个爽朗、健谈的人,现在子孙承欢膝下,温情脉脉,话题就更多了。孩子们喜欢听历史故事,尤其是发生在清宫、王府的事情。作为亲知亲历者,载涛讲得津津有味,孙子们听得饶有兴趣。

他时常陷入对早年宫廷生活和王府往事的回忆,那里有幸福和欢乐,也有痛苦和心酸。但无论是哪一种,对他来讲都是亲切的,他没有把这种回忆记录下来,而是对家人侃侃而谈。吐露自己的心曲,从而成为载涛晚年生活中的一种新内容,也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快乐。

清朝灭亡以后,关于清室传闻很多,而载涛对此却认为大谬不然。他往往针对于此讲了一些历史上的故事,不仅有趣,而且真实可信。

慈禧传膳

慈禧在宫里的时候,经常召近族侄辈进宫侍膳,说通俗点,就是陪吃。



到了晚年,这种传膳的事情就更多了。有人说,慈禧好动好热闹,一人吃饭没胃口,因此让饭桌上多几个说话的人。而载涛却说,吃饭是假,应试是真,慈禧的本意,是借着吃饭的机会,了解、观察子侄们,以便决定将来的使用程度。其实,当时宫内森严,人人自危,说来说去不过是几句问候的客套话,慈禧又岂能了解到什么真实的情况呢?

载涛也曾有幸奉旨入宫侍膳,但他不敢真吃,更不敢多说话。回府后,再吃一顿,中间缺了一顿,就像饿狼一样。但吃饭的阵势及菜肴的奢华,却让人历历在目:

慈禧要吃饭了。御前小太监向养心殿的太监说一声“传膳”!他把这话传给殿外太监,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个传一个,一直传进御膳房。

随即,几十名太监,抬着大小七张膳桌,上有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直送养心殿。小太监负责接过,摆好,平日主肴两桌,冬天加设火锅一桌,此外还有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小菜一桌。

明黄色的瓷器上,绘着龙纹和“万寿无疆”的字样,冬天则换成银器。盘子下是盛有热水的瓷罐,以保菜肴不凉。每个菜碟前摆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防止下毒而特设的。经过太监尝过,方可用膳。慈禧用膳,每餐菜肴都在一百样之上,究竟能吃多少,又浪费多少,那是可想而知的。

珍妃自尽

直至今今天,还有很多史料及文学作品,说珍妃死于慈禧,她命太监毡裹投井。还说,珍妃是妹,瑾妃是姐。而载涛则说,珍妃是姐,瑾妃是妹,并讲述了珍妃死因的真实情况。

珍妃聪明伶俐,为人随和,加之年轻好动,难免办事有些出格。对慈禧包办婚姻,把娘家侄女硬塞给光绪为后,也十分不满。但慈禧痛恨珍妃的原因还是政治上的。珍妃赞同维新,主张光绪亲政,因而激怒了慈禧,被隔离囚禁,防止他们接触惹事。

后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要挟帝西逃,忽然觉得珍妃如



留北京,很可能被同情光绪的外国人钻空子,让珍妃出来维持局面,政治上对她是不利的;如带珍妃走,又怕促成与光绪的团聚,即政治上的合作,结局也很难控制。

慈禧考虑再三,既不能留,也不能带,最后生了杀机。她指着身边的水井,对珍妃说:帝后西行,不能带你同走。你身为皇妃,留在北京,必遭洋人凌辱,愧对列祖列宗。为保全名节,可在皇帝面前一死,让帝后放心而行。

载涛说,珍妃并未像有些史料所说长跪求免一死,而是庄重地向光绪道别,然后昂首挺胸,义无反顾,自己一头扎入井内。在场之人,无不吞声饮泣,悲痛欲绝。

当年载涛已经十多岁了,不管是否见过珍妃,也不管是否身在现场,以他的年纪、身份而言,凭他对皇兄、皇嫂的了解和感情,这个故事想必是不会失实的。

载沣治病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醇亲王府,从来不设专职医生,家人生病也很少外请医生,而负责看病、治病的却是这座王府的当家人——载沣。

载沣看病有两绝,一是让家人常服用一些预防疾病的小药,例如焦三鲜、甘露茶、午时茶、牛黄抱龙丸、一捻金等。这些小药并不贵重,但对疗治一些小病却很有效,从而使载沣颇为得意。

实际上,载沣并未按科学办事,而是按节气、按旧制办事。他平时是一个思想和生活方式非常守旧而古板的人,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按照需要来办事,而是遵循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式来行事的。看病也是如此,等真有了大病,载沣不但不信西医,连中医也不相信。似乎只相信自己的命运“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得病之初,他拒绝治疗。后来不得不治,也很少认真服药。晚年得了糖尿病,置医嘱于不顾,照吃甜食,毫无口忌。

二是王府特备的批糠代药。家人生病,尤其是孩子们生病,下人会很快报告给载沣。他有时会去看看,有时连看看都不去,



迅速作出诊断,这个结论往往就是三个字:“吃多了!”

于是乎,立即进入治疗阶段。所谓治疗就更简单了,并不服药,只是停止了正常的饮食,改吃王府贮藏多年、经过虫蛙鼠咬早已变成粃糠的老米煮成的稀粥。可想而知,这种粥比苦药还难以下咽。所以,后来孩子们也都有了对付载沣的办法,生了病则力求隐瞒。万一被发现生病,也很快说病好了,以求尽快恢复正常的饮食,躲避这种吃老米粥的痛苦惩罚。

孩子们的小把戏,不但没使迷信的载沣醒悟过来,反而愈发相信这种老米就是去火化食、医治百病的良药。他相信这种奇妙的效果,视此为珍宝,走到哪里必定带到哪里。

以致后到天津避难,还不忘随身携带,妥为安置在楼下。直到天津发大水,这些老米一遇水便泡成了烂泥,才不得不忍痛扔掉。载沣为此痛惜,可孩子们却暗自庆贺,从此可免遭这种苦难了。

载涛对哥哥十分尊重,可是谈到这件事,却连连摇头。这种粃糠老米怎么竟成了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呢?特别是作为美食家的他,想到让孩子们喝那种把虫屎、鸟屎、老鼠屎都煮在一起的粥,还美其名曰治病,真令人感到可气,可笑!

载沣隐居

载涛是与载沣一同到天津避难的。在此期间,载沣为了确保全家安全,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固执地采取了一连串自以为得计的做法,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贻笑大方。

载沣开始采取的是“双保险”的措施,即光隐居租界是不够的,还要隐姓埋名。他对外称住宅为“王公馆”,生怕外界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电话簿上登记的是“王公馆”,商店往家里送东西也只知道那是“王公馆”。

载沣自以为他原来常说的“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生活似乎从此开始了。其实,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又怎能保证其神秘的隐居生活不受干扰呢?那些皇室家族中人,特别是那些热衷复辟的人们,发现载沣不在北京,便千方百计打听清楚,赶来



慰问、拜会。载沣本来就不善应酬交际，现在为长期隐居，便干脆托病，挡驾不见。

对待子女上学，载沣也要求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孩子们因此也改名换姓，对外不得向任何人说出自己的身世和真实姓名。课后不得在学校停留，不得参加课余和校外的活动，不得与老师、同学彼此往来。为减少外界注意，他有汽车不用，每天安排两辆人力车，由家里下人护送子女上学，而且不得在中途停留玩耍。

一切都按规定进行，载沣以为人们早已把前清的摄政王忘得一干二净，在天津已无人知道他是谁的时候，竟破例参加了学校的“恳亲会”。谁知一进校门，两个校警立刻鞠躬致敬，同时分列左右，摆出了护卫的架势。校长迎上来，连声说：“王爷安好，欢迎大驾光临！”其他教员、学生、家长也围拢来，问候声不绝，原来他们早都知道他是前清摄政王了。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扩张，为笼络和控制载沣，千方百计诱逼他搬进日本租界居住。为此，他十分矛盾，不搬，怕得罪了日本人，可能给家人引来惨祸；搬家，又惧怕社会议论他投靠日本人，惊扰了隐居生活。

于是，他最后设计，悄悄搬家，让公众以为他们仍然住在英租界，岂不两全其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精心组织家人，采取零星地、用小卧车、夜间秘密地绕路行走等特殊方法，将家搬进了日租界。搬家之后，仍留有仆人居住，主人也常来常往，避免外人生疑。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解除不了载沣的顾虑，当然更不可能瞒过群众的眼睛，掩过社会的视听。这件事，就是后来被天津报界戏称为“醇亲王的搬家游戏”，一度成为大街小巷、饭后茶余的笑料。

王府年节

醇亲王府，气派万千，制度森严，对孩子们而言，似乎又是一个空旷而神秘的大世界。这是一座清朝典型的贵族府第，可谓



世上少有、人间难寻的所在。在这个高大围墙里，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日程，除去那些繁琐的礼仪，欢度年节也许还会给人们留下有趣的记忆。

最隆重、最热闹的首推新春佳节了。吃完除夕年夜饭，孩子们顾不得抹嘴，便纷纷跑到院子里，看太监在午夜燃放辞旧迎新的鞭炮、礼花。听着清脆的爆竹声，看着五颜六色的烟火，孩子们真是又乐又跳，兴奋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轮到“踩岁”这一项，就更有意思了。孩子们在撒满玉米秸的院子里，跑来跳去，脚下沙沙作响，回声不绝，引得大人们也上来一走，声响越大越高兴。

夜深了，孩子们回房后还舍不得睡，翻出过年除夕给长辈叩头辞岁赏给的“压岁”荷包来玩。这可是一个神奇的宝袋，里面全是当时孩子们喜欢的物件，有铜元和银元，有钢笔和其他各种文具，有头发卡子和珐琅别针，还有各种小玩具，拿出来，又玩又数，不忍释手。

端午节也是大节。王府也和民间一样，除了品尝粽子宴之外，还要在每个门上都插上蒲棒，每个小孩子都要在衣襟上挂一串用彩线缠绕成粽子形的小饰物。女孩有时还要多带一个用绫子做成的带穗的香袋。佣人的手可巧了，做出的香袋，形状各异，有桃形的，有菱角形的，还有蝈蝈形和兔形的，惟妙惟肖，十分有趣。

到了中秋，情趣自然又不同。此节是家节，全家上下一一定要在月下围桌而坐，吃上一顿团圆饭。最后，要上王府特制的团圆饼。所谓团圆饼，就是桌面大小的月饼，先拿它供天供月亮，然后按长幼尊卑的顺序叩头，最后就把月饼分而食之。因为这个大月饼是佣人现作的，所以又好看，又好吃，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吃完月饼，接着开水果宴，各种时鲜水果，应有尽有。但孩子们最爱吃的是早在夏天就泡在盐水里留下来的西瓜，由于保存得当，摆上来照样鲜如盛夏，尤其是吃着甜津津、凉丝丝的西



瓜看景赏月,更是别有一番情意在心头。

王府除此之外,一年中还有许多特有的节日,有时比大的年节还有意思。比如,每逢四月初八,家人互相赠送“结缘豆”;在牡丹花、玫瑰花、槐花、藤萝花盛开的日子里,家人用这些花做成饼来吃;九九重阳节,全家必定登上花园的南山,一起吃菊花火锅。进入腊月,节日情趣就更多了,香甜可口的腊八粥,祭灶分灶糖,置办年货,互送礼品……这些对于孩子们都有童话一般的魅力,久久不能忘怀。

载涛晚年,花朝月夕,藤萝架下,炉火之旁,承欢膝下,向孩子们讲叙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生动感人,真实可信。孩子们得到教诲,产生兴趣,留下思考,还不时给七爷一个绰号——“故事大王”!

政协献戏

载涛一生,酷爱京戏。但在过去那个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连他也没有勇气面对大众登台唱戏。而能使广大观众耳闻目睹载涛精湛的京剧表演艺术,却是在新时代提供的舞台上。

在晚年生活中,载涛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当时的全国政协礼堂,为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及各界名流,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电影、音乐会、舞蹈表演、戏曲、跳舞晚会及其他文艺演出,应有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

载涛是个戏迷,特别喜爱观看传统的京剧表演艺术。如果同时收到戏票或其他什么票,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去看京戏,几乎场场不落。

光靠发票看戏还不过瘾,当时北京各大戏院凡有名角演出的京戏,载涛也是向来不放弃观看机会的。有一段时间,他除了听戏,还下力四处收集京戏表演艺术家的剧照,各种样式的京剧脸谱以及武戏武生的行头。

凡政协同仁聚会,特别是在中秋、春节传统的民族节日,载



涛总是自告奋勇，登台表演，连唱带舞，不时赢得一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说起载涛唱戏，这其中还闹了个笑活。有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载涛携带家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全国政协礼堂，参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联欢晚会。

宽大的圆桌上，摆满了各式月饼和时鲜水果，人们围拢而坐，开怀畅谈，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而欢快的气氛。大家对月抒怀，有人赋诗作画，有人载歌载舞。

这一诗情画意般的场面，令载涛感到陶醉。这位年已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竟又一次提出要登台献戏。他当时演的是《芦花荡》。事先，工作人员为他装饰戏装时，未敢紧勒帽盔，怕老人头疼。未曾想载涛演戏一向认真，这次又格外卖力，在表演抖盔动作时，帽子竟被甩掉了。热情的观众毫不介意，照例奉上一阵阵掌声。

然而载涛倒生气了：丢盔素来为戏家一大忌讳，唱了一辈子戏，最后竟当众砸了自己的台！越想越生气，越气越想不开，后来竟一下病倒了。

好心的同仁们，闻讯后纷纷上门劝解。最后也不知谁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有意再为载涛安排一个演出的机会，老人重新登台还唱《芦花荡》。大家格外捧场，演出效果十分圆满，皆大欢喜。捞回面子，载涛脸上才重新露出笑颜。

载涛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有很深的交情。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技艺。特别是解放以后，两人都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往就更多了。酷爱京剧的载涛，十分欣赏梅兰芳的演唱和表演，经常称赞他的艺术成就。梅兰芳听着载涛对京剧艺术的见解以及对自己表演的评论，深感遇到了知音，情不自禁地与他交流起来。

当时，梅兰芳经常在全国政协礼堂上戏，有时随慰问团正式演出，有时作为政协代表自演自娱。而载涛也是活跃分子，一会组



织，一会登台。在此期间，他不仅有机会详细观看了梅兰芳的表演，还有机会最先观看了梅兰芳新主演的戏剧影片《游园惊梦》。

随着交往的深入，梅兰芳向载涛告知了自己的身世。他出身于戏剧世家，前辈就曾在宫中唱戏。伯父曾在当时清廷专管演戏的机构中任职，专攻笛子、胡琴等各种戏曲乐器，十分有名。说到祖父，就更有名了，曾被咸丰皇帝戏称为“胖巧玲”。

在《皇门经略》的《京都竹枝词》中，就有不少“御口亲呼胖巧玲”的文字记载。他负责当时京城内外十分有名的“四喜班”，经常被皇帝传入宫内演戏。梅兰芳从小学戏，又得家人亲传，很快就名气大震了。

梅兰芳对载涛讲起两次应他之邀进宫演戏的经过。

第一次进宫，是为庆贺溥仪“大婚”。载涛奉旨邀请梅兰芳等人进宫唱堂会，连演三天。王凤卿、王瑶卿、杨小楼、余叔岩等名角也相继上场。“班底”由“富连成”来负责。第一天，上演《汾河湾》；第二天，演员反串《扒蜡庙》，青衣梅兰芳居然反串黄天霸，张桂兰由杨小楼饰演；第三天，梅兰芳和杨小楼共演《霸王别姬》。确实演技非凡，博得阵阵喝彩。

但有人却认为，溥仪“大婚”上演此戏为不祥之兆。溥仪却毫不以为然，全不理睬。到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的时候，这些人就说了：“大婚之日，演《霸王别姬》，应在今日了。”

第二次进宫，是为庆贺瑾太妃寿辰。当时，京城众多京剧名角应邀进宫表演，惟独缺少梅兰芳。载涛发现后，派专人设法找到梅兰芳，再三陈词，恳请梅兰芳进宫。碍于载涛的情面，正为筹款救灾义演的梅兰芳，不得已进宫，连演两场，才算圆了场。

有一次在政协开完会，载涛邀请梅兰芳一同乘车来到西扬威胡同载涛住处。饮茶闲叙之余，梅兰芳诚心诚意地向载涛询问《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某些表演手段。这件事一方面体现了梅兰芳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也表明载涛对于京剧青衣的造诣之深。



有时,他们还把当时的四大琴师之一徐兰沅请来。徐操琴,载涛表演,梅兰芳清唱,使载家热闹非凡,围来看热闹的邻居站了半院子。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对载涛说:“载老,你的京剧艺术造诣很深,可不能带着走啊!应该把艺术传下来。”载涛笑笑说:“我能传谁啊?”沈部长很认真地说:“到戏校当教授!”

过了几天,戏校真的派车来接载涛去教戏了。当时正是夏季。载涛总是把外衣脱掉,只穿一件背心教戏,使在场的人都很感动。著名京剧演员刘长瑜就是载涛的入室弟子,得到他不少亲传。本来载涛计划在戏校教三出戏,即《安天会》、《芦花荡》、《贵妃醉酒》。可惜,连《安天会》一出还没教完,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此,载涛再也没有机会唱京剧了。

“文革”风雨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估摸着,又是除四旧,又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回还不得冲一冲“涛贝勒”。说也奇怪,在那样动乱的年代,开始时载涛既没有享受什么特殊的保护,也并没有受到过冲击,甚至连他一张大字报也没有。

一些“红卫兵”曾企图召开大院群众大会,批一批这位大清帝国的遗老、皇亲国戚。但也许是院里没人买这个账,批斗会始终没有开成。

但是,载涛的侄女之子,一个当时只有十六七的中学生,为了向旧社会造反,主动与封建家庭决裂,便“引火烧身”邀一批“红卫兵”抄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家。首先光顾的自然是家族中辈分最高的载涛家。他们于一九六六年七月的一天,突然冲进载家大院,使载涛着实经了风雨,见了世面。

年逾古稀的载涛,被“红卫兵”推拽到院中,“必须端正对文



化大革命的认识,彻底交待历史罪恶”!吼叫声在大院里震天响,大院和邻近居民都聚拢来围观。在“红卫兵”们看来,“皇帝的叔叔,就是他妈的封建残渣余孽”!自然是“旧”得不能再“旧”了,焉能不横扫、竖扫!

然而载涛却不服,自以为早已经脱胎换骨,革面洗心,成了普通公民,你扫得着吗?结果,他被“红卫兵”一下子推倒在地,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十分痛苦,也十分不理解。在阳光的曝晒下,这位老人从地上爬起来,低垂着头,失去了往日的乐观开朗,脸色苍白可怕。

“红卫兵”开始抄家了。载涛多年珍藏的古董被搜了出来,屋里的金银首饰细软,一些珍贵的古籍、字画也都扔在地上。当天很快被一辆汽车运走了。

中午,“红卫兵”抄家结束,噶噶喳喳地离去。临走前还对载涛说:“等着瞧,没完!”

果然,时隔不久,门口又涌进一群人来。正在厨房做饭的载涛夫人金孝兰以为“红卫兵”又来抄家了,紧张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竟抄起菜刀,割断了手臂上的动脉血管,以自杀表示了无声的抗议。

此事传出,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对载涛要保护!”从此,在派出所的精心组织下,“红卫兵”再也没有来过,载涛一家免除了更大的灾难。

金孝兰之死,并未能阻止“红卫兵”的步伐。他们高呼着“最高指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又杀向附近的溥任家。因为所谓态度不好,舅舅竟挨了亲外甥的两皮带。结局是同样的,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统统被抄走,甚至家里值点钱的东西一点也没留下。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带头造了家族反的外甥,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家由此而幸免。随之遭殃的就是自己的家,“红卫兵”冲进来,翻箱倒柜,抄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包括他们生活必需



的工资、粮票，还向他们勒令：“你们必须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老实交代历史问题，必须向‘红卫兵’汇报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在“文革”中受害的家庭落实政策。全国人大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都派人多次找载涛夫人王乃文，征求她对落实政策的意见。并一再表示，此前对查抄物资的作价收购似嫌低了点，让她尽可以提条件，政府一定会满足的。

王乃文深明事理，表示：那些金银财宝支援国家了，除已作价的之外，不再要别的赔偿，只是我身边无子女，老了无人照顾，可否每月再增加一些生活费，以备将来雇人照料。目前住的平房，没有暖气设备，身患关节炎，冬天不大好过，可否帮助换一套单元楼房。来人听了王乃文的述说，慨然应允。不久，这两件事就妥妥当当地落实了。

渴望统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历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载涛，目睹新中国的飞速发展和辉煌成就，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同时也更加思念羁旅台湾的族人亲友、故旧袍泽，渴望伟大祖国早日得到统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载涛经常有机会参加一些有关党的统一战线的学习讨论会。建国初期，党的统一战线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

在伟大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中，载涛和绝大多数党外人士、民主人士，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探索着，政治思想上不断得到进步，开始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们的热情和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及其他各项事业中去。

按照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载涛自觉



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连续有几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

载涛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他们的归来。他曾参加过全国政协为欢迎徐廷泽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徐廷泽介绍了台湾情况,讲台湾人与大陆人一样渴望早日团聚,他说道:“家在大陆的蒋军官兵更是思念家乡和亲人。老朋友碰到一起,就谈家乡的风景,唱家乡戏。因此,黄梅调到处流行,使人有霸王困于垓下,四面楚歌之感。更多的思乡之客借酒浇愁,酒后悲吟:‘酒逢知己饮,月是故乡明’。”

了解到台湾真实情况的载涛,内心不禁感慨万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毕竟血浓于水啊!在祖国统一的大问题上,连徐廷泽这样的“克难英雄”都不甘落后,足见台湾军政人员的人心向背,大势所趋。

于是,载涛不顾年迈,亲自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发表了对台湾军民的广播讲话。

他在清末曾任训练近卫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民国初年又做过巩威将军,再加之平素颇喜交往,与现在台湾的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各界名流,有着故旧、同仁、朋友的关系。

载涛热情而坦诚地告诉他的朋友们:祖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医治好旧时代的创伤,向着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迈进了。他结合自己及其一家的切身经历和前后变化,说明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安定、自由、平等的新生活。他呼吁自己的朋友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捐弃前嫌,参加到统一祖国的洪流中来,对历史作出交待,为人民做出贡献!

以后,又一件事极大地震动了载涛。

一九六五年七月,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携夫人不远万里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在民革中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载涛有机会与这位前代总统会面叙谈,更加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台湾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



李宗仁即席答词,他说:“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的爱国人士,应该承认并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望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最后统一。”

载涛为李宗仁的话,拍手叫绝。两个经历决然不同的人,如今殊途同归,竟又走到一起,这是因为他们最后选择的道路是一致的。

载涛所选择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充满希望的光明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不仅自己坚定地走到生命的尽头,而且还呼吁和引导家族的其他成员一道走这条路。

这条路越走越宽广,越走队伍越壮大,载涛的心愿没有落空。尽管他本人没有看到这一天,海峡彼岸的亲人——爱新觉罗家族皇室成员中惟一在台湾的赵琪璠,在政府的感召下,历尽艰辛,几经周折,于一九八二年回到了大陆。

赵琪璠是溥仪的四妹夫,三十年代曾与溥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经溥仪指婚,与其四妹金韞嫔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在伪满任溥仪的侍卫官,一九四八年跑到台湾。先是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军训团”,结业后历任中校翻译、上校编审,后转入蒙藏委员会任专员、科长等高级官职。后来尽管官职越升越高,薪俸越长越多,但随着暮年的到来,怀乡思亲之情也越来越强烈。

他和许多去台人员一样,最怕过节,没有亲人团聚,更加感到孤单凄凉。他只得独自躲在寓所里,来个“一醉解千愁”,或是在庭院里踱步,反复吟诵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但也有一次例外。一位老友的妻子病故了,痛不欲生。正值春节前夕,怕他出事,也为了陪伴这个心境一样的人,赵琪璠才应邀前往,陪老友度过了那个痛苦的除夕之夜。

在台湾,思念亲人,渴望回归,是羁旅台湾的祖国大陆人的



共同心愿,也是他们私下常谈的话题。他们在绵绵长夜中寄托情思,在惆怅寂寥里打发岁月。

一次作客朋友家,竟吃到了具有北京家乡风味的炸酱面。他惊喜异常,连忙打听,得知朋友新聘了一位老北京人当厨师,便请这位厨师做了一大罐炸酱,带回家放在冰箱里,足足吃了两个月,最后都有点变味了,还舍不得扔掉。

在台湾的最后几年中,赵琪璠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坐骨神经痛,发病时腿都迈不开步。垂暮之年,重病缠身,连一位亲人也没有,他在病榻上百般无聊,一度想自杀了却残生。安眠药送到嘴边,可想到大陆的亲人,生前不能还归故里,死后还要葬身他乡,深感这是人生多大的憾事啊!他决心活下去,争取回到亲人身边,即使死也要死在故乡的土地上!

在最后的日子里,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是希望的力量,使赵琪璠能够活下来。后来,退休在深山孤庙里闲住的他,忽然收到大陆辗转捎来的家信。

他兴奋异常,“家书抵万金”呵!接着,他接到女儿从东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知道她陪溥杰夫妇来东京治病。他终于下决心与家人会面了。

在有关方面的精心安排下,赵琪璠赶到日本,与他的女儿和溥杰夫妇相聚了。亲人相见,感慨万端,眼前的一切,以及他们所说的事实,使赵琪璠的疑虑和恐惧得以消除。

溥杰诚恳而深沉地说:“共产党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海外各方人士的政策,历来是一致的,就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他们说到做到,不像台湾的宣传那样荒唐可笑。李宗仁从台湾回到大陆,章士钊从大陆去香港,共产党都不加干涉。七叔载涛还曾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欢迎台湾的亲人早日归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接见家族成员,几次问到你,希望你与四妹早日团聚。可惜,总理和七叔却没有看到这一天……”



赵琪璠听到这里,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终于彻底打消了全部疑虑,决心随溥杰一起返回伟大的祖国。

当他步下飞机舷梯时,前来迎接他的老妻、儿孙们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紧紧地把他簇拥在中间。望着阔别三十四年的亲人,赵琪璠老泪横流,百感交集,他喃喃自语:“亲人啊,我可回来了,我可回来了……”

人民政府热情欢迎这个迟归的游子,有关方面安排赵琪璠担任了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结束了三十四年来牵肠挂肚、梦牵魂绕的生活,看到四代同堂、儿孙绕膝的情景,赵琪璠感到此生之愿足矣。

回京后,他专程来到七叔载涛家中,表示了深深的哀悼。

在子侄中,赵琪璠是最听七叔话的。记得载沣六十岁生日前夕,孩子们多在外地,没有表示回京拜寿的意思。还是载涛为了安慰载沣晚年凄凉的心境,再三写信动员外地的孩子们务必回京给老人家拜寿。经过载涛的精心组织,除溥仪外,孩子们都专程赶来北京为载沣拜寿。

他们送上各式各样的寿礼,一般都是四件,取意“四季平安”或“四平八稳”之意。其中,四女婿赵琪璠为了表示敬意,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云鹤翩翩寿最高,苍松郁郁福绵长”,尤其得到载沣的欣赏和好评。

赵琪璠感慨地说:“是祖国的感召和亲人的呼唤,使我能够活下来,能有今天我们全家和全家族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啊!”

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赵琪璠,全然不像初下飞机舷梯时那样步履蹒跚、沉痛虚弱的老者了,而是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晚年得福的惬意,溢于言表。他在短短的日子里,几乎游遍了全北京,参观了不少工厂、学校、农场,每时每刻都有新的见闻和感受。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他连夜疾书,致信台湾当局,明确表示愿在祖国大陆定居,并将其所有存款、房产等全部捐献给台湾的



慈善事业。

赵琪璠晚年对宗教十分感兴趣。他在有关部门的陪伴下，专门考察了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对其建筑、文物等管理，发表了极深的见解。最后，对专程赶来探望他的八旬大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明真说：“我身体和精神尚好，愿在有生之年，为发展祖国的宗教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根据他的建议，雍和宫扩大了展览场所，增加了文物陈列，第一次正式开放了乾隆皇帝为迎接西藏六世班禅进京祝寿、受戒而专修的戒台楼。除受戒时的屏风、宝座等，还有转世活佛所用的器皿、皇帝的朝服朝冠、塞外行围射猎的武器火枪等。这些国宝及珍贵文物，使初来瞻仰的游客大开眼界。

作为新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赵琪璠的特长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春节庆祝活动中，他建议各地恢复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气息的花会、灯会，还提了不少好办法。

技巧繁多的踩高跷，豪放粗犷的舞太狮，优美风趣的扭秧歌，使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重放光彩，也使欢度节日的人们更加欢愉。

赵琪璠携带全家，兴致勃勃地参观灯会。宽敞明亮的大厅，高悬着数百盏花灯，好似银河坠地，火龙下凡，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一座仿照慈禧太后听戏的颐和园大戏台而制作的大型走马灯，由绢人组成了《红娘》、《柜中缘》、《白蛇传》等传统戏剧。随着灯光的闪烁，戏台徐徐转动，他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多精致的灯，多鲜亮的花，多美的场面呵！多年未见的花灯会，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陪同赵琪璠同机归来的溥杰，亲眼看到七叔载涛的心愿终于得到实现，内心既欣喜又感慨。作为今天爱新觉罗家族的长者，他决心继承叔父遗志，带领全家族在爱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诗言志。溥杰在航行途中即兴赋诗一首：

骨肉分离卅四年，



根归落叶理当然。
勛老珍此桑榆景，
爱国奚还论后先。
辗转云归良不易，
同登宝筏济迷川。
辉煌四化蓝图下，
添瓦尤期共拾砖。

光荣归宿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通讯社九月三日发的如下一条消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载涛先生（满族），因病医治无效，于九月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载涛于一九六九年得了偏瘫病之后，就卧床不起了。五儿子、五儿媳、夫人服侍床侧，喂汤喂药，端屎端尿，照顾极为精心周到。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民委，对载涛的病也十分关切。自载涛得病以后，他们就常常派人到家探望，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帮助解决医药。

一九七〇年八月底，身患心脏病、前列腺癌的载涛，突然病情加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快把他送到了人民医院治疗。但终因年迈体衰，多方救治无效，于九月二日零点三分逝世。

载涛卧床期间，经常向家里人念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这么大的恩德，可是我没有做多少工作，我还应该多干点事。现在却成了一个废人……他的亲属们总是安慰他，好好治病，安心休养，将来身体好了还可以为人民干点事。

载涛去世后，“内乱未息”，并没有开追悼会。但是，也举行了简单的悼念仪式。载涛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的时候，不



仅在京的家属乘红旗牌高级轿车随行，国家民委、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派人送葬。当时的民委主任谢扶民主持了仪式，大家向载涛遗体鞠躬、默哀后，即火化了。

载涛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八室。

载涛逝世的当天，周总理就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载涛后事的报告。他同意照此办理，同时批给李先念同志阅示。

载涛，这位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叔父，就这样走完了他漫长、坎坷、不凡的一生。

他作为训练禁卫军大臣和军咨大臣，却未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抵抗而赞成清帝逊位，避免了一场流血大战；

他反对借助外国力量进行复辟活动，更不赞成溥仪去给日本人当“儿皇帝”；

他自甘寂寞，不入政界，宁肯卖王府、卖破烂，也决不出山，多次拒绝伪满洲国、日本人以及蒋介石等的威逼利诱；

他从末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重臣，成为新中国的公民，竭诚为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事业尽心效力，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协商国家大事；

他作为爱新觉罗家族“族长”，关怀、教育、提携自己的族人亲友，使这个濒于灭亡的、具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古老家族，重又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载涛安葬在新中国的革命公墓，他得到了光荣的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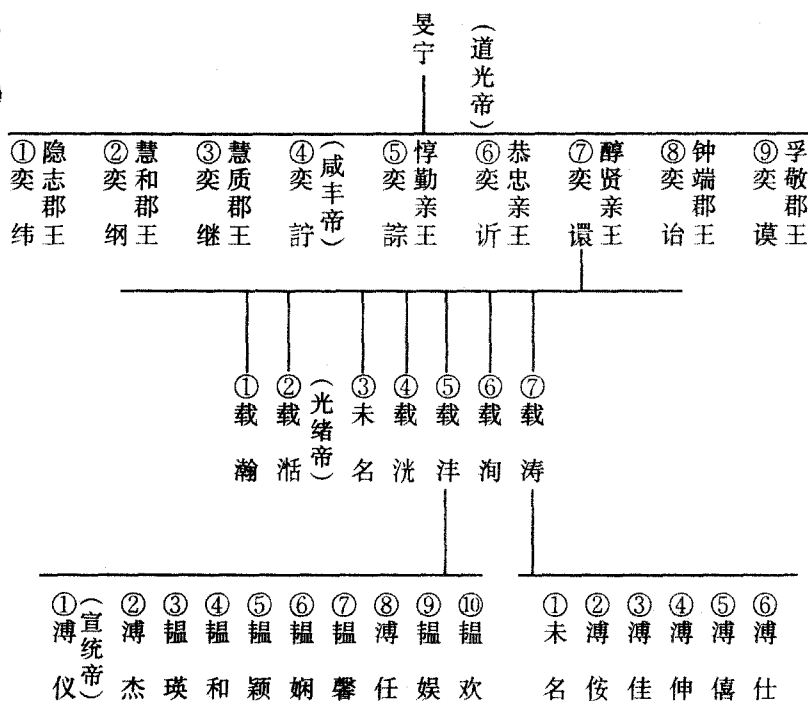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息着我国众多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缔造者、领导者，安放着的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骨灰盒，安放着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的骨灰盒。

载涛——中国末代皇叔，也以他传奇的一生以及对新中国的特殊贡献，获得了历史的应有地位，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載濤家系簡表



皇叔載濤



附 录：

原《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后记

(一九八九年版)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历经五年的思索、挖掘和撰写，才得以成书的。

我们丝毫不敢为成书而庆幸。相反地，倒是愈接近完稿，愈是感到有点不安。这本书，如果说是轶文轶事，但又确实是按照编年的顺序，有一个以史实为依据的基本体系；说是传记，却又有一些重要的活动资料，尽管我们费尽心机，也只能获取一鳞半爪。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终于有了这么一幅概括地勾画载涛这个传奇式人物一生的粗线条的写意画。

应当说，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本全面、真实地介绍载涛先生的专著。而且，我们自以为，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载涛先生生平最重要、最主要的事迹，也还颇能读得下去。因此，不揣冒昧地为这本书取了个名字：《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

完稿之后，我们不禁感慨系之：这本书的产生为什么如此艰难？而我们又偏偏迎难而上，去自讨苦吃呢？这得从头说起。

那是在一九八三年仲夏，我们受朋友之邀，出于对外对台宣传工作上的一些考虑，首先采访了载涛夫人王乃文，撰写了一篇通讯，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由此，我们开始对载涛这个历史人物发生了兴趣。接着，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广泛了解了一些情况，又撰写了一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显要位置上，连续刊出。反映之快，反映之多，反映之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组文章的发表，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一些报刊也争相转载。我们受宠若惊，于是一鼓作气，又连续撰写了第二组有关载涛的文章，陆续见诸报端。



惊奇之余,我们也在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载涛,这位中国末代皇帝的叔父,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清朝重臣,为什么会在今天得到人们的如此“青睐”呢?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逐渐认识到:爱新觉罗·载涛,的确是个不凡的人物。作为清朝醇亲王的嗣子、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的叔父,他身处两个王朝,历经三个朝代。在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岁月中,少年时代享受过皇亲国戚的殊荣;中年时代饱尝过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痛楚;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又枯木逢春,政治上获得了新生,生活上得到了安定,他的才干也重新得到了施展。他曾先后担任过军队、政府、人大、政协等多项重要职务,并竭尽全力,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死而后已。载涛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人。他饱经历史风云的一生,是一部难得的历史教材。

于是,我们决心尽最大努力,把所能找到的有关载涛的事迹都搜集起来,整理成书。为此,我们钻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浩瀚的历史档案中,仔细寻找着载涛的足迹;我们奔波于载涛的领导、同事、袍泽故旧、族人亲友之间,请他们回忆、思考,倾听他们的所见所闻;我们请教一些清史专家、学者,请他们给予支持和指点。经过艰难细致的挖掘,所得到的有价值的史料之多,使得我们喜出望外。于是,我们马不停蹄,赶紧把这些珍贵的材料加工、整理、撰写出来。几经修改,终于写出了现在这本书。

这里,谨向热诚地帮助我们查找资料、提供情况的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及载涛先生的亲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末贵族之生活

载 涛 恽宝惠

上 篇



附

录

本文所谈，为民国前清代贵族之生活状况。兹就所记忆及访问者记录下来，作为资料，以备参考。凡分上、下两篇：上篇专说衣、食、住、行；下篇专说祭礼、丧礼、嫁娶及家庭相见礼节、娱乐习尚。至于当时国家典制，则载于《大清会典》，衣冠制度，各有图说；即《清史稿》亦有舆服志可供参考。既无待于照本誊录，亦无须在此做考据工夫。但叙述一切，期于切合实际，即不免嫌其琐碎。如今朝代改易将五十年，从前家家通晓，习为故常者，及今不谈，则后生晚辈，恐更无人知晓矣。

一、居 住 房 屋

谈到贵族所居住之房屋，自应先从府第说起。清初以功封爵诸王，本早赏有府第，准其世世居住。皇帝生有皇子，在宫内上书房读书，十八岁出学，即令迁居于所赏之府，名曰“分府”。其门庭殿屋，间数多少，尺寸高卑，屋瓦颜色，各有一定之制度，一定之名称，不许稍有僭越。但府第“居住权”是随爵的，其人已故无嗣，则过继之人不论支派远近，一经承袭，即得进府居住。若因事革爵，则本人及其子孙皆不能享有“居住权”，其府第亦归另行承袭之人，并庄园收入，皆为袭爵者所有矣。

兹先述亲王府第，（皆坐北朝南）由东西阿司门行走。对面皆有影壁。阿司门外有斜行（读霞杭）木（古曰行马）、上马石木拴马桩。门内俗称狮子院，因院内正中即宫门，宫门外有石头狮



子也。其阿司门内靠南群房,为护卫等办事轮值休憩之所,及管事处、回事处、庄园处皆排列于是。

正面为宫门,门罩(上有起脊屋顶而下无门窗者曰罩)凡五间(郡王三间)。东西相对有两铺炕。沿北墙有枪架,上竖阿胡卢枪(满语),分左右各若干支,枪头罩以蓝布(古曰檠戟)。并有管项牌,长方形,胪列各项差缺,每项一条,黑色油木边框,用红纸写宋体字,上罩桐油,每年岁暮更换一次,常年悬挂。宫门外有石狮子一对,分东西对峙。宫门左右两旁门曰抱厦门。门扇于新年悬挂门神像,门楣挂红纸挂钱(挂钱为长方形,凿有花纹及满洲字,与门神像皆有木屉,布底,蓝布边)。凡门皆有门联,用白色纸写,与宫内同。以上皆于次年正月十九日摘下。

进抱厦门后,正面大殿,俗称银安殿,亲王五间,郡王三间。亲王大殿及宫门用绿琉璃桶子瓦,郡王则用桶子瓦。东西两配楼。大殿则非有大典礼不开,由东西夹道绕进,是为二殿(三间),东西配房各若干间,为首领太监及使唤太监居住。凡皇子分府,必由宫内将向来供使役之太监常往,而以首领管理之。

二殿后为神殿,两旁为东西配殿。神殿之西间有炕,名为卮字炕,实则“冂”形之砖炕也。西墙挂祭神之乐器多种,为萨满太太跳神之用。西墙、北墙均供有神橱。俟下篇谈祭礼时再详述。东间为亲、郡王及其袭爵人合婚之所。须在此住一个月,始迁回跨院(住房、书房等皆在跨院)。其新婚制度与坤宁宫为帝后合婚之所相同,盖坤宁宫西间向为跳神吃肉之处,仍沿关外风俗也。

神殿后院为遗念殿,专供奉先帝、后曾穿戴之衣帽等物。清代向例,帝、后崩逝后,由继位之皇帝将帝、后曾穿戴过之遗物,颁给各王公大臣,名曰“遗念”。此外则佛堂、祠堂皆在此院内。其礼节亦俟下篇详述。

住房在西跨院,屋内皆用尺六金砖墁地,砖面上罩桐油,砖



地中空。屋外前廊(两明间)皆有炉炕,上盖朱油木板;冬令在内生火,名曰“地炕”,室内温暖适度,而不见灰尘煤气。其唐花如牡丹、碧桃、腊梅、香橼、佛手,罗列满屋,经暖发香,并可经长时间之摆设。

府第正屋之外,各有花园,大约皆在住屋之西,亭台堂榭、山石荷池。园内若欲引进活水,须经特赏,如醇王府花园有恩波亭是也。园中并植各种树木花草,以供退食游赏及宴客之用。如三座桥恭王府之萃锦园,大木仓西郑王府之惠园,是其最著者也。

皇子之外,再谈公主。凡皇后生者。于下嫁时封固伦公主;妃嫔生者封和硕公主。惟恭亲王之女,于同治年间,经慈禧太后抚为己女,因为是后女的关系,特封固伦公主,经恭亲王力辞,始仅封公主,后于光绪季年,乃封固伦荣寿公主。其府第在大佛寺西街,今之助产学校及中医医院是也。

凡公主皆有府第,于下嫁前,在京者,由内务府承旨建造。其夫封为固伦额駙或和硕额駙,与公主同居。公主出自深宫,下嫁之日,皆有护卫官,其跟随下嫁蒙古者,并从事于种植农产粮食、蔬菜等。其跟随之太监、嬷嬷,为服侍其指导礼节之用。至于男女居室,生育子女,本与民间无异,外间或故为神秘之说耳。

公主故后,府第、妆奁、器皿、银钱均应上缴。如奉旨房屋赏给额駙居住,当可居住下去,若即令缴还,则另由内务府拨给官房一所,修葺布置,由额駙移居。公主嫁后,额駙先逝,可以停棺待葬,至公主身故,准其合穴。公主之坟墓曰园寝,与亲、郡王同。

府第之外再谈住宅。除府第有特殊典制外,其他亦许多相同,北京人俗呼为“大宅门”者也。住宅大门对面有影壁一座,门外两旁有上马石两方,其拴马桩则不能与府第一样,大抵于大门两旁墙内暗柱露出一截(于砌墙时,即已预为做好),上钉铁环一个,专为拴马之用。主人出门,车轿已备,随从人等在门前伺候,或来宾乘车轿到门,其跟随仆人,亦各有乘马,皆拴于是处。上马石左右各有风灯一座。其制法下为木架,中隔方板,上为四方形



之灯，四面木框糊纸，上有木顶。从前内燃羊油白蜡一支，后来煤油盛行，亦有改为油灯者。均归宅内“打杂”（即一种杂役）承值。六十年前，街道既无路灯，门前一片漆黑，专赖此风灯照明也。

大门门槛是活安的，朝里一面，有铁环两个，遇有女眷出入，即由打杂两人持环提起，放在一旁，以便乘车进至二门（俗称垂花门）下车，大门内两旁，各有坐凳一条，以备随从暂时歇腿。

门内往西（往东的很少），朝北有群房三间或五间，呼曰“门房”，即传达处，亦等于府第之回事处。世爵、显宦均有经管款项之人，名为“管事的”。其办事之屋，即与门房相连。

进二门后，中为穿堂客厅，所谓穿堂者，正中有绿油屏门四扇，无事不开。仍安设木炕，有炕桌、脚踏等物；横楣上方，例挂御笔匾额及福、寿字，此厅如系三间，则全敞；系五间，则三明两暗。院内转角游廊，廊子正中，东西各有叫扇绿油屏门，每扇有斗方写字。往西或往东，名为跨院，中为书房，凡往来熟习之亲友，或属下司员之回公事者，皆可于此屋接待。

客厅后为正院。由厅屋两旁走抄手游廊进入里院，迎面上房五间（东西另有两耳房），厢房左右各三间，皆有廊子（俗呼为钻山廊子）天阴雨时，可以不走雨地。再由上房火道走入后院，院内大抵为房屋七间，皆无廊子，亦无配房，名曰“后罩房”，多为储物及仆妇等住宿，其男女厕所即分设于此房两边。再后即为更道及后围墙矣。亦有有后门者，但常锁不开。

上房堂屋必为两明间。有后窗，窗前设木炕一，中安炕桌一。炕桌后为炕案，上摆陈设，两边各有靠枕、坐褥。炕下各有脚踏，中间安放灰槽子，或木或磁，盛以筛细之炉灰。后递改为痰桶，其作用同也。在两明间之中间，必有一槽硬木花罩，细雕各种花鸟，有边框下垂至地，名为落地罩。其向南窗引伸，有板隔、栏杆，名为栏杆罩。与栏杆罩相连为前檐炕，进式间（俗呼为里间）前后檐均有炕及炕桌、靠枕、坐褥。炕案则分设在炕之两边，摆陈设、菜盒、饽饽盒，并随手放置什物。其夜眠在接近南窗



之木炕,凡窗皆有护窗板(闸板式)。所用被褥,睡前由仆妇展开,并安放枕头,翌晨起炕,则将被褥折叠成四方形,连同枕头堆积于炕之一隅,盖以线毯,或粗栽绒有虎形之毯(俗称老虎毯)名曰铺盖垛。亦有移置于次间(俗呼为套间),于睡前始抱出者。其衣柜甚高大,并有上置扁木柜(亦两扇开门,中有立柱)而名为顶箱立柜者。其衣箱则存放在次间内。各屋皆有靠背椅,两边有拐栏,或嵌螺钿,或于后背镶大理石心,或雕花纹。以上各种木器,大多数用花梨、紫檀或硬木(即南方所谓红木);若用柴木者,则群嗤其寒俭矣。

凡为贵族,则内外之关防甚严。男仆无事不得进上房,回事者则于窗外高声陈述。厅房以后,完全由使女仆妇承应。先是,各屋皆点红色羊油蜡,名曰蜡灯,后始易以煤油灯,其擦灯罩、加油,皆由打杂每日经办,于将暮时分送各屋。另备点植物油之灯盏,以锡灯擎承之,下有灯盘,而于盏内用灯草两根,以拨灯棍压而拨之。于入睡以前,由仆妇擎至卧室安放。及有电灯,以至普遍使用,而此种油灯、灯盏遂废。

若晚间女眷由上屋至厢房,或由厢房至上屋,及到后院上厕所,皆用“手照子”照路。其制法下为朱油木托、安把,中点羊油蜡,外套以六棱瓜形之纱罩,每格皆画以粗劣之花卉。由仆妇、使女手持(府第则用太监),在前引路,并为照明之用。

二、乘轿车马

上赏紫禁城或西苑门内骑马,及赏坐二人肩舆(王爵而为首席军机大臣,冬季且有赏坐暖轿者),均在宫廷行走,不属本章范围之内。兹仍先从王公说起。所乘之轿,系用四人舁之。轿用绿呢,下围红布,名曰拖泥(满语)。亲、郡王均用紫绊(贝勒、贝子同);有赏用黄纒者,则用黄绊。一品大臣赏用紫纒者,亦得用紫绊。皇子、公主有特赏坐杏黄轿者(如惇王、恭王、醇王及大长公主,即固伦荣寿公主),皆曾赏坐。在府第之外,有存放乘轿之



所,名曰轿屋子,轿夫等皆宿憩于此。出则三班轿夫轮流易肩,后随敞车一辆,名曰班儿车,息肩之轿夫坐焉,大臣之乘轿者同。轿夫群居无事,则养花鸟,练武功(如著名武丑傅小山,即为礼王府轿夫之子)。轿夫常聚赌,轿屋子遂为公开之赌场,若步军統領衙门之官弁等(俗呼曰地面)干涉之,则以乘轿之主人外出无定时,且入朝(俗呼曰上门)每在夜间,此种轿夫随时可以走散,临时聚集匪易,必以赌羁縻之,始免误事,且可借此熬夜。振振有词,无可如何。若因赌肇事,斗殴伤人,地面不能不管,主人亦碍难护庇,则相率以全体罢工为要挟。若另行雇觅,则若辈声息相通,无人应召。因恐误公,遂不得不予迁就。清制,大臣二品以上,年逾六十者,皆准乘轿(惟武职不许)。然往往舍轿而车者,亦畏轿夫之要挟,难于应付也。

次述“方车”,此种车在五十年前已不经见。方车分男、女用两种,男式绿呢帟,红拖泥,两旁开门,下车用脚凳。女式方车,上下皆由前门,并须卸车,用苏拉(满语,即杂役)二人扶车而行。大长公主常乘以进宫,亦即轿车也,车帟红呢制,下御朱轮,车之轴在后挡。凡轿车分前挡、中挡、后挡。普通车轴皆在中挡,适当人坐之下,常觉颠顿。一品大员以上(亦有说二品以上者,待考)始得将车轴移在后挡,平稳多矣。方车之顶为弓背式而出檐,檐之四面缀以流苏(俗称绶子),与轿顶同。两旁有方窗,后面亦有窗,冬以玻璃,夏以纱,冬季里帟用棉,或缀以灰鼠皮。前有帘下垂。驾辕之骡,脊被鞍;鞍之饰,或景泰蓝,或铁嵌以银丝。鞍之中央有木橛一,临驾时,两车夫抬车辕,辕之中央有皮带相连,中有一孔,恰安于木橛之上,而车驾在庭矣。公主之出也,前引三品翎顶者一人为引马。引马之后,并有首领太监一人为顶马,车夫一人在左方,手持衔勒以驱,名曰拉小拴。赏过黄缰者,得用黄骡缰。跟随公主之太监,在后骑马相随。仆妇、使女则分乘小鞍车随行。王公以下人员遇诸途,须下车肃立避之,候舆过始行。



次述“大鞍车”。所谓大鞍车者，不但车之尺寸大，且骠背之鞍隆起。其形制与方车同，但中央无木橛，两辕之间无联属有孔之皮带耳。辕驾后，须将骠之肚带勒紧。其拉小拴亦与方车同。车顶作弓背式，随而下，与车厢前后左右相属，则与方车异。车外帑用蓝呢，下围红拖呢（三品以上乘车皆得用红拖呢）。两旁及后面各一窗，冬以玻璃，夏以纱。夏令则车厢两旁施旁账，而缀以飞檐。前面则有遮阳大帐，以竹竿两根，施朱漆，插于两辕稍后之铁槽内。其轮毂，自奉恩镇国公以上皆朱色，除则紫色。轮之周围镶以铁瓦。按其爵位及赏用紫缰者，骡缰皆得用紫。其引马、跟马，皆有体制，一引二跟，为普通所最习见。车厢外褥下，有长方小车凳，主人上车时，另一车夫抽板凳出，以手按之，可踏以登车。

若小鞍车，则外用蓝布帑子，下无拖呢，车轮油本色。车之尺寸既小（其普通车之进深为三尺六寸），行走灵便，车夫得跨辕，凡司员入署，及商民人等皆可用。

府第、住宅大门外无分层之阶沿石，以青石凿横纹，宽度与门齐，两旁镶平面边石一条，积累斜坡而上。进门拐向前院之处，亦用此种斜坡石道，女眷乘车出入，皆在二门（垂花门）外上下车。或有亲友之女眷来，车至大门外，车夫将驾辕骡卸下，带鞍牵至一旁。由本家打杂、小使双挽车辕，走上门前江擦，再下门内江擦，直至二门，将车落平。车内之女眷，仍盘腿端坐不动，候跟随之仆妇、使女在门外下小鞍车后，进门近前，先由打杂将车帘掀起，女眷始徐徐下车，由仆妇、使女搀扶入内。其出门上车之手续亦同，不过由打杂将车帘放下，两旁驾挽而出，再由车夫牵骡入辕启行而已。

其骑马者，体制与乘车同。贵族之讲究养马者，以及内务府大臣等之争奢竞侈者，于出门时，跟随马匹，今日为枣骝，则全为枣骝，为菊花青者，则全为菊花青，无杂色。拴诸门前马桩，毛色甚觉整齐，途人指而目之，羨为豪举云。



凡府第住宅皆有马厩，大抵在大门斜对过或附近。厩有车棚、马棚，存放车辆，喂饲马骡；并有群房，供车夫居住。王公贵族以祖制相传，须娴骑射，对于乘马一事，幼而习之，长而腾骧，马术好者往往而有，所以皆讲究养马。每年所需草料数目，亦甚可观。后来俸糈既停，庄产清理，生活既感拮据，开支节减，于是所养马匹，亦日形减耗，无复当年豪兴。今则房第住宅，无不易主，马厩随之俱去，皆已另建新屋，几无迹象可寻矣。

三、官、便衣服

朝衣按领（俗乎曰披肩）、高顶朝帽，皆有一定的典制，非朝会大典不用，不在本章范围之内。其官帽上各色顶珠，及文、武补服之鸟兽图案，亦均载在吴荣光所述之《吾学录》内。兹为叙述连贯起见，仍由皇子、亲王叙起，以次则文、武官员。

官帽分凉、秋两种（秋帽即暖帽）；凉帽分白罗胎、万丝胎（藤丝、竹丝）两种，白罗胎者，于穿单、纱袍褂时戴之；万丝胎者，仅于穿亮纱，葛纱袍时戴之。秋帽由呢檐起，而江獭，而熏鼠，而染貂（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始得戴本色貂檐帽）。皇子帽顶，为红绒结顶（其形制如缎小帽上之红算盘疙瘩，而特别加大，并与帽缨联结在一起，与另安顶珠者完全不同）。亲、郡王、贝勒、贝子、奉恩镇国公为红宝石顶（固伦额驸同），由顶珠下端穿两孔，谓之象鼻子眼，而系之于顶座。不入八分辅国公、公、侯、伯顶珠为珊瑚，其系法与宝石顶同。文武一品为珊瑚顶，则以镶金穿钉由顶端贯下，与顶座相连，从一品至九品、未入流皆同。二品为起花珊瑚（即在珊瑚正面镂起一圆寿字），三品为蓝宝石，或蓝色明玻璃，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为砗磲，七品为金顶，八、九品为镂花金顶。

其补服，分平金、缂丝、彩绣、打子、戳纱各种做法。亲、郡王至镇国公，皆龙形圆补。亲、郡王皆四团补，亲王二匹龙、二行龙（可加赏至四匹龙），郡王四行龙，贝勒、贝子、镇同公皆二团补，



附

录

贝勒匹龙,贝子、镇国公皆行龙;不入八分辅国公则方龙补服,公、侯、伯皆四爪正蟒方补(自一品至九品皆方补,皆钉于天青外褂之前后心,其上端约齐胸前二纽至三纽之间,亦有将补服绣于褂上者)。其品级图案,文职一品为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职一品为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其都御史、副都御史、给事中、御史、各省按察使皆服獬豸。

外褂料用江绸(即宁绸)。分天青(俗呼为红青)、元青两种;天青为常服,元青为素常服,遇先帝、后忌辰,及往人家吊祭,皆须著元青褂。盛暑入署办事,及到人家,可不穿外褂,名曰免褂。凡褂两旁亦皆开气,所以便乘马之用。

蟒袍又称花衣,可用彩绣、平金、缂丝等。三品以上为九蟒四爪,四品以下为八蟒,七品以下为五蟒,袍之下端为立水图案。凡太后、皇帝万寿前三日、后四日为花衣期,皆须着用,家庭有喜庆事,亦得用之。外官则初次谒见上宪,必着用。

官服之袍,以天蓝为正色。分二则龙(花纹名词)、五福捧寿、拱璧等暗花纹。皇子、宗室、觉罗(皆皇族)、公主之额驸及子孙,袍下端皆四开气(前后左右皆开衩);满族及汉族等皆前后两开气。其质料亦江绸,分蓝色、枣红、驼色等。暗花纹与外褂同。至明黄色则非特赏不能穿;黄色一种,为皇太子专用,尤非寻常所可妄用矣。其腰间所系之带,夏用凉带(镂空),平时用丝板带,宗室为杏黄色,觉罗为红色,普通皆蓝色。例如蒙古亲、郡王,其奉服与皇族亲、郡王同,固伦额驸与贝子同,而腰带则皆蓝色。

外褂以貂褂为最名贵(王公、满、汉大臣有特赏穿带嚙貂褂者)。自旧历十一月初一日,至来年正月底,凡王公大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除忌辰及斋戒日期外,皆准着用。

凡袍、褂,皮、棉、单、夹、纱按季换用。皮衣又分大毛(狐皮、猢猻孙、金银嵌)、中毛(深灰鼠、灰鼠、银鼠)、小毛(珍珠毛,即羔



羊皮)。凡外褂皆出风,大抵狐皮桶用天马(白色细毛),深灰鼠、灰鼠、银鼠、珍珠毛则用本毛出风,缀于褂之周缘。其羊皮褂则为简便之服,不出风,名曰四不露(读若漏)。凡袍皆有袖头(俗呼为马蹄袖),满语曰挖抗,棉、夹、单则用月白色缎子,纱则用月白实地纱,另加绸里,皮则用水獭、貂或海龙。当时创用皮袖头之意,为冬令关外气候严寒,骑马必须放下袖头护手也。纱袍褂料分实地纱、芝麻纱、亮纱多种,袍料则当有葛纱,亦按季节更换。凡袍皆无立领,除穿纱袍褂不用领子外,其他例用卷领,缀以领衣,如马甲式。其卷领质料,按时更换,或月白色缎子,月白亮绒,或水獭、貂皮等,惟其宜。

尚有一件长衣,似便服而非便服,则衬衣是也。凡穿官服之袍,前后均有开衩,若内无衬衣则露腿,所以必须内穿此衣。大抵皆用浅色调料,或上半截用白布,夏季则用夏布,下半截用月白色绸、实地纱,或芙蓉纱之类,名曰两截大褂。卸去官衣后,居家或外出,皆可服用。现不但无此物,且亦不知有此名称矣。

奉差出外,或随围,应穿纱装。夏季戴两缨帽(帽胎为纬帘)而缀以朱耗(即染红色之犀牛尾),秋帽则与普通官帽同。着方袖对襟马褂,皮马褂出风与外褂同。袍子缺右下襟而联以纽扣,随时可以解开,原意专为乘马便利之用。

五品以上始准挂朝珠。惟翰林院、礼部、太常、光禄、鸿胪等寺、国子监人员则不拘品级,皆许挂用。朝珠即素珠,为一百零八颗,前后面有圆形佛头四枚间隔之(前三后一),并有记捻三褂,适当胸前,男用为左双右单,女用则右双左单,以示区别。后面佛头之下,有一方形背云,背云之下即系坠脚。朝珠质料,以珊瑚为最贵重,非位至极品,不能悬挂,(一品以上凡应穿蟒袍补褂者,可以悬挂)。此外金珀、密腊、桃核(镂空)、草子、沉香、茄楠等,均可随意使用。其记捻则随素珠之质料颜色而改易,大抵每用珊瑚珠及蓝色料珠,其佛头则用翡翠或碧鹏犀(淡红色之宝石,简称碧犀),或绿松石,蓝色料。



凡袍必有腰带，必带“活计”。活计分七件头、九件头等种，其质料为缎子。颜色则分红、蓝、黑、白等，亦以配合时令、用场及袍色所宜。其质料则分缙丝、平金、绣花、戳纱、打子，以工细为贵。男所常用者，如扇套、眼镜盒、表套（用明面表，当时如“播喊”之类）、槟榔荷包、跟头褙裤、钥匙袋、扳指套儿。每件必以“别子”系于腰带之上。尚有长、短两种荷包手巾（狭长式，用白色或浅月白色绸子），随带有铜质别子两个，分镌忠、孝二字，故又曰忠孝带，宫廷召见时，及出外之行装皆用之。此外亦有带旱烟袋荷包（烟叶装在袋内）者，年老留须则带有胡梳套，此两样不在七九件头之内。每件均下垂有缝（颜色配合不拘），惟皇族及公主子孙，皆用杏黄色。女活计则仅用挂镜及荷包。

便服亦分皮、棉、单、夹、纱、罗各种。其皮桶则分细毛，为貂鼠、水獭、青白狐、火狐、金银嵌（读若浅）、狐腿、洋灰鼠、灰鼠、银鼠、珍珠毛，粗毛为宁夏黑紫羔，西、北口羊皮长（俗呼曰麦穗）、短毛。袍面用江绸、绉、缎，不拘颜色，织就花纹，亦不拘式样。单衫（俗呼曰大褂）用春绸、洋绉等。熟罗长衫，多系湖色，有七丝罗、九丝罗疏密之别。袍之素黑绸面者，则为居丧服色，平时不用。另有金貂绒、海虎绒、漳绒、漳缎（后两种皆福建出品），价值颇昂，则为名贵之品。其棉、夹之间，尚有一种，铺以极薄之棉，而以丝线缝成直窄行，名曰实纳（读若拿去声）棉袍。寻常所系腰带，亦可用各色绸子（宗室、觉罗仍用杏黄、红色），名曰搭包，酌带活计。

此外介于宫、便服之间，尚有利用便服之皮、棉袍而外加褂子，则名曰“一裹圆”者。当时长官属员在署办事时，必着公服对谈，或来宾公服到门，主人亦必须以公服接待，临时取其简便，无须易开气带袖头之袍。亦可不带卷领也。

袍之外，则罩以马褂或背心（俗呼曰坎肩），亦分皮、棉、单、夹、纱各种。褂面多用黑色缎，亦有用杂色者。宽袖对襟，与外褂同。另有一种右大襟而缺下襟。后以纽扣联之者，名曰琵琶



襟(背心同)。另有用各色绸,长袖、窄袖口而对襟者,满语曰额龙袋。马褂亦有用密行实纳者。尚有一种名曰夹纱马褂、背心者,内衬以月白色之绫、布,外罩以有花纹之亮纱或铁线纱,在夏令早晚时着之。背心则有式样特异,分前后两片,而在项下两肩处联以一行横纽扣,俗名十三太保者(满语曰巴图鲁坎)。亦有右大襟以黑缎子周身沿边而中镶以鹿皮者,皆非上等登场之衣,姑备一格而已。

女官衣分袍、褂(外褂长度与袍齐,与男官服不同)、氅、衬。褂之补服品级与男同,惟一品以下皆易方而为圆。蟒袍与男同。袍亦用卷领(夏季可用纱质)。两袖有大挖抗(袖头),用月白色。氅衣之袖口,则用花绦白色绣花卷袖,衬衣则用舒袖。凡新妇及青年妇之氅衣,用大红色;中年则藕荷色;如行辈较尊,已有儿媳,则用深紫色;年老或嫠妇,则用深蓝色。红及藕荷色者,皆周身镶大花边,至紫色、蓝色则仅镶右襟一道到底矣。衬衣颜色不拘,大抵用较浅之色。未婚女子不穿袍褂,可用氅、衬,不用卷领,以围脖手绢代之。女便衣,夏季无领子,出则围以手绢。其质料亦分皮、棉、单、夹、纱,颜色惟其宜,以宽、窄花绦子沿边。外加背心,皆右大襟,周边以花绦镶滚。其中年以上,亦于冬间穿马褂,其制法质料与男子同,惟易方袖为窄袖耳。

女子平时梳两把头,从前式样简朴,皆以真发挽于玉或翠之横“扁方”上,并不像后来所谓“大拉翅”者。其穿礼服时,则须戴“钿子”,镶嵌珠宝,累丝(铜)点翠,上端左右满插绒花,并插有垂珠大挑(读上声),或九或七,挂于额前。若欲详其式样,则系剧演《探母》中之萧后所戴,即此物也。

男子穿官衣时,皆着缎靴,分官靴、官快两种。官靴底厚勒长,其所谓内式者,则底形四闪,取其行走安稳;官快则底薄勒短,寻常入署办事,及应酬贺吊皆用之,取其灵便也。其便鞋式样甚多,兹从略。女子须穿高底鞋(俗称花盆底),平时鞋亦厚底,鞋皆家做,无购之市肆者。

四、饮食嗜好

谈到贵族的居家饮食,除尚守满洲旧俗,喜食牛奶制品,如酪乾(音干,以残牛乳熬膏成乾)、奶卷(奶皮子中卷蜜糕及芝麻盐)、乌塔(满语,即软奶子饽饽);及夏令之乳酪(以牛乳加糖,放入冰箱内结成)外,其他食品嗜好,与汉族颇多相同。其按节令所食之物,名曰“应节”,如正月之元宵、端午之五毒饼(其制法有模子,与从前点心铺所售大八件之饽饽同)、粽子、中秋之月饼(分翻毛、酥皮,及自来红、自来白数种)、重阳之花糕。又按花期盛开采撷制成之藤萝饼、玫瑰饼。以上食品,当时最著名之点心铺,如前门大街之正明斋、东四牌楼之芙蓉斋、东四北之瑞芳斋、西单北之毓美斋、地安门外之桂英斋,则府第住宅平日所需,或亲友馈送礼物,悉取给于是,谓他店皆不及也。如值本家或亲友生育子女,则于洗儿日送红糖、鸡蛋、小米、缸炉、槽子糕(即蛋糕)等物。逢腊月初八日,则彼此互送腊八粥,用各种米及果实制成。

每逢年节,必吃煮饽饽(即清水饺子),自全家老幼,以至男、女仆人,皆不例外。每值除夕,除由厨房剁肉拌馅大量预制外,女主及仆妇亦动手包制(此风尚盖沿自宫廷),其用馅以羊肉白菜为主,由元旦至初五,几至顿顿皆吃。今关外居民,每值旧历新年,尚家家制备,投入缸内,使其冻结,名曰冻饺,遇自吃或款待亲友,临时取出煮化,盖三百余年相传之风俗然也。

日常食饽,计分早点、早、晚饭(早饭即午饭);中午点、晚点(中夜宵),兹分述如下。

1. 早点:马蹄烧饼、油炸果子、炸糖果子、螺丝转、粳米粥、甜酱粥(系一种黏性面熬成,味略甜而并无酱,流传在百年以上,现无卖者),或肉馅及冰糖脂油馅(俗呼曰水晶)小包子,以上皆外买,有时自做馄饨、汤面。

2. 早、晚饭:每日米饭、面食各一餐,米饭用荤、素菜数盘佐之。面食或面条,或煮饽饽、单饼(即家常饼)、薄饼。如吃面条,





则以猪肉丁炸酱,猪肉煮汤连肉打卤,加黄花、木耳及鸡蛋。如吃饼,则叫外间熟肉店之九种拼、十一种拼,即将烧鸭、熏鸡、炉肉、酱肉、小肚之类,分格装在锡盘上或捧盒内;由厨房另加炒伙菜(菠菜、细粉、掐菜合炒在一起)、摊黄菜(炒鸡蛋)。吃煮饽饽则猪、羊肉,或三鲜,或素馅。每餐均有冷荤小菜,为下酒之物;并有大米、小米、秫米各粥。并喜食白煮肉(猪肉)及肉汤烫饭,冬季则家家吃羊肉涮锅子,均犹沿关外俗尚,平日所用咸菜、酱菜、糖蒜,皆在地安门外大葫芦购买。如遇接待亲友,则预向饭庄如金鱼胡同之福寿堂、西堂子胡同之源丰堂、石雀胡同之增寿堂、地安门外之庆寿堂等,传唤整桌席面,临时挑送到府或宅,由饭庄之庖人来做,或由本家厨房蒸炒。

3. 中午点:面茶、茶汤、豆汁、大麦米粥、烫面蒸饺、熏鱼火烧(从前串胡同叫卖,名曰熏鱼炸面觔,但鱼及面觔久已不见,或并无此两物,其所卖尚有卤肉、肝、肺、肚之类)、甑儿糕(系用米粉蒸制,粗面加红糖、冰糖屑、瓜子仁、红丝之类,用木制小罐两层,下承以炭火,顷刻即熟,小孩最喜食之,现市内已不见)、豆渣糕(加糖吃)、排叉、馓子、薄脆、糖麻花之类。春令则吃轧合漏、扒糕、凉粉。(以上三种,皆冷食,皆以香油、醋拌之)。

4. 中夜宵:馄饨、元宵、水爆羊肚、糖三角、花卷、馒头,而佐以预储之冷荤。及夜间门前叫卖之硬面饽饽,约分鼓盖、光头、镯子等。

平日消遣,计分烟、茶两项。为一般最普通之嗜好。

烟分水、旱、潮三种及鼻烟。

水烟:用铜水烟袋,以兰州皮丝、青丝、幼丝(以上皆烟叶切制成丝之名称)燃吸之。

旱烟:吸关东烟叶,用乌木杆,杆下安铜锅,其烟袋嘴则翡翠、白玉、皮子玉、象牙皆可。亲友相见,可互敬吸食,且观摩烟袋嘴之品质而欣赏之。

潮烟:烟袋杆较旱烟袋为长,铜锅亦较小,用切细之烟丝,稍



附

录

以水润湿。北京人呼湿为潮，故名曰潮烟。此惟妇女吸食之，烟袋荷包即系于木杆之上。

鼻烟：其烟料为舶来品，由广东贩卖，分金花、素罐两项，烟味各殊，怕潮怕干，不易收藏。用时以手指撮少许而鼻吸之。其装烟之器，名鼻烟壶，式样多种，玉、翠、玛瑙、水晶、套料，制作皆极精（宫廷早即习尚之），上镶翡翠、碧犀、白玉盖，以与壶质之颜色限合为上，另备有小圆烟碟，以烧料、象牙或碎“元瓷”而镶嵌用之。

茶：普通以香片小叶（即花茶，以用拣细之茶叶而以茉莉双熏为贵）为主，有时亦饮用龙井、红茶、普洱茶等。（满蒙多喜用内地所制之茶砖），平时接待亲友，必用盖碗（下有铜、锡茶托，上有瓷盖，或镂银盖），或另有折盅，则习见带耳之茶杯矣。

下 篇

现在所述，为清末贵族之祭礼、丧礼及婚嫁等礼仪。清代贵族在未进关以前，仍一切从旧日习俗，与汉礼当然不同；及至入关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既然经过满汉大臣议定典礼，则不能不研究采取历代通礼，融和制订，这就吸取了一些汉族的礼仪。但是这一类的杂文仪节，不是我们所要考究的，可以略而不谈。即如所谓“贵族”者，则王公宗室，与普通满族就有不同之处；满洲八旗，又与内务府三旗不同，更与蒙古（指京旗的蒙古）、汉军不同。这些礼节，自清末以至民国以后，故家巨族，各守旧习，尚可常常看见。即杠房、喜轿铺、糕点铺（从前称饽饽铺）及饭庄的茶房、当差的男女仆人，亦还是旧日的排场，后来一切从俗，日趋简便；到了现在，可以说五十岁以上的人，还听得见或曾看见过这一类的礼节。近年不但看不见，即有人口说，亦听不懂是怎么回事了。

五、祭 礼



皇
叔
戴
清

满洲祭神的杆子,是用楠木本色,不加任何油饰,竖立在神殿或神堂左方(房向南则杆在东南方)。高约二丈余,顶作尖形,顶之下为方锡斗(木质包锡)。满洲对杆子不敢稍有褻渎,甚至日光所照之杆影,移向任何一方,皆不许人践踏。在举行祭祀以前,要由主妇亲自动手做酒(味甜,如现在之江米酒,但只取其酒)、打糕(即粘糕,现市上讹称“年”糕,上嵌红枣或酒煮熟之黄豆渣),到时行朝祭礼,先在杆子前供糕、酒告祭,在屋内西炕(满洲祭祀皆以西为上)悬黄云缎幔子,内挂佛、关帝(即关羽)、观音菩萨、穆哩罕(满洲神名)画像,贴纸钱三挂(即上篇所说之挂钱);前设红漆木桌,供糕十三盘,酒十三盏,香三碟。主祭及从祭者免冠(冠置于地,花翎朝前)叩首,换酒三次,焚纸钱一挂,挪靠南一个香碟及第三糕盘于北墙板上(满俗称为祖宗板);后请牲人(活猪,呼为黑爷),提耳灌酒,后舁出省之(省读若醒,不说杀)。先取阿穆孙(满语),即猪内脏之脂油《诗经》、《礼记》谓之营(音聊),供于桌之北面;候肉熟,装入大木盘,捧以献,猪首向上,插以尖刀。主祭及从祭者免冠叩首,礼毕,即将已熟之猪肉由庖人治席,阖家同食,或延亲友参加,是为“享胙”。

夕祭(在天黑以后),挂黄幔于北炕,礼节与朝祭同,供糕十一盘,酒十一盏,请牲不取背,献熟时,熄灯,撤火,布幔遮窗,由主妇叩首,谓之“背灯”。礼毕,传呼燃烛,撤幔、分胙,如早祭之礼。

次早,在杆子前上祭。设高桌,摆空碟五个,分别盛米、盐、香、水、空其一,留备供阿穆孙;次即洗杆上之锡斗,斗内原置旧猪骨,燎(谓之升)于屋瓦上。主祭者免冠叩首,凡撒米三次,请牲省之,如昨祭仪。盛牲血以盆,涂杆子尖,随即脱衣(即剥皮)、解节(将肉及骨剔开);俟肉熟,跪切成宽肉丝,盛以碗,配以陈米饭同供。免冠叩首,取碟中物置斗内,以猪喉骨(俗称梭子骨)贯于杆子尖;午后燎骨于斗,燎牲衣(即把带毛之猪皮焚化),礼毕

撤供。

祭杆子第三日,举行换锁(童男、女脖上所挂之锁)。其锁系以绒线制,此尚系昔年旧俗,于生子女后,乞线于亲戚家为之,俗名曰百家锁。线用蓝、白两色,亦有用红黄色的,聚为一束粗线作圈,于线头合处结一疙瘩,结处剪小绸三块缝其上。旧例上次祭时所带,必于下次祭时始换;后来只带三天,即取而藏之,俟下次祭时再带,并亦不向人乞线,但自买线为之。其带锁,男子至授室(即结婚),女子至出嫁,始去之。每换锁时,备有祭果一桌,撤供即由换锁之男女以手撮食之,盖受福之意也。



附
录

六、跳 神

清宫内坤宁宫每日祭神,其礼节不具载,惟有一事足述,坤宁宫西殿西墙正中,悬黄幔一,向不知所供何神。从前恽宝惠任职故宫博物院时,曾掀幔看视,内系男女两布偶像(以布裹棉絮为之,其制法与市上所卖布娃娃相同)。长约尺余,男像有须,作明代装束,红蟒玉带,头戴如舞台上之王帽,而缀以蓝绒球;女则作者姬形,凤冠、红蟒玉带、绿裙,皆不审为何许人。宫内旧执事者呼为“万历妈妈”,当然不是;又有传说是明朝关外总兵官李成梁夫妇,云于清太祖有恩,故世世祀之,每食必祭,以示不忘之意,然亦无确证也。

满洲祭神,预于府第之神殿或住宅之神堂西墙上,悬挂各种乐器,如桦铃、拍板、手鼓、腰铃、三弦、琵琶之类,及带架之大鼓。届祭日,延萨满太太至,先摘帽向神幔叩首。主人设供,献黑爷(即活猪,见前):萨满乃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名太平鼓,系单面,以皮蒙于铁圆圈上,下有把可持),摇头摆腰,跳舞击鼓,名曰“跳神”。于是鼓、铃声并作,鼓以三击为一节。萨满太太诵祝词(作满语),旋诵旋跳;主人并自击手鼓、架鼓,其鼓点之紧慢,随萨满之鼓声为准,萨满太太诵祝词愈快,则跳愈甚,铃鼓愈急,众鼓皆应之,祝将毕,主人叩首神前,持杯酒灌猪耳;猪若

挣跃作声，则阖家皆喜，以为神来领受。其时萨满太太亦作惊醒状，急叩谢神，贺主家受福，乃犒之而去。

七、丧 礼



皇
叔
載
涛

亡人气绝后，即为其穿衣，自裹衣裤以至外穿的官衣，皆预制，用棉不用皮，质料不用缎（避谐音“断子”之意），是为寿衣。按照亡人生前官阶品级，穿蟒袍补褂；其应用朝珠，安放身旁不挂；官帽不拘时令，皆用秋帽（不用皮），放在头旁，不戴花翎（避鸟兽毛入棺之意），靴用绫质朝靴式，底画莲花。有皇帝谕赏陀罗经被（黄绫印红色梵文大悲咒）者，候内务府颁到，盖在尸体之上；亦有因时值炎暑，不及久候，而由丧家自备，及上赏颁到，则蒙于棺盖上者。

先向杠房租用灵床，将尸体停放其上，安在住屋正中，头必向西，是为正寝。妇女亡后，亦按照生前封赠品级穿戴，其停放灵床，与男子同，是为内寝。一面请画手依生前照相或行乐图，追摹真容，是为朝衣大相，以备年终悬挂奉祀。

次预备棺木，满洲沿用之棺，其盖为隆起式，两边斜坡，中安木质大葫芦头，突出于前（亦有能折叠向棺盖上者），挂整貂一具。但亦有用普通式棺木，名曰汉材。殓人手续不具述，大抵与北京之汉俗同。

棺殓后，将灵床撤出，棺停屋之正中，向南，租用架棺两凳，名曰交木。用红缎寸蟒当罩（寸蟒之式，系分若干层排列，体积寸许，略具蟒形，以红缎织就，由杠房租用），将棺遮严。临时由棚铺支搭月台，衔接前廊之阶石，上铺棕毯、地毯，并支搭席棚。棚内安设桌椅，各有桌围、椅披、椅垫，用蓝缎或蓝呢平金绣花，名曰官座，以接待亲友。其棚高大，棚顶正中安彩画玻璃天井，并有于停棺正屋之上支搭席棚，上作屋脊形，名曰起脊棚。亦有时值冬令，在正、厢房游廊外，以蓝布将院落包住，上面有顶，若账幄者；四周有檐，三面有门，悬挂毡帘。



在二门外竖立幡杆(帝后大丧礼节单中名曰丹旒),男左女右。杆上有荷叶形宝盖,中为红缎寸蟒,若大宽飘带下垂,镶黑绒腰。幡长约及丈,另自宝盖缀悬两窄条,无绒腰。幡杆有大红油漆架子,四方形,方柱,金漆柱顶。

二门外备太平杠一份,列于右方,应用之杠夫昼夜伺候,祭时立于杠旁。并陈设椅轿(俗称亮轿)一乘,四人肩绊,轿杆之两端,安放于前后架上。另有驱路(满语)八面,按本人所属某旗旗色,如正红则金红,镶黄则黄色心、周围红火焰形,其式如舞台上龙套所持之长方旗(古谓之帟)而较高大,亦有架子。

大门外立大鼓锣架,鼓帮金漆画黑色花物,人立于凳上敲之;门内号筒、喇叭、锣,随鼓声为节奏,谓之官吹。

月台正中,在堂罩之前,安放坐凳,围以红寸蟒缎,亦名灵床。再前则摆设方桌,将亡人生前所用之匙箸、杯碟、茶碗(带托),及水烟袋等,安放桌上。再前为闷灯,外作亭形,中有门向里,内安灯盏,以油燃点灯草,长明不熄。再前设五供(香炉、烛阡、香筒之类);桌前于地毯上摆设奠池(闷灯、五供、奠池、壶盏均景泰蓝制)。奠酒时,另由穿孝服之两男仆(通称家人)跪于左,执壶盏酌酒,递与奠者,以双手举献后,倾于池内,凡三次,三叩首;若于桌前供有饽饽桌子(亦名满筵)者,则奠池再移于前,前乃铺设拜垫。

兹再略述饽饽桌子之性质、形式。此为满族特有之供品,系由糕点铺承做,下有金漆长方矮桌,层叠而上,凡三节,每节前后左右安放光头饽饽(白糖馅)若干碟,而空其中,最上一层摆干果碟,每碟上插以纸花,发引后,可拆散分送亲友。

每日早晚两祭,名曰供饭(午后一时供果桌)。祭时,将所备之祭筵,预陈于另一桌上,由家人舁上,摆于灵桌之前。并备木墩子四个,分设于祭筵两旁,名曰木兰(满语),陈列熟猪肉两大方,一染红色,一本色;大馒首两盘,每个约重半斤。其从丰者,则改用烧猪一头,烧鸭一对,馒首照样。此项木兰墩子,亦为满



族特有之风俗。每祭由祭主奠爵举哀,从祭者皆随跪举哀;二门外奏乐,椅轿离架,于前后绊中间支轿杆,谓之打杵。曾赏朝马者,亦将马备鞍毡牵入,向外立;所设驱路,有人持起,皆作欲行之势,以象神之归享也。二门、屏门背后之两铜环,各拴皮条一根,长约一尺,祭时及来宾吊祭,皆由家人各手拉皮条启门,人进复阖,撤供则门外一切复旧。

亡人尸体停放后,第一件事即须通知亲友,谓之报丧。用长方白纸条书写,条左端必写有“此条交门上或门房口回”等字,所以避不祥之物达于人前,只囑口曰某人逝世,某日接三而已。丧家一面乃预糊明器如轿马、杠箱之类,于第三日夕间,送往左近空场焚化。亲友凡接有报丧条者,即须往吊,谓之探丧,并于三日夕间往送,有僧众击响器念诵,谓之送三。晚间延僧众作瑜伽焰口仪式,升台诵咒,召亡施食。嗣即规定诵经(名曰讽经)若干棚,分僧、道、番(喇嘛)三种,每三日称为一棚。其讲究面子地位者,则僧必柏林寺或贤良寺(所谓官刹),道必白云观,番必雍和宫。每讽经一棚,应焚纸糊楼库一次(内装金银纸镞),由僧或道,诵经随送(喇嘛击鼓吹号不诵)、亲友亦随之目送焚化,谓之送圣。亦有并两棚为一棚者。发引日期确定后,前一日为伴宿,亦即为领帖之期(受吊之意),是日亦有经及焰口。一切定规后,遂刊印经单,分送亲友。此节与汉族之刊印讣闻,牒列死者封赠赏恤、官阶及子孙服制,人名者不同。接经单后,即可接戚谊之亲疏,交情之厚薄,分别应酬。伴宿之夕,孝家及至亲皆守灵。以上系棺柩在家停放二十一天或多至三十五天之经过。其停放日期之长短,视亡人之爵位行辈而定之。

尸体殓入后,其家属自妻(或夫)、妾、子、女、侄、孙、子媳、侄媳、孙媳等,各遂定制成服,男戴用黑布制官帽,夏戴凉帽壳(即苇连,上缀一小黑算盘疙瘩)。其丧服(通称孝衣)、腰经,均按斩衰以至缌麻,分布质之粗细,及毛边与缝边之别。子之足靴为黑布制,青缘(读沿)条;妇女一律去首饰,摘扁方。妻为夫,服最重,去



耳环。子媳耳环易白银质；侄媳、孙媳易玳瑁质。皆不施脂粉，于发中心挽髻，以小银扁方用发绕之，用二寸宽约二尺长之白布，折叠围额际，至脑后，将垂下之布条挽于发际，供饭时放下。族谊较疏者不去两把头，而将挽发垂下一端编辫；其孝服则用白细布（俗呼曰漂白），蓝挖抗（即袖头），亦不洗去脂粉，不易耳环。

夫为妻，按期服制，缟素二十一日。男子遇亲丧，须解发辫；将辫梢截寸许，谓之截发。自成服之日起，百日不薙发；胞侄或孙则六十日（此与汉族不同，亦较汉人为重）。分男左女右，列跪于堂罩两旁。未适人之女，只持服一年（与汉族不同），除供饭时外不跪。服制最重者，跪白布垫；余用青布垫，谓之跪灵。服制轻者，缟素七日，或仅于灵前穿孝而已。凡来吊之亲友，孝家以漆盘盛白布腰经跪递，谓之递孝，亦有不备者。

发引至茆地或庙宇，除亲、郡王、贝勒例用八十杠夫外，余均用六十四人杠。棺罩一律用大红寸蟒缎，罩上正中有木质金漆顶，例用紫纒者用紫绊；曾赏用黄纒者可用黄绊，余一律红绊。届时舁棺出堂，杠夫用二十四人，至大门外，棺上加罩，抬至巷口，谓之“小请”。至大街始上大杠，换大罩，其所用执事，按品级典制，以幡杆为最前列，用二十四人舁之。大乐、细乐前导，亡人生前、身后所得荣典，如奉旨颁赏某某、赐奠、赐恤、赐祭等，为黄牌红字；其所任官职翎衔，为红地金字。皆高脚牌，一式两块，分两行掬之（亦有将子孙官衔列入者）。次则上赏各物，用黄绸所扎之亭；其他影亭、神主亭等，皆以蓝白色绸扎之，每亭以四人舁之。次则魂轿、椅轿，于棺罩近前，用未成年之童男穿孝，手皆捧盘，上摆各种陈设（均以纸制），口举哀音不绝，名曰小拿。其一品以上执事，照例可用鹰、狗、骆驼，以像出外行猎，不忍处以为死也。小拿之后，为送殡之亲友，分两行，棺前由孝子执幡（男左女右）导引，有服制之晚辈皆从行，棺后孝眷乘轿或车随送，与汉族同。棺后则用后扈十五件，每五件为一组，以湖色绸联缀之，所用枪刀皆木制，亦若豹尾枪之制也。

八、婚 礼

如探得或相准某家之女，可以为子妇，则先托与女家相熟之亲友，为初次之征询；如荷同意，则随便以钗、钏、戒指等物（不拘多少大小）央媒持往，谓之放小定。或本是老亲旧友，则由男家径自求亲，插戴一言为定。亦有如汉族之算八字合婚者。至皇族、贵族之由太后、皇帝指婚，或有由父母相准某家之女，请旨指婚，此不备述。

过此则为放大定。由男家备整身玉如意一柄（亦有用紫檀三镶玉者），以栏杆桌抬往，请全福太太（即有夫、子女之妇人）两位押往女家；并将如意捧进内室，亲置于未来之新妇怀中。

及婚期已定，举行通信，其礼节如汉族之过礼。男家将礼物上抬（栏杆桌），每抬以两人舁之，鼓乐前导，继以猪、羊、鹅、酒、禽畜随之。其羽毛皆略染红色，酒则整坛花雕，外加彩画，数必成双。头抬如意一柄、礼单及通书，内写迎娶吉期，何时上轿，喜神在何方，及在新妇旁应避忌之属相。次为新妇所穿之衣服，所戴之头面、钗钏（均钉在玻璃糊锦匣内），合欢被、褥之里、面，及装新之棉花，并备半斤重之馒头（上印红双喜字）二百个（至少一百个），分作两抬，随同前述之猪、羊、鹅、酒送往女家。

女家妆奁，有带木器（最讲究的是紫檀、花梨，次为硬木），有不带木器者，其丰俭不同，亦称家有无之意。送妆奁在迎娶之前一日，或当日，除沿俗例不陪送刀剪外，必力求周备。其带木器者，则自穿衣镜、衣箱（用香樟木做）、顶箱、立柜、几案、方桌、圆桌、琴桌、炕桌、炕几、罗汉椅、方凳、圆凳等，皆在其列。后来西式家具盛行，亦备沙发、靠椅、小圆桌之类。屋内门帘、窗帘、幔账、铜盆（内扣皂鞋，取同谐之音义），书架、洗脸盆、案上座钟、盆景、帽筒、帽镜、全桌瓷器、大瓷掸瓶——内插鸡毛掸（红油把）及吉庆谷毯等，按类均用红绿绒线缠扎。方桌正中带座大果盘，须装苹果满盘。至手使匙箸，桌上、炕几各物，如新妇梳头之镜箱，





各种瓶罐，化妆品；文房四宝，插红烛之锡铜烛阡（大抵为四川制刻龙凤花纹之方形红烛）及锡油灯一架（内盛香油和蜜，取蜜里调油之意，象征夫妇亲密和美，燃以红头绳，备吉夕点用）、壁间挂钟、挂镜暨字画挂屏之类，无不应有尽有。并将男家送来之被褥里、面及棉花成做齐备，配以枕头，随妆送到男家。

女家临时请送妆亲友四人或八人，随妆送往男家；男家亦预约迎妆亲友，在院中迎候招待，候妆到往屋内搬运陈设，进屋略视即行。妆奁将到时，即由大宾（即媒、妁）二人挈同新婿前往女家，进至上房中间，向上三叩首，不发一言，随即走出登车而回。女家虽由妻父母或尊长衣冠在旁立候，然并不接送，不烟不茶，谓之谢妆。

次即迎娶，男家租备大红呢官轿一乘，八抬，轿窗玻璃上水银，画方龙，裹帏则红缎平金绣花。前导为牛角透明质画双喜字高架灯十六对、二十四对、三十二对不等（满族迎娶，多在夜间，恰合古昏礼之意），后跟戴帽穿靴著外褂之家人四名或八名，手持长杆大藏香一支，官吹、锣鼓、细乐随行吹奏。出发前须候喜房铺设（铺床须请全福太太）齐备，先在院中吹奏各一通，同时由童男一人持大锣一面，在喜房内敲打三声，名曰响房。喜轿随即出发。

新妇于上轿前，例须将头发挽一丫髻（俗称抓髻），带上头绒花（取“富贵荣华”之意），花上并有通草制的人形，如麒麟送子之类。所穿之上轿袄裤，向系絮棉旧衣，不用新制，或男家传代，或借自亲戚本家，既肥且大，且不知已经若干人穿过，以为穿的人愈多、愈旧、愈吉祥也。上轿鞋为蓝布制，鞋端绣双喜字，钉单股带子，系于足胫（俗称腿腕）；其女家所备之鞋，交陪房妈妈带走，俟到男家下地时，始许更换。

于发轿迎娶之时，娶亲太太先乘车到女家，与送亲太太（皆须为全福太太，并属相相宜）为新妇上头，即由娶亲太太将大红绸盖头盖于新妇头面之上，向喜神方向端坐，静候轿到迎娶。于是送亲太太随轿前往女宅。老例新郎须在女家门口坐车上等



候，见喜轿出门，即进门谢亲，后有谢妆之举，此礼遂废。

此时男家已预约定亲友四人或八人，往女宅迎亲，名为娶亲老爷（此称呼是茶房对人普通之称呼，不论其爵位之大小有无）。迨新妇娶回时，由女家将合卺所用之饭碗一对，连筷子两双拴好，由茶房递与某一位亲家老爷（预问明）带回，谓之偷碗，此种滑稽举动，不知出自何典？有何用意？

女家亦预约定亲友四人或八人（视男家来人之数而定），随轿往男宅，名为送亲老爷。其本与男家熟识，座行人情（即道贺送礼）者，另自请安称贺，皆坐于棚内官座，临时烦人相陪，本家并不周旋，候礼成即行。

喜轿一到，临时关门，由送亲者递进喜封启门，以铜钱向上扬撒，名曰满天星，仍由执香之家人前导，轿经过火盆（须将木炭燃炽），盖取兴旺之意。轿在院中落平，其时喜房外间已预设天地神马桌（纸印各种神像，染以极粗劣之彩色），桌上并陈列弓箭、新秤杆（以红纸裹之），即由新郎向轿门射三箭，盖亦驱除邪祟之意；轿夫将轿舁至屋外，紧对屋门。新妇下轿时，皆须脚踩红毡（上轿同）；不令鞋沾地。于是由全福太太搀扶新妇下轿，与新郎同拜天地神马，新妇跨马鞍子（木质金漆，摆在里屋门槛上）进屋，与新郎并坐木炕上，即将幔帐放下，名曰坐帐。少顷再打开，以预备之秤杆，由新郎将盖头挑下，并亲手将新妇头上所戴之绒花摘下，插于喜神方向之窗或墙壁上。两人复在炕上盘腿对坐，喝交杯酒，吃阿什不乌密（羊腿）及子孙饽饽（即清水饺，由女家包制，在男家煮熟）。事毕，新郎退出，新妇遂盘腿坐于炕上，不得随便下地，名曰坐财。大抵娶妇进门，若在前半夜（即亥正以前），则当夜台卺，第二日早晨即可下地；若已届子时，即为第二日，则新郎不得在屋内停留，须另觅宿处，新妇则须坐一夜一天，第二日夜间合卺，第三日晨间下地。

夫妇临睡以前，在炕上对坐，中间扣铜盆，吃长寿面（即切面，亦由女家预备）后同寝。次日新妇下地，开脸、梳头、戴钿子、穿敞



衣,外褂,先往厨房祭灶、佛堂祭神、祠堂祭祖;夫妇同到上房叩见父母、翁姑(中设双椅并坐),谓之行双礼;次分大小,本家及亲戚长辈,请坐受礼,平辈相对请安行礼;小辈向新夫妇请安行礼。礼毕回屋,夫妇对坐炕上,由全福太太将两人长衣之下襟扯搭在一起,中间铺红挖单(即包袱皮),为倒宝瓶。此瓶木质金漆,由喜轿铺租用,预装五谷杂粮,以红绸扎口,届时启瓶倾出(此种风俗,或亦寓预祝丰收之意)。时约近午,女家男女偕来,谓之吃梳头酒,或曰坐筵席。是日男家门首彩绸(红、黄两色)排子,及垂头彩子,皆不拆下。女亲入门,进上房见礼后,皆即在棚内(席棚亦过是日始拆)官座分别序坐;男家设果席相款,敬酒安座,上大菜,沿俗皆不动筷。新郎须按桌磕头,上汤后,即放赏封起席。

次即新妇开箱,谓之开箱礼(此礼满、汉皆同),自翁姑、伯嫂、长亲,皆须备物进献,兄弟、子侄晚辈亦均分别赠给。大抵为尺头[绸缎衣料、鞋、袜、活计(分七件头、九件头,皆装匣)]之类,一切皆由女家预备。丰俭并无规定,其高门大族,人口众多者,则供应尤为烦伙。

次为回门(即归宁),大约择双日子,如结婚后第二、四、六等日,是日新妇须于黎明前登车(俗谓不见婆家瓦,亦极滑稽)回家;新婿则可日上三竿,始著衣冠继往。岳家照例设宴款待,而后双归,归时则又不得迟至日落矣。

其王公府第之迎娶礼节,大同小异,惟应在神殿东间合巹,殿之西间,设备略如坤宁宫之制。次日新妇下地后,一切礼节完毕,即于西间跳神吃肉(详见第二节)。按旧制,婚后应每日跳神,萨满太太亦每日必至,后来礼节从简,仅举行一次而止。夫妇于神殿东间须住满一个月,始回卧室,其女家妆奁,概安置于卧室之内。

九、习尚娱乐

皇子满十八岁出学,由宗人府奏明,奉旨派给差使,其他经过



因袭考试,即可入仕当差,皆为其正当之职务。所学习熟练者,亦皆注重在此。至于公余消遣,原无一定范围,各随其性之所近,或所接近之人,习尚娱乐,各有不同。约而举之,如吟诗唱和,几为一时风气,往往乐此不疲,习画作字,均有研究。溯其原因,则清朝历代皇帝无不注重诗文,讲求翰墨;皇子及近支王公,令在上书房读书,选派翰林官授读,自幼至长,熏陶渐染,自然成为一种习尚。分府、出学以后,仍以吟咏笔墨为传统的习惯,骑射以外,多以此为日课(当然亦有不近此道者,未可概论)。后来有一时期且盛行押诗条之会,其法择任何古人诗句而藏其一二字,别取类似通用之字凡四,连本字并列于条,以待会友猜测。中者按所押款数多寡给酬,并有将整首五律、七律句句全做。其藏韵者为尤难,既须顾及本人之胜负,尤要揣摩押者之心理,一经揭露(须对证古本),相视鼓掌。此外有爱习京剧(遇堂会常登台演唱)音乐、弦索及种花、养鸟、养鸽子、养金鱼,均雇有“把式”,专理其事。骑射本为满洲长技,从前皇帝时常举行蒐猎,其随围者皆皇族、贵族,平日马箭、马枪,皆须熟练。所以每值永定门外娘娘庙(俗称南顶)、东便门内蟠桃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年例开庙之时,皆有跑马组台,加入赛跑者谓之下道。每家各有养马之处,平日喂饲刷洗,备极珍护,以备驰骋临风,博得观众之喝彩。至平日对于衣服之制作形式,饮食之挑样讲究,车马之装饰华美,亦为一般习尚。并有时互约作“叉麻雀”之戏,则为赌博性质。

贵族因所得俸禄,既甚优厚,有庄田者,并有地租收入,所居府第住宅,皆由先人传付。平日养尊处优,不知物力艰难,生活所需,其权付之“管事”。迨民国成立以后,从前所赖以养赡的条件,逐步消失,卖房搬家,已成普遍现象,生活日渐拮据,几致不能自存。北京所谓“车、马、人”者,已无复昔日之景象,数十年来,愈趋没落,其势然也。所幸贵族之后裔子孙,其寄生、依赖之惰习,为环境所迫,亦渐革除。近十年中,受党的领导,教育改造,早已放下架子,劳动生产,学习技艺,各效所长,昔日所谓“公

子哥儿”，除少数自甘堕落者外，顿改旧观。此稿上、下篇所写种种，追忆已成陈迹，但可供研究北京掌故者之参考资料而已。

其附带可述者，当有专为剥削贵族阶级而设之私营企业，其名为“老米碓房”。业此者为山东登莱一带的人，原其性质，不过因由仓上领来俸米，有时须加舂串，仅收取加工手续费而已。后来与管事者勾结分肥。赴仓领米，一切手续皆由碓房代劳，每食所需，随时拉送，应用钱财，亦归其借给，米银折合，莫可究诘，而碓房遂大发其财。号称贵族者，只得坐待其剥削，至俸禄全停，同归于尽，事隔数十年，已少有道及之者，特附记篇末。

（一九六〇年十月）



附
录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 涛



皇
叔
载
涛

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得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绝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

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至于传闻之说，如光绪临终拉着载沣的手，叫他杀袁世凯；又如隆裕面谕载沣，杀袁给先帝报仇等等；载沣生前并没有向我说过，或许是他保密的缘故。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从判断了。

载沣摄政不久，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



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大意就是说袁心存叛逆）。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遂同意善耆等的做法，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不能动朱笔）。其实，这种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不是可以迁延时日、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袁每日上朝，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便只他单身一个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说，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张之洞如何危词耸听，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这从袁的方面来讲，就已因此有了宽转，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等一看，奕劻尚模棱其词，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地说出什么“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力为反对。彼时，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自无可如何，乃将原谕一再修改，措词前紧后松，变为“开缺回籍养病”。纵虎归山，自贻后患，善耆等亦只有付之浩叹而已。

我在此尚要补充几句话。清朝家法最严，尤其是近支王公更不能稍有轨外行动。所以每一代皇帝死亡和继承的时候，从未有过如过去历史上各个朝代所发生的那种变故。当辛亥年冬，丁士源曾问过善耆：“王爷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时候，为什么不帮助摄政王将袁除掉？”善耆说：“你不知道，我们宗族王公，在宫廷内错走一步便是死罪，我虽是御前大臣，怎么敢在宫内乱来。”这段回答，曾见丁自著笔记。这是实在情形。载沣究竟不是皇帝，其不能作断然的处置，此亦原因之一。

袁住在彰德洹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这种报告，善耆曾经给我看过。当辛亥年四月，新组成之内阁（将军机处归并内阁）受各



省咨议局的攻击说：“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失臣民立宪之希望，请另行组织。”于是总协理大臣均奏请辞职。奕劻、那桐、徐世昌的原奏，均在政治官报上发表。所最不可解者，那、徐两人均说，自己才力短绌，从前罢免之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云云（大意如此）。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不足深论；那桐是一个著名圆滑的官僚，何以亦有这样说词？况且其时各省并无特别事故，必须袁出来收拾。他们两人既敢如此说，监国亦居然未加斥责，凡看到官报的人无不诧异。

到了武昌首义，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沅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野心，待时而动。冯国璋、段祺瑞是袁的嫡系心腹大将，亦认为“非官保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沅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其实，彼时除近畿陆军以外，禁卫军是一支新练成的精锐之师，未尝不可一试。但是冯、段已先任为第一、二两军总统，担任前线军事，此两军已为袁所能直接操纵。于是将禁卫军编列第三军，专负保卫京畿之责。我自永平秋操营地赶回北京，内阁总协理大臣已决定如此主张，我亦不便再持异议。及听到前线作战缺乏炮弹应用，我立即派遣禁卫军炮标统带吴金声带领炮队一营，配带应需实弹，专车抢先开往。陆军大臣蔭昌督师南下，过彰德时曾与袁会晤。至于外间传说，徐世昌曾秘密赴彰，往来磋商条件，据我想，袁、徐两人早有默契，似不必再作形式上之会见，且当时亦未听说徐有赴彰之事。

袁世凯既出任内阁总理，于十月十五日（旧历，下同）奉皇太后懿旨，监国摄政王载沅以醇亲王归藩，不预政事。袁于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婪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



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其来源固无从深悉,恐亦不是随便捏造。平日蓄积有如是之巨,真是骇人听闻。又据人说,吴禄贞之得第六镇统制,亦曾化了运动费二万两,其过付为谁,现尚有人能指实。吴是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轻放过,则其他更可想而知。那桐亦是著名大贪污者,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在当时的朝局,已成公开之秘密。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

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平日宠信太监张兰德,言听计从。张亦居然以李莲英自居,器小易盈,惟知聚敛资财。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款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后来他三人皆如愿以偿,各自在家纳福去了。奕劻在天津所买大楼房,即是张兰德的产业。王闿运所著《祺祥纪事》末段说:“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论财货,禅让亦以贿成,举古今不闻之说,公言之而无忤。”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沣对于皇帝退位,是始终不赞成的,但他无权无力,在袁世凯看来,已在无足轻重之列。但因他优柔寡断已贻误于前,到此也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

载 涛



皇
叔
载
涛

清末摄政王载沣监国，命我与毓朗、铁良创建禁卫军，经两年多之筹备始训练成军。辛亥革命起，清廷以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官；民国成立后，禁卫军改编为普通陆军。

禁卫军之创建，起源于载沣出使德国。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德帝国主义以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要求清政府派一亲贵大臣往德谢罪，始准议和。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约签字，载沣以光绪皇帝胞弟身分，被派为头等专使赴德。载沣抵德后，德皇命其胞弟亨利亲王专任招待，并陪同参观军队。载沣因鉴于德皇族之威势及近卫军之精良，特请教于亨利。亨利告以德皇族制度即亲如皇弟、皇子，无不自陆军学校毕业，以至身入联队当兵，由低级军官以至将领，因之，皇族军事力量强大；教以皇室应以揽握兵权、革新武备为第一要着。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亨利衔德皇之命来华，将德皇照片及礼品赠送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载沣奉命招待，二人又谈及创建皇族武装问题，从此，载沣即有模仿德国、实行掌握兵权之意。但因慈禧太后总揽大权，光绪皇帝被囚禁，自己系光绪胞弟，因避嫌疑，不敢提出建立皇族武装之意见。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月，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相继逝世，载沣以摄政王监国，遂立即施行亨利之建议，创建皇族武装之禁卫军。于十二月下诏：禁卫军归监国摄政王统率调遣，命我与贝勒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并规定：所有练兵规划奏请事件，均径行封奏密陈，朱批特准发下，始行录咨陆军部备案，与近畿六镇不同。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正月,训练处开始办公(借用西堂子胡同税务处房屋),奏派溥侗(皇族,镇国将军)、哈汉章(留日士官步兵科)、文华(留日士官炮兵科)、章骞骏(留日士官工兵科)、田献章、徐致善(陆军部司长)为军咨官。及田献章调任步标统带,以麟光(满族、公爵)充军咨官。姚宝来为军械科监督,廷夔为军需科监督(后廷夔辞,以衡永任监督),王金绶为军法科监督,游敬森为军医科监督。按照奏定营制,应编制步队二协,统辖四标;马队一标,计三营;炮队一标,计三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机关枪(原营制称机关炮)一连。先成立步队一标,马队一营,以王廷楨(留日士官骑兵科,曾任陆军第一镇正参谋官)暂充步一标统带,兼马一营管带,并先奏定禁卫军服制图说,如帽章、领章、肩章,皆与普通陆军有区别,并以团鹰为禁卫军标识。

旋于是年三月,有旨调铁良筹备海军,开去禁卫军训练大臣。至次年始续派载掇(皇族,镇国公銜镇国将军)为训练大臣。于新街口嘎嘎胡同购买民房,先将训练处移住,一面计划建筑新楼房,为将来成立军司令处办公之用。

其步队一、二两标,以第一镇正副目为基于日兵,挑选京营八旗及圆明园、健锐营、内外火器营各旗兵入伍。其官长自管带以次,调由第一镇军官考取录用;第三标续亦如之。步一标统带为忠和(陆军大学毕业),二标为崇恩,三标为扎拉芬(陆大)。清朝宗室,向不充兵,特别奏请挑选入伍,与其他兵丁一体待遇。第四标则奏准专赴直隶、山东挑选农家及格壮丁入伍。其四标之统带,则调田献章充任。马标统带为王廷楨,马一营管带为罗虔(留法陆军)、刘嗣荣(留日士官骑兵科)。调马三营目兵补充炮队,将全营目兵选调蒙古马队补充,以锡琨为管带(留日士官骑兵科)。炮标统带为宋玉珍(陆大,原军械科科员)。工程营管带为刘锡龄,刘后升任步四标统带,以于彰充补。辎重营管带为兰芳(陆大,后更名傅桂生)。并成立警察队(即宪兵)一队,队长为李飞鹏;军乐队一队,队长为李士奎。



及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我奉命出洋考察陆军,哈汉章、徐致善均随行,遂以冯耿光(军咨府厅长)、恽宝惠(训练处执事员)署军咨官。我在德国延揽专习麦克沁炮(即机关枪)之留德陆军学生锦铨(后更名张铨)回国担任教练,并制定机关枪操典颁行(前练兵处制定各项操典,独阙机关枪)。

当开始编练军队之际,先暂借用南苑营房。后乃奏明于西郊畅春园旧址建筑全军营房,于校阅成军,始行迁入。并另于京城西安门内旗檀寺地方建立步标更番所,由二标常驻,统带先为应龙翔(留日士官步兵科),后升任河南陆军协统,以管带崇林(后更名索崇仁)升任。于西安门内大光明殿地方建立马营更番所(由马一营常驻),以拱卫禁城及备监国摄政王随时调遣。嗣即成立两协,以良弼(满族爱新觉罗氏,留日士官步兵科,由陆军部司长调任)为第一协统领,王廷桢为第二协统领。良弼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调任军咨使,遗缺以王廷桢调任,并以姚宝来充任第二协统领;姚于宣布共和后辞职,以统带忠和升任。因全军建立,奏请由监国摄政王亲临德胜门外黄寺教场校阅并亲授标旗,时为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距武昌首义,已不足一月矣。

及革命军起,清廷允咨政院之请,实行立宪,宣布十九信条,皇族应解去兵柄。及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据我等奏请,奉旨添派徐世昌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南北停战议和,冯国璋任察哈尔都统,由汉口返京,遂由内阁奏明禁卫军训练成军,应将训练处改设军司令处,奉旨以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官,并令我等妥为交代。溯当训练之时,每官长目兵,均各发给手册,备列遵守规则,平日谆谆告诫,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所以于宣布共和之际,惟知遵奉朝旨,全军帖然,未发生任何事故。

冯国璋接统后,组织军司令处,分设参谋、秘书、副官、军械、军需、军法、军医等处。迨共和成立,按照优待条件,其第八款载:“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而仍由冯任军统。至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冯



出任直隶都督，仍兼统禁卫军。直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冯调任江苏都督后，是年始将禁卫军改编为陆军第十六师，军统名义取消，军司令处结束；以王廷楨任第十六师师长，并任为江宁镇守使，随冯驻宁，十六师军队仍归冯统辖调遣。及冯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八月入京代理大总统职权，十六师与十五师分担公府翊卫。冯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十月卸任，退归私第，及旋河间原籍扫墓，仍拨十六师两连更番担任随护驻守。直至冯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病歿于京师，十六师与冯之关系，始告结束。

当宣布大清皇帝辞位优待条件以后，皇太后等仍暂住居宫内。其神武门、北上门之守卫，仍照旧担任；即于禁卫军改编后，亦仍由十六师步兵第二团任守卫之责。二团团长的先为索崇仁，后为翟殿林（陆大）。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冬，溥仪出宫，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将宫廷移交民国接管，而十六师守卫之任务，始告完毕。

此外尚有特加追述者：（一）禁卫军军队内之非战员，较其他陆军务镇为少，如训练处之书记员裁去后，事务由执事员承办；协、标、营之书记员、书记长全行裁去，由军官兼办；其司书生出缺不补，即由正副目拣充。（二）步队第四标编练新兵，系仿征兵制，派员赴直隶、山东两省，就地挑选身体健壮，略识文字之及格农民入伍，两年退伍，拟逐渐推及河南等省，不用向来招募办法。（三）马队第三营系挑选蒙古族入营训练，三年退伍，遣送回蒙；拟陆续推广，渐及边远，其优秀者送学校，以资深造。此外，军中所用军号，原以传达命令，整肃军容，所以禁卫军只吹奏军号，并不若其他各镇之兼用鼓音；编制内只有司号长、号目、号兵，而无鼓手。此虽小节，亦当记及。

又尚需附记者，则颁发“爵章”是也。我自欧返国，即参酌中外制度，奏请制定爵章，计分五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满、蒙一律）。其式样采取分茅胙土之义，中镶红宝石，四周以嵌

珠之多寡为等差。凡亲王以次任军职者,由禁卫军大臣奏请颁给佩带。及改民国后,政府制定勋位,除大勋位外,由一位至五位均特令颁给。当时完全采用爵章式样,并利用成品,即以禁卫军原存爵章应用,后来绶制,概沿其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皇
叔
載
涛

清代官员品级简表

品 级	文 职	武 职
超 品	和硕亲王 多罗郡王 多罗贝勒 固山贝子 奉恩镇国公 奉恩辅国公 不入八分镇国公 不入八分辅国公 镇国将军 辅国将军 奉国将军 奉恩将军	公爵 侯爵 伯爵 公主额驸
一 品	太师 太傅 太保 内阁大学士 内阁协办大学士 衍圣公(孔氏世袭) 头等出使大臣	子爵(精奇尼哈番) 领侍卫内大臣 銓典卫掌卫事大臣 亲王女额驸
从 一 品	少师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各部院尚书(大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 各地总督	侍卫处内大臣 八旗满蒙汉军都统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 领 各省驻防将军 各省驻防都统 各省提督
二 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男爵(阿思哈哈尼番) 銓典卫銓典使



续表

二品	太子少保 内务府总管大臣 大理院正卿 二等出使大臣	八旗满蒙汉军副都统 前锋统领 护军统领 步军左右翼总兵 陆军统制 海军统领 镇守总兵 各地专城副都统 世子、郡王女额附
从二品	内阁学士 各部院左右侍郎(副大臣) 翰林院掌院学士 各省巡抚 各省布政使 各省民政使	侍卫处散秩大臣 禁卫军及陆军协统
三品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翰林院学士 詹事府詹事 大理寺卿 太常寺卿 上驷院卿 武备院卿 奉宸苑卿 大理院少卿 大清银行正监督 造币总厂正监督 大学堂总监督 三等出使大臣 顺天府府尹 各省按察使(提法使) 各省学政(提学使) 各省交涉使 各省度支使	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 一等侍卫 协办事务侍卫领班 冠军使 指挥使 军咨使 前锋参领 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 火器营翼长 健锐营翼长 守陵翼长 署翼长总管 守陵总管 鸟枪营总 圆明园营总 步军营翼尉 城守尉 包衣护军统领 参将 都司 禁卫军及陆军标统 贝勒女额附



续表

从 三 品	军机处领班章京 光禄寺卿 太仆寺卿 大理院总检察厅厅丞 盐运使	步军营副翼尉 包衣护军参领 包衣骁骑参领 圆明园包衣营总 指挥同知 宣慰使 管带官 游击 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 王府长史 王府一等护卫
四 品	内阁侍读学士 都察院掌印给事中 通政副使 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 大理寺少卿 太仆寺少卿 太常寺少卿 鸿臚寺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医院院使 四品太庙尉 三陵掌关防官 京师高等审判厅厅丞 顺天府府丞 各省道员	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 番) 侍卫班领 二等待卫 云摩使 副护军参领 副前锋参领 副骁骑参领 副鸟枪护军参领 步军协尉 信炮总管 防守尉 指挥金事 贝子女额驸
从 四 品	军机处帮领班章京 翰林院侍读 翰林院侍讲 内阁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 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 知府	城门领 包衣参领 包衣佐领 王公府二等护卫 王公府司礼长 王贝勒府四品典仪



续表

五品	宗人府左右二司理事官 各部郎中 都察院给事中 通政使司参议 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 光禄寺少卿 钦天监监正 翰林院修撰 翰林院秘书郎 太医院左右院判 五品天坛、地坛、社稷坛尉 五品太庙尉 三陵副关防官 顺天府治中 同知 知州	云骑尉(托沙喇哈番) 三等侍卫 銮舆卫治宜正 步军副尉 捕盗步军校 包衣护军校 守陵防御 守备 千户 内外城巡警总厅金事 五品警官 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 额驸
从五品	宗人府副理事官 各部员外郎 都察院监察御史 詹事府司经局洗马 鸿胪寺少卿 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检讨 宗人府副理事官 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 高等检察厅检察官 地方审判厅推事长 大理院看守所所长	四等侍卫 委署参领 王公府三等护卫 王贝勒府五品典仪 守御所千总 护军营内管领
六品	宗人府堂主事、汉主事、经历 各部院主事 都察院经历、都事 乐部神乐署署正 大理寺左右寺丞 詹事府左右春坊中允 太常寺丞 国子监司业	蓝翎侍卫 整仪卫 亲军校 前锋校 骁骑校 护军校 鸟枪护军校 委署步军校

续表

六 品	钦天监左右监副 太医院御医 六品天坛、地坛、社稷坛尉 农工商部一等艺师 六品苑丞 大兴、宛平县知县 通判	护军营副内管领 门千总 营千总 百户 六品警官
从 六 品	詹事府左右春坊赞善 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五官正 州同	銮舆卫整仪尉 内务府六品翎长 卫千总 王公府管领 王公府六品典仪
七 品	内阁典籍、中书 通政史司经历、知事 学部一等书记官 大理寺堂评事 国子监绳愆厅监丞 七品苑丞 七品苑副 皇史宬尉 农工商部二等艺师 儒学府教授 知县 初级审判厅推事	恩骑尉 城门吏 把总 盛京游牧尉 七品荫监 七品警官
从 七 品	内阁中书科中书 詹事府主簿厅主簿 光禄寺典籍厅典籍 光禄寺署丞 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助教 州判	盛京游牧副尉 贝子公府七品典仪
八 品	各部司务厅司务 乐部协律郎 太常寺协律郎 学部二等书记官 法部监医	盛京养息牧左右翼长 八品荫监生 外委千总 八品警官



附录

续表

八品	农工商部一等艺士 大理院录事 国子监学正、学录 钦天监主簿 八品苑丞 八品苑副 府经历 县丞 儒学州学正 儒学县教谕	
从八品	鸿胪寺主簿 翰林院典簿 国子监典簿 乐部左右署丞 太常寺各祠祭署祀丞 太医院八品吏目	副护军校 委署亲军校 委署护军校 委署前鋒校 委署骁骑校 公府八品典仪
九品	乐部司乐 学部三等书记官 钦天监五官监候 钦天监五官司书 国子监九品奉祀官 农工商部二等艺士 九品苑副 府知事 县主簿	包衣护军蓝翎长 外委把总 九品警官
从九品	翰林院待诏 翰林院满孔目 国子监典籍 太常寺司乐 鸿胪寺鸣赞、序班 太医院九品吏目 钦天监刻漏博士 钦天监五官司晨 京师初级审判厅委用录事	额外外委把总



载涛年谱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五月二日,生于北京太平湖畔醇亲王府,为醇贤亲王奕诰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排行第七。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迁往什刹海后海,就读家学。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正月,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赏给头品顶戴并赏戴花翎。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一月,父醇贤亲王奕诰病故。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二月,赏二等镇国将军,以示优异。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正月,晋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五月初九日,嫡母叶赫那拉氏病故。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四月,赏用紫缰。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四月,奉旨过继给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为嗣。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五月廿七日,至塘沽送载沅出使德国。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五月,奉上谕著挑在乾清门行走。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五月,奉旨承继钟端郡王奕诒为嗣,并承袭贝勒。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七月,《辛丑条约》签订。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九月,慈禧令载沅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结婚。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入陆军贵胄学堂,为官费生。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生第一子(次日死),嫡夫人姜佳氏所出。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正月十四日,侄溥仪生于后海醇亲王府。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六月九日,生第二子溥佳,嫡夫人姜佳氏所出。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九日,侄溥仪登极为宣统皇帝,五哥载沅为监国摄政王。年二十一岁。



附

录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病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慈禧病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出任总司稽查大臣。公布加强宫廷门禁的章程。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加封郡王銜。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三日,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开缺袁世凯回原籍。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入法国索米骑兵学校为官费生。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二月,因差使繁重,奉旨开去总司稽查守卫事宜之差。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二月,上慈禧尊谥。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二月,上光绪尊谥庙号。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三月,迁光绪梓宫于西陵。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五月,任管理军咨处事务大臣。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九月,受赏一等第二宝星勋章。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奏准挑选禁卫军兵丁,兼挑闲散宗室。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十一月,葬慈禧于东陵。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赴欧洲考察陆军。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谋杀载沣“银锭桥事件”未遂,加强摄政王保卫。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四月,载涛充专使大臣,赴英国。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九月,资政院开院典礼,通过提议及早行宪。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十月,下诏提前举行国会,并先行内阁,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置海军部,载洵为海军大臣。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受赏郡王爵章。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四月,任内廷行走,因差较繁,不再兼当御前行行走差使。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六月十六日,下令举行永平大操。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陪载沣检阅禁卫军。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任军咨大臣。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上谕著赏穿黄马褂。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上谕开去训练禁卫军大臣之差。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生第三子溥仪,嫡夫人姜佳氏所出。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上谕著准开去军咨大臣一缺。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时二十四岁。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载沣下诏罪己。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载涛罢官。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载沣辞监国摄政王,退归王府。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逊位。

一九一二年九月,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所有从前恩赏府第房地亩,均著加恩赏给作为私产。

一九一四年十月,奉谕旨署理宗人府左宗人。

一九一五年正月,奉谕旨管理宗人府银库事务。

一九一五年正月,因勤奋当差,谕旨赏加一级。

一九一五年二月,奉谕旨暂行佩戴宗人府印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第四子溥仪,嫡夫人姜佳氏所出。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奉谕旨署理宗人府宗令。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称帝。

一九一六年二月,奉谕旨补授宗人府宗令。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拥清室复辟,溥仪第二次登极,为期十二天。时二十九岁。

一九一八年九月,被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授予巩威将军。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奉谕旨朗润园著加恩赏作为私产。

一九二一年二月,奉谕旨著加恩赏穿戴膝貂褂。

一九二二年五月,奉谕旨参与通盘裁并内务府各衙门。

一九二二年十月,玉牒告成,著加恩赏给载涛之子溥仪头品顶戴。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总办溥仪大婚典礼事宜。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奉谕旨著赏穿亲王补服。时三十五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恭办大婚典礼,勤慎周详,恩施赏给御书福字一幅,匾额一方。



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生第五子溥儀,庶夫人周佳氏所出。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驱逐溥儀出紫禁城,废除皇帝尊号,暂住醇王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溥儀逃离北京,移居天津张园。

一九二五年,生母刘佳氏病故。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携家人逃难于天津。时四十一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溥儀赴长春,投向日本人怀抱。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儀第三次登极,任伪“满洲国康德皇帝”。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

一九四〇年,第六子溥仕降生,庶夫人金孝兰所出。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为载沣祝贺六十大寿。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崩溃,溥儀等被捕。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六哥载洵病逝于天津。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列席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六十三岁。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状,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五哥载沣病逝于北京。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经全民普选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六十七岁。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经周恩来总理介绍,受毛泽东主席接见。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赴抚顺战犯管理所探视溥儀。

一九五六年五月,赴广东视察。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

一九五六年,赴四川视察。

一九五六年,任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经李济深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附

录

员会，后任中央委员。时六十九岁。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一九五七年九月，赴吉林视察。

一九五七年九月，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继任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继任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特赦后的溥仪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七十二岁。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总理宴请载涛及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

一九六〇年五月，周恩来总理会见载涛及族人亲友。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总理邀请载涛及家族成员共度除夕。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应邀来华访问的溥杰夫人嵯峨浩一家，载涛陪见。

一九六一年十月，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参加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参加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

一九六三年，赴福建视察。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继任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年八十三岁。

清代中央机关简介



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实际上是专为确保皇族正统和特权而设立的。主要职责是登记皇室人口,编修皇室家谱,办理皇室人员封爵及安排官职,颁发恩赏等事项,并参与审判皇室人员。它设有“空房”以圈禁皇室罪犯,使他们逃避法律的惩办。

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皇家的衣食住行都由它承办。会计皇家财务收支。经手工程营造。管理与考核太监、宫女等。它还掌管审批上三旗的刑狱案件,罪轻的不送刑部。它对下打着给皇家办事的旗号,活动范围广,权力大,涉及各行各业与全国各地,包括江南的织造,塞北的牧放等。所属司处众多,官员多达数千人。

上驷院——专管御用马匹。

武备院——掌管鞍辔、伞盖、帷幕、盔甲等。修造器械,陈设兵仗。凡车驾出入,官员戎装以从。

奉宸苑——管理与修葺皇家园林。

侍卫处——选精锐组成侍卫亲军,随侍警卫皇帝。这些侍卫人员的官阶很高。首领叫“领侍卫内大臣”,一品。其下“内大臣”,从一品;“散秩大臣”,从二品。

銮仪卫(銮舆卫)——专管皇家车舆仪仗。皇帝所用称“卤簿”,按出行目的之不同分为“大驾”、“法驾”、“銮驾”、“骑驾”等。太后和皇后用的称“仪驾”。皇贵妃和贵妃用的称“仪仗”,妃嫔用的称“彩仗”。官员品级很高,首领“掌卫事大臣”一品,“銮仪卫使”二品。宣统朝避溥仪讳改“仪”字为“舆”字。

太医院——医疗机构。首要的是为皇家服务。兼及王公大臣。亦偶至军营、刑狱。其首长太医院“院使”仅为五品官,一九〇九年改为四品。

内阁——在清初原是辅佐皇帝的首要中枢行政机关。其任务是理国政,助诏命,定宪典,议大礼大政等。自一七三〇年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逐渐为军机处所取代。到清末,内阁已变成一个处理日常例行文书、保存档案等的次要单位。



通政使司——收受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核查有无逾期及不合规格等事。经手的工作实是内阁工作的一部分。一九〇二年撤销。

军机处——初设时职权限于军务，故有此名。后来成为日常在皇帝身边值勤，随时召对，皇帝出外巡幸也要跟随前去的“掌军国大政以赞（助）机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参与决定一切军政大事，起着相当于宰相的作用。所以官场和民间习惯上也称军机大臣为“相”。

吏部——掌管文官的任免、考核、升降、赏罚等事项。一九一一年夏改组内阁，设铨叙、制造等局，撤吏部。

户部（度支部）——“掌军国支计，以足邦用”。田地、户口、赋税、财政、俸饷等，都是它主管的业务范围。一九〇六年改设度支部，职掌大致未变，而又有审计公债外款、管理银行、造币厂等事。

礼部（典礼院）——掌管祀典、庆典、军礼、丧礼、接待外宾礼、学校与科举事务等。一九一一年改设典礼院，将原礼部所管的行政事务分别划归各部。

光禄寺——专职为典礼预备筵席。一九〇六年撤销并入礼部。

鸿胪寺——专管朝会、宴会等赞导礼仪。一九〇六年撤并礼部。

乐部——专管为祭祀、朝会等典礼演奏音乐，及审定乐器音乐等事项。

兵部（陆军部）——掌管武职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赏罚，及军事行政事务等。一九〇六年改设陆军部，权力有所加大。

太仆寺——专管牧马事务，在内蒙古有牧厂。一九〇六年撤并陆军部。

军咨府——一九〇七年在陆军部下设军咨处。一九〇九年军咨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一九一一年改为军咨府。相当于参谋总部。

海军部——一九一〇年建。“掌主海军，稽核水师及司令部，以固海疆”。

刑部（法部）——掌管刑罚政令。一九〇六年改设法部。

大理寺（大理院）——平反刑狱机关。“与刑部、都察院称三法司”。一九〇六年改称院。

都察院——监察机关。监察大政的得失，官员的良劣，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等。

工部（农工商部）——主管工政：土木工程、水利工程、船只修造；国家



政令及皇家祀典等所用器物的制作和备办等。一九〇三年曾设商部。一九〇六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设农工商部,分设主管农务、工务、商务的各司。原来工部的有些任务分交其他部门。

理藩院(理藩部)——“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取抚绥,以固邦翰”。实际上是一个管理除满汉以外的民族事务机构,目的在于安抚控制各民族。也管一部分同属国交往的事务。一九〇六年改称部。

翰林院——撰拟祭祀祝文、册封文稿、赐祭祭文、碑文等。纂修实录、史、志。编辑校勘书史。所属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

詹事府——“掌文学侍从”,“经史文章之事”。一九〇六年撤并翰林院。

钦天监——掌管观测天文气象、编制历书等事项。

国子监——掌管国学政令。设六堂为贡生、监生学习之所。一九〇五年撤并学部。

学部——教育行政机关。一九〇五年设,国子监并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掌管外交外贸事务。一八六〇年建。一九〇一年更名外务部。

巡警部(民政部)——公安行政机关。一九〇五年设。一九〇六年改名民政部。

邮传部——一九〇七年设。主管水陆交通及邮电等。

弼德院——“掌参预密勿,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一九一一年设。实为顾问机关。

咨政院——一九〇七年设。实际一九一〇年才正式开院。实为参议机构。

盐政院——一九一一年由督办盐政处改为院,掌主盐政。

后 记

《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一书出版后,受到有关方面领导、专家、学者、载涛亲属及广大读者朋友的大力肯定和热情支持,使我们感到极大的欣慰和鼓舞。

但我们决不敢以此为满足,更不敢因此而陶醉。正像我们在前书的后记中所说的:“我们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把所能找到的有关载涛的事迹都搜集起来,整理出书。”这既反映了那个阶段我们努力的成果;也表明了我们将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的方向;同时也证明,搜集材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一些专家、学者及载涛亲属对此书的肯定,应该说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非是谦辞,而是我们的心里话。实际上,确有一些人给我们来信,或对某些文字提出订正;或提供新的线索、资料;有的甚至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章节的文字修改稿。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深受感动,也使我们更增强了继续搜集、整理载涛事迹的责任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们开始修订这本书。

这次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对原书一些技术性的疏漏和笔误予以订正。

二、以较大篇幅增补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在《载涛家谱》中,也增加了一些材料,为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载涛提供一些粗浅的线索。

三、为适应增补内容的要求,一些章节结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现在,增订本又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敢认为,此书将载涛一生有价值的资料,都搜集起来了,就连我们想到应当搜集的材料,也还未能找到,如载涛在接到毛主席任命



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的任命状后,和接到毛主席给他修房用的两千元稿费后,他给毛主席写的极为珍贵的两封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未见踪影。

我们衷心希望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如有必要和可能,我们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再作修订,通过本书,能够使载涛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更加臻美。

郑怀义 张建设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附 记

近日翻阅旧报,发现与本书有关的两份很有价值的资料:一是清史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潜先生的《有关载涛种种》;一是载涛之侄溥杰先生的修改意见。原来,本书在成书之前,一些篇章于香港《大公报》连载之后,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报》也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作了连载。其间,朱家潜先生对文章中一些细节和表述提出了订正意见,并在《团结报》刊登。溥杰先生也由秘书笔录写了便条,提出了修改意见。对这些意见在成书过程中均认真采纳,作了相应修改。借本书再版机会,将这些资料刊出,以表示对两位先生诚挚的谢意。

郑怀义 张建设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朱家潘先生的《有关载涛种种》



皇
叔
载
涛

《团结报》第 618 号连载《从“皇叔”到全国人大代表爱新觉罗·载涛外传》。因醇亲王奕譞为先相国文端公之受业弟子，载涛先生与愚亦忘年之交，故对于醇邸事略知一二，兹为补正如下：

（一）文中说：“三岁的载涛也被晋封为公爵”。按：载涛先生三岁时，始封为二等镇国将军，而不是“公爵”。

（二）文中说：“溥仪……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载涛这位皇叔也随之……被封为郡王。”按：载涛于光绪二十八年袭贝勒，光绪三十四年加郡王衔，没有实封为郡王。

（三）文中说：“溥仪坐上了皇帝宝座，他的父亲载沣顺理成章晋封为醇贤亲王。”按：载沣在醇亲王奕譞逝世以后即袭封醇亲王，并不是到了宣统元年因儿子坐上宝座才晋封的；并且“醇贤亲王”的“贤”字，是奕譞本人身后的谥号，载沣袭爵是不能连着谥号一起袭的。（朱家潘同志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清史专家）

（载《团结报》第 622 号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七版）

溥杰先生的修改意见

朱家溍的补正是正确的,应改写第一段。

(一)

“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一语,虽然可能是事实,但写出来未免寓有贬意。

(二)

- 1.我未听说过夫人骑马。
- 2.溥侗应为溥侗。
- 3.“提笼架鸟溜后门”是一句轻蔑旗人的语言,不用为佳。

(三)

听先叔对我说,去西扬威胡同住所安排去抚顺的事是彭市长派一位秘书去的,彭本人未去。去抚顺是由公安部一位科长陪去的。



附

录

修订附记



皇
叔
载
涛

一、对本书的修订、充实,目的是希望它能成为一部反映载涛一生比较详实、准确、权威的人物传记。全书共修订、增写达一百多处,新增十三节,增加约九万字。

二、新增的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及内容,对长期流传有误,如涉及慈禧、载沣等人的一些问题作了澄清,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为重点突出载涛在新中国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军界、政府、人大、政协方面参政议政的作用,增写了“策婚起义”、“助出奇书”、“满堂高朋”等。

四、根据史料,用较多笔墨描写周总理对载涛及其家族多次的接见和教诲,生动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宽阔胸怀。

五、为反映一些事态的最新发展,让历史焕发新生,增写了拟议中的一些有关内容,如故宫内建福宫开始举世瞩目的整修、抢救濒临消亡的满语、颐和园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

郑怀义 张建设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北京